大卫的母亲

〔荷兰〕伊福娜·克尔丝 著

林丽萍 译 王福曾 校



大卫的母亲

〔荷兰〕伊福娜·克尔丝　著
林丽萍　译　王福曾　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1 - 0624 号

Yvonne Keuls

The Mother of David's
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MBO, Baarn The Netherlands

本书出版得到了荷兰文学出版和翻译基金会的资助
(Nederlands Literair Produktie – en Vertalingenfonds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卫的母亲/(荷兰)伊福娜·克尔丝著;林丽萍译. 王福曾校 -
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1.7
ISBN 7 - 02 - 003469 - 1

Ⅰ.大… Ⅱ.①克…②林…③王… Ⅲ.长篇小说 - 荷兰 - 现代
Ⅳ.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7846 号

责任编辑:刘引梅
责任校对:刘引梅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大卫的母亲

Dawei De Muqin

〔荷兰〕伊福娜·克尔丝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http://www.rw-cn.com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 18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125 插页 2
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 - 5000
ISBN 7 - 02 - 003469 - 1/I.2636
定价 12.80 元

第　一　章

大儿子出生的时候，我与西蒙结婚才两个月，当时住在娘家。洗澡间就是我做饭的地方，而睡觉，我们一家三口挤在我儿时的睡房里。关于这段时光的回忆，说起来总有点朦胧，只记得大卫没完没了地哭。我们把小宝宝放在两人中间睡，他还是照哭不误。我们抱着他整夜整夜地在屋里转悠，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哭。保健所的一位护士小姐来看过，我妈妈又请来两位医生，还约来过一位儿科大夫。末了，只好送大卫去医院做检查。但是，一切正常，过了两个星期，抱回家来的照旧是那个夜哭郎。

西蒙那时在一所高等技术学校读书，白天在学校里，晚上回家就忙着温习功课。西蒙的父母和我妈妈都接济我们的生活，他们觉得西蒙处境不佳时，就会出面干预。这样西蒙又得回到他父母家去躲清闲，留下我在我妈妈家带着不停哭闹的大卫。只要我抱大卫去遛弯，他就变得又可爱又乖。但是，只要我一停步，他马上又不要命地哭。为此，我就像拴在童车上的发动机，每天要转悠三四个钟头。只有在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才能见上西蒙一面。那时，他疲乏至极，我也让大卫闹得焦躁不安。渐渐地我不大关心西蒙的学业，而他则越来越少地过问大卫的情况。偶尔小宝宝安静下来，我们就抽空赶紧做爱，可总担心，说不定

马上就会哭声大作。慢慢地我就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，现在看来，可以说“打心眼儿里怨”。我怨西蒙，因为他不想让我和小孩搅扰他的生活。怨西蒙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儿子的学业。怨我母亲，因为她把小孩的哭归罪于我，再者，怨这小东西。

一天早上，我给大卫洗澡时，突然浮出了一个念头，直到现在它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我左手托着大卫的小脑袋，下面是水盆，心想：只要往下一放，他就一定小命呜呼。我被这个念头吓坏了，结果我真的失了手，小脑袋滑到水里，刹那间，我呆若木鸡，看着大卫做求生的挣扎。后来，我慌了手脚从水里把他捞了出来，紧紧贴在我的怀里。听到我的叫声，妈妈赶过来，从我怀里接过大卫，利利索索地把一切收拾停当。我木然看着她。时至今日，我恍若还记得那个慢镜头：她抓住大卫两只小脚，让他头朝下。再拍打他的小屁股和后背，好让他把水吐出来。然后，她把他肚子朝下放在毛巾上，再用毛巾给他浑身上下擦，使他暖和过来。大卫仍然在水里挣扎，小手和小脚使劲地踹。我妈妈将他包进小毯子里，紧紧抱着他，手托着他的小脑袋，就这样在房间里来回走动。

“安静些，我的小宝贝，安静些，”她说，“他们这都干了些什么。”

每次，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我都看到大卫的小脑袋。这小脑袋靠近我，再离开我，可我竟无力向他伸出我的手。

“去给他找衣服来，”母亲说，“他现在安静一些了，我要给他穿衣服。去灌一个热水袋来。别这么傻站着，好像不是你的孩子似的。”

我还是一动不动，母亲推了一下我的手臂。

“别傻站着，”她又说一遍。我终于猛醒过来，深吸了一口

气，好像憋了很长时间，才重新吸了一口气。我扭转身，朝洗澡间跑去，烧水灌热水袋。

那天下午，妈妈塞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。

“我看该给他打个电话了，”她说。我完全知道她指的是谁。此人是我妈妈常去请教的催眠疗法医生兼占星师。不过我向他讨教，是后来的事了。

那是大卫快一岁的时候。西蒙开始了实习，搬来同我们一起住。他做了一块板，放在浴缸上，到了晚上我们就把大卫的小床放在板上。但大卫硬是不睡。我们把他包裹好，他躺在床上，一连好几小时声嘶力竭地哭，挣扎着要坐起来。我们俩就对着吵，接着还跟妈妈吵，因为实在想不出辙来对付他。西蒙请来的家庭医生只能耸耸肩，说：

“无能为力,不过,这种小孩还真有。”

应我们的请求，有个儿科医生再次给大卫做了检查，结论是孩子没有任何病。

“小东西总有一天会变好的,”他断言。

但是，我和西蒙等不及那一天，就开始想办法。我们发现大卫能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入睡。所以，晚饭后，就是外面下着倾盆大雨,我们也要给他穿暖了,带着他转悠,直到他睡着了,我们再轻轻把他抱出他的小座椅，不给他脱衣服就放到床上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刚把他从自行车上抱下来，他就醒了。

此时，无论是我还是西蒙都已困乏至极，我真是觉得走投无路了。于是就忙着找妈妈给我的那张小纸条，万般无奈之际，拨通了电话。就在大卫的嚎啕声中，占星师静静听了我的诉说。

“您要我现在就上您那儿去吗?”他问道。

“噢,太好啦,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,”我说。

半小时后，占星师独自来到浴室，坐在大卫的小床边。我和

西蒙六神无主，蜷缩在走廊里。侧耳细听，也许哭声能停息下来？可惜没有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占星师走了出来，双手拥着我们肩膀，拉着我们进了房间。

“请坐，”他说，“我要跟你们说个奥秘。大卫在前世里，还是个幼儿的时候，死于轰炸之中。他受的惊吓太重，恐怕要好长时间才能平复。我们切不可阻止他度过此劫数，我们也办不到，这点你们已经有体会了。我们无法理解他，因为他对于死的恐惧横亘在我们之间。”

我和西蒙哑然。我凭直觉认为，他说的这番话有几分道理，但西蒙的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。

“您要我相信这一套吗？”西蒙问。

占星师摇摇头。

“我说这话是要明明白白告诉您，我何以无法帮助这孩子，说得更确切点，我无能为力。当然我可以使他稍许安静下来，可是，我现在驱走他的恐惧，过后恐惧感还会向他袭来。我已经告诉您了，他正经历此劫，您可以给他爱和安慰，但您不能让他逃脱劫数。”

西蒙送他下楼的时候，我蹑手蹑脚走进浴室，从床上抱起啼哭不止的孩子，紧紧搂在怀里：

“你为什么如此惊恐，有妈妈在，我会安抚你，爱你……”

大卫刚三岁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，叫朱丽叶。在产院，她的摇床就紧贴着我的床，一整天我都提心吊胆地竖着耳朵听：又要哭声大作了吧。到了夜里，送她去婴儿室，早上，每当她回到我身边的时候，我总要仔细端详一番她的小脸蛋。因为我根本就不信护士的答话：“是，她很乖的。”

可朱丽叶确乎是个性情安详的小丫头。回到家里的头一

夜,她一觉睡到天亮,一回也没醒。那时,我们已经搬到旧区,住一套四居室的寓所。西蒙请了假，来帮我度过开头这些日子。他毕了业，已经在一家技术公司干了一年。当年他二十五岁，我二十三岁。再添了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又有了新房子，我们这才蓦然醒悟，噢，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

大卫不再哭了，可又添了新毛病。常常是稍不顺心，他就毫无缘由地大发脾气，倒在地上歇斯底里大发作，撒泼打滚。他手里的玩具要么伤他自己，要么就打别人，或者弄毁他身边所有的东西。惟有我妈妈最有办法，能把他哄得服服帖帖，别的人都让他惹烦了，我和西蒙也很快对他失去了耐心。大卫耗费了我们很多精力，弄得小朱丽叶出生后头一年，就被冷落在一边。到大卫上了幼儿园，我才得到了解脱。大清早把他送到幼儿园，我像一阵轻风自由自在地奔回家，盼望着带朱丽叶共同享受在一起的快乐。我真的不愿意承认，大卫的午间休息是一种打扰。

吵架时第一个吼叫的是西蒙：

“你懂不懂？这孩子把咱们的生活统统都给毁了！什么地方我们都没法带他去，连商店都不成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霸王，我怕他，怕他说不定又会闹出别的什么恶作剧。他真把我弄得神经错乱了,这小鬼头!”

“可他真是个可怜的孩子!’我也嚷了起来。

“很可能是这样,但我已忍无可忍,我已经麻木不仁了,我看不出这孩子有什么可怜的。”

“要找个人来帮帮我们。”

“还不是老一套,说他一切正常。”

“不,要找一个能看透他的人。”

“一定是你妈说的那个术士，还有他那个轰炸的故事，最后‘无能为力’。”

“不,找别人,其他人,肯定有高人。”

“比如说,是谁?”

“我还不知道,可他是个可怜的孩子,我去找人……”

我找到了亨丽艾塔，一个儿童心理学家。她毕业后去美国工作了六年，在一家特殊儿童心理教育中心任过职。此番回荷兰是为了探望父母亲，打算在家呆上个把月，但是，由于父亲突然去世，她就多住了些时日，顺便打算到各亲戚家看望一下。因此，她来到了我母亲家，通过母亲也就结识了我们。我得承认亨丽艾塔从未向我喋喋不休，炫耀她的医学知识。有好几个下午，她像一个好朋友一样，来我家帮着做些家务，逗孩子们玩，到了晚上就跟我和西蒙促膝长谈。而当大卫去上学，朱丽叶睡熟了，我单独面对她的时候，她就不动声色地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，来了解我内心深处的感受。有的时候，我甚至震悚于自己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：

“大卫好像是对我的惩罚。”

“是对你的惩罚?”亨丽艾塔重复了一遍。

“我过去就是一个坏得要命的孩子，没完没了地发脾气，没完没了地折腾我的母亲。”

“折腾你母亲?”

“对，因为我觉得她只关心我的大哥。他出过车祸，但这只能怪他自己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还驾车乱窜。后来他全身瘫痪，在康复中心躺了几个月。”

“康复中心?”

“对。她总往那儿跑,星期六,星期天,甚至在圣诞节的假期也去。我一向孤零零的。有一次，我就朝着她喊：‘难道非摔得粉身碎骨,才能在这个家得到关心吗?’你是知道的,我父亲那时

已另有新欢，住到自己的情人家去了。”

“得到关心？”

“是呀！我那时十七岁，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功课上。我母亲甚至不知道我上哪个年级。有一次有人来我家做客，她说：‘这是我的小女儿,已上四年级了。’我就反唇相讥:‘不,是五年级，我马上就要毕业考试啦。’我老是独自一人，后来上美术学院也是这样。要不，我怎么会嫁给西蒙呢。你说荒唐不：我二十岁，他二十二岁，彼此还不太了解，我们根本就不般配。我早上醒来到浴室去，心想：老天爷，那杯里的另一只牙刷是谁的？我们同床异梦，各有各的想法。怎么回事嘛，我们的牙刷怎么会在一个杯子里呢？”

“你们同床异梦？”

“对。西蒙很自负，他要继续深造，想去代尔福特大学攻读建筑学，他父母则从旁怂恿，推波助澜。钱不成问题，他们可以供他上学。我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这会有什么后果。这个家有大卫，他当然无法安下心来学习。瞧，半年后他又回他父母家去了，而我也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才能见他一面。他同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干系？至于我内心的感受，我简直都没法跟他去谈。”

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“大卫是对我的惩罚，但这也是一种还报机会。说这是对我的惩罚，是因为我自己未曾善待过自己的母亲……而且我还有一块心病，就是前世里轰炸受惊的说法老是挥之不去。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，上辈子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，而大卫则是我的牺牲品。我常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母子二人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也许，这真的是我的还报机会，我说‘惩罚’，指的就是我的还报机会……”

亨丽艾塔让我说出我所有的疑虑，与此同时，她并不操之过急，也不忙着给我出这样那样的好主意。她总是以提问的方式，从我的话中抽出最要害的部分，让我想得更深些，以至于不经她的点拨，我也能慢慢尝试着思考。“大卫就是对我的惩罚”——这个想法演化成更深沉的念头，“也许，大卫就是我还报的机会”。最后，经过许多时日我做出了这种心甘情愿的选择。

我们三人一连聊了好几个晚上，西蒙有点烦了，总是借故躲开,他不来闲谈,却忙着去煮咖啡,打电话,要么就倒头大睡。我冲着他发脾气，可亨丽艾特却做出毫不理会的样子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有一次他故伎重演，伸伸腰，就势往沙发上一倒便闭目养神，我就朝着他大叫：

“你怎么不给我滚蛋？”我嚷了起来，“你要是听着不顺耳,怎么不滚？!”

他照旧平心静气，闭着眼睛躺着。我怒气冲天，随手就抄起手边的一件东西，是一个小花盆，不知为什么我至今还把那个花盆记得真真切切。黄黄的小花球，花瓣上有赤褐色的彩点。这花叫蒲包花。我抡起花盆朝西蒙的头砸去。顿时，花盆里的土弄得满屋子烟尘飞扬。西蒙跳了起来，抓住我，把我摔倒在地。之后，传来嘭嘭两下摔门声，那是前厅的门，还有睡房的门。再过后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死寂无声，我抬起头来。

到处是泥土和小黄花，地上一片狼藉。亨丽艾塔两眼直视前方，她没有参与这场争吵。

“亨丽艾塔！”我叫道，“瞧这些土,到处是土,到处都是……”我失声痛哭，头顶着地爬到亨丽艾塔身边，伏在她的膝上嚎啕不止，完全情不自禁地把我心中的感受一股脑儿倾吐出来。

“他不是胡闹……是个不幸的……孩子……我要救他……

救救我的小大卫……”

亨丽艾塔只是白天来我这儿，因为西蒙不想见她。他只愿和我单独谈，不想有外人掺和。但是，我们只要一谈，马上就相互怪罪和指责，结果总是以争吵和叫骂告终。事后我就气急败坏地上床睡觉，心情糟糕至极，西蒙仍是独自去沙发上睡。显然，再也混不下去了。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亨丽艾塔当时在她母亲家，我见西蒙在收拾他的绘图用具和衣服。过后，他借了他父亲的车，把东西装进去，但没走。他在睡房里闷坐，我就守在孩子们身边，大家都在等着事情的结局。

但是，什么也没发生，我怒不可遏地推开睡房的门。这时只见他坐在床上，双手捂着头，不抬头看我。突然之间，我感觉到他还是那么年轻，他本人也还需要父母亲的照料，还要让父母替他拿主意。

“你走吧，”我说，“如果再回来，希望是你自己的决定，而不是别人把你打发回来，或者叫你回来。”

他站起身。

“我会想办法安排，让你有足够的钱用。”

“在你们家里，钱从来不是问题。”

“兰恩，”他说，接着就哭了。

“我要一个妥善的解决办法，小恩小惠是搪塞不过去的。我才不哭哪，我不想再有一个孩子揪着围裙。”

我声色俱厉，他的淡漠更让我怒火中烧。

“走！”我叫道，“去找你爸爸妈妈吧，到那儿去好好把书念个够！快开溜吧！”

他朝房门走去。因为我站在门口，他必须从我身边走过。猛然间，我觉察到他太可怜了。“西蒙，”我想，“可怜的西蒙，你

比我更难受……”

但愤怒终究压倒了怜悯。

“废物!”我冲着他身后喊。

“我该回去了,兰恩,”亨丽艾塔说,“但是你不能没人帮忙,最好趁我在的这几天帮你找一个。”

“回去?”这回是我在重复发问,但用意不同,我是不想让亨丽艾塔再说下去。“回去？那你什么时候走呢？不是马上吧，不是马上就走吧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月底吗？”

“五天后,我就得走了。”

我即刻盘算了一下。再过五天。亨丽艾塔要推荐一个人帮我，我又得从头到尾说一遍。西蒙把这种人称为“局外人”。不，我不愿意。我已经把所有的事都说完了，不是向亨丽艾塔，而是向我自己。够了。我已经都弄清楚了。

不再踌躇不决了。

“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，”我说，“我自己总会想出办法来。到我真要人帮助的时候，会有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你不就是在需要的时刻出现的吗？”

“我不能强迫你,”她微微一笑,“不过是出个主意罢了。”

我自感更有信心了。

“亨丽艾塔,”我说,“还有五天,我们还可以做许多事。”

“兰恩,这是一件要花费多年心血的事。”

“那我就心甘情愿熬上这些年。我会给你写信，你也回信给我好吗？但我起码可以跟大卫一道苦撑下去。跟西蒙一道，我想还要磨合很久。”

开头那些日子真是艰难极了。倒不是因为西蒙的出走，也

不是因为亨丽艾塔的离去，而是因为我母亲老是来搅扰。一方面她是我的支撑，帮我照料小孩。但另一方面，她总是跟我没完没了地絮叨。她催促我和西蒙“重归于好”，因为，社会容纳不了像我这种遭遇的女人。我不知道我是在对抗社会，还是在对抗把这个社会说得一塌糊涂的母亲。但是，有一点我坚信：我不会被任何人抛弃。尽管违背人之常情，我也不想把这幼稚的婚姻再维持下去。西蒙得走他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每当我踽踽独行，长时间散步的时候，我就反复琢磨我的计划。我要去找西蒙谈谈，提出建立友好关系，以便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。尔后……我考虑再回美术学院去。

我知道我母亲肯定会支持我后面的打算。她总是言过其实地夸奖我的才能。此外，她认为我去上学是一种转机，好启发我“换个想法”，而并不认为这是我“独立生活”的开端。她说不定会提出来，白天帮我带小孩，那样我一方面可以做自己的事，另一方面又能放心地让她去照顾大卫，因此一定会同意她的建议。

我找西蒙谈，但他不理解我，他坚持要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。

“还是照老样子再混下去？”我问，“如果我不怀孕的话，我们会结婚吗？不，西蒙，我受够了，我要去学习，我要抓住这个时机，自食其力。我已经耽误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要弥补回来。这是我惟一能摆脱对大卫的负疚感的机会。我终于想做一个好母亲了，而不会再在执拗的儿子面前束手无策了。因为大卫不是那种坏孩子，他跟我母亲在一起就根本不是那个样子。这就怪我和你，怪我俩了。”

但是，西蒙什么也不懂。他看上去还那么年轻。在他父母家，他总算能睡个安稳觉。可我呢，一直滔滔不绝地讲学院，讲下午四点回家，顺路把大卫接回来，讲逗孩子们玩，哄他们睡觉，

讲晚上我拼命做功课，以求日后好找一份工作来养活我自己和两个孩子。这种种打算里我都没有把他算在内。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。因为我对他已经毫无感情。只有一点稍微让我动心，他还是那么满脸惊奇，还是那么年轻。他有一连串的问题：

“钱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能见两个小家伙？你看，要是我回这儿来,或许,或许你喜欢……？”

我们把一切都做了“临时”安排，惟独只字未提离婚。但在内心深处,我坚定不移地感觉到,这是第一步,瞧吧,妈妈,我可放开手脚啦！我才二十四岁，我才迈出第一步。不错，这是后退的一步，但这至少是我自己走的。此后这十年，我会奋力拼搏，不会再在愤怒和争吵中虚度时光了。

一个像我这种遭际的女人，是不会被社会容纳的。那时是一九六三年，这种事还真的很少见。

我母亲容光焕发。在家里，她居然哼起了小曲，我过去从未听到过。下午四点我从学院回来，她和孩子们都端坐在桌边。裹在旧式暖套里的茶壶已经在蜡烛保暖炉上。孩子们管外婆叫“妈妈”，我觉得这倒也合乎逻辑，她完全有权和我同享这一称谓。我时常悄悄从旁观察她做事，尽量在我记忆里重现她过去的形象：一个遭人遗弃的妇女，以她的悲苦自豪，藐视现实。我越来越惊叹她身上的变化。我为之感到欣慰，为之受到鼓舞。我心目中那个失去了许多关爱的孩子沐浴在温暖之中。我和大卫一样，用骑车时冻僵的双手捧着茶杯。我还想得到比这暖手的温暖更多的温暖。不过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

西蒙想来的时候就来看看。他对孩子们亲切温存，又有耐心。他按照我们达成的默契，对我以朋友相待。我也暗自观察他。一副真正的学生模样，围着长长的毛围巾，可那脸还是老样

子：青春焕发，透着一种好奇的神情。对他父母，他显然想出了一个对策 听其自然,不动声色,慢慢恢复关系,而主要的是 不可间断学业。每当他通过一门考试，他就满面红光，请我出去吃饭。我们坐在一家半暗的餐馆里，这里充斥着一种强作欢颜的气氛。粉红色的蜡烛，粉红色的餐巾，我在餐巾上给西蒙画了一幅素描，他看着那幅惟妙惟肖的头像笑了，并自荐做我的模特儿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今天晚上……”

“今天？”

“对,你母亲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十点来钟吧……”

当然啦，他没做成模特儿。我们立即滚到床上，做起爱来。

“小心,我不想再怀孕。”

“不要紧,我回到你身边来……”

不过他还是听了我的话。感谢上帝，我没怀孕。既定方针：首先要完成学业。

整个一年，我都昏头昏脑，老是跟学院里的朋友们聚饮。升入二年级了，我跟我的孩子们倒都成了我老妈的孩子。那为什么就不能常常和西蒙同床共枕呢？

这情况很快就让我母亲看穿了。她虽然什么也不说，但明显地是在担心。一方面她很高兴，心想我们马上就要“和好如初”了，而另一方面，她又害怕再去过她以往孤身一人的生活。她的言谈举止变得不可捉摸了。她抓住每一个机会来表扬我的进步。

“你画的真像个样了，我的孩子！你要再接再厉,继续学,别

离开学院,要不就太可惜了。”

但是，这丝毫不影响她突如其来地训斥我，只要我没照她的意思管教孩子，她就会训我，她是要趁机表明，只有她才能管教孩子,没有她,就会弄得一塌糊涂。

每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我母亲就让大卫由着性子围着桌子乱蹿。

“唉,他总这样不好好吃饭,”她说。

“小孩不会老在一个地方安静地坐着，以后一切都会好的……”

这孩子一个劲围着桌子转。边跑边把玩具车在我们的背上磨蹭。我母亲带着宽和的微笑容忍着，可我不能。

有一次我发了火。

“大卫,”我说,“淘了半天了,够了。像好孩子那样,坐到椅子上去。”

他非但不坐，反而用小车打我的背。

“大卫!”我叫道,“你给我消停一会儿,坐下!”

我转身对着他,他往后一跳,挑衅地看着我,我一转身,他还是故伎重演。我跳了起来。

“你要打我,我也打你!”

我母亲马上就过来干预：

“来,大卫,到外婆这儿来,我的宝贝,再吃上一口。”

我重新坐下，立即就觉得后脑勺上挨了一击，我气极了，跳起来，打了他一个耳光。大卫咆哮着，耍赖躺在地上。我母亲站起来，隔着桌子一巴掌打在我脸上。

此时我忍无可忍了……我就一股脑儿冲着她发作，一桩桩一件件数落着，有些责备的话还是我过去从未说过的，连我自己也没料到，这些事让我这样愤怒。

“你什么事都跟我作对，你违背我的心愿，还把我当孩子看，可我不愿意。你糟蹋了自己的生活，现在又一门心思来作践我。要是你以前稍微多花点时间关心我，我就不会和西蒙有什么瓜葛……总之，我看还是上夜大学的好，我自己来照顾孩子。”

母亲暴跳如雷。

“真没想到我有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女儿！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付出了一切，你就会坐享其成。还有你们学院里的那些狐朋狗友，那些不知廉耻的小妖精，实在是没想到，我的女儿会堕落到如此地步。”

她抱起大卫，把他紧紧贴在怀里。

“妈妈不可以打人，”他啜泣着。

“当然,妈妈不可以……”

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我转身扑向朱丽叶，把她从小椅子上抱起来。我们俩各抱一个孩子，怀有敌意地面对面站着。突然间，朱丽叶挣脱开我，把小手伸向我的母亲。

“外婆……”她哭了起来。

“噢,上帝,可怜的孩子,”我母亲叫着,“她有点不高兴,到外婆这边来,咱们喝点水。”

她从我腋下抓住朱丽叶，往她那边拽，但是我紧紧抱着女儿不放。

“放开!”我叫道。

两个孩子都扯着嗓门哭叫起来。但我母亲的尖叫声更响：“你算什么母亲！先毁了自己的家，现在又轮到孩子们的头上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跟你爹就是一路货。”

我的天，又扯上我爹了……

我抱着朱丽叶跑出房间，匆匆拿下衣架上的外衣给她披上。要走，但去哪儿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紧紧抱着孩子一溜烟跑到

门外。在走廊里，我把她的小手臂伸进衣袖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自己没穿外衣。我的天呀，现在我可上哪儿去呢？

看到自行车，我就知道西蒙在家里。我按了三次铃。他从我的手里把小孩接过去，又交给祖母。西蒙抓住我的肩膀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大卫怎么啦？”

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婆婆焦急地追问，可我只是摇头：不，不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

“你就不应该把孩子留给她，他们在这儿会更好些，”她朝着西蒙发火。

“让她平静下来，”公公急了，忙插嘴说，“很快就会弄清楚的。”

我抬起头看他，第一次看到他那和蔼可亲的表情。他冲我点点头，于是我就说起来了。

“总之，要想办法。简直没法再跟我母亲呆下去了，”我一五一十说了事情的原委。

西蒙不做声了。婆婆把朱丽叶紧紧抱在怀里。末了，公公心平气和地说：

“现在你马上回家，求你母亲宽恕。你太离谱了。你母亲把孩子们照看得很好，你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反省。你的时间白白丧失了。你已经二十五岁，也该照料自己的孩子了。快别上那个学院了，西蒙会回去和你重归于好的。”

婆婆立即反对：

“没门。西蒙火烧眉毛，马上就要做学位答辩。要是他回去，那一切就鸡飞蛋打了。我们为她付出了一切，她没吃过一丁点的苦头。这个不知好歹的丫头把西蒙的一辈子都给毁了。”

“她先回家去，请求母亲宽恕。”

“这是另一码事，不过，西蒙要在这里完成学业。”

我看着西蒙。他死盯着地板，一言不发。他可真是见鬼了……

“把她送回家去，”公公把汽车钥匙递给西蒙。

“小孩可以留在这里，”婆婆说。

我从她手里夺过朱丽叶，结果这一天我又第二次逃出家门。

“好，我慢慢开，”我听到身后传来西蒙的声音。

“妈妈，”我说。

她带着大卫躺在床上。

“别开灯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他好容易睡着了……”

我双手捂着脸，坐在床边上。

“妈妈，我都糊涂了。”

此刻，我觉得她的手放到我的膝盖上了。

“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”她哭着说，“这真惨透了，孤苦伶仃一个人，你们还有我在帮着呢。你父亲就是这样丢下我和你们的。我从没对你说过，可就在你上小学的时候，那女人就勾搭上他了。”

“妈妈，要说的不是这个。”

“不，正好就是这个。我过去一向都觉得自己太窝囊，到现在还是这样。可现在再加上你，我对你可是尽心尽力了，我明白被抛弃的滋味……”

“妈妈，我没被人抛弃，是我让西蒙离开我们的。我们早就过不到一块儿了。”

她听不进去。

“永远是孤身一人做这做那，永远是孤身一人跑东跑西，现在，我好不容易觉得自己心情好了，我的亲闺女却要把我扫地出门……”

她放声痛哭。

我摸了摸她放在我膝盖上的手。

“好啦,妈妈,闹成这样,我很过意不去。请留下吧……”

她的哭声嘎然而止。

一切还是老样子。

我继续上学，西蒙通过了学位答辩。我们又去那个粉红色餐馆，当夜又像新婚那样做了爱。两个孩子都得过麻疹、水痘和腮腺炎。就在我们庆幸一切病灾都已过去，美好的春日正姗姗走来的时候，朱丽叶得了病毒性感冒。她整整一个星期发高烧，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，无暇照看大卫。有时我留意到，他躺在地上，晒着太阳吃手指头。这倒没引起我的不安，因为他没发烧。我想，他得过那些病后身体当然是虚弱的。有一回医生照例来看朱丽叶,我就请他也看看大卫。没事,暂时还没什么,不过,也不排除这几天会染上流感。

幼儿园的老师来过电话。说大卫突然嗜睡，已有好几天不大正常，老实得过分。我赶紧去接他，立刻就发现他在发烧。瞧，家里又闹流感了。但是，大卫的病情不像朱丽叶。他的温度持续了很长时间，后来急遽下降，过了两天，体温再次升高。大卫躺在床上，形容消瘦，神情疲惫，因为这些天来他只要喝水。又请来一位儿科医生。他也不得要领，但他说，孩子病情很重，不宜滞留在家。我和西蒙就把他裹在被子里送到医院去。

一间玻璃隔离室，小家伙躺在里面，几乎都认不出来了：小脸瘦削，小手和小脚细如枯柴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沉默不语，相拥而行，头一次意识到我们俩人的共同感受：惧怕，令人心寒的惧怕，还有一种苦不堪言的负罪感，令人不寒而栗的负罪感。

“要是他有什么情况,会通知我们吗?”

“现在看来只会渐渐好转……”

“如果夜里来电话呢？……”

“我接……”

我们躺下了，紧紧地相拥，等电话铃响。一天里我们要去两次医院，看来他越来越糟。

“上帝呀,他得什么病了?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们?”

“他们心里也没谱,他们也在密切观察。”

医生把我们叫了去。

“当然,这不是感冒,”他说,“我们碰到了一个极其少见的难题：肺脓肿。今天早晨我们就确诊了。你们可以去看看大卫，只是别惊动他，他在氧气仓里。我们给他的胸腔插上了引流管，好把肺里的积液引出。至少我们现在知道，他得的是什么病，这样才能立即着手治疗。”

“脓肿?引流?”

“这病要紧吗,大夫?”

“是,很重,唉,我们暂时还没有什么办法来安慰你们。”

我们去看大卫。他的脚下挂着一个牌子：强力抗生素——大量给水。

玻璃隔离室，氧气仓，爱子的半昏迷状态，好像大卫距离我们更远了。他还会病多久？他还能支撑多久？他羸弱的身体还能扛多久？我们倒是可以随时去看视。西蒙的父母把朱丽叶带到自己身边。我母亲则常和我们一起去医院。大卫在氧气仓里呆了足足十四天，小腿上密密麻麻满是针孔。似乎他已没有知觉，只是在被针扎痛的时候才哭出声来。

我们刚走进隔离室，我母亲便突有所悟。

“他要死了!”她叫道,“快叫大夫!西蒙,快!”

西蒙回身就去叫护士，叫大夫。我在老远就听到人们吵嚷。我站在小床边。我的大卫，我的孩子……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，我好像置身于事外，好像躺在氧气仓里。一切都已远去，与此同时,我的心里是如此痛苦。大卫,噢,上帝,大卫,我的孩子……

“他憋得喘不上气来,”我母亲嚷了起来,“护士!大夫!你们都跑到哪儿去了！”他们都冲进了隔离室，一个是穿白大褂的，另一个也是穿白大褂的，还有穿白围裙的，白糊糊的一片，我被推到了一边。医生抱起大卫，有个护士拿着从他胸中伸出的小管，另一个托着流进液体的小袋子，三个人就在隔离室的门边挤成了一团。

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况，我透过玻璃墙都看到了。我看见他的胸里涌出一股水流。还看见母亲抓住他的小脚，拍打他的小屁股。同样那张红红的小脸。那股水流到现在才算流完。发生了我打心眼里期待的事。这总算解脱了，这总算解放了，从现在起我们两个都得救了。

医生的种种解释我都没听见。

“大卫现在安静多了,”他说,“我们不能再做穿刺了,很可能在这次发作之后情况会好转。”

“可是,为什么不再做引流?”西蒙问。

“因为他是痰堵塞。大概血压过高所致。”

但是我心里有数。这股水和他的病毫无关联，这是那天灌的水。那水流进婴儿的嘴里，滞留在肺里，滞留在他的命根子里，有五年多之久。今天的病是昨天留下的祸根。后来的惶惶不安，就是我们的罪孽延续下来的深远恶果。

第二章

蜡烛的气味引出了整个故事。

“妈妈，”约欣说，“大卫把屋子弄得乌烟瘴气。连我这儿也觉得憋闷。他总拉上窗帘，没完没了点着蜡烛，我想进去，他就把我轰出来。”

又是大卫。他近来有点什么事，总闭门独处。同学根本就不上门了，他就跟一个叫贝尔纳的往来。这小伙子十八岁，是我们的街坊，住得不远。

“贝尔纳还上着学吗？”我有一次问。

“上不上学有什么区别？”

“怎么，问问都不行吗？”

“你少烦我。”

约欣拽了拽我的手。

“妈，去跟他讲，”她求我，“我受不了这股臭味。”

我轻轻推开门。大卫没发现，他低着头坐在褥子上，床搬到地下室去了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蜡烛。屋里连课本的影子都没有，放的是弗兰科·扎巴[1]的音乐。那种感觉再次袭来：有什么

①美国著名的摇滚乐手，吉他演奏家。

东西不对头，可究竟是什么呢？

“大卫，”我叫他，“大卫。”

他慢慢地抬起头，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。

“大卫，来，咱们到楼下去，想喝点什么吗？”

“喝点？”

“对，跟我来。”

“不，我在听音乐嘛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把窗帘拉开？”

“我就想拉上窗帘。小声点，我听音乐呢。”他把弗兰科·扎巴的音乐放大了音量。

“你就再别点蜡烛了，屋里的味儿太难闻，”我大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他嘟囔着，可是一转头又全神贯注听音乐去了。“够了，没什么好商量的了。”

这孩子真难对付，我想，还好，这只是个苗头。

“也许是近一年来他发育太快了，”西蒙说，“他不再和同班同学联系，自我封闭了。我想这会过去的。可就是那个贝尔纳我真不喜欢。你能不能让他离咱们远点？”

我觉得这事太棘手。离远点？谈何容易，再说……

“还是让他到家里来玩，我好歹也能监视着点。”

然而，什么线索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什么也不干，就是坐在褥子上抽烟，把窗帘严严实实拉上。音乐开到最大音量。大卫不时到厨房去，从冰箱里给贝尔纳拿啤酒，自己喝可乐。

医生也是这个意见：

“去年这一年他长得太快了。我倒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得了。你试试，劝他多运动，好好调理他的饮食，督促他学习。”

首先，我们接受这最后一点建议，决定去找大卫的班主任。

“我很高兴你们自己来了,”他说,“否则我也会请你们过来,因为你们儿子的学业每况愈下。最近一个月以来，简直就是门门功课都不及格。上课也心不在焉，懒洋洋的，我们真不知道他怎么了。照这样下去，他恐怕升不到四年级。当然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他毕竟才十五岁。”

“过两个月就十六了,”我指出,“再说他很聪明,根本不可能留级。”

“眼下只能说是成绩下降。也许你们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?父母关系不睦,这也是常情。”

是呀，父母之间确实失和。那时候我才三十五岁，守在家里看孩子。大卫十五岁，朱丽叶十二岁，约欣八岁，勃朗麦七岁。后来，上帝保佑，就靠避孕药片了。我们只有两段和美的日子。大卫生病的时候,我们就决定,大卫病愈之后,我们一切‘从头开始”。第一件事就是带孩子们去度假。林中小屋近旁有个游泳池，把孩子们放在后座上，骑自行车兜风。我们一回来，西蒙的父母就说：我们给你们在代尔福特买一套房子，这样西蒙至少能安下心来把书读完。我们夫妇两个像是受宠若惊的孩子，欣然接受这一善举。有空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自己动手做这做那，画些东西，我一点也不后悔自己退学。可是，刚有一点点不愉快，我们马上就失和了。西蒙有两次考试不及格，医生建议我休息个把月，因为我有了身孕。我的母亲又过来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还是没完没了地抱怨和责备，因为没能跟着我们搬过来，她一直耿耿于怀。我坐在床上火冒三丈，西蒙也在书房里生闷气。大卫就赶紧抓住机会拉拢外祖母。才过六个星期，刚从医院回来时他那文文静静的乖孩子样儿，连影子都没了。

我母亲又回她自己的家去了，于是从这一刻起，我们就无休

无止地吵架，直到勃朗麦一岁，几乎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西蒙终于拿到了文凭，在东部的一个设计所谋了个差事。到一九六八年，我们就搬到那里去了。

很大的一座房子,有个花园,是个僻静的地方,车也少,我和西蒙都心满意足。第二个和睦时期的开头，对大卫也有直接的影响。他参加了足球俱乐部，不费吹灰之力就结交了一批朋友。西蒙有了工作，朱丽叶进了芭蕾舞学校，再就是大卫参加了足球俱乐部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朋友圈子。年轻的工程师一家是从西部来的，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形象，我们也很为我们这种身份高兴。常有一些“小型欢宴”，我们每次都被邀请。我整天看孩子，忙大的，照顾小的，洗衣服，打扫房间，买东西。我竭尽全力给人以好印象，重要的是让各家愿意接纳我们。有时我上阁楼去，我的绘画用具放在那里。只要置身于阁楼里，我就再次找回了自我。我毫无牵挂，什么人都不去想，我不必让自己去扮演什么角色，我好像与我的画融合在一起，真正体会到此时此刻我才算活得像个样子。

在这间小阁楼上，我也和大卫度过了一段非常和谐的时光。他是惟一时不时上楼来看我的人。起初他只是默默看着，后来就小心翼翼去动那些画笔。接着我们就相视而笑。他打开自己的图画本，想给我画张像。和我一样，大卫天生就对色彩敏感，对轮廓和材料敏感。

“大卫,”有一回我说,“你千万要抓住生活里出现的短暂的灵感。”

他平心静气地还在画他的画，但显然等着我说下去。

“你知道，人在一生中只有一次恍然大悟，这个瞬间是绝无仅有的，这之后他可能会给自己选择另一条道路。”

“你想过要当画家吗?”他问。

“我就是画家,只不过……只不过我还没真成画家。”

“那我是画家吗?”

“你是画家,大卫。”

“我能当画家吗?”

“我不知道，这取决于好多因素……取决于你恍然大悟的那一瞬间，取决于你所在的环境……当然还取决于你自己的毅力。我也有过这样一个瞬间，我当时就想发掘我的全部才华，到学院去，学会独立创作……但是，我受环境的约束，当然，我也害怕。发掘自己的才华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朝哪里走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了。”

“那我有没有才华,妈?”

“你要明白,大卫,随便什么人都有他的特长,问题是看他怎么利用他的才华。”

有的时候，大卫不言不语地画画，后来就叹口气：

“妈妈,在这个地方,在楼上,我们就完全是另一种人,不像在楼下,是吗?”

我们搬回海牙的时候，我的母亲美滋滋的，快活极了。

西蒙和他的一个同事在贝诺登豪特开了一家建筑设计所。像每个殷实之家一样，我们买了一幢尖顶的房子，有一个大花园，大海近在咫尺。我们冒了很大的风险，借了一大笔贷款，那抵押苛刻得惊人。我们那条街上的许多人家都爱攀比，比房子的阔绰，比烧烤架和花园摆设的考究，我们也不甘落后。可是这些人家里却总是闹穷，为了钱争吵不休，到了买内衣的时候最会穷算计。有半年的时光，我们在这里也交了一批朋友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就卷进了孩子们的学校生活。大卫升到中学三年级，西蒙还成了家长委员会的委员。朱丽叶和约欣则分别上了小学五年级和一年级。就像是必然结果，我也成了家长委员会的成员。

对于我们这个兴旺的家庭来说，美中不足的就是还没有加入网球俱乐部了。但是，这事很快就办到了，经过朋友介绍，我们加入了俱乐部，甚至不需要推选。

我们心满意足。能够高枕无忧，不受烦心事的侵扰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凡事都顺顺当当，我呢，也就很少再到阁楼的画室去，不再去琢磨什么是真正的生活。

可是大卫常上楼去。让西蒙不高兴的是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到素描和油画上，而对学校和他参加的俱乐部却不大感兴趣。有一天，天色晴好，大卫宣称，他觉得星期六的网球训练太没劲，也厌烦了足球俱乐部。从那一刻起，他就天天坐着：坐在屋里,或者花园里,屁股不离椅子(要是有人从旁经过,他也从不打个招呼），要么就斜躺在床上或厨房吧台的椅子上。他的举止行动中流露出一种极度消极的情绪。只有到阁楼上去才是例外，但这又让西蒙大发脾气，结果大卫认为还是赖在床上为好。

仅仅一个月，大卫身上就发生了这种种变化，于是我们的第二次“和美”时期就此终结。我和西蒙互相指责，一个说对大卫太苛刻，另一个就说对他太娇纵。

“这小子整天吊儿郎当，”西蒙说。“我要好好管教他。暂时不给他零花钱，让他早早起床去送报纸。”

“这真新鲜，谁叫他起床？自然还是我。什么闹钟都吵不醒他。”

“没关系，想办法弄醒他。只消一次睡过了头，就要丢掉工作。”

“别太天真了。这正合他的意。”

“既然他不去打网球，那就让他星期六去工作……”

“星期六去工作？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？他要是能在十二点从床上爬起来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再说他上哪儿去找工作？

谁要他？”

“我到林场去找那个给我们整修过花园的人说说。大卫要是跟他一块儿干点活，保险就壮得像头牛，在户外，到地里滚一滚，爬一爬，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。”

“我看，这是异想天开。医生不是也说了，他发育得太快。给他点时间吧，我想，这孩子是疲乏极了。如果像你那样去做，那他肯定不会做功课了。他还说，要是再蹲一年班，他就不上学了。”

“唉，上帝，他真这么说了？那我要好好教训他一顿……”西蒙气得脸发青，大步流星朝门口走去。我赶忙追上去，但到楼梯边才叫住他。

“看在圣徒的份上，你现在别和他吵。我觉得他病了，可能得了普法依菲尔疑症。或者是一种让他苦不堪言的病，所以才这样极度疲乏。”

“好啦，”西蒙说，“我就不上楼了，但他明天得和你一道去看医生。如果他没灾没病，那就是常见的懒惰，我就要到林场去打听一下，看能不能在那儿给他找点活儿，哪怕我不得已自己掏几个钱呢。我不会就此罢手。你总是优柔寡断，瞎忙活……”

西蒙真的自掏腰包了。起初他花二百盾买了一些多年生植物，这玩意儿我们根本就不需要，只是为了巴结林场的老板。最后他们约定让大卫前去帮忙，但是不给报酬，“说真的，我纯粹是想帮你的忙，我现在不需要帮手，说不定他还会添乱”。因为西蒙预料到大卫肯定不会接受这条件，因此他们商定：西蒙掏钱给老板，后者则装作是他自己付给大卫三十盾。而这全是因为没查出大卫患有淋巴病毒的任何症状……

我早就料到事态将如何发展。

第一个星期六，用棍子打大卫也没把他打起来。头天晚上他不知到哪里去闲逛，答应“十一点准回家，明天就去上班”，自然，他食言了。我们俩像傻瓜似的想方设法让他麻木的身躯恢复生机。两人硬拖着他去淋浴，在浴室里使劲搀着他，不然的话他就会瘫在地上。我们往他手里塞肥皂，然后再递给他手巾，末了还替他擦干身子。

“吃点什么吗？”西蒙指着我给他做好的夹肉面包说。

“别管我，我病得很厉害呢。”

“胡说，别再糊弄人了。”

“要是你不想喝牛奶，那喝点茶好吗？”我问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是有气无力地低着头。

“他真的病了，西蒙，”我说，“他都快站不住了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，见鬼去吧，”西蒙答道，“一准是昨晚喝酒喝得太多了。嘿，起来吧，你可以不吃东西，但得麻麻利利地到林场去！”这时我到车棚去找他的自行车，可是自行车不在了。

“你的自行车哪儿去了？”我问道。

大卫晃晃悠悠地站在门边，西蒙只好扶着他，他比父亲高一头，看上去令人好笑。这孩子还能去铲土吗？

“你的自行车哪儿去了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大概我放到哪儿了……”

“到底放到哪儿去了？”西蒙问道。

“噢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放到一个地方了……他们今天会送回来的。”

“上车，”西蒙把他推进汽车，“快点，你已经迟到了。”

大卫仰坐在前座上。西蒙使劲关上车门。他们的车拐弯时，大卫歪着身子靠在玻璃窗上。

那个星期六，我一连几次去林场。在暖室里我买了一束鲜花，问那个给我配花的姑娘：

“ 那个新来的小伙子在这里干活吗 ?”

姑娘朝四周看了看：

“ 可能他在那边浇花呢。”

“ 难道他没去收拾花园吗 ?”

“ 花园？星期六我们不收拾花园，一个星期只收拾一次。 ”

“ 是这样，”我说，心想 糟糕，在这个闷热的暖室里，他非睡着不可。

我佯装观赏植物，顺着暖室走去，真的在暖室的最里边发现了大卫。他坐在装了土的麻袋上，无所事事。木桌上有几束玫瑰，显然这是要他干的活计，可他什么也不干。我在高高的橡树后边站了大约十分钟，看着他，可他什么也不干。我的老天，看着这一切我真的要闷坏了，就赶紧躲开这气闷的暖室，跑到大街上。

我把花送给了母亲。这事不可让西蒙知道，但是过一会儿我不安起来，就又跑到林场。这回我直接到橡树后面的那个观察点上。大卫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。我心想，他们一定发现他什么也不干，就把他轰出去了。我赶紧去找那个卖花姑娘，再买一束花，顺便问道：

“ 刚来的那个人跑哪儿去了 ?”

她有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把大拇指举过肩膀指了指：

“ 可能坐在外面吧…… ”

他确实坐在外面，坐在一堆装煤渣的口袋上，离他的老板有十来米远。老板一袋一袋地搬麻袋，而大卫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在我悄悄观察他们两个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是这样。真是怪了，我想，老板怎么对大卫就不闻不问，怎么就不逼着他干活

呢？坐到车上，我突有所悟：钱是西蒙付的，要想强迫大卫干活，还要再付钱……

这第二束花我又给了母亲，还瞎编了一个说法：

“我本来给你买了两束花,这束花忘在车上了。”

她似乎大受感动。

“唉,都是多好的孩子啊,”她说,“大清早是你,后来是西蒙，都送来这么好看的玫瑰，现在你又来送。我这不是受之有愧吗？”

“西蒙？”我问。

“对呀,一个钟头之前他前脚刚走,大卫随后就跟来了,也拿着花。”

“大卫？……”

“是呀，他不是在林场干活吗？他有午间休息，直接就来看我了。可怜的孩子，干了一天活，统共才挣三十盾。你们连零花钱都不给他……”

“妈妈,你没随便给他钱花吧？”

“给了，他的自行车让人偷了，现在他就靠两条腿到处跑。我给了他一百盾，让他买辆旧自行车。是啊，这又怎么啦？又是什么都不能做了吗？”

“妈妈，好好听我说。要是大卫再来找你，就别再给他钱了，千万千万！这是为了我。我们给的钱足够他用的，要是不够，就让他自己去挣。妈妈，我不想……”

“你这是怎么跟我说话呢,”母亲发火了,“我跟你没话可说，不过我认为这简直是丢人，仅有的一个休息日还要逼着他去干活。让他去打网球，或者去踢足球有多好。这对他的身体大有好处。小小的年纪，一个充其量还不到十六岁的孩子，让他这么早就去干活。看他那副可怜样儿，一个小东西。我看得明明白

白，这几个孩子里你们最不待见的就是他……”

这些话刺伤了我。

“妈妈，”我说，“答应我，您别再给他钱了。”

母亲立刻摆出一副长者姿态：

“我不明白，兰恩，要是像大卫这么一个可爱的宝贝带着花来看我，我却不给他一点像样的东西，我岂不是一个坏外婆了……”

现在我既然知道西蒙也去了林场，就决定自己先开口：

“听着，西蒙，你去林场了，对吧？是这样，我也去了，甚至去了两次，两次他都坐在麻袋上，无所事事。你这把戏是想继续耍下去，还是另有高招？”

西蒙的眼里流露出听天由命的神情，父母为他做出安排的时候，他总是这种神情：“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西蒙要做学位答辩，如果他回去，那就全泡汤了。”“要办的头一件事，就是你们去休假。”“我们有个建议。我们在代尔福特给你们买套房子，这样西蒙才能安安静静完成学业。”但他这回改变了胸无主见的习惯，转而咄咄逼人。他的两个颧骨肌肉绷紧，面颊发青。

“真见鬼了，我这个倒霉蛋一辈子就是付出。我们住在这个家里，就是因为有我这个倒霉的家伙在付出。那小子却随心所欲，有求必应，但他必须守这个家的规矩。他占着最好的房间，可他在干什么——赖在床上。他可以到任何一个俱乐部去玩，可这小祖宗，瞧见了没有，他连这个兴趣都没有。我已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为他操劳。你以为我就这么愿意为他操心，我办公室里没事干了？这小子该清醒了，老老实实给我到林场去，哪怕每个星期六拿着鞭子硬轰着他去！”

他猛然转过身子，扬长而去。大门咣的一声。我看着他上

了汽车，汽车猛一起动，向前冲了出去，险些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。那人眼瞅着他飞驰而去，接着朝着我们家走来。说不定西蒙碰着他了？没等按铃，我就打开门。这是贝尔纳。骑的是大卫的自行车。

“您好 ,太太 ,我还自行车来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这车让人偷了呢 ,”我说。

“偷了 ?不 ,我不过是暂时用用他的车。”

诚然，大卫的兜里揣着我母亲给他的一百个盾。我决定瞒着西蒙找他谈谈，因为我不想又闹得沸沸扬扬。

“一百个盾？”大卫惊讶不已，“你说什么？哪来的一百个盾 ?”

“你跟你姥姥说，你的自行车丢了，她就给了你一百个盾。”

“没有的事 ,我的自行车没人偷啊。”

“那你要了一百个盾没有 ?”

“要了 ,因为你们不给我零用钱了。”

“不 ,你说过 ,你的自行车让人偷了。再说 ,就算你没有更多的零用钱 ,可是 ,你还能在林场挣三十个盾。”

“我在林场根本拿不到三十个盾，我只挣十五个盾。”

“十五个盾？为什么？说好了的，付给你三十个盾。”

“那我怎么知道！大概是嫌我剪不好玫瑰花。”

“玫瑰花 ?”我火冒三丈 ,脱口而出 ,“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们为你费了多大的劲，你爸爸低声下气，求爷爷告奶奶，让林场收留你。这三十个盾是你爸爸掏的，你听着，你爸爸拼死拼活地干活，为了你睡不着觉啊！可你呢，不知好歹的东西，大大咧咧 ,笨手笨脚的 ,连玫瑰花都剪不好 !”

大卫无动于衷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他走近冰箱，拿了一

瓶啤酒。

“从什么时候起,你喝上啤酒了?”我嚷道。

他从抽屉里取出开瓶起子，耸耸肩。

“放在冰箱里不是给喝的吗？不让喝就别往冰箱里放。”

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不由得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滚到你的房里去,”我吼了起来,“去做功课,星期一你就要开始考试了!”老天,我干吗跟他提林场的事。“这事别跟你爸爸说。钱的事，就算我白说。要是让你爸爸知道了，他一准儿冲着你大发脾气。”

他慢条斯理地喝着他的啤酒，从我身边走过。

“我再不去那里了,”他说,“反正我什么也不干。你们的那些馊主意,跟我没关系。”他走到门口,回过身来,“对,顺便告诉你我那零用钱的事。希望你们还是给我零用钱。”

大卫逼得我无路可走。星期三，他拒绝上学校。那天有地理考试。他自然没温习好功课，正好找个理由赖在床上。

“我耳朵疼,”他宣布,“你给学校打个电话,说我耳朵疼,行吗?”

“不行,”我说,“我不打电话。你哪儿也不疼,就是没复习好功课。”

“我耳朵真疼，劳驾你打个电话吧。就算我耳朵不疼，你也可以帮帮我嘛。我不是也帮了你吗？”

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:“你这是存心威胁我吧?”我问。

“我?”

他转身面对墙壁，我绝望地朝电话走去。如果这电话不打，我想，到了晚上就要吵翻天。大卫一定找他爸爸告状，说我讲了林场的事。到那时就要闹得不可开交，就是说，西蒙先跟大卫

吵，然后再跟我吵。还是打电话吧……

暑假对我们一家来说变成了真正的地狱。大卫没升到四年级，他断然拒绝同我们一道去别墅度假。这别墅是向朋友租来的。

“怎么着，要我去那个地方，跟我的小弟小妹一起到林子里去玩？”他说，“你们去吧，我呆在家里。”

我们大伙想方设法，软硬兼施，又是好言相劝，又是威胁吓唬，但大卫顽固不化：不去就是不去。结果面临两种选择：要么呆在家里，让别的孩子跟我们一起消磨时光，把暑假糟蹋了；要么就去别墅，放任大卫，不加管束。

“我不想让这臭小子为难我们，”西蒙说，“我们还是去，只给他留点饭钱，让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。”

“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他会把一大帮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人物招来，把家里弄成猪圈一般，再说，如果他忘了关煤气，还不把家全烧光了。”

“可是我也不想亏待自己，”西蒙说。

“也许可以让他参加帆船竞赛或类似的活动？”我提议，“也许他可以到马术训练营去？”

帆船竞赛，马术训练营，农场……凡是能吸引他的办法我们都想遍了，但大卫仍固执己见。最后我们只好去求邻居，因为他们七月份呆在家里。

“哎，这孩子多讨人喜欢，”邻居说，“他能干出什么不好的事？就让他有空儿来我们家吃午饭，好不好？”

“您看到了，”西蒙说，“近一个时期，这孩子可难缠了。有什么事，您打个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“出事？能出什么事？”

“哎，这很难说。总之……大卫刚满十六岁。我们觉着把他

一个人放在家里,有点愧疚。”

“请不要担心，我们会照顾他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把三个儿子都带大了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女邻居向我们挥手道别。此刻我的感觉像是：我们偷了最好的朋友的东西。

“他们会发现,我们给他们留下了多大的累赘,”我说。

西蒙立即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显然，他并不比我轻松。

“当然,应当把话说明白,”他说“大卫完全是一匹野马,这是真的，我们让他弄得太累了，我们一定要离开。见鬼，你怎么不说话?”

我一下子就急了。

“我?你自己去跟他们说好了!”

“对,但是,我和这些人不熟,你经常和她在一起聊天,怎么就不能把话说清楚？”

“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你纯粹是个呆子，你这是强人所难！”

“怎么啦，你还大惊小怪说我难缠？你整天都在我耳边说大卫长大卫短的，可我一有重要会议，你就偏偏打电话来，说他让学校轰出来了，或者闹出别的什么事了。每次都有新花样。我对你说，过了假期，我就想办法让这个东西滚出家门。否则我们大家都会发疯。”

“你怎么就忍心把他从家里轰出去，孩子才刚刚十六岁！再说，是你自己说的，要是大卫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你。”

“是啊，因为你什么事都瞒着我。我想知道，我这个家出了什么事。你们嘀嘀咕咕的，我烦透了。”

“上帝呀，你昏了头了。我从来就不跟大卫说悄悄话。”

“你们都别再说啦!”朱丽叶嚷了起来“除了大卫,难道就再

也没有别的了？好端端一个假期，算啦，下一个转弯处，你们让我下车吧，我去找我的女朋友，或者随便去什么地方。为了大卫,总是没完没了地吵。”

她突然哭了，几个小一点的孩子也跟着大哭大叫。

我和西蒙默然无语。朱丽叶是对的。我们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孩子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围着大卫转。我转过身子，把朱丽叶搂在怀里。她贴着我的脖子抚弄我的头发。

“我也认为，大卫太不像话，但我还是打心眼里可怜他。如果你们总是谈他的事、吵架，那最好哪儿也别去了。”

“你是对的,孩子,你是对的,”我说。“算啦,我们再也不谈大卫了。”

“爸爸,你也答应啦？”

“是的,”西蒙说,“我们可能太过虑了。”

有一个星期的光景，我们的心都扑在别的孩子身上，但是关于大卫，虽说一个字都没提起过，可我们一想到他就如坐针毡。到了星期六，上午八点，电话铃响了。我们赶紧接电话。西蒙抓起联机电话的听筒，我拿起另一个听筒。

“是大卫的父亲吗？”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。

感谢上帝！幸亏不是我们的女邻居……不过，原来是邻居的儿子。

“先生，我母亲再也应付不了啦。你们在度假，她本来不想打电话。可是你们家里天知道出了什么事。我不清楚，有多少人在你们那儿过夜，我只能说我母亲没法睡觉。”

“我马上就回去,”西蒙说。

“我看你得马上回来,不然我没辙就得报警了。”

对方挂了电话，没向我们细说详情。西蒙也不敢多问。我

们只好收拾零用东西，十万火急往家奔……

我们把孩子们安顿在我母亲家里，来不及细说，就径直往家里跑。头一眼，我们就看到花园里有五辆轻便摩托车。推开门，点着的蜡烛迎面送来浓烈的气味。楼下的房间里弄得一塌糊涂 地上有几箱子啤酒,到处是面包屑,香蕉皮,地板上是随意踩碎的烟头，还有一堆空奶袋，衣服扔得到处都是，椅子摆得杂乱无章，有的腿朝天，坐垫和枕头围成一个圈儿。桌灯翻倒弄坏了，西蒙的音响设备还开着，唱片丢得东一张西一张。

我们呆站着，无言以对。我弯下身去，从地上拣起一个茶杯去找水龙头，心里空荡荡的。这当儿有个小女孩走进屋来，她穿着针织背心，长可及膝。她一言不发，也不打招呼，对我们简直就不屑一顾。她打开冰箱，从里边拿出两个橙子。

西蒙猛醒过来。

“ 嘿,你是谁 ?你在这儿干什么 ?”

小姑娘拿起刀来切橙子，把每个橙子切成四片，没有答话。便靠着洗碗池嘬起橙子来了。

西蒙走近她。

“ 你怎么着,聋了吗 ?见鬼,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?”

他抓着她的肩膀狠命地摇。她呢，照旧吃她的橙子。她只穿一件针织背心，里边什么都没穿，这我已经看到了。她把眼影乱涂一气，脸上的化妆品深一块浅一块。

“ 西蒙,”我说,“ 住手,放开她,你要打死人是吗 !”

但是西蒙气昏了，他狠狠地拽着她推搡，结果她手里的橙子飞了出去。最后，他把她从餐桌边揪开，推倒在一堆枕头上。她的脸贴在枕头上，双膝跪下，背心撩起，露出完全童稚的小屁股。西蒙已不能自持，喘着粗气看了一眼这小屁股。我走过去拉平

她的背心。上帝，看样子小丫头也就刚十四岁。我蹲下去把她拉起来，让她坐到枕头上。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，“你从哪儿来？”

她用手捂着脸，好一会儿才分开手指，瞟了我一眼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这就告诉你，”西蒙吼了起来，但我把他拉到一边。

小丫头又把手指并拢。西蒙气得发疯，叫道：

“那我告诉你，我是谁！我是大卫的父亲，听着，这是他的母亲。可他的小弟和小妹现在都不能回家来。我们在度假，你听到没有，在这之前，我这个可怜虫整整辛苦了一年，我有权利休息几个星期，但是一个星期还不到，大卫就把整个宅子弄得乌七八糟，恨不得把海牙的败类全都弄到这里来！”

小丫头终于把手从脸上移开，呆滞地瞄了西蒙一眼。

“大卫是什么人？”

“大卫是我们的儿子，”我说。

她耸耸肩膀。

“我不认识这么个人。”

“你倒是认识谁呀？”我问。

“谁也不认识，我就是跟他们一块来的。”

“跟谁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我根本谁都不认识，可我要找个地方过夜……”她站起来，向水池走去。

“我把橙子都吃了，行吗？”

我们哑然，呆呆看着这小不点儿从地上捡起那几片橙子，若无其事地又啃了起来。

“别的人在哪儿？”西蒙问。

“大概在楼上。他们也许还睡着呢。”我们便上楼去。在二

层楼上,我停住脚步——不会在我们的卧室里吧……我们奔上三楼的儿童房。最大的一间是大卫的。西蒙推开门，我们看到大卫睡在自己的床上。房间里没有别的人。西蒙冲向前去，打开所有的房门。三张床上有三个小伙子睡得正香。我们相视无言……另一些人肯定在我们的卧室里。西蒙急忙往上跑，到了阁楼上，大概想看看客房里的床。接着他冲着下面嚷道：

“没人,见鬼!”

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向二楼冲去，闯进我们自己的卧室。在离床两米远的地方，我们顿时像着了魔似的停住脚步。床上躺着三个人，还有一个人裹着床单睡在地上。我立刻发现百叶窗弄坏了。一股恶臭。地上七零八落到处都是啤酒瓶、胡乱放着的衣物。鸭绒被上烧了一个窟窿。椅子上不知怎么却整整齐齐地挂着一件衬衫。西蒙惊呆了，他把被子一拉，三个赤裸的身躯不约而同地都蜷缩起来接着睡。西蒙拍打他们，扯他们的胳臂，扯着嗓门大喊大叫。床上几个光屁股的家伙略微动了动，他们的动作也一模一样：弯腰弓背，摸索着找裤子，穿上裤子后又在西蒙的拳打脚踢下一个劲儿往上拉裤子。他们全醉烂如泥，招架不住，只得乖乖地挨打。我也怒不可遏，跑上楼就猛扑过去，把另外几个年轻人往床下拖。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没去惊动大卫。我挥拳，我用脚踹，用最不堪入耳的脏话咒骂他们，我尖着嗓门大吵大叫。他们弯着身子摸索着找裤子。我抓起这些肮脏的裤子从楼梯上往下扔，他们就跟了下去，拣起裤子就边走边穿。我气急败坏，浑身瘫软，慢慢下了楼，眼瞅着这帮小伙子一个个溜走。他们下楼梯，过走廊，鼠蹿出门。接着是发动轻摩托的声音，他们一溜烟地逃走了。直到今天我连做梦都能听见摩托车的咆哮声。总算静了下来。房子里空空如也。西蒙躲在我们屋里。我坐在台阶上。

“西蒙，”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。

没有回答。我站起来走进房间，浑身无力地靠在墙上。西蒙双手抱头坐在床上，我看着他。

“西蒙……”

他摇摇头，没拿开手。

“大卫在楼上躺着哪，”我说。

他还是摇头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坐在地上，把头放在他的膝上。我感觉到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。我感觉到……我产生了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。

“我真像个傻瓜。应当马上打电话报警。我是傻瓜，兰恩。”

“下楼吧，”我说，“我给你弄点喝的，然后我们再打电话报警。我们下楼吧，西蒙。”

我们手拉手下楼去。在患难中我们一向携手同行。我领着他来到厨房。

“别看了，”我说，“这些垃圾，我马上清扫。先喝点水。”

我们坐在凳子上，彼此看了一眼。喝点什么呢？还喝个什么劲儿？这事发生之后，现在怎么面对生活……

“真见鬼了，那个毛丫头跑哪儿去了？”西蒙从凳子上跳起来，“楼上没她。她藏到哪去了？”

我懵懵懂懂地四下里看，寻找那个满脸稚气、露着小屁股的小丫头。

“她只穿了一件背心，不可能就那个样子跑到大街上去。”

我扫视房里，目光停在惟一的一张不是底朝天的椅子上。进房门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大衣挂在椅子上，手提包也丢到上面。椅子上的这两件衣物都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
“西蒙，”我说，“她拿我的大衣包着她的光屁股，顺手抄走我

的手提包，开溜了！这个贱货跑了！”

“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手提包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
“所有的东西，”我说，“所有的东西，还有我的一把指甲刀……„

邻居躲着我们。那天晚上，我们按响他们家的门铃，前来开门的正是女主人。我们急忙问候她，她不予理睬，但她的眼神流露出惊恐不安。接着，她就赶紧哐当一声关上门，把我们拒之门外，仿佛看到凶神恶煞一般。我们别无他法，只有灰溜溜回家。由于恶气难消，由于心中委屈，我一边走一边数落大卫，就在一个钟头前我还为他立下的誓言着实感到一些安慰。

“听着，别再惹事了，’西蒙说‘，这已经弄得够呛了。”

是啊，他当然说得对，整个一上午，一个白天，一个晚上，一幕幕撕心裂肺的场景，加上警察的光顾，我们已经精疲力尽。大卫没法就发生的事做一个像样的交待。原来他和贝尔纳是在一个赌场里认识那些男孩的。后来那个丫头也混了进来，“愣是窜上了一个家伙的摩托车后座”。贝尔纳告诉他们说，我们在度假，所以马上就打定主意上我们家来弄‘这玩意儿”。大卫说，他说什么也挡不住：有一个小子竟拿刀相威胁。大卫害怕，所以就顺着他们干了这一切：从地窖搬来啤酒，他们围着他，让他坐在中间，以便把他看住。他喝了很多啤酒，结果酩酊大醉，他们就把他拖到床上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忘得一干二净。他连一个人的名字都不记得，就是那个小丫头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，也没想过要把轻摩托车的牌号记下来。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他从床上拉下来。他醉得一塌糊涂。他哭泣，他浑身颤抖，还呕吐，在呕吐的间隙，他大喊大叫：

“我没错，我什么坏事都没干。”

警察认定，这是酗酒滋事。我吓懵了，哼哼唧唧地问道：

“酗酒滋事？什么叫酗酒滋事？从没听说过！”

有一个警察领着大卫围着房子绕了一圈。他们一一记录下被毁坏的和丢失的东西，同时也和贝尔纳谈了话，但他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:名字,他不知道,车牌号,他不记得,一句话,他吓坏了。末了来了一些人，说是要取指纹，而西蒙则要去警察局正式报案。

但是，祸兮福所倚。好长时间以来，大卫头一回偎依着我，可怜巴巴地渴望温暖和安慰。他让我抚摸他的头发，吻他的额头。我打算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更紧地偎依着我，我就再坐下来。他就这样紧贴着我，直到完全平静下来。

“我并不想让你们心烦,我不想,我也不想惹朱丽叶,”他低声说，“往后，我要帮助收拾家……放完假，我就回学校去上学……然后当个大学生……不过你们要告诉我该学什么……你们不是希望我考上大学吗……”

西蒙在我们近旁激动地听着。

“听到了没有,西蒙?”我说。“听到大卫说什么了吗?他说他要回学校继续上学。”

西蒙走近我们，也把手放在大卫头上。

“我们要尽快忘记这些荒唐事,”他说,“去,大卫,先去淋浴，再把自己收拾收拾，然后我们也洗个澡。呆会儿我和你妈妈去拜访邻居，把这事圆满解决。去吧，先洗个澡……”

他拉大卫站起身来，扶着他的腰，领他到门口。

大卫自己上楼去，西蒙回到我身边。我抬起头。

“听到了吗，西蒙，他又要上学去了，经过这事他得到了教训，以后他还想继续上学……”

我们心领神会，彼此点点头。我们相信了大卫。

下一个星期全家都感到温馨和睦。我们常去海滩，一溜小跑经过邻居家大门，一溜小跑过了大街，一飞脚踢起足球，一下子就隐没到沙丘后面。大卫总是跟我们一起消磨时光，总要别出心裁跟小孩子们玩有趣的游戏，还看着他们，不让他们往水深的地方跑。这样一来，我和西蒙就能整天沉浸在懒洋洋的、昏昏欲睡的心态中了。

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。开头的荒唐总是在所难免的，现在看看大卫吧！一个月之前，他什么都听不进去，可当我们为这事那事弄得身心交瘁、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却意想不到地大彻大悟了。他感到心有愧疚，总是问：

“说实话,你们真的不再想这件事了？”

或者：

“我要发奋,你们相信我吗？”

还有一次他甚至说：

“教教我做饭,一个星期我给你们做一回饭。”

为了取悦西蒙，大卫有一次找他，说是要去学驾驶帆船。这是西蒙的头等爱好。可大卫以前对这种事却毫无兴趣。到了晚上，我看到爷儿俩都晒得黑黑的，满脸笑意地下了车。

“我要给小伙子买一艘快艇，”西蒙说，“驾驶快艇是一项有益健康的运动，这就是他最需要的，他马上就会大变样的。”

“快艇？”我问，“拿什么买？”

“我弄得到钱，”他说，“这是头等重要的事,这样我们就能让他不再往街上跑，对我也没坏处。一到水上，一切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”

第二天他带来一大摞说明书，冥思苦想，比较，计算——可是在大卫的眼神里却找不到这股子兴奋劲儿。

大卫也尽量讨好我，叫我到阁楼上去画画。单独跟他一起，

我很幸福，虽然我的内心隐含着疑惑：他也许只不过是尽力弥补自己的过错而已。

我们的假期已进入第三周。西蒙打电话给贝尔纳的父母，请他们晚上抽空儿来我们家小叙。他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，说早就想和我们认识，但凭良心说，还没那个勇气。他们至少比我们年长十五岁。进门后，赫莉和汤姆就主动介绍自己。赫莉长着一双滴溜转的黑眼睛，黑黑的眼圈，面目清秀，嗓音柔和，说话缓慢。这样的女人是不会大吵大叫的。汤姆性格开朗，是个乐天派，过于肥胖，过于红润，笑起来声音过大，见人就熟，但过于武断，在椅子上简直就坐不住，贪吃，贪杯。只消五分钟，他就做出了结论，说我们这房子买对了，买得高明，因为五年内房子要升值三倍。最好来点咖啡……

“不要糖，多谢，”是柔和嗓门发出的声音。

“我太太不要的，我都要。”

他爽朗地笑着，我礼貌地回应。老天爷，我们哪来的共同语言。也许只有跟这位太太还说得来。

“我们开门见山吧，”汤姆说，“你们两口，我们两口。我们都有一个难教养的儿子。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机会，但是他们不领情。就说我吧。我十八岁就做买卖，勇气十足，卖的是家常香肠，那是在战前。战争期间，我什么都经历过了，参加了抵抗运动，跑到英国去，学过开飞机，战争结束后又干老本行，卖香肠。当时的市场很大，谁也没往这儿想，但过去我父亲是开肉铺的，就这么着，我想到这是条赚钱的路，结果赚了一大笔钱，一来二去，过了十年，我就当起了经纪人。您要问我了，我是不是什么时候有过什么条件：还不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，我父亲从不支持我学习。不，全靠自己去闯，自己去动脑子想，这辈子能干点

什么。您瞧，贝尔纳是我们家最小的孩子，女儿出嫁了，大儿子也结了婚,一个接着一个,连生了四个孙子,还有列奥,他比贝尔纳大五岁，也在经纪人事务所工作。就是说，贝尔纳是最小的，因此就有点娇惯，应当承认，他脑子好使，轻松地进了优秀中学，但连三年级都没上成，因为他认为学习纯粹是扯淡。他连一分钟都不能静下心来念书。我们真的为他做了所有的事，买补充教材，请补习老师，可到了三年级就留级一年，无论如何也升不了级。结果他不想再念书。你看，你拿这个二流子有什么办法？职业介绍所，心理测试，我们确确实实什么都做过了，他就是不买账。”

汤姆稍停了停，高高挑起眉毛，结果出现了一种说不清是悲还是喜的神情。

“是啊,”他叹口气,“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。我们曾经让他到一个初中学校去读四年级，那时我们可能还是让他去上三年级好一些，那就再想想办法吧，”他满脸愁云，“反正什么都得办……,,

我们四个人都默然不语。

“我们确实尽心尽力了，”赫莉说，又是好长一段时间的静默，汤姆沉重的喘息声显得更加清楚。

“长话短说,”他口气坚决,又说开了,“学,贝尔纳是不能上了,那就做工,起初这么尝试过,那么尝试过,可是没有一个地方他能呆够两星期，只是在唱片商店干了三个月，可终于还是烦了,不想再工作,只想租间房单独住,就这样住了三个星期,后来还是回家来了……”

“那模样真可怕。他回家来，我高兴得要命。回家时他变瘦了，浑身脏兮兮的，连件干净的衬衣都没有……”

“因为闹出了乱子,是吗,赫莉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警察来了，为他偷自行车的事儿。我的儿子偷自行车……”

“太丢人了……”

“人家说，他加入了一个什么团伙。开头我想，这些人准是乌合之众，我的儿子跟他们混到一块去了。嘿，原来不是，而是一些体面人家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弟，这些人都是咱们这个区的。”

“这听起来还真让人纳闷……”

“成群结伙去偷。贝尔纳是从犯，警察说了。他只管‘望风’，不过这对警察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他反正是跟着干了。谁知道他们干了多少这样的营生，他们狠命地偷，能卖到好几千，就拿这些钱狂喝滥饮，还买麻醉品。结果他也跟着吸大麻和印度大麻，再往后就用这种药片，让人昏昏欲睡。那都是些什么来着,赫尔？”

“催眠的,巴比土酸。”

“巴比土酸……可我们真是从没听说过，后来染上了佩普，一种兴奋性毒品……还有一种叫什么，赫尔？”

“叫维卡明，一种强兴奋制剂，起的作用和催眠药相反。人一旦用了这东西就兴奋，完全不想睡觉。贝尔纳变得极其暴躁，动不动就把玻璃全都打碎。这就瞒不过邻居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现在我们不避讳这事了，过去简直就难于启齿……”

“按照常理，我们尽量不让家丑外扬，没跟人提起过一个字，就是孩子们也讳莫如深，只要可能，只要他……不，汤姆，你说吧，我到现在一想起来就心有余悸。”

“就是说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他切了自己的动脉……”

我一下子糊涂了。上帝啊，这些人都说的是些什么？说自

己的儿子吗？说贝尔纳？

“你们说什么？”我问。“佩普，大麻，巴比土酸？这都是些什么？”从西蒙的表情看，他也不大懂。“西蒙，这说的都是什么？”

“大麻，”西蒙耸耸肩膀，“大麻这玩意儿，我听说过，还有印度大麻。可是，维卡明……”

“我们也一无所知，”赫莉说。

“那么，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——就是你说的这个？”西蒙问道。

“这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”汤姆说，“有的让人晕头转向，有的让人变得脾气暴躁。我问过我们的家庭医生，他对我说，那是一种麻醉剂，服用了这东西会产生幻觉。”

“幻觉？”我和西蒙异口同声地问。

“是的，幻觉，”赫莉点点头，“我也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。总之，它能使人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，这就是所谓‘幻觉’。”

要是她再往下说，我就要疯了，我想。既然贝尔纳干这个……那就是说，大卫也这样？

“如果贝尔纳干这个……”我的心凉了。

汤姆和赫莉也不吭声了，但他们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

“我们开头并不怀疑贝尔纳，”赫莉轻声说，“我们也不想出这种事。”

“我就是那么想的，我不会碰上这种事，”汤姆又说话了，“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，腾出我所有的时间陪他，带他去打保龄球，您问问赫莉吧，我还带他做冬日锻炼，我想，他需要换换环境，便买了一艘摩托艇，但我们最多玩了两三次。但不管我花多大工夫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总是找机会就开溜。我们一回来，他马上就骑上摩托走了，于是我们只有耐着性子坐等他露面，最后神经崩溃……，，

“当时他心脏就……你自己说吧，汤姆……”

“当时我心脏出了毛病。又到晚上了。我对贝尔纳说：‘你吸毒了吧?’可他对我说:‘我压根儿就没吸,我跟你说过。’但我不是瞎子,我对他说:‘别撒谎,我从你的眼睛能看出来。’瞳孔起初是小圆点，过后慢慢放大了……”

“是呀,我从来就看不出什么区别,可汤姆行,汤姆一向明察秋毫。往下说,汤姆。”

“我情绪激动,气得不得了,说:‘你撒谎。’我突然间觉得受了骗。这些天来，我一直在取悦这小子：你说吧，干什么都可以，这个，那个，好极了，咱们形影不离……可在这同时，他照吸不误……那天晚上,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神不对,我说:‘孩子,我看得出你那眼神。’他一下子号啕大哭起来,说:他看着我为他尽心尽力，于心不忍，他觉得他猪狗不如，如果说他用了点麻醉剂的话,也就只是弄了点药草,或者大麻,这没什么了不起的,因为大家都这么干……我听着听着，忽然大发雷霆：‘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，’我说,‘带着你的大麻,快滚,这里不能有你的邪味,不然的话,我就一刀一刀把你宰了。’我已经神志不清,身不由己,只知道要豁出去了……赫莉泪流满面，这我还看得见，她护着贝尔纳，拼了老命也要保护他，就是说……”

“哎,你能怎么样呢?他毕竟是你的亲骨肉呀!”

“我不埋怨你,但是,事实是你袒护他,可这兔崽子明白这一点，就从她的背后窜出家门，我本想追他，突然觉得抽搐了一下，胸口就……我一下子就倒在走廊上了……”

“在急救室躺了四天,”赫莉说,“这段时间没有贝尔纳的任何消息。汤姆没完没了地打听他的情况，可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过了一个星期他才露面。唉，他那副样子真寒碜透了，面黄肌瘦，龌龊不堪，衣衫褴褛，他什么话也没说就立即躲进他的屋里，直

到第二天我才找到机会对他说了他父亲的病情，当时他就跟我一起到医院去了。”

“可是他与母亲单独在家时又旧病复发，吞他的药片，她还是没有发现,就这样。”

“是啊,我没有察觉。”

“当然是故伎重演，又去偷，又去跟那帮家伙鬼混……但是平心而论，我回家以后他毕竟安分守己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。”

“这事发生之前,”赫莉说，“夜里就在你们家……贝尔纳说，他也蹲过警察局，这帮孩子他并不认识，这完全是另一伙人，现在他又跑了，已有一个星期我们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孩子怕我们不信任他……”

我们躺在床上睡不着。

“西蒙,”我说，“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不会让赫莉和汤姆弄得晕头转向。不管贝尔纳干了什么，大卫不一定也跟着学，最近这个星期毕竟过得很好嘛，他为过去的事很是懊悔，正在发奋。明天我们就去看那艘赛艇。你今天晚上都听到了，他们做事愚蠢：汤姆过于武断，她呢，又太软弱。我们就完全不一样。我对大卫就像朋友一般，你跟他也有格外特殊的感情。我已经想过了，你还是多带他画画。他不大愿意去上学，那就算了，每到假日，让他跟我一道去玩赛艇。到了冬天，我想我们总会找到可玩的东西。你瞧，大卫说不定一切都会顺顺当当的。说老实话，兰恩，你大可不必为这事钻牛角尖。”

“那他们说的大麻之类的东西呢？”

“你好好想想，你从他眼神里看出什么来没有？多此一举。你别自寻烦恼。再说了，是大卫自己说的‘我想去上学’，对

吧。”

“他愿意继续上学。”

“这么办。我们让他离开贝尔纳，只此一条路。我早就对你说过。所幸我们跟他的父母谈过了。他们真可怜，吃尽了苦头，但愿别再出什么事了。是啊，这边是小儿子，那边是年迈的父母。我看，他有五十多了，自然，很难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孩管束得太紧。好啦，睡吧，我想明天早点和大卫出去。”

“你上楼看过他没有？”

“看过，一切正常，他睡了，”西蒙翻过身去，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你关收音机了吗？”西蒙按了一下开关键。我也翻过身去，静下心来。晚上的情景一直浮现在眼前。大麻，印度大麻，巴比土酸，佩普，维卡明……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汤姆说。开头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无所知，赫莉说。幻觉，汤姆说。他那样子寒碜透了，面黄肌瘦，龌龊不堪，身上的衣服没一处是干净的，赫莉说。直到有一次他切了自己的动脉，汤姆说。我们确实尽力而为了，赫莉说。我辗转反侧。你该怎么办呢，这是你的亲骨肉呀！赫莉说……

我们通宵达旦，一夜无眠。

“我的零用钱哪去了？”朱丽叶嚷道，“我明明今天早晨放在厨房的吧台上了。妈，你是不是又放回到你钱包里去了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”我回答，“你记准了是放到吧台上了？”

“当然，我还没糊涂到那个份上。方才电话铃响，我拿起听筒，钱就放到吧台上，忘了拿 先上楼到浴室去梳头了。”

“先到浴室或者回房去看看。你就是这样顾前不顾后的。”

她在楼上喊：

“这儿没有、我房里也没有，哪儿都没有。看看你的钱包

里。”

我叹口气，拿起钱包。唉，这些孩子，总是到处乱扔东西。我打开钱包，里面的钱不多。早晨我个个都给了零花钱：大卫十个盾，朱丽叶一个盾二十五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还剩下二十五盾的纸币。现在那纸币不见了。“莫非是西蒙拿了？”我自问。不会，胡扯，没有这样的事，他要是拿了会说一声的。从来没有旁人碰我的钱包。一个早晨就乱套了。我和朱丽叶找遍了所有的地方。

“都看看自己的衣兜里。也许在走廊的厨柜里？电话那边你看过了吗？”

我审了几个小不点，他们当然都说没拿。

“算了,还是问问你爸爸吧。”

“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”

“要一整天,我想。他和大卫去看赛艇去了。”

“是啊,这倒好,我现在没零用钱了。”

我把所有的零钱都凑起来给她，然后上楼去大衣柜里取小盒子里的那一百个盾。小盒子空空如也。一百个盾到哪儿去了？我是在那些小流氓来过之后，才将一百个盾放进去的。猛然间我就像遭了电击一样：大卫，是大卫偷的，我不知他为什么偷钱，但我感觉到偷钱的只能是大卫！但是，公正的上帝，什么时候偷的呢？上个星期他不是那样悔恨交加，尽力想讨好我们吗？于是我拿着盒子下了楼，把它放在餐桌上。他一回家就会看到这盒子，看到后也许会大吃一惊。我根据他的反应就能明白……可我又从桌子上取走了盒子。有两种做法：如果真是他偷的，那么我切不可当着西蒙的面戳穿他，否则就要闹出天大的乱子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果他是无辜的，那我的怀疑就会彻底毁掉他真诚的改过自新的愿望，他将变得心灰意冷。我要看看他

的房间。

我四下里一看，房间里凌乱不堪，但这对我并不新鲜。我的心怦怦乱跳，他的褥子底下、被套里边，他的唱片中间、书堆里头，他的牛仔裤兜里，还有装新唱片的那个塑料袋，我都翻了一个遍。那个塑料袋里还有一张发票：19.90 盾，是两天以前的购物票据。他哪里弄来这许多钱？就是说，又是偷的？可别发生这种事。我接着再找，终于拿了那个装满东西的烟灰缸下了楼。上帝呀，这么肮肮的房间！磨破了嘴皮老是跟他说，别在睡前乱扔烟头！下楼的时候，我发现烟灰缸里有什么东西闪闪发亮。这东西裹在锡箔里，褐色的小块块，我从未见过……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我看见他们父子下了车，装得很像：你是爸爸，我是儿子，这把戏突然使我怒不可遏。你是个没良心的小偷，我心里想，这就是你一进门我要说的话。但是，我去厨房喝了一杯水。

“兰恩，”西蒙叫我，“兰恩，我们买了快艇。”

我什么都没说，深吸了一口气。然后满面笑容地迎上去。

“孩子们，妙极了！”

大卫吻了一下我的脸颊。

“不是为我买的，”他说，“是他自己找乐。”

“不，咱们一块儿买的，咱们一块儿玩。”

我的脑子顿时天旋地转。还买了摩托艇，但最多驾了两三次，汤姆说。

“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冬天的运动？”老天爷，我胡说些什么？带他去做冬天的运动，他需要换换环境，汤姆说。我的头发晕。

“冬天运动？”西蒙问道，“你说什么哪？”

我觉得天昏地暗，倒在椅子上。别提小盒子的事。可别声张……

“给妈妈拿点水来，”我听到西蒙的声音，他抱着我的肩膀，“你怎么啦,病了?拿水来,大卫。”

“不要水。这个盒子……”我指着柜子，“那里,抽屉里有个盒子,对,就这个,把它给我……”

我看到两个人都奔向柜子。别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然后我看到了那盒子。西蒙把它放在我面前。别的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我看那盒子。是你拿走了那一百个盾，大卫？——我想问，但没说出声来。银纸里头那是什么东西，大卫？我想问，但没说出声来。我看着大卫的眼睛，他的眼珠忽大忽小，神色不安。

“妈妈,你怎么啦?”他问,双膝贴地跪在我的面前。

上帝，幸亏，我什么话也没说。我一把搂住他。大卫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大卫，你没偷妈妈的东西吧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感谢上帝。你要跟你爸爸去玩帆船，跟你妈妈去画画。一切都多美好，一切都多美好……

“水!”我喊了一声，“我要吐了。给我点水喝,大卫……”

我苦不堪言，头疼，疑虑重重，胃里堵得慌。吃饭的时候我目不转睛看着大卫，他就坐在我的对面。他的眼神如何？正常，还是不正常？嗯，有变化，眼皮微肿。不对头，是，肯定不对头……要不就这样，本来就这样嘛。唉，我不能再盯着他不放了，大卫不抬头了。过去他从不这样。就是说，他这是故意的。因为他知道：他的眼睛现在有点异样。我要好好审视他的眼睛。我有个小算盘：我要给他画像，到那时我就能细细琢磨他的眼神。

“大卫，”我说，“我想给你画张像。饭后跟我上楼,到阁楼上去,好吗?”

“哼,又让我一个人洗碗，”朱丽叶立即嘟囔起来，“老是宠着大卫，给大卫买帆船，姥姥也给他钱，可就没有我的份……”

“姥姥给零花钱啦？”我问，“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大卫不言语。

“怎么啦，星期天我到姥姥那儿，”朱丽叶说，“我亲眼所见。在厨房里他得了十个盾，可我呢，姥姥说：‘等你长大了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也给你点补贴。’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，”西蒙说，“什么补贴。你怎么啦，我们给你的还少吗？”

“姥姥以为，到现在为止你们还不给我零花钱呢。”

“你可以自己告诉她嘛！”朱丽叶嚷着说。

“噢，好了好了，”大卫说，“下回我告诉她。没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充其量才十个盾。”

幸好西蒙嘴里塞得满满的，我赶紧阻止他：

“这事我们到阁楼上谈，那十个盾你还给姥姥。”

我们先洗餐具，朱丽叶揪住不放，决不比哥哥多洗一个盘子。大卫没吱声，他显然一肚子火。

“说吧，你干吗要姥姥的钱？”我一边画素描，一边问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”他耸耸肩。

“你要钱做什么？把钱花到哪儿去了？”

他突然发起火来。

“听着，你让我上这儿来干什么？训我？整天就唠叨我的书……反正我还上那个年级不就行了吗。”

“难道就不能问问一共要买多少课本吗？也许现在需要别的课本……要把这些书包上书皮……”

“真是的，烦人……可是我压根儿还没决定是不是回去上学呢。”

“你自己说过的……要继续上学。”

“我说过吗？这都是你们硬逼我的。”

我咬紧牙关，接着往下画，该画他的眼睛了。大卫的眼睛像我，是灰色的。这眼睛比平常显得更灰。不是的，不是更灰，而是更阴沉。眼里没有光泽，而且光线也没射进他的眼里。眼皮还是微肿。还有眼珠……变小了。胃里那倒霉的难受劲儿又来了。他的眼皮在收缩。接着再画，心里什么都不想，可我还是把炭笔丢到一边了。

“大卫,”我说,“你在吸,你在吸大麻,可能也用了别的毒品吧。我从你的脸上看得出来。”

他仍然直视我的眼睛，毫无所动。

“你偷了我的钱。别躲躲闪闪的。你没什么可害怕的。我不会对任何人说，可是你偷了我的钱和朱丽叶的零花钱，还哄得姥姥晕头转向，这都是为了一件事——去买这见不得人的东西。”

转瞬之间我发现这画不成个样子。我画的是我为之苦苦奋斗的孩子，是我百般呵护的孩子，我的心肝宝贝，我的理想和希望。这个凝视着我的孩子和我那个孩子毫无共同之处。他看着我，他看透了我，他对我视而不见，并不对我说真心话。今后他还要撒谎，骗我，骗西蒙，骗所有他不愿接近的人。

“上帝,你想到哪里去了?”他问道,脸上没一丝表情,“谁抽大麻啦？我吗？！你说的什么钱，是姥姥那十个盾吗？”

“盒子里的一百个盾。”

“胡扯,”他说,“我不知道什么盒子……”

大卫带着去年的课本去上学了。没有包书皮的书本破破烂烂的。他的书包里还有一块放假前放进去的面包，已经发霉。我注意到了这块面包，但我却仔细看那几本书。

“这些书还能用吗?你知道吗?”我问。

“当然可以,我不过是再念一年。”

我再一次问:

“如果现在用的是别的课本呢?”

他气急了，朝着门跨出一步。

“没人用别的课本，这太蠢了。你别再啰嗦了。”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他回到家里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伸直两腿。

“可笑,”他说,课程表上完全是别的课本,只有地理是旧课本。”

我冲着他喊:

“你瞧见没有!我说什么来着?课程表在哪儿，快去订书吧。”

书店老板说，书要等两三个星期才到货，这段时间大卫像傻瓜一样坐在教室里。家庭作业他没法做，因为“谁也不肯借书给他”,于是他就旷课,而且每天都迟到。班主任找他谈话,校长找他谈话，最后他们就请我和西蒙到场，对大卫大加训斥:要是再迟到一次，再旷课一次，那就不用再来上学了。

结果，第二天大卫按时去上学了，但他没到学校去，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我们才眼巴巴地把他盼回来。我和西蒙气急败坏，互相指责，翻陈年老账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把十五年前的事都抖搂出来，其实这些事都跟大卫和他近几个星期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捎带着还提到了我母亲、他的父母，说我幼稚，说他也幼稚,说我有错,他也有错,说如果我不这样,如果他不那样……就在我们两个“剑拔弩张”的时候,大卫突然出现在西蒙面前,他就一下子把火撒到了大卫的身上。

“你到哪儿去了?”西蒙扯着嗓子朝他叫喊。

“怎么了,到一个朋友那儿去了。”

西蒙扑向大卫，一场恶战开始了，不过西蒙肯定会败下阵来。大卫狠狠揍了他一顿。

“我要把你们全杀了!”他咆哮不止“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全砸烂！把整个家都砸烂！”

西蒙咕咚一声倒在墙边，而大卫却不管不顾，见东西就砸。我多年来一件件精心搜罗来的那些爱不释手的小玩意儿，让他扔得满屋都是。

“大卫,”我嚷道“住手!”

嚷也无济于事，他的怒气反倒越来越大。西蒙站起来。我看见他的鼻子流血。他火冒三丈，扑过去抓大卫，揪住大卫的后脑勺使劲推，弄得大卫疼得直叫。我再也看不下去了，一定要制止这场恶斗。应该找人来劝架。找汤姆，他遇到过这种事……我冲出家门。他千万可别睡了，我心想。真是万幸，他刚刚下汽车。

“求求您啦,跟我走一趟吧,”我恳求他道“大卫……大卫和西蒙……他们打架哪。”

我忘了他心脏不好，可他满不在乎。他拖着肥硕的身躯大步流星往前走，越走越快，我赶不上他。我跑进屋里的时候，他已经像一个楔子插在大卫和西蒙中间。西蒙瘫软无力，抽抽噎噎的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大卫看到他朋友的父亲，顿时屏声敛气。他们俩脸对脸站着，我从汤姆的眼神里看出他的嫌恶和愤怒，他气的不是大卫，而是他自己的儿子。

“吸毒鬼!”他说“讨厌的吸毒鬼 摧残父母,逼得他们发疯,把所有的东西都砸了,这都是你们干的!”

有一段时间，他们互相对视，一动不动地僵立着。后来我突然看到汤姆挥动右拳打在大卫的腮上。大卫摇晃了一下，捂着脸颊。汤姆站得笔直，两腿叉开。他有办法对付他的不争气的

儿子。

我又学会了一个词儿：吸毒鬼。一个人居然不吸毒就没法活。大卫，大卫不吸毒也没法活。这是因为吸了毒就可以得到满足，或者因为觉得在吸毒者的圈子里活得开心，想成为他们的“知己”。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。一言以蔽之，他不吸毒就没法活。

大卫的腮上挨了一击，一言不发，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里。汤姆以胜利者自居，陪着我们。他没有注意到西蒙没心思闲谈。

“我还要让他们尝尝我的厉害！”汤姆说。“早晚有一天……等着瞧，我会给他们点厉害看看。”

他说，他又是整个晚上开着车满城转悠，找贝尔纳，这小子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没露面了。

“我当然先去警察局，可这是徒劳，我就自己去找。先是找遍了所有的酒馆，后来到流浪汉聚集的空楼房去找。我清楚地知道，贝尔纳就呆在这种房子里……什么叫兴奋剂——他们也许没有这种概念。这些物质来自安非他明一类毒品，这里边还有一种叫拍飞丁，这东西没任何区别。孩子们都管它们叫‘特快’。就是‘加速剂’。还是那句话，因为这倒霉玩意儿能快速对肌体起作用，让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药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，这样人就不知疲倦。但是，自然也有它相反的一面，因为吃了以后根本就不想睡觉。一般来说，他们是吞食药片，药性能够维持一段时间，过后他们再吃。一停止用药，就无精打采，因为他们缺觉，要补觉。这时候他们困乏之极，什么都不想干，精神委靡。贝尔纳就是在这个时候切了自己的动脉。毒瘾过足的时候，他们就趾高气扬，云遮雾罩，吹嘘他们永远没法实现的抱负，而且变得像着了魔一样富于攻击性，动不动就把身边的东西打

得稀巴烂。比如大卫，他平日会这样大打出手吗？”

“我觉得是西蒙先动的手。大卫回来之前，我和西蒙为了大卫的事在吵架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他刚才就是禽兽。正常人怎么能出此毒手？不，我看这孩子是吸毒成瘾了，他和贝尔纳一样，沿着那条不归之路滑下去了……”

第二天早晨，西蒙没法去上班，他的脸肿了，青一块紫一块的。我收拾房间时他心神不安，在屋里乱转。电话铃响了，他的业务需要处理，于是他就冲着我发火，电话铃又响，他就臭骂大卫和贝尔纳。邮局送来一封信，是校长寄的，文字简短而明确：大卫已被开除，他干扰了班里的正常秩序，再来上学对他已毫无意义。与此同时，书店老板通知说，预订的教科书到了，付三百五十二个盾就可取书。西蒙顿时大怒，要冲上楼去揪大卫的头发。我好容易才制止住他，因为这样做无济于事。

“要是你昨天肯听汤姆的话，那你现在就会更清醒些，”我说。

“汤姆说什么了？”

我试着把汤姆说的那些话重复了一遍，但西蒙硬是听不进去。

“今天我就让这小子到另一所学校去报名，”他宣布，“找个地方把他管得严严的，再请个辅导教师。”

上帝，又想新辙了。

一个钟头以后，我和脸上又青又肿的西蒙动身去“另一所学校”。

“我脸上的伤还看得出来吗？”西蒙问道。

我当然看得出来，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刚被儿子猛揍了一顿

的老子。但是，我说：

“不,看不大出来了…… ”

校长听了我们的一番话，愿意接受大卫试一下。不过孩子一定要按时到校，一不能旷课，二要把课本都带齐全。三嘛，他想看看大卫本人……

“西蒙,”我在回家的路上请求道“,别再向他多说什么,我想试试我的办法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 ?”

“无论如何都不能吵翻。今天白天我要找他谈谈。 ”

“好吧,那我白天也去一趟……不,不是去上班,其实今天我最好是去划帆船。”

我端着一杯橙汁上楼看大卫。已经是下午两点了，他还赖在床上。我打算奉献最大限度的舔犊之情，说我什么都明白，什么都理解，如果有什么过不去的，那我就帮一把。但是他故伎重演，还是规避和撒谎。开头他甚至还没转过脸来就矢口否认他吸毒。

“我什么都讨厌,”他说“,你们找的那个学校我也不去……上帝啊,让我睡一会儿吧,别老站在这儿,瞧你那傻瓜样子,还伤心。 ”

“喝果汁吗 ?”我问。

他抢过我手里的杯子，一口气喝光，又蒙头盖上被子。

“我让你再睡一个钟头,”我说“,过一个钟头我们再谈…… ”

但是过了一小时，我实在忍无可忍了。我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,胃又犯毛病了,我吞了药片,喝点牛奶,下决心睡个觉,但我又站起来给赫莉打电话。

“赫莉,”我说“,汤姆跟你说了我们家的事吧 ?上帝啊,赫莉，我真的受够了。他还赖在床上。学校开除了他，我很担心，

你是知道的……他骗我，说他什么药片都没吃过。也许他没撒谎？我能相信他吗？你怎么看，赫莉？你说呢？”

她沉默了好久才回答我：

“汤姆在警察局呆了整整一个上午。贝尔纳纵火，被逮捕了。汤姆想请个最好的律师…… 他为什么干这种事？他跟一帮流浪汉住在一座空房子里。汤姆告诉你们了吗？只是我们不知道住的是哪个房子。是啊，我们现在才知道，他和一群男女共九个人住在一起。他们放火烧了对面的一个小工厂。有贝尔纳，还有两个男孩子。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干这蠢事。贝尔纳说：为了引人注目，为了报复。为什么呢？报复谁？汤姆说，他一定要找一个最好的律师，找到了一个，现在他已经去了，可大卫昨天在贝尔纳那里……”

“大卫在哪儿？”我问。

“在贝尔纳那儿，昨天就在那房子里。他起初想呆在那里，后来突然走了……”

就是说，大卫跟贝尔纳一起呆了一整天，在那里，他弄到了那臭玩意儿。照理说他应该留下，可是他突然动身回家了。因为他们要拉他纵火吗？因为他胆怯，不想陷在里头吗？到家了，可我们家却出了乱子。我们彼此指着鼻子大吵大闹，甚至都没听到推门的响声。大卫在走廊里站了多久，听了多久？他听到什么了？为什么他突如其来地掺和我们的事？为了给我们劝架？寻求帮助？我们没有明白过来，西蒙不了解内情，动手就打。我不了解他的情况，就把汤姆叫了来。汤姆也不了解情况，狠揍了他一拳，虽然这一拳本来是要打他自己的儿子的。我的上帝，一连串的误解。我的上帝，我怎么才能补偿这一切呢？

我慢慢地上楼找大卫。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不用想，但要有感觉，找感觉，跟着感觉走吧。我跪在他的床边，把头放在他

的胸上。我哭了，觉得他的手在抚摸我的头，于是我说出了当时的感觉，他毫不反驳。

“是的，妈妈，有那么回事。是的，我是吸毒了。我吃那些药片，老早以前就开始了。是的，我偷你的钱，也偷别人的钱，我哄骗我姥姥，但我不想干这种荒唐事……现在让我睡一会儿，好吗？我觉着困乏极了，疲倦极了，伤感极了。贝尔纳的父亲说得对：一旦这东西过了劲儿，就会体验到这难受的滋味了。但是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好一点，就痛改前非，我要努力做给你看，一定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。只是要把我的课本都整理好，再去把课程表拿来……再给我几天时间，对爸爸说，让他别来看我，因为他什么也理解不了。你了解我，对吗？你会帮我的，对吗，妈妈？也许你可以告诉爸爸说我病了？装病几天呢？请给我拿点喝的来。要茶，不过糖要多加一点，还要橙汁。就对别人说，我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求你了，妈妈！”

我准备有求必应。为了他而撒谎，为了他而把所有的事都做得天衣无缝，为了他，甚至可以去偷。我送去了茶、好多的糖和橙汁。我眼巴巴瞅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儿。

“还要吗？”我问。

他怀着感激之情看了我一眼。

“好了，呆会儿再说。”

我摸着他的头，再一次听了他信誓旦旦的话，相信了他，再一次……我一直呆在他那里，直到别的孩子们回家来。

让我惊讶的是，听我说大卫病了，西蒙竟什么也没问。他的忧郁已被海风刮走了。到了晚上，他才向我打听大卫的事，我面不改色地帮大卫说了谎：他病了，发烧，呕吐，腹泻。

“那么大夫来了没有？”

对,再撒谎 大夫来过了。

“他说什么?”

病毒感染，要卧床三天三夜，谁都不能靠近他。你也一样，因为他需要静养,除此之外,这病传染,大夫说了……

“我仍想和他谈谈。”

“别,不必了,再等等。”

他向我投以怀疑的目光，不过还是说：

“好吧，也许再等等为好，等他全好了再说。而且我也要舒缓一下。我其实也不大正常。我想好了，要是明天不下雨的话……想再抽出一天时间玩玩，因为划船对我真有好处。”

他以乞求的眼神看着我：体谅体谅我吧，我再也受不了啦，什么谎我都信，只要放我走，让我清醒清醒，否则我就完了……

为了大卫，我情愿满世界地跑，我去学校拿教科书的单子，对校长说那套瞎编的话：病毒感染，还要一段时间他才能痊愈。

“很遗憾,他不能很快来上课。”

对书商也说那套瞎话：儿子病得厉害，在原来的那个学校缺课太多，现在要换一个学校，能不能把预订的书退回，我在您这儿买新的书。

“这就要多加钱了,太太,取书日期也要推迟两个星期。”

不能再早点吗，这孩子真是倒霉……电话铃响了。

书店打来了电话：

“紧急订书要多花钱,您同意吗,太太?”

好吧,同意,同意,只要能救大卫的急就行。为什么呢,我不知道。只知道救急要紧。他一定能得救。我来救他。我收拾了他屋里的垃圾，蹑手蹑脚的，别惊醒了他。我楼上楼下地爬，给他送橙汁。我努力说服自己相信他不会食言。这回他一定能一一兑现。再过几天，我们就一切重新开始。他重返学校，去另一

个学校，到那里谁都不知道他的情况……

西蒙回家来了。划了一阵子船，他变了样。一个看待我们的生活如同隔岸观火，只知心疼自己的人，重新充满活力回家来了。他不再相信我瞎编的鬼话。

“他现在怎么样了？起床没有？下次你一定跟我一块儿去划船，这对你的健康太有好处了。嘿，他还是老样儿吗？”

他等不及我的回答，立即就要上楼去。

“西蒙，”我喊道，“让他安静点吧，他病了，他腹泻。让他安静地睡一会儿！”

他还是往楼上走，他每上一个台阶，我对他的憎恶就加深一步。他毁了我的希望，强制我承认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信心。他没把我今天的忙碌放在心上，又勾起了我心中的恐惧。

“西蒙，”我吼了起来，“让他安静些吧！”

我听到了说话声，但我只能听清西蒙在说什么。

“不想起床吗，老先生？病了吗？哪儿不舒服，得什么病了？”

足有一分钟的静默，接着就是这样的话：

“从床上滚下来，吃饭去，你哪儿也不疼，你是货真价实的懒蛋！”

再次静默，后来就传来大声吼叫，我听得清清楚楚：

“滚出我的房间去，我也没请你来！”

丁当乱响，有什么东西扔了过去，玻璃被打碎的声音，哐的一声门响……

西蒙下楼时，我坐在最下一级楼梯上。

“不下楼就不给他饭吃，”他说，“那几个孩子呢？坐下吃饭，不理他。”

可等你明天一上班，我心想，从今往后，也别想我理睬你。

我嫌恶他,从今往后,我恨他,连同他的小艇……

我们坐下吃饭，大家都提心吊胆。西蒙若无其事地和约欣说笑，摆出一副“我们不理他”的姿态给大家看。

朱丽叶不赞成这出闹剧。

“我端点饭给大卫,”她说。

“你敢,”西蒙声色俱厉地说,“他要是饿了,自然就来了。”

朱丽叶不管，从桌子上拿起一盘饭，这当儿大卫下楼来了。

“我说什么来着?饿了,就来了。”

朱丽叶把盘子放到桌子上，恶狠狠地瞪了西蒙一眼。我侧耳细听，大卫应该已经下来，可他跑到哪儿去了？前门猛摔了一声。朱丽叶当即跳了起来。

“你瞧,”她说,“他走了,永远不会回来了,永远,因为爸爸气坏了他。”

她哽咽而泣，转身上楼跑回自己的房间去。

“你看,你演的好戏,”我说。

“什么好戏？我不过下决心不再让这个不务正业的孩子耍赖。这个家有这个家的家规，其中的一条就是我们全家一起吃饭，如果有人懒得下来吃饭，那就什么菜都别想往楼上端。”

“如果有人病了呢?”

“真没意思，你明明白白知道他没病。你和他串通一气反对我，而且不仅仅是现在，而是由来已久，你一向当着孩子们的面贬低我。”

“你这一辈子都没把我放在眼里。当年我带着朱丽叶去你父母家，你居然让你父亲赶我走，让我求我母亲原谅，你就袖手旁观，全不当一回事，你甚至还有脸送我回我母亲家。”

“这是哪辈子的事了！我不想再提这事。”

“那好,从今以后绝不再提。”

我在盛怒之下跳起来向楼上跑，糊里糊涂地弄不清要去哪里，但是听到朱丽叶的哭声，我就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。

“我的孩子,你干吗这样伤心?”她躺在床上,我靠着她,“大卫一定会回来的。”她摇摇头。

“我不想在这个学校呆下去了,”她泣不成声,“他们老是往我书包里塞字条。”

“字条?”我不知是怎么回事。

“对,字条上说大卫被学校开除了,因为他抽大麻,吸毒,要是我哥哥吸毒，我大概也要吸大麻，吞药片，我也会被学校开除，班委会里也没我的份了……”她扑在我的怀里哭得更厉害了，“啊,妈妈,大卫要死了。”

“不会的,”我说,“当然不会。别哭,他死不了。”

“噢,妈妈,人家都说,吸毒的人全都会死,他们带着刀子,他们互相捅刀子。他们抢东西，干坏事。噢，妈妈，我不想让大卫吸毒,你要找到他,他应当保证再也不动这东西,你要找到他,妈妈……”

我紧紧把她拥在怀里。可怜的孩子，她不得不把恐惧感深藏在心里。我心里却只挂念着大卫，没空照顾她。我到哪里去找大卫呢？要不得像汤姆一样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开着车满城转悠，最后才能在那群流浪汉中找到他？就算找到了他，我能期望他会顺从地跟着我回家吗？也许要去报警，照汤姆的话说，别无他法？

“他去阿姆斯特丹了,”朱丽叶说,“他自己说的。如果他离家出走,就去阿姆斯特丹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“因为大卫不让,我说了他会杀死我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说的?”

“就是那天晚上,一整天不见他的踪影,你们在骂他,我坐在楼梯上听着。后来大卫上楼了，他精神恍惚。就在那时候，他说要去阿姆斯特丹。他迷迷糊糊的……”

精神恍惚……这孩子知道些什么？什么叫“精神恍惚”？那天晚上她坐在楼梯上是怎么一种心情？

“什么叫‘精神恍惚’?”我问“,我不懂。”

“精神恍惚,就是……吸了好多卷着大麻的烟,手脚僵硬,像石头一样。到那个时候人就觉得精神恍惚了，迷迷糊糊的……”

“精神恍惚”。手脚僵硬。都说到那个时候就叫精神恍惚，迷迷糊糊……

“但也可能是一种‘麻醉状态’。抽了大麻往往就是这个样子。‘麻醉状态’,就是这时候觉得快活,舒服,周围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的世界，但是会觉得口干，眼睛觉得有点不同寻常。”

“但是，朱丽叶，那天晚上大卫根本就不快活，情绪糟透了，他跟爸爸吵架。”

“是那么回事,但是,大卫什么乌七八糟的毒品都用过了,所以我害怕极了,妈妈。”

她紧紧靠在我的身上，我搂着她。

“哦,孩子,你从谁那里知道这些事的?”

“大卫告诉我的,”她轻声说。

“麻醉状态”——这就是快活、舒服的时候。这话在我脑子里反复冲撞，听起来就像儿歌那样天真无邪。如果抽了大麻，就会处于“麻醉状态”,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。如果“恍恍惚惚”，那手脚就要像石头一样沉重僵硬。如果什么毒品都吸，那动辄就要打架斗殴，大卫，你的妹妹就坐在楼梯上为这个胆战心惊，怕得要命……

大卫没有回家。西蒙去警察局报了案，我们彼此几乎无话可说。

“他们说什么？”

“没说什么。我写了他的名字，说了事情的原委。”

“他们要去找他吗？”

“在这个城市里，有好几百人离家出走，他们没法把他们都找回来。”

大卫出走已经两天。我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只是围着电话机乱转，盼着他来电话。到第三天我熬不下去了，就打电话给赫莉，问能不能去她家。

“你能来，我太高兴了，”她说，“我已经不敢跟任何人说话了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成见：我们的孩子可不做不成体统的事。我就看不出来，子女们规规矩矩的，他们做父母的又有什么功劳值得炫耀。这取决于孩子，而不是我们。昨天，贝尔纳被检查官传讯了。起初我们想，他可以呆在家里等候判决，可是把他关到未成年人监狱去了，审讯的时候他们又查出来，他还多次参与过偷盗。他和另一伙青年人偷窃音响，这些事凑到一起，罪上加罪，情节就重了，他现在得坐九个月牢，是包括刑前的羁押，还是缓刑，我搞不清楚。汤姆向来都明明白白。太叫人伤心了：你为了你的孩子甘愿做一切，下场却是九个月的监狱……汤姆也说，你做什么都是为了……哎，据说贝尔纳受审时说，他，还有居无定所的两个男孩子，起初想去对面那家工厂找份工作，可是工厂没收留他们。人事处的处长说，对于像他们这种孩子，这种居无定所的流浪者，说不定还是吸毒者，他不太相信他们。他们碰了钉子，后来出于报复，趁着黑夜闯进工厂，但什么都没偷，因为没有可偷的东西，索性一把火烧了那个厂棚……”

我听着她的话，看着她苍白的脸蛋，端详她絮絮叨叨不停说话的小嘴，望着她富有表情的眼睛。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尽管儿子放了火，受到社会的惩罚，却还是她的命根子。她的儿子偷了人家的音响，为此受了惩处。她命运多舛的儿子理应接受惩戒。她恨检查官,恨警察,恨这世道,恨监狱,可能还恨她的丈夫,这家伙“心里一向都明明白白”。大概他还盼着，儿子受了惩罚能因祸得福。她只有这个儿子，就像我只有大卫一样。我们都不责怪他们犯下的罪过，我们想的只是他们在孩提时代是什么样，怀念他们幼年的混沌时代，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过失，我们早就原谅他们了。

我觉得，这女人与我心心相印，我攥住她的手。

“赫莉,”我说,“我非常了解你,我了解你的感受。我也恨那些人，还有那些当父母的，孩子不做有损体面的事，他们还夸口，我也恨他们。你是对的，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们不过侥幸罢了。你从贝尔纳那里没得到好处，我从大卫那里也没有得到。对贝尔纳还是要有信心，赫莉。我也希望，大卫一切都会好起来……以后……不管什么时候吧……可能……”

她感激地久久看着我，就像我们达成了默契。

“你的儿子,”她说,“情况不那么严重。他太小,你也太年轻。你们还可以管住他。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他离家出走了，也许迷途知返，会回来的。但是谁知道我们的一片苦心能不能感化他呢。也许他永远就不回来了，那以后他会怎么样呢？”

“他出走了？不，不可能。不，他还太小……”

我频频点头，会心地微笑，还紧握她的双手，深感我们心心相印。

十天过去了。大卫杳无音信。我养成一种专看报上通告栏的习惯。“凡梅德福特大街发生抢劫案，若干弗里斯兰产手表被盗。罪犯，克·伏·赫，二十岁，罪犯，德·特，十八岁，二人均是失业者，被拘。”我看了一则“十八岁的戴·斯一案”，我的心凉了。他们指的可能就是“十六岁的戴·斯”，看到有个“十六岁的斯·戴”，我肯定这是印刷错误。当然指的是十六岁的戴·斯·大卫。是我的大卫。

但是，要是他被拘留了，那应该打电话通知我们啊？我等着，可是，电话铃没响。不过要是真来了电话，我还不火烧火燎地跳起来。噢，仁慈的上帝，人家把他逮起来了，他溜门撬锁，偷东西了，他跟贝尔纳学，放火去了……谢天谢地，他被拘留了！

我从西蒙的神情看出他也一样心情恶劣。他借酒浇愁，喝得太多，总在电话里跟他公司里的人吵嘴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家里的风波。西蒙一挂上电话，回过头就找碴儿责怪我，说他马上就要丢掉工作，还归罪于我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

“咱们两人还是要心平气和，”我说，“到班上把情况都告诉他们，大家会理解你的。”

但他只是苦笑。

“你以为是这样吗？就凭我这个吸毒的儿子，同事们立即就把我打入另册。谁也不会理解。”

“别管这些，西蒙，”我说，“至少我们两人该彼此理解吧。”

他突然哭了。我打心眼里反感，而不是理解和同情。还哭呐，我不能容忍一个哭天抹泪的丈夫，我寻求的是支持、温暖、知心，西蒙也一样。可是我们不能同舟共济。在床上，我们离得远远的，背对着背。有好几次，他夜里抚弄我的头发，我推开他，满腹恼恨和厌恶。然而那是他想同我和解的表示，可这对我却成

了一把利刃。我们大概都经受着同样的恐惧，同样的痛苦。而我们却不能共渡难关。

终于，大卫来电话了。是晚上九点。

“妈妈,快来领我回家,来吧,求你啦!”

“大卫,孩子,你在哪儿?我就去……”

“在阿姆斯特丹,火车总站。来接我,马上。”

“我去,和爸爸一起去,我们不生气。大卫,我真高兴你来电话。你怎么样？你病了吗？孩子，你病了吗？”

“快来接我，妈妈，我就在火车站出口。我没钱。带上钱和我的外套，劳驾啦。别的我现在就不多说了。”

我们跳上汽车。我顺手给大卫抄了一件外套和一点吃的东西。西蒙往车的后座上扔了一个被子。我们疯了一样飞驰。大卫在火车站总站打电话:“妈妈,拿我的外套来,劳驾啦,来接我,劳驾啦。”我哭了,西蒙也哭。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,我的头靠在他的肩上。我爱他，因为他善解人意，像我一样。他什么也没问，我也什么没问。我们要把大卫带回家来，给他围上被子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这个细高个儿的少年又成我们的宝贝了……这里有个疑点：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能多说？他不是一个人吗？谁在他身边？也许我们应该先去警察局报警？不行，快去火车站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……

不让停车——管他哪！我们闯进大厅，因为出入口没有大卫。

“售票处那里！”我听见西蒙喊了一嗓子。

我们出其不意地来到他的面前。他又脏又瘦，眼圈发黑。大卫，是我的大卫。他浑身颤抖，站在售票处。旁边有个小个子男人，戴黑框眼镜，他朝着我们走了一步，站在西蒙和大卫中间。

“拿一千盾，”他说。

我们没听懂。

“拿一千个盾，”他再次说。

西蒙伸手拿钱包，包里空空如也，钱包里的钱从来不超过两百个盾。大卫一言不发，浑身颤抖。我也拼命翻我的手提包。我应该还有一百盾。那小个子男人把我们拽到大街上，我们就在阴暗处开始讨价还价。

“他欠了我一千盾。把钱放在桶上，然后带他走。否则，没门儿。”

“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。”

“有多少，你全拿出来。”

我一听这“你”字简直就火冒三丈。可笑的是，该让我生气的并不是这一点，我却……我们拿出了所有的钱，又要回二十五个盾好给车加油。余下的钱要在一个星期内还清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个地方。至于哪一天还，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。

我们开车回家。大卫和我坐在后座上。我把被子披在他身上，他就像小时候一样伏在我的怀里。我在小镜子上看到了西蒙的眼神，他沉默无语，但他的目光所表达的意思比这些日子他说的话加起来还多。

到家了。朱丽叶在屋里坐着，一见到我们马上就跳了起来。大卫像个病人，我们搀着他进了门。朱丽叶冲到他跟前，用柔弱的小拳头敲他的胸，紧贴着他，又敲他的胸。大卫不躲避，最后抱着她的肩膀，两人一块儿坐到沙发上。我们站在孩子们的对面，他们好像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似的。

“瞧你干的好事！”朱丽叶叫道，“傻瓜，你自以为是，下流！你为什么干这事？”

“朱丽叶该睡觉了，”西蒙说，他小心翼翼地要拉她的胳膊，但两个孩子紧紧偎依着。

“就让她呆在这儿吧，”我说，“反正她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他抖得多厉害呀，我的孩子。他全身颤抖，他的手摇晃着。我摸摸他的额头，可大卫摇摇头说：

“我不发烧，每到这时候就这样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西蒙忙问。

但大卫不说。

“我们不会生气，我在电话里告诉你了。大卫，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这样。”

他紧搂着小妹，开口说他的故事。

“我早就‘梦游’了，但这舒服极了，跟别的孩子们混在一起，我好像在做梦，舒服极了。”

“别这样说，”朱丽叶说，“爸爸妈妈听不懂，他们不同……”

“我早就‘梦游’了，”大卫接着说，“麦角酸，这玩意儿不危险，非常舒服，五光十色的，你好像腾云驾雾，轻飘飘的，眼前晃着许许多多新鲜东西，我还想再有这样的感觉。这样我到了阿姆斯特丹，在那儿碰到一个德国来的小丫头，一个善良的小丫头，她和她的男友住在运河里的一艘驳船上，她说：‘我带你一块儿玩‘梦游’去，咱俩会舒服极了。在这之前，我还在另一个地方呆了好几天，在那儿过足了烟瘾，还打坏了好多东西，可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地方了。总之，我吸了大量的毒品，还喝得酩酊大醉，后来从那里出来，走呀走的，直到碰到这个小丫头。她说，我看上去很累，可以到她那儿过夜。她还问我有没有钱，我说有钱，她就让我上船了。但是，吸了这些麻醉品，喝了那些东西……大概，所以，‘梦游’完全是另一个样。这次梦游持续了好长时间，好像时间根本就不存在了，我躺在那里，腾云驾雾一般，

但后来不知怎么一切都无影无踪了。我看到那德国女孩坐在那里,奇怪的是,她没有头,只有头盖骨。她的头盖骨会笑,后来我也死了。我好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我死了，可是我那时还和平常一样。女孩离我一会儿远，一会儿近，总是顶着她的头盖骨。我怕极了……直到现在我还害怕……这种场面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，我无力制止。后来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他们说我‘走火入魔了’，谁也无法把我从恐惧中解脱出来。这种情况拖了好长好长时间，我简直都没法说下去……我看见了魔鬼，也可能我自己就是魔鬼，也这么吓人。我好像不存在了，没有归属了，或者相反，我属于我身外的另一个世界，它也许高高浮在我头顶上,也许在地底下,我不知道,但是我已经不存在了,只剩下说不出来的害怕。大概是喝得太多了。这个高头盖骨的小丫头留下陪我，试着安抚我，可她总说德国话。后来这个戴黑框眼镜的小个子来了。人家告诉我，他叫阿诺德，我还知道，他是学医的。他给我一点东西,然后我就‘升天’了,小丫头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。后来我就昏睡了，不过很快就醒来，马上拔脚就从那个地方逃了出来，因为我从噩梦中惊醒了。噩梦至今还缠着我，我再也无法入睡，我怕极了，因为一切都离我而去，因为我死了。我听见他们说话,那个小丫头希尔达,还有那个小个子,他说,我必须走。小丫头说让我走，我就给你们打了电话。我这些日子欠了他们好多钱，所以一定要点钱……”

他不再说话，浑身仍在颤抖，朱丽叶也跟着他吓得发抖。我们陷于恐惧之中。西蒙和我都说不出话来。这真是地狱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就是所谓的“梦游”、地狱之游吗？我们和大卫都默然。我抓住他颤抖的手贴到我的脸上，我吻他的手，那双手还在抖。

西蒙站起来，无可奈何地摆摆手，就去打电话。

“我去给医生打个电话,”他说,“找夜间出诊的医生,让他马上来。”

“要不,我们一块儿睡?”我问大卫。

他不知所措，看了看我说：“我睡不着，我怕睡觉，我不敢睡……”

“我们去睡吧,大卫,你起来,我把我的褥子铺在你房里的地上,”朱丽叶站起来说,“今天夜里我陪着你,别怕。你要是还怕,我就到床上挨着你睡。”

可是大卫不愿意，摇摇头。

“我就睡在这儿沙发上,开着灯睡行吗?”

西蒙回来了，听到大卫刚才说的话。

“好吧,”他说,“躺在沙发上睡吧。我们都在这里,就在你身边,朱丽叶,回你房里睡去。”他拉着她的手,“走吧。我送你去睡。”

夜间出诊的医生来了，是个上了年岁的人，他显然无能为力。

“嗯,说老实话,我的本事比你们高明不了多少,”他说,“你们明早应该去找少年心理医生。打个电话给市卫生局，他们会给你们派个心理医生来。也许他能帮上点忙。我只能给些镇静药，但我要老老实实承认：自我行医以来，还没有遇到过这类病例。‘升天’,这‘升天’是什么意思?这是疑难杂症,我一无所知。”

我们就这样过了一宿，硬挺着轮流守在大卫身边。他睡了一会儿，后来陷入极度惊恐的状态，推开我们在房里来回转悠，自言自语,再坐到我们面前,浑身颤抖,汗流浃背,无休无止地叫唤:“妈妈,妈妈,我死了……”西蒙搂着他的时候,他竟然也喊叫。我恨不得倒在床上哪怕睡上个把钟头也好。

市卫生局介绍来一位少年心理医生。事先我们和他通了电话。他说，我们一定要陪着大卫来，但大卫不肯。我们打电话央求我们的家庭医生来看看，此人颇受大卫信赖。家庭医生忙活了差不多一个钟头，同样一口断定，要救这孩子，非心理医生莫属，但大卫依然无论如何不肯。与此同时，他的病情几乎没有变化。他处于自我封闭状态，一动不动地盯着一个地方，过一会儿又突然惊恐不安，满屋子乱转，嘴里前言不搭后语地嘟囔。

有的时候，他多少也能和我们完全正常而理智地谈话。

“跟你们说吧，”他总是这样开始，“我谁都不需要，无论是心理医生还是别的什么人，因为我其实没什么病。我心里明明白白我是怎么回事。我到过另一个你们毫无所知的世界。我那时的感受永世难忘，而且再也体验不到了。其实对我来说，一切都已成为过去。我曾经拥有一个完整的躯体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身体垮了，就是说必死无疑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哽咽难言，喘不过气来。我的上帝，这个孩子说的都是些什么？“完整的躯体”“死”“另一个世界”……他必须找心理医生看看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和西蒙都手足无措，连朱丽叶都说：“大卫，别老说这些事，他们听不懂，爸爸妈妈不是那样的人。”我们就靠这心理医生了。可大卫仍然反复念叨他那些话。使他坐卧不宁的，只是他心中想像的那个世界。如果有电车当着他的面从我们身上轧过，他恐怕也会无动于衷。

有的时候说着说着，他就大放悲声：

“如果我的魂没了，我的躯体还活个什么劲，或者我应该找点什么东西，好让我再体验一下。”

家庭医生来电话：

“我跟一位年轻的心理医生说过了，他正巧是研究这门学问

的，让他到你们家跟大卫谈谈。他三点钟到。不过千万别告诉大卫。”

我们什么也没对大卫说，一直忍到三点钟，由着他折腾。

他叫吉斯，大胡子，长头发，骑自行车来了。他穿着牛仔裤和牛仔外套。心理学家就这样儿，我心想……

大卫没问他从哪里来，就劈头盖脸冲着他嘀咕那老一套：“整个身体，粉身碎骨，就是说，我一准要死……”还垂头丧气地嘟哝：“想活不想活。”

“能不能让我们两个人谈谈？”吉斯恳求我们，“我们想谈谈我们都熟悉的感受，你们多半没有这些经历。”

大卫向我们打手势，意思是说，走你们的，我和吉斯谈悄悄话。我和西蒙很快就躲到走廊里去。

“去睡一会儿，”西蒙对我说，“我到学校去接孩子们。如果你母亲在家，我就把他们送到她那里；如果不在，我就带到朋友家去。”

我上楼去，散了架子似的扑倒在床上。吉斯大概要呆一个小时。我精疲力竭，阖上眼睛，眼前一片旋转和晕眩，片刻就坠入沉沉梦乡。

飞机轰鸣，空袭警报，像看电影一样。有个人拉着我狂奔，一条长长的、漆黑的走廊，那是我们的藏身之处。但是我已经不是我，而是大卫。我变得越来越渺小，孤独之感压迫着我，惧怕的情绪与时俱增，以至于怕得大叫起来。可是在空袭警报的呼啸中，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。后来炸弹纷纷落下，爆炸了，不过我没有受伤。炸弹离我不远，可还没有伤到我，我就忍着。一个炸弹落下来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黑，最后炸到我了。我觉得我被炸成了碎片。可我依然还是我，还是大卫，我已经不知道我是谁。我身上的每一块碎片都疼痛难忍。

我醒来时整四点。

“妈妈,你在哪儿?”我听到大卫的声音。“吉斯要走,他有话想对你说。”

他的话听起来很正常。过了片刻我才回答：

“我就来。等等。我睡觉来着。”

下楼的时候我才明白，我确实经历了我母亲的占星师所讲的和大卫的那一段前世孽缘。这事对谁也不能说，没人会理解我。大卫前世的死化成了无尽的惊恐，他的幻觉，照我们家庭医生的说法，他的身不由己的幻觉，就是那枚炸弹引起的种种恐惧。

吉斯答应明天来，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他给大卫拿了些药片，帮他夜里入睡，白天减少惊悸不安。不管怎么说，吉斯赢得了我们的信任。有他诊治，一切都将化险为夷。他深通此道，他自己就有过类似的经历。

可能是对袖手旁观和过去几天受尽惊恐的反应，我突然间变得很好动。我收拾和清理整个屋子，晚上则兴致勃勃忙着做丰盛的饭菜。当我们晚上围桌而坐的时候，大家都心情绝佳。说是所有的人，但大卫例外。不过他的情况现在也绝对看好，就让他自我调整吧，愿意死盯住一个地方就盯吧。明天吉斯就来，一切会好转的。正在大家吃晚饭的时候，阿诺德，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打来了电话，问西蒙同意不同意十点钟到火车站总站还他那笔余下的钱。那笔钱？我们家里没钱。大家围着大卫忙得团团转，把钱的事全忘了。

“我现在手头没钱,”西蒙说,“明天我去取。”

“明天太晚了,今天晚上拿来。放聪明点 如果你去报警,我们就不会让你的儿子安生。就是说，今天晚上十点钟，在总站，

一个人来。’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在卧室里，我们开始盘算。我又怕得不得了。

“为了上帝，去借吧，”我说，“也许能找个人救急。那话是什么意思：‘我们不让你的儿子安生’？”

“我不会屈服于讹诈，”西蒙答道，“我打电话报警。”

“别！”我叫了一声，“别这么干，我怕，首先把大卫的事安顿好。我不在乎这点钱，你想想看，与大卫的生命相比，这几百块钱算得了什么。”

可是西蒙死心眼，硬要去打电话。

“我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。”

我揪住他，打他，扯着嗓子叫，不让他做这蠢事，终于他瘫软无力地倒在床上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这个阿诺德自己就是个瘾君子。他需要钱，好买毒品。我不能让这些乌七八糟、毫无廉耻的败类把我逼到死胡同里去。”

“我们可以打电话给吉斯，问问他。”

“‘我们不会让你儿子安生’，”吉斯又说了一遍，“当然，这可能意味着他们要不择手段。也可能，这是不足为怪的信口开河，那就不一定花这种窝囊钱，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也完全可能是说话算话的威胁，因为，你看，他们不一定都是毛孩子。依我看，冒这个险不值。给钱吧，说不定他今后不再打你们的主意了。”

“什么叫‘说不定’？他们该不是想敲诈我一辈子吧？”

“你想到没有，”吉斯说，“这些孩子要是真的需要钱，他们会不择手段的。他们要纠缠的恐怕不止你一个。”

西蒙拒绝付钱，他不再犹豫了。他就是不愿意拿钱，他要等着瞧事态的进一步发展，打算随时去报警。

“这有什么意义，”吉斯说，“要么你今天晚上给钱之前先报警，当场把他擒获，但是，那样他们就完全有可能报复你。要么你不给钱，拭目以待。”

西蒙没给钱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束手无策。他就是不拿钱。他来了牛劲儿，等了整整一个通宵，接着怀着同样的心态迎来新的一天。他泡在家里，甚至都没给公司打个电话，以致他的同事鲁德打电话来发火说：

“西蒙是怎么回事？还来不来上班？”

“让他稍稍安静一段时间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家里发生了一点事，他实在没法承受。”

“那你觉得他还要熬多久？你们总是故弄玄虚。”

“如果没有事，我才不愿意故弄玄虚呢。我想西蒙自己会告诉你们的。再等一等吧。”

“我就再宽限他一两天，但是他要尽快来上班，他不来，这里就没法工作了。”

我把鲁德的话转告西蒙，但是他心里只装着一件事：阿姆斯特丹这桩“悬案”如何了结。阿诺德有没有胆量铤而走险？他倒很少关心大卫。有时吉斯来看大卫，他就缠着他不放，想琢磨出个可行的方案来。吉斯洗耳恭听了五分钟的光景，就毫不客气地说：

“听着，我是来看你儿子的，”接着就领大卫进他的房间。

西蒙大惑不解，看了看他的后背。我的儿子怎么了？我看着他的脸，明白了他的心思。我的上帝，他紧张到了极点，头脑发昏了……

儿子的情况有所好转，但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。

“他压根儿就没走出自我封闭状态，”我送吉斯出门的时候，他说。“一个劲儿胡思乱想，想起他经历的种种感受或者希奇古

怪的事，比如说，他觉得他已经有过完美的感受，可是这种种感受却消失了。这都是他自己的过错。他本来前途无量，被他自己给毁了，因此他觉得像过去那样‘再活下去’就没有意义了。他现在不那样丧魂失魄、惊恐不安了，这首先是药的作用。我们说好了，明天他到我那儿去。我想，一切都会好的……噢，对了，”他走到门外时说，“你最好叫家庭医生来看看你的丈夫……”

大卫在椅子上坐了一夜。他心不在焉，死盯住一个地方，忽而咕噜些什么，忽而仰起头目不转睛看天花板，忽而又俯身膝上，双手捧头。孤独啊，可怕的孤独。他即使和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，我们也接近不了他。吉斯说：“随他的便吧，尽量别干扰他，他问你们，你们就回答，最好三言两语。”我们彼此难以沟通，他也不努力，或者说没那个愿望了。

不过，西蒙让我烦透了。他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地来回走动，坐立不安，总想找事情做，最多安静地呆上两秒钟，马上又来烦我。

“当然，我傻透了，我做错了，应该给那笔钱。我怎么能打听到阿诺德的地址？也许今天晚上就去阿姆斯特丹？万一他就在火车站……我不明白，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。要自己拿主意，不能听旁人的。这个人让我往东，那个人让我往西，一辈子就这么过的。要自己拿主意……”

我什么话都没说。我有意回避只有他一个人不肯付钱的事，回避我央求他的事。吉斯已经提醒我们了：这些人可不是毛孩子。

“所有的人都可以支使我，”西蒙说，“我从来就没法主宰我自己。最初是我父母，后来是你，现在轮到大卫。去你们的

吧……我再也不去上班了。打电话给鲁德，就说：你想知道我遇到什么倒霉事儿了吗？这样吧，你另请高明吧，我从来就不是你的合伙人，我不过是你那里的小听差，我得听你使唤，你一开始就摆出这个架势——好像你要干的就是发号施令。可我受不了这个。从今以后我要变个样儿了，我过去太驯服了，我憎恶所有的人，我要摆脱压迫。我要解放，特别是摆脱你的压抑。我想去划船还得问你行不行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你怎么啦，疯了吗？你觉得似乎我也是你的听差，就像我要听鲁德支使一样。还有，你再也不想和我同房了，我要求你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低声下气，像个蠢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嗯？”

“西蒙，这事以后再谈，别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这些。”

西蒙回头张望，确实看见孩子们都在，便沉默了好长时间，观察他们在做什么，好像对孩子们就在眼前毫不在意似的。接着他又冲着我来。

“孩子们在这儿干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今天是星期五，他们可以晚点睡。”

“哎，真是的，要马上打电话给家庭医生！”我心想，吉斯是对的。

西蒙猛然起身，走向屋门。

“再说我没必要向你报告我要到哪儿去！”从走廊上传来他的叫喊声，“我走了，你管不着我上哪儿。”

前门嘭地响了一声。我看到他大步流星地沿着花园小路走去，没上汽车。老天呀，他上哪儿去？

约欣坐到我身边。

“爸爸上哪儿去？你们吵架了吗？”

我抱着她。

“不，压根儿没吵，不过爸爸太累了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走

吧,我带你们去睡。”

勃朗麦发难了。再过一会儿，我说不定就要爆炸了。朱丽叶看出我心情不好，便缓缓走近弟弟身边，把他拉走。我跟在后面，领着约欣，而她呢，则尽力讨回多少个月来没有体验到的母爱。

“你看，妈妈，我摔伤了腿。你那儿有药膏吗？我昨天就摔着了，可是你没管我，还记得吗？这儿，你看，胳膊肘上有个包，是大虫子咬的，也是昨天的事，你没管我，记得吗？”

我禁不住流下泪来。老天爷，这个家太让人费心了！我总是顾此失彼，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。

“今天你陪我睡,求你了,好吗,妈妈?给我讲个故事,求求你,陪我多坐会儿,等到我睡着了再走,好吗,妈妈?”

我答应了。但是我泪流不止，哽咽着讲不下去。约欣玩这玩那，硬是不肯睡，好让我在她身边多呆会儿。有多少次我一站起来，她就拉我坐下。

“别走,先别走,我还不睡,你要呆在这里,你答应过的。”

可是我困极了。

“睡吧,”我说,“我还要看看大卫。”

她马上就撒起娇来：

“你说过的，你答应了。你说你要陪我。老是大卫。大卫怎么啦？我现在根本就不喜欢他。”

朱丽叶——只有她能替我打这个圆场。我叫她来，她当即心领神会。

“你下楼吧,”她说,“我陪她睡,我给她讲书里的故事。”

我打发大卫去睡觉，他并不反对，一副惘然若失的样子，吞下药片就慢慢地上了楼，我站在下面看着他：在上三楼之前，他在楼梯台上站了好久，最后我听见了他关门的声音。他合衣而

睡，倒在床上，鞋也没脱。这是真的。我独处房中，忽然觉得我解放了，没谁要我分心了，终于是我一个人了，终于没谁要我分心了。我想睡，想一个人独享这张温馨的床——不再想夜里大卫有什么事,西蒙有什么事。哦,上帝,赫莉,我多么想听听你的声音，因为只有你了解我此刻的心情……

我脱了衣服坐在床上，拿起电话，开了灯。

“赫莉,”我说,“我,兰恩。我能占你点时间吗?”

“你这是什么话,孩子。”

我说,我哭,我骂人,我扯着嗓子叫,要不就闷声不语,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挤出话来。但是她从未打断我的话，只是反反复复说“对”,“嗯”,“对”,“嗯”。只有当我无话可说的时候,她才问：

“怎么样,轻松点了吗?”

“是,当然,不过一切照旧。”

“你认为,我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吗?”

“不,当然,不。”

“你怎么想起给我拨电话了?”

“我想……我不过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觉得你了解我的心情。”

“对，不错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兰恩，我对这些也一无所知,我也在自问‘为什么’。我叫喊过,我哭泣过,许许多多的事情，我都得一个人承受下来。我也期望过，这一切总是有起有伏的 希望,失望,希望,失望。那天晚上我们在您家里,正是我们失望的时候，因此我很难同你们两位说什么。不过，兰恩，如果我说现在我又满怀希望了，你听了会轻松些。我们收到过贝尔纳的一封信，这就给了我希望。在这之前，贝尔纳从没给我们写过一封信，你明白吗？把这封信念给你听听，好吗，兰恩？”

我的心里顿起波澜。正当我深深陷于绝望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去听一封给别的女人带来希望的信？

我和你有什么相干，和贝尔纳有什么相干，和你的希望有什么相干？我哭了。我觉得我苦不堪言，倒霉透顶，我没法再听下去了,你懂吗？

“念吗,兰恩？”

念吧，念吧，但我没有丝毫兴趣……我当即又对着话筒说：

“好,念吧……”

“‘亲爱的父母亲’,’赫莉念道,她稍事沉默,接着又说“他还从来没这样叫过我们，听起来真是字字暖在我心上。‘亲爱的父母亲,我给你们写信,因为该这么做,还因为你们应该知道,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为我受够了罪，但我自己也不好受，所以我决心弃旧图新。我被判了九个月，两个月的缓期，这就给了我充分的时间改过自新。以后我会在这里，在监狱里给你们写信，说说这里的情况，现在我呆的时间还嫌太短，写不出来。过去发生的种种事情都过去了，会好转的，因为现在我知道我向往另一种生活，我明白我是怎样沦落到这地步的。你们已经尽到了心。说实话，你们要相信，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生活中，我简直找不到我的位置。我也不曾有过朋友，你们知道，我只和大卫来往，而当我最后进了那伙人的圈子的时候，我就身不由己，跟他们一道吞云吐雾，因为我不想仅仅因为我不同流合污而再次被抛在圈外。再说那里有我几个要好的朋友。但我清清楚楚，一旦走到那一步，我就别想住在家里了，我看到你们一直心神不宁，为我操心，爸爸心脏不好，妈妈也一天比一天形容憔悴。我总是想：这都是我的过错。我深感我的罪孽深重，又不知如何是好。出路只有一条：从此吞云吐雾下去，因为我当时感觉到自己飘飘

欲仙，也不再有沉重的负罪感。我从这个团伙中的几个孩子那里得知，他们都在流浪汉的楼里栖身，有一次他们对我说：别傻了，你已经无家可归了，要是愿意，就上我们这里来。就这样，有一天我也这样干了。当时我已经没法再顾及这一切了：妈妈又哭了整整一夜，说老实话，负罪感真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决定出走，跟那帮孩子混在一起。不过我活得很自在。有两个孩子很招我喜欢，越来越喜欢。他们很信赖我，我也信赖他们，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。当然在那个地方，我的瘾劲儿更加超乎往常，可即使这样我并不自暴自弃，这两个兄弟也一样。他们想再去找工作，因为总是游手好闲，我们自己也慢慢厌烦了。当时我们三人就申请到那个工厂找点活儿干。倒不是走投无路了，而是要找个机会开始干。我们三人想通过青年住房保障局弄一套房子，一定要住在一个楼里，大家不能分开。在赫鲁涅维格就有这样的房子，重要的是，第一，那里全都是青年人 第二，我们只交正常房租，每月九十五盾。要是有活儿干或者有补贴就好了。总之，我们想工作，所以就请求录用。但我们一无所获。最后我们就决定蛮干，打定主意报复。那天大卫也在，我在城里见到他，我和他关系一向不错。但他听说我们的打算后马上就走了。看来当时我真该跟他走，其实我觉得，报复大可不必，况且我们确实已经闯尽了祸。总之，我怕跟大卫走，怕丢掉朋友，加上我不想回家，后来我又急切要在赫鲁涅维格弄间房子。就这样，深夜我们就“干上了”。没费吹灰之力便把门撬掉，不过我们什么也没拿，那里面真的什么也没有。厨房里有几瓶啤酒，我们就喝个精光，我的一个朋友说“：别再磨蹭了，烧了这破房子。”是的，我想，要让他们尝点厉害。接着就放火。不过我们当时没处于麻醉状态，甚至都没逃，而是走到对面的大街上，坐在地上看热闹，后来就被捕了，我们如实招认，当然还弄清了我们其他许多

劣迹。现在我们坐牢了：我在阿尔克玛，另两个在海牙的斯普兰监狱，因为他们年纪大一点。我只能对你们说，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切从头开始。我已经戒毒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吸，决心洗手不干了。但是我也不想再到你们身边了，不如找个地方租间房子，也许救济局会给个住处。不能再依赖你们，要自谋生路，也许很快能找到工作。我希望，社会救济局① 能给我帮助。不要怪我，我不想回家，但对我来说，最伤心的是我给你们带来了不幸。请理解我，负罪感将成为我的前车之鉴，永远告诫我不要再染上毒品……”

赫莉默然，我也默然。这信给了她希望，却让我感到强烈的嫉妒。我要是收到这样一封信有多好……与此同时，我忽有所悟。“负罪感将成为我的前车之鉴，永远告诫我不要再染上毒品……”我也常让大卫有负罪之感，让他立下他不能履行的誓言，结果使他的负罪感不断增强，他照旧吸毒。突然我大彻大悟。上帝，我犯了个错误！我操之过急了。西蒙的怒气也没有用。这一切我们在大卫面前暴露无遗。看吧，是你的过错，亲爱的，快弃旧图新改变你的生活吧，因为你拖垮了你的爸爸妈妈。我们这个家也给拖垮了。突然之间，我看清了这一点，但我还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。不管怎样，我还是睡着了，带着赫莉在我心中撒下的点滴希望。

可是我没有睡太久。有人站在我的床边。我还没全醒，但已意识到这是谁。我睁开眼，看到大卫站在我的面前。他穿着衣服和鞋子，显然是和衣而卧的。忽然我发现他浑身颤抖。我

①专门为有前科、服刑期满后获释的人员安排工作的机构。

坐起来，抱着他。他服服帖帖躺在旁边，颤抖着紧紧靠近我。我抚摸他的头发，亲吻他的脸。

“大卫,孩子,感觉不好吗？”

他更紧地偎依着我。

“都是这里边的事,”他敲敲他的脑袋说,“这里全是恐惧,它们总在我眼前晃。这真可怕，所以我死定了。而且我早死了，我身上只有一小块还没死，可现在也快了，它也要死。不然我就要发疯了……妈妈，我怕我会发疯……”

“不,大卫,你不会疯,有些事你不明白,所以害怕。你不知道什么是发疯,怎么可能害怕呢？”

“你什么都不懂,”他说,“我觉得我要发疯,我觉得。”

“来,我给你脱衣服,”我说,“脱了鞋,脱了衣服,就好受多了……”

但是他更紧地靠着我。

“妈妈,我真的要疯,我确实有这种感觉。”

“那我们就给吉斯打电话,问问他,能不能和你谈谈？”

“对,”大卫嚷道,“让我和吉斯谈谈,千万别再把我弄到床上去,我已经不是小孩子,不然我会觉得更难受。”

吉斯……我看了一下表：一点。大概睡了吧？可是大卫要跟他谈谈，这会给他一些安慰。我真不知道对他如何是好。我拨吉斯的电话号码，他并不觉得惊讶，说早有这种预感。我把电话移到西蒙的书房里，大卫跟着我，想和吉斯单独谈谈。我躺下想再睡一会儿。半夜一点。我听见大卫在书房里说话。蒙眬中我听着他的声音，犹如来自远方。

多半是我睡熟了，因为大门砰的一响把我吓醒了。我想是大卫走了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起身，就看见西蒙在屋子里。他打开灯，忙着去拉开窗帘。

“拉开！”他命令，“全拉开，拉开！”

他浑身酒气，我又害怕又反感。

“这就是你的办法吗？”我喊起来，“睡觉吧，我到楼上客房去。但是还有一件事你要听清楚：大卫很不好，他在电话里跟吉斯谈了一个钟头。让他说说吧。我警告你：别打扰他。去睡一觉，至少让你的酒劲儿过去……”

他在门边抓住我，把我摔在床上。

“你给我听着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晚上我算清账了。我和我的父母清账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工作我再也不干了，我找过鲁德，跟他就是这么说的。都说了……我再也不让……瞧我说了些什么。我再也不让……让，我说了……你找别人吧，你休想再见我……明天我就走……我……我要做我想做的事，至于做什么，就凭你那点智商，你一窍不通，这话你给我好好记住……好好记住……好好记住……让你妈妈完蛋吧……你也……活不成……我倒要看看你守着这所豪宅，背着大笔贷款怎么办，我再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了……一分也不……一分也……”

我从床上滚下来，抓住我的枕头，像个挡箭牌一样护着自己，离开西蒙。我打算往门那边跑。猛然间听到玻璃窗响。首先想到的是：西蒙打碎了东西。我回过身，看到他吓得目瞪口呆盯着窗子。一根四十公分长的木棍落在床上，整个屋子都是玻璃碎片。

“棍子是从花园扔进来的，”我说，“那些棍子……”

又一根木棍飞进来，打碎了第二块、第三块玻璃。我们听见楼底层和楼上的窗户接二连三地被砸碎。过后就一片寂静。有个小门被撞了一下，有辆汽车开走了。我们跑到一扇窗子跟前。花园里满目狼藉。木桩搬倒了，花草被拔了出来。大街上到处灯光闪烁。人们穿着睡衣走出家门，围在我们家的栅栏边。他

们低声耳语，他们讪笑，他们比比画画，他们盯着我们，可是谁也不想伸手相助。孩子们哭着下楼来，偎在我身边让我保护。大卫不知所措地站在镜子旁边，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，好像这和他毫无关系。西蒙脸色苍白。

“阿诺德，”他终于脱口而出，“这是阿诺德干的！我对你说过，要给那笔钱。我不该听你的，不该听你的，听别人的……”

站在前面的一些人顺着花园小径走近台阶，践踏了花木，后来就停住脚步，仔细打量我们，我感受到他们的敌意。不是阿诺德破坏了这富人区的平静，不是的，这都是我们干的。我们是吸毒者的家。他们对我们了若指掌。隔壁邻居都告诉他们了，大家都躲着我们，拿我们的孩子取笑，用手指戳他们的脊梁骨，已有好几个星期了。一九六三年的时候我母亲就说过：社会不容纳离了婚的女人。可能这一告诫影响了我，可能因此我才没敢离婚，一直背着我的婚姻枷锁。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至今我不得而知。

一九七五年十月：社会拒绝我们这个吸毒者的家庭。我对着破损的窗子站着，我还能理解这一切，我还有理智。可是西蒙不能，他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。他从地上抓起一根木桩，把一扇最大的窗子上残存的玻璃击个粉碎。玻璃碴落在人群里，他们就对着上面指指点点，一片威胁叫骂声。

“好好管教自己的孩子吧！”有人这样喊。另一个嚷道：“你们在这个区里搞了些什么名堂？”

面对这一切，西蒙暴跳如雷。

“你们都给我滚蛋！”他朝着下面咆哮着，又拿起那根木桩击碎窗框上仅存的玻璃。

我看到他的双手鲜血淋淋。

第 三 章

家庭医生把西蒙安置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活动中心，让他完全换了一个环境,可以休息、看书、散步、和像他一样因种种原因而紧张过度的人们交往。如果天气好，还能乘汽艇兜风。那些天我去看他的时候，我们两人面对面坐在花园或房间里，形同陌生人。我们不提大卫，不提那个可怕的夜晚，不提回家的事，也不说他是否能恢复工作。西蒙绝不为任何事操心。精神病医生观察他的情况，同我有过几次谈话，他说西蒙的反应属于良好。

“他自建了一道防线，”医生解释说，“只说眼下的所见所闻。”

我听了这个反应特别恼火，感到自己身陷不幸，孤独失落。我用超人的力量抚养着一个吸毒的儿子和其他三个孩子，他们都需要特别的关爱，可家徒四壁，经济拮据。况且是住在一个备受人们白眼的地方。只有赫莉和汤姆还理我。

“说真的,我也可以自设防线,”我悲苦地说“怎么不行 我离家个把月去休假，也只说眼下的见闻，只说花香鸟语。”

“你是太生气了,”精神病医生说“你为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，生丈夫的气。请你回家去找一根结实的木棒，再拿两个枕头

放在地上,就想像着那是你的丈夫,然后痛打一顿。”

对,对,好好地打一顿……

大卫不知多少次改变了对我的态度。现在他一言不发，要么就是骂人。他只把自己的想法和“烟瘾发作”时的一切感受告诉吉斯一个人。他一天给吉斯打两次电话，有时打三次，午饭后就到家里去找他。上学校的事再也不提了，甚至预订的课本到了也不理睬，我就把书收起来，放到柜子里，——我又一次失败了。遇到这事我已经能够忍住火气了，因为在家里本来就度日如年，没法过了。我不敢睡在靠窗户的地方，怕万一阿诺德回来。有一点声音我就会被吓醒，一听见电话铃响我就出冷汗。我开始服安眠药，医生给我开了镇静剂。

大卫又旧态复萌：直到中午一点还躺在床上。我时时倾听屋子里是否有异常的声音，他是不是起床了？是，是起床了……或者没有起床，起床了，去卫生间了。是我听见淋浴的水声抑或只是感觉？我像老鼠一样坐着，根本就不再吸尘了。有一次大卫听见吸尘器的声音，把他的房门砰地一摔，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吸尘了。他做什么事我都害怕。有时候他好容易下楼来，自己做点吃的。他做一份西红柿煎蛋，就把柜子里的东西全都翻出来，弄得厨房里乱七八糟也不收拾。如果我说他，他就说一通粗话，我就得朝他嚷，看着他一个人占着厨房没完没了地打电话，或者躺在沙发上。他好像什么都不害怕了，只有吉斯苦口婆心的劝说才能起些作用。不过我对吉斯也产生了某种不信任感。他再也不来我们家了，同我通电话的时候也不多说一句话，如果我要求同他谈话，他就斩钉截铁地拒绝。说他正忙着给大卫治疗，如果我需要帮忙，得另请高明。

“不是,我是想说说大卫的事,”我请求道,“他变得真让人受不了。”

“那就把他赶出去，”他回答说。

“赶出去？赶到哪儿？”

“这就是他的事了。让大卫自己决定上哪儿。他在你跟前你受不了，那就掐着脖子把他赶走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能把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赶走吗，他还要人指路呢。”

“那么你能给他指什么路？”

“不能，至少目前不能。”

“也许他要的不是指路，而是理解呢？如果你把他赶出去，他反倒会觉得轻松，他可能去找那些能够理解他的人呢？”

“那时候他就去找流浪者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或者还会到其他地方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会找那些了解毒品的人。”

“我觉得，他要找的那些人肯定会让他越陷越深。”

“你就是让他越陷越深的人。”

“我？

“不错，就是你，因为你每天跟他在一起，引起他的犯罪感，经常让他感到你们的家庭在破裂。就是你，你的唠叨和歇斯底里。你教他吸毒，因为你根本不理解他。你自己需要帮助，所以你就寻求帮助，你可别找我，因为我要帮的是大卫。”

我朝吉斯大发雷霆。他凭什么这样说？我把所有心血都用在大卫身上，自己甘愿为他去死。我的唠叨和歇斯底里……我朝吉斯发了一顿火，就去找赫莉谈心。

“你别听这些心理分析家胡诌，”赫莉说，“他们已经习惯了，向来都是诿过于父母。他们帮忙，帮的是倒忙。要是大卫和吉斯一块儿吸毒，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，因为经常听说他们从这些所谓帮助他们的人那里得到毒品。你就真的了解吉斯吗？他是

精神病医生？可就是这帮人里才有一些最古怪的人。”

我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，竟开始每天搜查大卫的房间。找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有时他午饭后离家出去，我马上就开车去跟踪他。经常是他消失了，我看不见他了。有几次我看见他骑着自行车朝吉斯家的方向去。我把车停在街口，但没有下车。想来想去，不知道该不该按门铃。我想把他们抓个正着，找到他们在一起吸毒的证据。但是我自然是什么也没做。其实我根本也做不了什么。我忘记了买菜，做饭也心不在焉，孩子们说了些什么，我根本就没听，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。我百分之百地受制于大卫的一举一动。

有一次他又是整夜未归。午饭后他去找吉斯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注意着他的行踪。我在屋子里坐了一整夜，吃药片，抽烟，喝酒。我过去可是从来不吸烟不喝酒的。我小睡一会儿，马上就又醒了，总想强迫自己脱衣躺下，但还是没有动弹，最后是和衣而睡，直到凌晨五点来钟。然后起来，盲目地上楼去。没有，大卫没有回来。我看了看别的孩子们，他们还正睡着，我就下楼了。上帝啊，我在这所房子里还能干些什么……我机械地穿上大衣，戴上帽子——那正是冬天，我走进了黑暗的街道，过了一个小沙丘，朝海边走去。但是辨别不出方向，看不见海在哪里：也许我会一步迈入水中，也许永远也走不到海边。不过这并不重要。我只是想出去。一片黑暗，寒风阵阵，药片也在起作用。好，一切都好，只要不呆在这所房子里。

我大约走了近两个小时，还是没有看见海。忽然我到了我们这个街区的另一头。我沿街走着，见一家人开了灯，便停了下来。我向窗户内窥视，见那家人已经忙碌起来了。我看着这幅景象，就像一个小孩子望着圣诞树上装饰的蜡烛；我看见一个年轻的母亲穿着晨衣在铺台布、切面包、沏茶。

我想，如果我能进去，如果我能问一问我是否可以成为他们家的一员……但是我向前走去，走到下一座亮着灯的房子。到这里我又停下脚步，看上去我犹如一个躁狂的女人在偷看别人的生活。整个小区的窗户逐渐地全都亮起了灯光，只有我家还黑着灯，那里没有穿晨衣的母亲在做早饭、叫醒孩子们……

这个念头让我一惊。我马上转身往自己家走去，一路上经过灯光闪烁的窗户，同离家出行的汽车擦身而过。我走得越来越快，忽然间感觉到街上寒风刺骨，我的手指已经麻木了。我又有了感觉，真的，双脚像冰一样。我又有了时间感和现实感。现在到底几点钟了，孩子们该上学了吧……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奔跑着,匆忙打开门,上了楼,也拿出自己的晨衣,到浴室去换上衣服，又穿着晨衣下了楼。我把桌子摆好，切好了面包，沏上茶——最平常的那一套过日子的活儿。最平常的那一套过日子的活儿,我对自己重复着,垃圾桶满了,火柴用光了,没有做夹肉面包的料了，该化冰箱了……最平常的那一套过日子的活儿，就是这些活儿应当挽救我。就这样过日子，只过一天。我应当自救——烧开水,灌水壶,沏茶,洗碗;一连串的琐碎事,从烧水开始,看,水就要开了。这是我的家,我开了灯,楼上是孩子们在睡觉。大卫不在家，他会回来的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如何回来，他的精神崩溃到何种程度。这不是我应该想的。我应该想的仅仅是些鸡毛蒜皮的事，比如水就要开了……

我好歹过完了这一天，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。我奉行西蒙那样的处世哲学：只顾眼前，没有过去，没有将来，没有责任感，我的见闻就是一切，今朝有酒今朝醉。

四天以后下午五点半发生了一件事。我正忙着鸡毛蒜皮的事，电话里响起一个不熟悉的声音：

“我是苏斯特贝格街警察分局值班室主任。你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吗？”

我从话筒里听到远远的喊叫声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正沉湎于鸡毛蒜皮的事中，一点情绪也没有。

“不错，我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，”我说。

“好的,那就请接听市医疗站 P 医生的电话。”

我从话筒里听到远远的喊叫声。

“喂,我是 P 医生，市医疗站的。你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吗？”

“我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。”

听筒里传出某人的喊叫声。

“S 太太，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告诉你，你的儿子在大街上被人救起了，他情况不好。也许你听见了吧，这是他在叫喊。我给你打电话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要把他送到 X 精神病院去。再见,夫人。”

听筒里传来叫喊声和弹击声。

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接着做未了的事：她的锅里煮着豌豆汤，把豆倒出来，用叉子把豆抠出来，又放回锅里，把豆壳倒进垃圾桶。做完了以后，她意识到发生的事情，家务活做不下去了。有情况。她还能听见某人远远的叫喊声。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上楼到卧室里。是发生了什么事。莫名其妙地一切都乱套了。叫喊声越来越大。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像是找东西，可不知道找什么。她把所有的柜子打开又关上。到卫生间去找。下了楼又找。她打开炉灶，找到了一根铁棍，那是用来烤鸡的。回到卧室，从床上拿出枕头放

到地上，开始用铁棍子打枕头，打了好一阵，用尽全力挥动着铁棍，一直打到失去知觉。

我的耳际总萦绕着一个人的叫喊声。我忽然间意识到这是谁的声音，自己也叫喊起来。

“大卫，他们在大街上抓的是大卫！他们要把他关到精神病院去，可你还在那儿同那些知识分子，同那些艺术家坐着！你把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！你让我独自对付这一切！我要把你打死！我要打你，一直打到你也喊疼，我打死你……我用不着求饶，我也不会回到母亲身边。你就玩你的汽艇吧，我打死你，我用这根铁棍子捅死你……西蒙，你为什么撂下我和大卫不管……”

我趴到枕头上，哭着，抽泣着，叫喊着，直到没有力气出声，我明白没有人能够安慰我。我哭喊着，直到喉咙失声，这时候我又能听到发自内心的声音。外门开了，有人进来，上楼来看我。我感觉到朱丽叶在抚摸我的头发。是朱丽叶的小手。

“妈妈,是我,妈妈……”她说,“我真高兴你又能哭出来了。”

我和朱丽叶一起给医院拨电话，电话接到了病房护士办公室。

护士说:“您不能探视,现在还不行,他病得厉害。他体力很差，全身都是疹子一样的斑点。他精神也不太正常，他有幻觉。他只讲德语，以为自己是在船上。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。到能来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们。”

“可是现在怎么办?”我问。

“我一点办法都没有,只要他有幻觉,你们就不能来。”

“幻觉?他怎么了?”

“麦角酸引起的精神病。”

电话里传来了西蒙很有朝气的声音，他报告说：

“我一切都很好，近两个星期以来我身体好多了。我已经同鲁德谈过，我想下星期就多少能干些事情了。暂时还不好说我那时是否就搬回家住，我需要逐渐地恢复，不是一下子就行的。”

我没说什么，对他一点也不忌恨。我已经把怒气全都发泄到枕头上了。我想像得到他打电话时的姿态，像过去一样：一身学生装，系着领带，年轻而动人，一点也没有做父亲的感觉。

“西蒙，”我说，“回家来吧，想办法，今天就来。”

“好，不过……说真的，我看，如果……还是……”

“回来吧，”我重复说，“你没有别的路可走，你不能再躲着了。”

“为什么说我没有别的路可走？”

“我也没有别的路可走。我们两人面对着同样的现实。大卫被送进精神病院了，他得了麦角酸引起的精神病。我听见了他在警察局的喊叫，这就是现实。我们不能去看他，他情况很不好，有幻觉。我们要等电话——这就是现实问题。如果你想面对它，就回来吧。”

接下来的是停顿，这时候我想 如果他说‘不’，我不会强迫他；这已经过去了，我已经发泄了怒气，听天由命吧。如果他说“不”，就当没有他这个人了。

他说：“见鬼，我在这里泡了多长时间了？这段时间出了些什么事？为什么他在警察局里喊叫？我为什么一直在这里？见鬼，该回家了！”

他上了出租车，坐了一段火车，又上出租车，不到十二点就

回家了。

“浪子回头，”我说，我们两人都笑了。

“我想同你谈谈，兰恩。这段时间，我很想念你们。”

我们坐在沙发上，离得很远，就像那天晚上大卫和朱丽叶坐在我们两人中间一样，我们感觉到，对他们来说我们形同陌生人。现在又有某种东西横亘在我们中间了——只有三个月的时间，西蒙去疗养，我因之陷入深渊，难以自拔。我把自己的怒气埋葬在这个深渊里。我们谈了一夜。我讲了吉斯的情况，表露了对他的不信任，讲了赫莉和汤姆二人相助于危难之中。我告诉丈夫，我几乎每天都跟踪大卫，可又越来越难找到他的踪影。我说我害怕阿诺德，说我吃了那些药片。说救了我一命的那些灯光闪烁的人家和他们日常生活的情景。您是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吗？对，我是……关于听筒里传来的喊叫，关于精神病医院。关于豌豆汤。关于厨房炉灶旁边的铁棍，关于我打枕头，关于朱丽叶的小手。

“你真的和我清账了？”西蒙问。

“我也同这一切清账了。”

“你的情况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刚到的那段时间好像消失了，我什么也记不得，据说我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不动。有人把我拉去散步，和我一起坐汽艇兜风，后来我砍柴，还给小棚子上了漆。其他就记不得了。你们慢慢进入我的记忆：开始是孩子，记得有一次在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给人看。然后是朱丽叶，可是她让我感到十分不安。记得吗，有一次在饭桌上她看我的那种眼神？她想把饭菜给大卫端到楼上去，可他跑开了。朱丽叶说：‘好了，看吧，都是爸爸惹的，爸爸取笑他。’说这话的时候她是那样的神情，我总感觉到她的神情。这个场面一连几个星期一直在我眼前，后

来突然消失了。然后是你，你对所有的人指手画脚——真受不了。我同精神病医生谈过许多咱们两人的情况，可是你的形象出现得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强烈，以致有一夜我梦见你压在我身上，把我吓醒了，我感觉到我要窒息了。那时候我就操起床边那根棍子。”

他沉默了。我们对视着大笑起来。

“咱们找的是同一个精神病医生，是你把这根棍子放在床边的吧？”

“这棍子一天没离我的手。”

也许这是神经质，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平静。

“那你就把枕头当成我打了一顿？……”

“我把你痛打了一顿，枕头里的羽绒都飞出来了。”

我笑得更加厉害。我在笑，但已经没有任何笑意了。眼泪不能发泄的痛苦此刻随着笑声涌了出来。我流泪了。

“西蒙，”我说，“我们的大卫，你的儿子，我的儿子，现在关在精神病院里。他们说那是精神病院，可这是地地道道的疯人院……”

早晨九点，孩子们在学校上课。忽然间电话铃响了，我拿起听筒，听到的是大卫惊恐不已的喊叫：

“妈妈，快把我接走！马上！这里的窗户上都钉着护栏！”

“大卫，你知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吗？”我说。

“这儿的窗户上全都钉着护栏，我是在一个什么监狱里睡觉的，还让我喝一种什么药，我不想喝。我使劲喊叫，把这一片的人全都吵乱了，我叫喊说：是我母亲，就是她应当把我接走。现在让我给你打电话，让你把我从这里接走，我旁边现在站着两名护士。你得把我接走，妈妈，知道吗，你应当……”

有人夺走了他手中的话筒。我听见大卫越来越远的叫喊：

“她应当，应当！我的母亲应当把我接走。”

我听见有人把他拽走，他呼喊着，叫妈妈，我听见门砰地关上了。这时电话里换成了一位女士平静的声音：

“请不要怕,他的烟瘾过去了,他好些了。他想离开这里,这是完全正常的，可您不能把他接走。您今天可以来看他，他会找理由对你说他应当回家，但是我们还要让他在这里呆一段时间。”

“他现在不讲德国话了。”我说。

“他是不讲德国话了，也知道自己不在船上。所以比昨天又进步了一点。但他的情绪还很波动，所以您今天一定要尽可能镇静。有事找我，我是护士福丝。”

有人用钥匙开了门，我们进去后门又锁上了。护士福丝迎面走来，把我们领到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。

“请在这里等等,我去把大卫叫来。”

墙角放着四把藤椅和一张桌子，桌上有几本杂志。没有鲜花，没有书，墙上也没有挂画。

“上帝啊,西蒙,这里太乏味了。”

“我跟你说,这是暂时的,下个星期他就回家了。”

门开了，大卫进来后又关上了。他一个人站着，一步也没有朝前走。

“如果你不想接我走,那就滚蛋,’'他说。

“大卫!’'西蒙朝儿子走去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告诉妈妈了，让她把我接走。”

“我们不是来接你的,’'西蒙说,“我们是来看看你,如果你愿意，就跟你说会儿话。要是你让我们走，我们就改天再来。”

大卫看了父亲好半天，忽然用脚踹了一下门，然后轻轻地摇

晃着，低下头把手插在口袋里，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我坐在墙角，平静地等待着。西蒙站起来，在门口盯着儿子。大卫每次经过父亲面前，总用力甩甩手，好像要打他。忽然他朝我走来，坐在我对面。

“你把他叫来干什么？我让你叫他了吗？他已经离开我们了，别让他再回来了。”

“你父亲感觉好些了，就回家来了，我很高兴。以后我们会重新团聚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会一块儿来看你。我很高兴。”

他挥了挥拳头，猛一下转过身去。我沉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看了看我。

“我会逃出去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不把我接走，我就自己逃出去。如果需要，我就杀人，那也要逃出去。”

我沉默，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大卫隔着桌子朝我弯过身来说：“我要杀人！”

“我听见了。”

“那怎么着……”

“这是你的事，不是我和爸爸的事。不过我想，到那时候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。”

“那现在谁又能帮我什么忙？”

“把你放在这里，就是为了帮助你。”

“你们定要让我吃药，可我不愿意吃，也不想吃。你看见这里的那些人了吗？个个都是有气无力的，都是因吃了药。我就不吃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把我接走，我就自杀，割动脉或者跳窗户，反正我有办法。无论如何不呆在这里。”

我看了看窗户。

“窗户上有护栏，大卫。”

“反正我有办法，到时候你就该后悔了，再后悔也没用了，我

可告诉你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大卫，那不是我们的办法。你应该留在这里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暂时的，你知道。只要你不打电话让我们别来，明天我们还会来看你。”

我站起来朝门口走去，轻轻一推门就开了。大卫跟着我，在门口使尽全身力气抓住我。

“妈妈，”他喊道，“带我走，带我离开这儿，我要自杀，告诉你，我早就不想活了！”

两个护理员扭住了他的胳膊。

我们站在外面，还听到他的喊叫。我们十分沮丧地上了汽车。

这天晚上我到母亲家。应该把某些情况告诉她，不能全都瞒着她。可是我能告诉她些什么呢？说你的外孙子吸毒，他因为吸毒出现幻觉，现在进了精神病院吗？如果现在我们请你照顾孩子们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了吧。我已经编造了好几个故事，可是听起来都不真实。最后我决定说说看，见机行事。还在车上我就看见母亲的房子沉浸在黑暗中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因母亲晚上从来不出门。我忐忑不安，把钥匙插到钥匙孔里。门从里面闩上了，进不去。我通过钥匙孔看见走廊里没有灯光。母亲即便出门去，也总是开着走廊的灯……我按了门铃：两声短音，一声长音——过去我忘记带钥匙时总是这样按铃的。我开始等待，看怎么回事。房子里依然悄无声息。我越发着急，门是闩着的，就是说母亲在家。忽然间窗户上有微光闪烁，窗帘动了一下，朝一边拉去，我看见了母亲的脸。窗帘放下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屋子里亮了灯，我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。母亲开了门，

让我进去，然后让我坐到椅子上。她说：

“我,啊……睡着了,不知道你会来。”

为什么我的母亲要说谎？是神经紧张吗？她到厨房去烧开水 。

“你喝什么,茶还是咖啡?我怎么都行,听你的。”

她睡不着，故意把灯全关了，把门闩上。

“你来了，真好。晚上还是经常过来走走，否则我总是一个人。”

她匆忙地沏茶倒水，没有问起孩子们的情况。

“西蒙回来了,”我说。

“孩子,”她说,“这很好。你们应该一起承担。一个人呆着太可怕了。”她又摆弄茶壶茶碗,“我沏上茶,这样好,对吧?”

我们两人进了屋，开了落地灯。

“冷吗?要不要把暖气开大些?”

房子中间是一张大桌子，左边是玻璃橱，右边是三角钢琴，家具还是我离家之前的摆法。

“妈妈,你为什么不开灯,一个人坐着?”

她抬起头，面前是一个茶杯。她的脸看起来比她的七十岁要老，孤苦无望。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。

“唉……大卫……”她说。

“大卫怎么了？他也在你这儿呆过？”我问道。

她耸了耸肩膀。

“我还是要告诉你,孩子……”

她又用手绢擦了擦眼睛，把茶碗放到桌子上。

“大卫情况不太好,”她说,“你们从来没有关注过,他特别敏感，可在孩子们中间他总是最不讨人喜欢，所以才会变成这样。他太不幸，不只是我一个人觉察到这一点。他生在我这个房子

里……„

妈妈开始用一种怪腔调说话，我受不了，便打断她的话：

“你到底是说呀，有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一个人黑着灯坐着？”

她啜泣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也对我这么凶？我本来就够烦心的了。我黑着灯坐着，是因为我……我怕大卫再来。至少现在你知道真相了。近几个月来他一到晚上就来，还……说一些吓人的话，我怕自己的亲外孙子……你不觉得这可怕吗？在我家里降生的外孙子，我对他……”

老天爷，别跟我来这一套吧！我抓住母亲的肩膀，使劲地摇晃。

“请你别演戏了！你是说大卫一到晚上就来找你，你怕他。为什么？他找你干什么？要钱？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要钱，’母亲回答。

我放开她，坐到椅子上。他要的是钱。一连几个月。当然，我想像得到，他从我这里拿不到钱，所以就找外婆。

“那你就不能问问他要钱干什么？”

“我问过。他借了别人的钱，要是不还，他就会死……还说我不能对你们说一个字。”

“你给过他多少钱？”

“我不记得了。每次都是一二百荷兰盾……”

“每一次……多长时间了,几个星期了,他多久来一趟?”

“你不该对我生这么大的气。他一个星期来一两次，已经连着好几个月了。可是最近我黑着灯呆着，就像是我不在家，近一个星期他没有来。”

对了，一切都对上碴了，近一个星期他因吸食麦角酸出现幻觉住在精神病院里，买毒品靠的就是你给他的钱。对了，你早就

应该掉眼泪……

“最可怕的是，”母亲接着说，“我知道他要钱干什么。不，不是从他那里知道的，但我知道，我找医生谈过。怎么让我们摊上这样的事。医生说：您务必同女儿谈一谈。你今天来了，我很高兴，最近我对于你们的情况一无所知，而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到你们那里去……医生向我解释了大卫要钱去干什么。还债吗？是的。不过不是借了钱或者输了钱，而是因为吸毒，医生说，不管怎样他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时下许多青年人都这么干。”

“可医生也没说你该不该给大卫这些钱？”

“没有，当然没有。他不谈这个，因为他自己也不了解，他是这么说的。他只说：请同您的女儿谈一谈。可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想：那个不省心的丈夫本来就够你受的了，所以起初我就把钱给了大卫，心想也许他会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我。我哪儿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他会，就是说，他竟然……”

“他怎么了，妈妈？你应该把情况全都告诉我。”

妈妈再次用手绢捂着脸。

“他会威胁自己的外婆，”她大声哭起来，“这太可怕了，可是我要告诉你：你的儿子——他吸毒。噢，怎么让我们摊上这样的事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”我怒气冲天，“威胁？你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指的是，如果我不给他钱，他就自杀，因为他离不开毒品。”

我勃然大怒。我恨大卫，恨我的母亲，恨他们干的这一切。

“老天爷，那你干吗让他这样吓唬你？”

“我又能怎么办？”母亲喊起来。

当然没有任何办法。她又能怎么办？如果大卫威胁我，我

认了，那我的母亲，一个对外孙宠爱有加的外祖母，又能怎么样？况且他还是生在她的家里。

“妈妈,咱们别哭了,也别喊了,还是面对现实吧——大卫吸毒。他吸食毒品，大量吸食。眼下他在精神病医院戒毒，治疗因吸食麦角酸而患的精神病。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他要接受治疗，我也不清楚要多少时间。不管早晚，他会出院的，不管健康或者不健康。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来找你。你不会再给他钱了吧？他来的时候，请你告诉我，还有，请不要再黑着灯坐着。”

母亲点点头，答应我，又点头，再答应我。她被戒毒精神病院吓得魂不附体，根本就不敢再问什么是麦角酸引起的精神病这一类问题了。她答应以后不背着我做任何事情。我穿上大衣，母亲送我到门口。我走到街上，听见她把门闩上。

朱丽叶到门厅来接我。

“你告诉外婆了？她可能让大卫给吓坏了，哭了吧？贝尔纳的父母在这里，他们收到他的信，是从监狱寄来的，爸爸把大卫的情况都说了。爸爸回来了，我真高兴。他一点也不生气，把他自己的遭遇讲给我们听。不过现在他好了，多让人高兴，妈妈，真的！我已经煮好了咖啡，他们正喝哪。也给你煮一杯吗？”她把我拉到屋子里“：你知道吗,爸爸允许我晚一点睡觉,他自己说的。”

她坐下了，靠着爸爸坐到沙发上，西蒙紧紧地搂着她，笑了。他们之间重新出现了平和与安定感。

赫莉和汤姆。我感受到温暖。同他们可以无所不谈。我们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如果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那完全可以患难与共，想出办法。父母，我想道，吸毒者的父母应当互相鼓励。

我把这话说了出来，汤姆反对：

“这可是许多人的事。你怎么能把这么多的父母聚集到一起？你发一个布告试试，他们会吓得不行，根本不敢露面，不会响应的。还是让他们想想自己的难处吧，干吗要把家丑外扬。也许过上一两年能做到，可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是免开尊口。”

赫莉说：“如果现在有那么一些家长组织起来，一定会大有好处。比如监狱里那个本尼。每星期三我们可以去看他。这已经有一个月了，他每次都求我：下次给我带点毒品来。这里的人都有，他说。就连社会救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说，太太，没关系，可以带一点来。我们没有给他带。结果本尼说：如果你们什么都不带，那就别来了。我们也就不再去了。可这不过是说说而已，实际上我们真头痛。如果有那么一个组织，说不定就找得到有一定经验的人，他会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对付过去的。可我们呢，单枪匹马，绞尽脑汁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每星期三我都想：不,我还是要去,悄悄地,不告诉汤姆。我去了,买了一点这该死的东西,放在《特洛伊木马》那本书里。我真的苦恼透了,”她笑了，“你能想像我在那里的模样吗？我穿着格子裙，戴着项链——却买了毒品放在《特洛伊木马》里……”

“可是你现在已经同他失去了一切联系,”西蒙说,“你不能再去看他了。”

“是，这太可怕了，你看，我们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看见他了。但是他给我们写了一封信，我带在身上，你们应当看一看，你们知道,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都不带才对。”赫莉说,“你们看，这就是信，我读给你们听，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教训……‘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把监狱里发生的事和我的态度讲给你们听。这里的情况是不正常的，因为被关在这里的人都怕暴露自己的弱

点，都装成不可接近的超人。不能表露情感，否则人们就把你当成胆小鬼。我学会了袖手旁观。好在这里还有几个小伙伴，可以同他们打招呼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友谊和信任。那里还有一些穿灰制服的看守，能让他们做的仅仅是打开牢房的门，如果你把我说成看守的朋友，那你在这里就没法过了。当然有时也会想：一切会好起来的，只要别犯规。我希望能早日出狱。我现在在装订车间干活，我喜欢干这个。早晨七点起床，洗漱半小时就吃饭。八点五十分每人就要开始工作，十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自己的号房。你会领到一份热腾腾的食物，从十二点到十四点，牢房的门上锁。这个时间我总是躺在沙发床上。然后又上工，到五点钟。此后的半小时可以淋浴，或者收拾房间，或者聊天，五点半送饭车到，每人可领到面包和咖啡。六点四十五分牢房门又会上锁。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活动，看电视，打弹子或者乒乓球，或者做鸟笼子。这是我喜欢的，因为我想买两个卷毛鹦鹉，教它们学会点玩意儿就把它们放生，那它们就会围着我飞。九点四十五分牢房又锁门，到第二天早晨七点开门。于是一切从头开始。我也运动，一周打四次排球，这对健康很有利。就是说被监禁的日子完全会过去的，不过我觉得这样活着实在没有意义。为什么？——有时候我问自己。我明白，是我做错了事，社会要惩罚我。可是光惩罚解决不了问题。这样做什么好结果也没有，大部分孩子是怀着仇恨回到社会上的，他们感觉到有人浪费了他们一年的光阴，还有别的事叫他们不满。我认为，一千万荷兰人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监狱，监狱又如何伤害人们的心理，这太糟糕了。可是最大的不公平却是，你获释后就没有人关心你，因为你是另类。这是百分之百的骗人。这是我从那些几进几出监狱的孩子们那里听到的。他们能做到的仅仅就是给检察官写信，给部长或别的人写信，其余就完全无能为力了。说实话，我

认为把吸毒的人定为刑事犯本身就是犯罪，因为事实上他们是病人，如果他们需要，应当帮助他们，他们不能为整个社会的过错而承担罪责并受到惩罚。我到了这里马上就被强制戒毒。好了，过上两个星期一切就过去了，可这只是生理上的，不是心理上的。我的感觉坏极了，所以我总是请你们给我带点毒品来。其他的孩子能随便得到毒品，就连社会救助处的工作人员都给他们。不过你们没有这样做，我感到很骄傲。我想过，他们会投降的，结果却没有这回事。你们也挺住了。过两三个星期也没有带毒品来。你们做对了。现在你们还可以来看我，我不会再要毒品了。我出去以后会努力克制的。我需要一间房子；当然，会有人让我再吸，可这是小菜一碟。也许你们会替我想出什么办法。再见。本尼。”

赫莉慢慢地把信叠起来，小心地放到手包里。

“看见了吧,我们挺住了,他为我们感到骄傲,”汤姆说。

“我也为他骄傲,”赫莉温柔地说。

赫莉和汤姆没有给本尼送毒品，不过他们因此同他失掉了联系。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“头痛极了”。赫莉甚至想背着汤姆给本尼送去，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下来，采取一致行动。现在儿子为他们感到骄傲，这给了他们新的希望。希望——失望,希望——失望。不过眼下他们还有希望。赫莉和汤姆教会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作为父母，我们不能做任何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负责任的事。但首先我们学会的是，父母应该一致行动。

对于我和西蒙来说，这十分重要，因为我们也同样为大卫的要求“头痛极了”。他任意摆布我们,并且敏锐地观察,看我们两人是否一致，看我们之间有什么空子可钻。我们第二次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站在装有护栏的窗户里面，边走边对我们破口大骂，

显然这是事先准备好的。然后他说：

“你们干什么？看热闹来了？要是不把我接走，就滚开！”

这太可怕了，但是我们平静地走了进去。到了摆有藤编家具的屋子里，他接着骂我们。但看见我们一言不发，他就改变策略。他得胜回朝似的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以为我在这里过得挺好，这是个好医院，就能让我把毒戒掉。能行吗？这是一家糟糕的精神病院，如果我想抽大麻，护士就会给我的，只要我开口就行。”

“哪个护士会给你？”西蒙马上问。

“就是我们这个科的，昨天他给了我一点，是他自己卷的，今天早晨又给了。如果我还要，他还给。要多少给多少。”

“你真走运，”我说，同时向西蒙使眼色，让他不要说话。可我强压怒火。不用说，马上就得终止这种事。

“只要想要，这里每一个人都能要到。这里是一个该死的小铺。”

“我看见楼下有一个乒乓球台，”西蒙说。

“他们不让我去，怕我跑了。只有爸爸或妈妈领着才让去。可我不想跟你们去。”

我们又沉默下来。

“你想打乒乓球吗？”西蒙问大卫。

“要是桌子闲着……”

“可以问一问。”

大卫站起来敲了敲门。护士走进来。

“你给我听着，”大卫说，“我们想打乒乓球。带我们去。”

听了他十分粗野的口气，我心如刀割。我看了看西蒙，他也像我一样在极力忍着。但是护士却做出没有听见大卫的话的样子，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想回家了吗?”

“我们想打一会儿乒乓球,当然,如果可以的话,”西蒙说。

“可以,我带你们去,”护士回答说。

大卫走到门口。

“我不去。”

我们三人都不说话。忽然间大卫用力猛踢屋门。

“我不去！不打……你们两人滚吧！”

他朝我们挥了挥拳头。护士拽住他的手，把他拉到屋外去。

“冷静一点,”他劝道,“你的父母要回家,好好和他们说再见。”

我和西蒙相继出了门，我全身发抖。

“再见,大卫,”我轻声说罢就从楼道跑出去。我们面前的门再一次打开又关上。我披上大衣，袖子耷拉着，像两条鞭子。西蒙想挽着我的胳膊，可是抓住的是一个空袖子。要是别的时候我会笑他，可现在这成了我们软弱无助的象征。我实在忍不住了,便说:“我再也不来这里了,没有力气,我再也不来了。”

“我们没有必要再来这里，至少过一段时间再说。”

“然后呢？我们应该了解情况呀？”

“明天往这里打个电话。我想和精神病医生谈谈。”

第二天我们打了电话。护士和蔼地告诉我们，大卫坐在隔离室里。

“是的,你们可以同精神病医生谈一谈,请等一等,我给您把电话接过去。”

“B 医生今天开会，但他可以晚一点见你们，大约在四点半。行吗?”

行、谢谢，好极了，我们能坚持到四点半。隔离室。大卫在

隔离室里。我脑子里闪过一幅幅可怕的图画。我活到现在，听到了许许多多可怕的故事，现在把它们都套到大卫身上。他穿着精神病人的拘束衣，服了药后安静下来，在空荡荡的屋内喊叫。门上安装了监视眼，有监视器对着他。护士们紧盯着监视器上的图像。

“西蒙，我受不了。让他给我们说说什么是隔离室？”可我自己就有了答案：“找吉斯。”我直奔电话。

“我告诉你，大卫那次没有回家，你至少应当给我打个电话。现在已经过去七天了。我能帮他点什么？”他说。

“什么是隔离室？它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？他要关多久？”

他一言不发，过了一会儿说：

“据我所知，现在父母们要听的是能安慰他们的故事，可我不想这样做。你和你的丈夫，以你们常人的心态，总希望一切都完美无缺，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孩子不良行为的深层原因。你以为我三言两语就能在电话里把隔离室是怎么一回事说清楚吗？顺便问一句，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？这是你们这些可恶的人在承认自己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使用的办法。现在听明白了，该问我什么是断头台了吧？我怎么也得从法国革命最早的起因开始说起。我相信，你知道的仅仅是这场革命开始于一七九五年。”

他放下话筒。我忽然间全都明白了：吉斯恨我。他恨我和西蒙这样的人，就是靠父母的供养上学、住着豪华的房子、生活上应有尽有的人，按他的话说，这些人应当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负责。他穿着牛仔衣，骑着自行车，为上学欠了政府一大笔债，所以他替大卫这样的人说话。不是因为我能够或者想帮助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证明了他的道理。“吉斯教我行得端走得正”，这是大卫同吉斯前几次谈话之后对我说的。当时我没闹明白他指的

是什么。"怎么能'行得端走得正'地吸毒"——这是当时那句话的含义。大卫可能就是在吉斯的唆使下继续吸毒的。我这才茅塞顿开。

大卫的精神病医生把我们的婚姻做了一番解剖，结果好像该进精神病院的不是大卫，而是我们夫妇两人。

"我想同母亲再谈几次话，"医生最后说，"我非常需要了解大卫的全部童年生活。请同我的女秘书预约最近四次谈话的时间，好吗？"

"为什么要单独同母亲谈？"西蒙问。

"据我所知，您本人也在精神病医生的监护下，我不想卷入这个过程，再说，同母亲一个人谈也就够了。"

"大卫到时候会在场吗？"我问。

"不，我们二人单独谈。"

"我不喜欢这样，让大卫一起来，反正谈的是他的事。"

他冷冷地看了看我。

"夫人，这事我说了算。我只需要你的配合。"

"大卫不是小孩子，他有权知道我要对你说的一切。另外，如果他听到我同你单独谈话，他一定对我大发雷霆。我想他这样做也没错。"

又是冷冷的一瞥。

"夫人，我自己会做结论。我只需要你的配合。"

我们提出的问题得到的仅仅是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回答。

"医生，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吸食麦角酸引起的精神病？"

"这是一种'绒毛状组织的不正常状态'，会出现恐惧和慌乱。需要让病人恢复原先正常的思维和生活方式。"

“大卫说他不想服药,是真的吗？”

“眼下他是千方百计地对抗。每个病人都会根据患病时间的长短得到必要的药物。大卫应当明白，给他开了药，他不用，就恢复不了。”

“大卫说如果他想要毒品,他就能得到。”

“你们看见他吸了吗？”

“没有,他只是这样说。”

“这是他故意吓人。我们医院里只有药。我们为病人考虑，从来不用毒品，毫无例外。”

“那为什么大卫要住隔离室？”

“他拒绝服药,这你知道,所以他经常出现狂乱状态,一个人应付不了，惟一的出路就是隔离室，”医生说。

“这一个人指的是某一个人应付不了，还是大卫本人应付不了？”西蒙恶狠狠地问道。

“我指的是总的情况，治疗的过程，治疗就是让病人恢复正常。服药，隔离室——这些手段全是为了抑制病人的反抗，要等你的儿子完全安静下来，我才能给他治病。”

后来的两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四次谈话。

我要把一切和盘托出，从大卫出生讲起，务求真实，因为我想这是为了大卫好。精神病医生几乎不看我，他不停地记录，谈话结束时他把笔记本合上说：

“今天就讲这些。我们前进了一步。”

最后一次谈话时他说：

“好吧,就这些了,以后你不用来了。”

我十分惊诧。

“怎么就这些了？你用这些东西去做什么？”我指了指他的

文件夹:“你把我的全部个人生活都记录下来了。”

“我打算在病历上用，我们要对他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了解。”

“那你能给我看吗？”我问。

“病历只记病人的情况,不能给你看。”

我站起来，一句话没说就出了房间。精神病医生显然是想把我也完全制服。

在此期间，大卫开始寻求同我们接触。我们最后一次探视他后过了三天，他非常平静地打了一个电话给我。

“我觉得我应当向你们道歉，”他说，“好,现在我就给你们赔不是。”

我的反应错误至极，我几乎哭着对着话筒大声说：

“大卫，我真高兴，你打电话来。不然我们整夜都睡不着。当然，我们不生气。你受了那么多罪，我们理解！你想让我们来看你吗？那我们今天就来，我们说说近来的事。”

大卫恰恰就是想说近来的事。像任何一个健康的正常孩子一样，他应当好好想想自己过分粗野的行为。可是我却用和事佬的叹息为他重新控制我们开了绿灯。事实上我告诉他的是：“父母可以承受孩子加予的一切，因为你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错误，我们知罪。”

我说服西蒙推迟明天同鲁德的会面。然而这次会面非常重要，关系到西蒙恢复工作。但是这难道能与大卫向我们道歉这一极其重大的事件相提并论吗。西蒙也“为这个孩子这些天经受了那么可怕的折磨”而感动得几乎流泪。

我们到了医院。我们和大卫一起打乒乓球，打得满身大汗。院方允许我们带他到公园散步。只有十五分钟，不错，当然，我们会看好他的。因为大卫特别喜欢散步，我们答应他一定每天

带他去公园散步。当然我们要征得护士的同意。当然，会说好的。然后我们一定要求延长散步的时间，这我们能办到。一个星期里大卫成了一个“受到特殊照顾的病人”。在家里大卫是我和西蒙谈话的全部内容:他想什么,说了什么,精神怎样,眼神如何。我们把其他的孩子忘了，再也没有一句话谈西蒙的工作，我们没有时间考虑我们俩的“新”关系。

这期间大卫却很有心计地同我们周旋。看到威胁和好话都没有起任何作用，他依然住在医院里，于是就开始改变策略，想利用我们为他牵肠挂肚的心理。只要我们单独呆在一起，大卫就装出想睡觉的样子。他不听我们说话，或者盯着一个东西看，不过装得很得体，否则我们就会去问医生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见我们神经过分紧张,就又‘清醒’起来。

他说：“这都是药的作用，见鬼去吧，这儿给我吃那么多药，我都成傻子了。”

大卫出院后过了很长时间，我们才听说他把我们骗了。他从未服用过一个药片，精神病医生根本就拿他没办法，不能“制服”他。他装出睡眼惺松的样子，动摇了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日日夜夜不得安宁，反复琢磨我们让他继续住院到底对不对？对他的治疗是否合适？是否应当让他去专门的戒毒所？我们做父母的，现在是不是应当干预？

我们同赫莉和汤姆商量了一阵。

“你们去‘艾米利胡维’收容所试试,”汤姆说,“我有一个亲戚的兄弟在那儿工作，我可以和他商量一下你们的事。”

我们同这个人见了面，结果是“艾米利胡维”同意派一个专门小组去同大卫谈谈。

我们的成绩还要多些……

到医院之前，大卫买了两张弗兰科 ·扎巴音乐会的票，他一直在说这件事。

“ 我一定要去听这场音乐会，要是不让我去，一切就全完了，”他坚持道。

我们再次顺从地出发，先到护士那里，后去找精神病医生，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西蒙得到允许陪大卫去听音乐会，西蒙要求大卫答应：

“ 什么毒品也不能碰，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得接触，否则就去不成‘ 艾米利胡维 ’了。”

大卫答应了：

“ 当然,什么毒品我也不吸,我又不是精神病,我知道我应该老老实实的,否则‘ 艾米利胡维 ’的事也办不成了。”

但是他还没进大厅就食言了。他向一个认识的孩子要了一支自己卷的烟，接着就和他一起消失在人群里，西蒙找到他的时候，音乐会已经结束，他东倒西歪，不成样子。他的诚实化为泡影。在音乐会进行的三小时里，西蒙气得眼睛冒火。最后他看到大卫走了出来——那眼神父亲太熟悉了 ——这已经足够了。后来西蒙对我说：

“ 我看不得他这个样子。他多么轻易地又骗了我，不珍惜任何机会。我受不了，我愤怒至极。好像是我推搡了他，然后把他拖到街头。他一点也不反抗，过路的人开始同情他。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上车的，也不记得后来大卫反抗过没有。我让大卫坐在我旁边，像疯了一样开车回家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我也一样，只是急切地编造着说过的理由，以解释大卫为什么没回精神病院。他那副样子，我没法把他送回去。 ”

“ 如果我们说…… ”

“ 不,我知道我们该说什么,”我喊了起来;“ 我马上打电话,

就说你从鹿特丹打来电话，你的汽车出毛病了，你可能撞了什么人。”

“这要到警察局去查证。”

“好吧,就算没有撞人,车出了点问题……车灯坏了,你回不了家,留在鹿特丹了,我们那里有熟人,你们在那里过夜,明天早晨就把他送回去。”

“最好别说熟人，因为他们到时候会要地址，一定会去核对的。”

“那么,我就说你还不知道去谁家过夜。”

我就这样打了一个电话，绷着脸。唉，到了什么地步：我们像大卫一样也撒起谎来，为了尽可能救他，不惜说瞎话。可是大卫不能再错过去‘艾米利胡维’的机会了，否则我们在这里会束手无策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明白这一点。

早晨我又打了一个电话，请求晚些回家，因为大卫自然又是卧床不起，不省人事。

“我的丈夫把车送到鹿特丹的车行去了，修车需要一段时间，不过到中午无论如何会把大卫送回来。”

后来我们终于上路了。大卫像一捆草似的坐在后座。我总是转过身去看他。不，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异常，不过是累了，多少有点感冒，现在到处是流行性感冒。第一次出门太疲劳了。

“你看他有什么不对头吗?”我问。

西蒙看了看镜子。

“没有,”他说谎了,“我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

“艾米利胡维”的专门小组第二次前来谈话。大卫跟他们聊了一阵，最后决定：他可以去。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我

现在明白，大卫极力想去“艾米利胡维”并不是因为他继续吸毒就活不下去了，而是因为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逃出那所精神病院，他在那里呆了五个星期，觉得就像被关在监狱里。对于西蒙和我来说，这是个解脱。最后总算找到了一个能帮他的地方。我们百分之百地相信“艾米利胡维”，他们多半会帮助大卫戒毒。此外，由于前几个月不许他见我们，我们也终于有时间安排自己的事了。不料大卫的精神病医生对我们的想法持激烈的否定态度。

“如果大卫连这里的环境都习惯不了，那么到了‘艾米利胡维’他会一无所获。”

然而这个聪明人的高见我们不爱听，去他的吧！

我和西蒙又开始笑了。重新制订了计划，比如把大卫的房间收拾好：他用刀子把墙壁全都划得乱七八糟，往地上扔了一些瓶子和烟头，我们决定擦掉所有的痕迹。等到大卫健健康康地回来、上学，他就会住在一个新房间里开始新生活。我们买了涂料，马上就开始装修。我们的手已经多少个月什么活儿都没干了，这时候忽然刷出了一道白墙。装修工作干得越多，我们就越想恢复以前的生活。有一天早晨西蒙说：

“你自己把屋里的活儿干完吧，剩下的不多了，我今天就想去上班。”

大卫将由“艾米利胡维”的人接走。我给他拿上干净衣服，就到医院去。可是忽然间我感到不舒服。我马上就会哭出来，我知道。在楼道里遇到护士福丝，我确实马上就哭了。

“来，给我，”她接过我手里装东西的箱子说，“我给他送去。你回去吧，安静一下。一切都会很好的，等着吧。”

但是我没有回家。我忽然感觉到，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

我和大卫联结在一起了。我在停车场上把车调转了方向停下，好看清楚医院的门。我戴上墨镜，坐在车里一直等到大卫出来。这就是他，我的儿子，迷上了毒品，已经戒不掉了。他长得又细又高，眼神还像个孩子。他拎着包，走在两个陌生的男孩子中间。他们上了车。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别人在帮助他。我像失去了理智，开车跟在他们后面。我知道要小心，要保持距离，否则他们会看见我。蒙斯特斯大街……离我大约五米远，他们的车向左拐进一条小路。我加速行驶，也向左拐。大卫坐的车不见了。忽然间我看见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艾米利胡维”。“艾米利胡维”……“艾米利胡维”……“艾米利胡维”……

大卫消失了。只能看见树木掩映的小街和有“艾米利胡维”字样的牌子。我顿时无力地把头靠在方向盘上，眼镜掉到地上，我的痛苦一下子涌了出来。

那天夜里我又梦见这个场面。我把大卫放到小浴盆里，一只手托着他的头，下面是水。我只要一放手，他就……我只要一放手，他马上会死……我害怕极了，我喊叫。我的母亲抓住大卫的小脚，拍他的背，拍他的小屁股。水流出来了。一股股地流出来。水像喷泉一样从他的胸腔里涌出。一股股水柱打湿了我的衣衫。

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，才惊奇地发现，几乎要溺死的不是大卫,而是我。

只要大卫不在家，我们的家总算还有个家的样子。我们又开始关照其他孩子。九个月来我第一次带着朱丽叶进城，给她买牛仔服，让她吃冰激凌。我和西蒙又去看电影，到学校开家长会。我要重新习惯于做家庭琐事，采购时还需要不停地看表，惟恐我出来得太久，大卫出什么事……睡觉，首先是睡觉，我已经

好几个月和衣而卧了，睡不着，总听着，不知大卫是不是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我还要习惯于西蒙，他像每家的父亲一样早晨八点钟就离家，我不用再把自己的钱藏起来……好去买花，买点好吃的食物过星期六；多亏做这些琐事，我才明白我们家为大卫吸毒吃了多少苦头。与这些相比，勃朗麦的神经性腹痛，约欣生湿疹的小手，都不在话下了。挽救家庭只有一个办法：撇开大卫去安排生活，不要天天迁就他的乖戾。大卫在“艾米利胡维”没有危险，那里有整个一个专家组帮助他。我们应当调理自己，因为我感觉到我们都有病，一家人都有病，全家都怕上街，家里再也没有朋友，谁都不理我们了……感谢上帝，我们终于有时间恢复原来的生活了。

我们得到了五十八天空闲时间，有五十八天家庭生活，体味了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。有五十八天可以让西蒙再次投入工作，并且同鲁德处好关系。五十八天对于我和西蒙——对性生活不再反感，不再耍滑头，上床的时间既不比他早，也不比他晚，而是和他一起就寝。五十八天可以用来同父母言归于好。然而，在五月的一个明媚的日子里，下午六点钟，“艾米利胡维”的一个女工作人员给我们打电话说：

“大卫逃跑了，”她告诉我们，“他多半是在回家的路上，请你们不要让他回家，把他送回来。如果今天半夜之前他回来，我们还容留他。就是说，请你们让他回来。别让他回家，这对他好……如果他出现了，请打电话来。”

这对我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我丧魂落魄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是重复她的话：

“逃跑……送他回去……半夜之前……”我竟然没有想到问一问他为什么逃跑。放下电话我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。两个小

孩子在桌子旁边跳起来，着急地喊叫，抢着问是什么事。

“把谁送回去，妈妈？大卫逃跑了，是吗？为什么？他们怎么他了？打他了，是吗？你说呀！你不能送他回去。妈妈，妈妈,你倒是说话呀!”

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我看着朱丽叶，她还是平静地坐着吃饭。也就是说，她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每次有人打电话或按门铃，她就知道可能是大卫。她知道会发生这种事，所以没有像我一样惊慌失措。我看着西蒙，他正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。难道他也预料到了？对于我来说，这个“艾米利胡维”已经是最后的希望了。大卫不该从那里逃跑，不该，因为不能这样做。只有彻底康复后他才能回家。

西蒙让孩子们坐回到桌子旁边。他说：

“什么事也没有。妈妈总是动不动就害怕，所有的妈妈都这样。我想，大卫只是想回家来看一看。两个月了，时间太长了。他想看看我们，然后就回去。你们好好吃饭，一会儿我们一块儿收拾桌子。等大卫来了，就干干净净的了。”

朱丽叶默默地看着前面，她不想参与这种游戏。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，迫使她看我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她耸了耸肩膀。

“大卫熬不下去了，”她回答说。

“朱丽叶，你还不和妈妈去散步……”

我不想去，我想在家里等大卫。此外，我明白，西蒙会把他送回去的。“艾米利胡维”要求这样做。我不知道这个决定对不对，可是我不想趁我不在的时候办这些事。不过西蒙还是坚持：

“大卫要过一小时才能来，早不了的。朱丽叶，叫妈妈跟你一起去散步。”

朱丽叶站起来，和父亲交换了一个眼色，那是只有他们二人彼此会意的眼色。

“穿上外衣，”她对我说“爸爸说得对，如果你留在家里，大卫来了你会伤心的。”

我和她一起出去，没有气力说一句话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

朱丽叶说：

“你太傻了，你怎么想不到大卫会逃跑呢？怎么就想不到呢？你是一个梦想者，如果梦想实现不了，你就生气。你生气是因为大卫逃跑回家，把家里搅得底朝天。我们在过幸福的家庭生活，可大卫一来，会把一切都搅乱了。可是我们能够保持幸福生活，不让大卫破坏这一切，对吗？他可以和我们一起享受这种生活，但他必须先在别处学会这种生活。你应当把这话告诉他。或者让爸爸告诉他。爸爸学会了许多东西，我想，学得比你多。是的，让爸爸告诉大卫，他应当回‘艾米利胡维’去，如果爸爸不说，我说……”

朱丽叶边走边说，直到我的眼泪干了。我开始说话：

“你一直知道会是这样，你预料到了，可我没有，为什么？”

我在门口看见西蒙。有个穿工作裤的男孩子在花园里和他站在一起，那孩子剃了光头。是大卫。

“他们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剃了光头，”我说。

我加快了脚步，迎面传来他们的声音。西蒙语气坚定、果断。大卫有气无力地在求情。一股极其复杂的感情向我袭来：失望——朱丽叶管它叫生气——同时又高兴能看见他。我跑过去，抓住大卫，把他推到屋里，可是西蒙把他推了出去。

“我跟他说了让他回去。如果他十二点以前回去，他们还收留他。”

“西蒙，不能这样！”我喊了出来“他什么模样，你难道看不

见吗？先给他吃点东西，喝点水。他们怎么把他弄成这样？你看看他的头。西蒙！让他进屋去。”

我又一次推大卫，可是西蒙站在那里像块大石头。

“你疯了！你要前功尽弃？我跟他说了让他回去。”

“妈妈,放开他,”朱丽叶说,一边想扒开我的手,“你回去吧,我和爸爸就行了。”

可是我看见的只是这条工作裤，这个几乎光秃的头，瘦削的小脸，满面病容，眼睛里充满恐惧。

“不,让他进家去,”我喊叫着,“让他进去,不然我把全小区的人都叫来。”

西蒙四面环顾。小区。他没有想到小区。小区。

西蒙向后退了一步，我就不费力地把大卫推进了家门。

“可是他留不下,”西蒙说,“他还有十分钟,他可不能留下呀。”

好了。十分钟。我拿两个橙子榨了汁，切了奶酪。好了。让他吃一点。你得吃一点东西。上帝，你怎么这样子了。”

朱丽叶贴着墙站在那里看着我。

“你是奴隶,”她说,“你是儿子的奴隶……”

大卫艰难地喝下橙汁，他好像咽不下东西。

“我想吐,”他说,“我已经好几天不能吃东西了。”

我们围坐在他身边，他就开始讲自己的事，并没有人要他讲。

从他的话里可以了解到“艾米利胡维”提出的要求，那里的气氛，最重要的是严厉的态度——这一切他都对付不了。

“在那里，你自己什么都没有。把你的衣服要走，发给你短裤和工作裤。前两个月你就穿这身衣服，然后才把你自己的衣

服还给你。后天我也能领回自己的衣服了。把你的头剃得精光，当然，他们是想打掉你的傲气，或者类似这种东西，可我为这太难过了。每天我看见自己的头都特别难受，习惯不了。然后就乱喊！所有的人都彼此吼叫，总是有人朝你吼，最可怕的是我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开始吼叫。我实在受不了。还有，根本不让看家里人。”

他沉默下来，摇了摇剃光的头，接着又用双手捧着头不停地摇。

“要咖啡吗？”我问。

他恶心，觉得胃里堵，他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了，根本不想喝咖啡，可是他抬起头来央求地看着我。咖啡——这是我们家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你自己想喝吗？”他问。

我点点头站了起来。我煮咖啡的时候，听见他继续在那里讲：

“今天中午是‘谈心治疗’，这样你就会面对自己。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我觉得这就是乱喊。忽然我明白了：不能这样下去。有休息，休息以后我们继续开始。明天还是这样，后天也当然是老一套。我再也不能忍受，就跑了，过了几个沙丘，沿着沙滩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跑回家来了。你们可以把我赶出去，可是我就不回那里。”

“你应该回去，”西蒙说，“你现在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，但这是你惟一的出路。”

我递给大卫一杯咖啡，对他说：

“爸爸说得对，你应该回去。我们本来就不该放你进家来。”

西蒙站起来，朝电话走去。

大卫立即感觉到情况不妙。

“你上哪儿？要干什么？如果你往那儿打电话，我就跑，随便跑到哪里。你不能往‘艾米利胡维’打电话。”

“听话，孩子，那你好好听话，我们就不打电话了。自己走！不管怎样，自己回到‘艾米利胡维’去。因为他们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，你自己也没有办法。他们有办法让你恢复。”

但是他摇了摇光秃的头，站了起来。他拿着杯子朝厨房走，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对我微笑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教会了我一件事，”他高高举起杯子说，“自己把用过的杯子送到厨房去……”

这当儿西蒙离开了房间。过了不大一会儿，我看见他上了车，一定是开车去‘艾米利胡维’了。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别人也明白了。

大卫见爸爸不在，说道：“爸爸到‘艾米利胡维’去了，他还是去了。可怜的傻瓜！我不会投降的！他到底怎么想的，真以为能把我拖回去吗？”

朱丽叶走近他：

“爸爸是傻瓜，可你要是不回去，就是更大的傻瓜。”

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大卫转过身去，非常愤怒地走开了。我抓住朱丽叶的肩头，因为她要去追赶大卫。我喊道：

“别去，他会伤你！”

但是她挣脱了我的手，从我面前跑到大街中间，把手掌举到嘴边，朝大卫身后喊：

“傻瓜！最大的傻瓜！白痴！”她哭了起来。

我把她拉过来，于是我们两人回家去了。她是个坚强的孩子，我们给她带来了什么？我心如刀割……

过了一个多小时，西蒙回家来了，气得直抖。

“‘艾米利胡维’这鬼地方！我真想啐它！大卫哪儿去了？当然是流浪街头了。由他去吧。我在路上从电话亭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他们，可是谁也不接。我到了那里对他们说：‘大卫在家里,情况很不好,请跟我去一趟,把他领来。’‘我们不想揪着耳朵把他抓回来，’他们回答说,‘他应该自己回来——十二点以前。如果他明天回来,我们就不接收他了。’我劝告他们说:‘他心情不好,你们应该同他谈一谈。’‘不,我们不会这样做。他只能心甘情愿地自己回来。’他们冷若冰霜,顽固得很。我十分生气,绝望至极。‘该死的！’我骂他们,‘大卫在你们这儿的几个星期里，我们一切都按你们的要求做。我们相信你们，处处配合你们。可现在我们走投无路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办不了事——我们放他进家门，仅仅是因为不能把他拒之门外。我只要求你们和我一起去同他谈谈，他好像有些事不大明白。可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你们知道。可你们就是他妈的不愿意。六点钟的时候你们打电话给我们，建议我们别让大卫回家，把大卫送回来。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？我们不是聋子，不是哑巴，不是瞎子，不是铁石心肠的人！我们是活生生的人，这个孩子让我们束手无策，我们不能执行你们的命令。我们需要帮助。那就请帮我们一把吧！没办法，我就打电话——没有人接。我在路上往你们这里打了三次电话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为什么叫我在他回家的时候打电话？’‘我们是说过,可到晚上我们有谈心活动,所以我们把电话拔掉了。’这些该死的,’西蒙无力地坐到椅子上说,‘我还真信这些狗崽子的话……”

我们再也没有听到大卫的任何消息。找警察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可是过了三天我们还是去了,“他走了,没回来过,失踪了。”“如果找到他我们就通知你们,可往后呢？”“我们不知道。”

我和西蒙商量好：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。西蒙去上班。我做家务。

“你还是拿起笔来作画吧，’西蒙说‘我们不能像从前一样不能自拔。”

拿起笔来作画吧……过了两星期，我才勉强动笔。我把绘画用品拿到楼下,在桌子上摆放了一些东西 苹果、橙子、一瓶葡萄酒。我摸了摸，同时产生了一种感觉—— 画这些东西太荒唐了。这些水果太真实，是给想吃的人充饥的。我的使命是画肖像，揭示内心世界，把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挖掘出来。不过我还是知道，眼下现实生活应当挽救我。现实生活就是苹果、橙子和葡萄酒。

“无聊，’我说出声来了‘不管怎么说,我会画的。画一个苹果，一个橙子和一瓶葡萄酒……”

这时候大卫进来了。他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，离我有三四米,开始看我——我几乎像呆子一样面对我那些实物坐着。

“你这是瞎闹什么？这是些什么东西……苹果、橙子、葡萄酒……,,

那种可怕的复杂的感情又一次涌现出来。“上帝，他活着！”“上帝,他回来了!”——可接着就是气愤：

“你吸毒吸麻木了！告诉你，就凭你这模样，我不想理你！”

“我回来取衣服,我们不用说话。”

我焦急不安起来。

“大卫，你住在哪儿？在谁家？你吃饭正常吗？胃怎么样了？你穿的是谁的衣服？”

“我住在一个朋友家,这是他的衣服。”

他站起来，上楼去了。我特别想跟随他上楼，可是忍住了，恶狠狠地开始作画。他的衣服在柜子里，我都洗干净了，修补好

了。他的房间也粉刷一新，我们当时还相信那是为他的新生活做的准备。他回来后见到这些什么也没说，也许根本就没有注意这四面白墙。他夹着衣服朝冰箱走去，打开门拿出一瓶啤酒，回到房间里。他停下脚步，开始看我作画。我画出了清晰的线条。苹果、橙子、一瓶葡萄酒。他忽然间伸出了手，抓起瓶子就塞到衣服里。一脸讪笑。他转身出了房间。

这一切过去得这么快，快得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盯着画，然后看了看摆好的格局，它失去了重心。我糊涂起来：有人破坏了我的画作。

西蒙说：“这不行。我换一把门锁。他要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要拿就拿，把我们的生活全毁了。他要是不想同我们谈谈如何改变他的生活,那就算了,他就永远别再回来了。”

“不错,可怎么能这样呢?”我绝望地喊叫起来,“他刚满十七岁！我们要对孩子负责任。我们应当给他钱，他得吃饭……要是忽然病了……还有，那他就不该再上学了吗？”

“该,只要他想。我一定换一把锁。”

换一把锁……

我们躺在床上，听见大卫抓门。

“西蒙……”

“别出声！别开灯。好好躺着。让他知道，只要他不戒毒，我们就不让他进门。”

“可他会按门铃,那就把别的孩子吵醒了。”

“我已经把门铃拔下来了。”

“那他会打碎窗户!”

“打不了!”可是听得出来,他也动摇了。

忽然间我听到熟悉的敲击声。不是敲打，是哐啷啷晃动邮

箱的声音，就在我听出这声音的一刹那，我像是被刺了一下。大卫小的时候要回家了就总是制造这样的声音。我能根据邮箱声音的强弱判断他的处境。如果声音不大，那就是他不着急，好像在说，我还和小朋友们说话哪。如果声音大了，那就是说：快点，他们欺侮我，快点给我开门，让我回家。

“这声音够大的了！”我说着甩掉了被子。

“躺下！”西蒙把我拽回来，“让他知道，让他明白！”

我挣扎着哭了起来，感到歇斯底里快发作了。

“放开我，我去给他开门，不能这样，放开我！”

他打了我一个耳光。我一惊，几乎窒息。就在这一瞬间的寂静中，我已经听不到大卫的声音了，他走了。

“大卫走了，”我说。

西蒙点了点头，流露出得意的神情把我放开了。

“重要的是不能投降！”他说。

我转过身去，用被子把头蒙上。我恨他，不是因为他得意，而是因为他能这么狠心，更恨的是他竟不记得孩子小时候的事，不记得孩子晃邮箱的情景。

此后就是几个星期的争吵。我给大卫钱，西蒙觉得这不好。要是西蒙给大卫钱，我也觉得不好。

“现在大卫要钱有什么用？他拿这些钱去买那玩竟儿。谢谢上帝，你同他谈谈吧。”

“你可真够烦人的，你自己不也这样做吗。”

“不是！”我喊叫起来，因为我能做的就只有喊叫了，“我不光给他钱，我还为他操心呢！”

“你说的是你忙着给他榨橙汁，给他干净衣服吧。他把脏衣服全都扔到垃圾箱里去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你不用这样喊。你对他有求必应，你给他钱。”

他说得对。我和西蒙做的一样，不过评价不同，我自认为我的动机至少还是出于母爱。

“不能这样，”赫莉看见我们吵闹便说，“你们商量一个办法，然后两个人都照着办。为什么你们的孩子住在一个什么朋友家里？你们给他想点办法，给他租一间房子。噢，想起来了，等等看，我问问汤姆，看他有什么线索。”

过了一个星期，我们在老城区租下一间已经决定拆掉的简陋房子。

“这房子还能用一阵子，”汤姆说，“不贵，能收拾出来，还像个样。一般的房客当然找不到这房子。我认识房东，他发了善心。让大卫在那里住吧，否则那些流浪汉也会把这房子占了。”

陋室。破败不堪的房子。我的儿子将要住在这破败不堪的房子里，可我不能再让他堕落下去了，所以我去了那间房子，把它打扫和收拾一下。到了晚上，我的双手已经十分疲劳，不得不从肿胀的手指上摘下我惟一的戒指。我把它放在厨房料理台上方的架子上。一边是钻石戒指，一边是住在陋室里的儿子。

三天里我装了满满三十袋垃圾：污物，碎砖乱瓦，玻璃碴和空瓶子。一切都收拾停当后，大卫又回来要钱，这时我才敢开口，劝他同我一起去看看。

“房子真的很不错。当然，要修理一下，不过我们会帮助你。如果你住在那里，有自己的一个地方……如果不再上朋友们那里去寄住……也许你就……”

他和我一起去了，那是他拿了钱以后，偷了我的戒指以后。晚上我喜悦地告诉西蒙：

“他想住在那里，还愿意帮助我们一起整修房子。也许这是

引导他走上正道的一个手段，再说至少他会离开那帮人。”

但是我没有告诉他，大卫丝毫不感兴趣地在那房子里溜了一圈，觉得无聊，去了十来次卫生间，放水冲洗。“给笨蛋住，”他说。不过他还是同意住在那里，所以我和西蒙又有了盼头，如果他开始那样，如果他开始这样，如果，如果——简言之，我们不知道‘如果’的含义了。

整个周末都用来修理和粉刷，大卫站在一边看着，打不起精神。最后说他愿意用石膏装修墙。他想要石膏墙，说是在谁家见过。我们感到非常幸福，他总算做点什么了，一切都很好。石膏就石膏吧。买去吧。这是钱。大卫买回来一大堆石膏，还来了他的一个朋友，说是要帮忙，不过东倒西歪地快站不住了。他们折腾了一个星期，往墙上抹石膏，在洗脸盆和水池里涮桶。水如果流得不畅，就全倒入抽水马桶。墙上有十公分厚的石膏，往外渗水。到了周末，这房子已经住不得了，所有的水管和下水道全被凝固的石膏堵塞了。可是大卫一点都不着急，他有了自己的一所石膏房，便让我们走。

“让他自己对付吧，”西蒙说，“这全是胡闹，我再也不会去他那里，你也不许去，你别往他那儿跑！”

“可是他要钱呀！”

“如果他张口要，只给他吃饭用的钱，一星期给一次。房费由我们付。你把他的衣服也置办好。只给他饭钱，多一分也不给。记住：不许到他那里去！”

但是我还是去了，悄悄地带上一大包食物、新裤子、六身内衣、褥子、毯子，地下室有的，我都拿了一些。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了他，他就在门口吼着赶我走：“你滚开，我又没叫你来！”我每次都看见那个像影子一样的朋友，总是东倒西歪，快站不住的子。有一次我看见那里还有几个小姑娘，有的半裸着身体，有的

只穿背心，背心是我上一次送去的，洗得干干净净，有的穿着西蒙昂贵的浴衣，显然是大卫拿来的。我不知道着了什么魔，依然执行我的任务，每次都背去一包包食品。我想，如果我把这里收拾得好一些，如果我安排一下，让他好歹走上正路，如果让这个小窝多少有些朝气，如果这，如果那……我自己家里却尘封三尺，我把阳台上种花的方盆拿到了大卫这里，好多少装点一下这个小房子。浇花的喷子也给了他，结果是我用自己的喷子去浇灌别人街上的牵牛花。

“算了吧，”赫莉对我说，“现在你成了大家的坏榜样。”

“大家是谁？”

“所有吸毒孩子的家长。”

“所有的家长？他们在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，他们羞于见人，藏起来了，说真的，他们应当联合起来，互相提醒，不要像你这样做蠢事。”

我看见的那个东倒西歪、快站不住脚的男孩，是个鬼影（我这样叫他），是这房子的第二名住客。第三名是一个女孩，大卫叫她叶特，那个鬼影叫她谢利威。有一次我问那个女孩到底叫什么，她说：

“这管你什么事？告诉你，我吸海洛因，这可能对你还有用！”

大卫成了“小房子里的人”。除了常住的人，他还经常让其他人来过夜，显然是为了挣点钱，而且是一笔不小的钱，因为大卫开始把我们每星期给他的饭钱当成奖金买点心了。鲑鱼罐头他一下子就吃一个，还吃用葡萄干泡的白兰地酒、白巧克力、昂贵的海产品和虾。他自我安慰，享用美食。赫利－扬成了这小房子的第四个常住客，他的父母在瓦森纳，很有钱。他向大卫

“ 租 ’了这房子里惟一的大房间,其他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(或者轮流睡），这张床搬进了小房间。这张床同时还是一个三色猫的窝，这猫在房子前面停放的一辆车上生了几个小猫咪。三色猫妈妈带着五个猫仔。猫窝里铺了报纸，粪便太多的时候就流进马桶里了。这样一来，我的食品袋里又添上了猫食。

有一天早晨我到大卫那里的时候，见他满面泪痕。他没有轰我出门。他没穿上衣，只穿着一条牛仔裤，神情沮丧地坐在床边的地上。赫利 – 扬让我进去,说了一句话,好像是“ 不知哪个猫死了。” 大卫哭着说。我的第一个感觉是：谢谢上帝，他还能哭。大卫哭着，手里抱着一只已经僵直的小猫。

“ 我把它压死了,”他说,“ 我真混蛋。”

猫仔的死不知使他受到了什么震动。他开始画画。房里没有桌子，所以他在地上画。地板上铺着几张撒旦的像，姿态各异,颜色从粉红一直到鲜红。一个恶魔,恶魔,他在那次“ 不开心的梦游 ” 之后就把撒旦画成这个样子。小猫仔们就在这些恶魔的头中间嬉戏。直到它们五个星期大时，大卫突然把它们揣到军外衣里抱着，第一次带它们去呼吸新鲜空气，因为大卫当时要离开了。铺了报纸的猫窝 ——不需要了。下水道全部堵塞，污水流到走廊里。住在这里的人谁也不想管。他们要逃走。先是“ 鬼影 ’带着他的谢利威走了,接着是赫利 – 扬 ,最后是大卫。他把能扔的东西全都扔了：衣服，家具和偷来的东西。我到的时候，三色猫站在大开的门口，邻居朝着窗户大叫：

“ 全都滚蛋了 ,这些混账东西 !’他把我好好数落了一顿。三色猫在蹭我的脚，饿得直叫唤。我抱起它，因为我已经喜欢它了，不忍心把它扔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脏地方。

“ 本尼放出来了 , ’赫莉说,“ 给他弄到一间房子 ,再就业社会机构正在给他找工作。

我为之一惊。

“难道已经过去九个月了？”

“已经快一年了，他前几个月就放出来了，他去西班牙休息，去了两个月呢。昨天他到咱们家来了，看起来挺好的，我意识到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。”

我感到痛楚和嫉妒。他的儿子戒毒成功了，可我的儿子——没有。

“大卫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，”我说，“他揣着四个猫满城转悠。”

赫莉笑了笑，说道：

“不会的，他早就住在另一个地方了，可能是在朋友那里吧。如果你觉得大卫没有任何希望改好，那仅仅意味着你自己失望了。”

“怎能是这样呢？”我想。一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她垂头丧气，心情压抑。可现在她十分明智、清醒地面对现实，认为能活下去。

“你怎么就能办到呢？”我问。

“不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只知道自己应当振作起来，如果最后你成功了，那就要记住：任何时候你都又会跌下去的。”

她又跌下去了。没过一个星期，她给我打电话：

“我要同你谈谈，马上。”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会告诉你。请到我家来。”

赫莉接我进去，我还没脱大衣，她就对我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，你这个儿子带着四只猫和我们本尼住在一起。”

“啊，上帝！”

“你就会‘啊，上帝！’我已经决定了，今天我去看本尼，给他

送些东西，我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。他现在有一切条件重新开始生活。能找到一份工作，有一间房子，很长时间不吸毒。我去了，你猜我看见谁躺在床上？你的儿子！这本尼还想帮助他安排好生活呢。”

“啊,上帝!”

“你怎么就会没完没了地‘啊,上帝!’‘啊,上帝!’我要请你把儿子带走。他要是不在那里，本尼还有希望走正路。”

“我不能把他领走,这你自己知道。”

“如果汤姆知道了,非把大卫扔到门外去不可。”

“赫莉,求你了,咱们别着急。你不能阻止本尼不留大卫,我不能阻止大卫不找本尼。我们根本不该为这事吵架。”

赫莉用手捂住脸。

“我当时还真希望，可现在……我全看明白了。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过几天他们就把房子弄成猪圈，就一块儿吸毒，只要大卫不工作，本尼也不会去工作。你的儿子把我儿子的一切都毁了。我心痛,兰恩,可是我不能看见你,也许我不够宽容,但是我看见你就不能不想这些事。最可怕的是我还打心眼儿里生你的气。”

赫莉的预言应验了。他们真的把房间弄成了不折不扣的猪圈。刚‘工作’了两天,本尼就断言,他干够了。我和赫莉决定找两个孩子谈谈。我们央求他们不要在一起厮混，央求他们哪怕是为了我们也不要再吸毒,我们威胁他们,指责他们,骂他们,又说他们的好话。我们苦口婆心，尽了我们的能力，可是我们的儿子们却朝天花板翻白眼。最后，本尼很客气地要求我们走，他和大卫十分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他们决定住在一起，一个房间当然小一些，应当找一层楼。

对我们来说，他们住在一起就意味着一起吸毒。我们感到绝望和沮丧，不敢把这事告诉汤姆和西蒙。我们强忍着绝望和恐惧,可有一天还是爆发了,我们互相指责,说的话不堪入耳,连市场上的泼妇听了都会脸红。我们在我家的厨房里面对面地互相痛骂和指责。我们哭，我们吼叫，我们甚至要把对方的眼睛挖出来,到最后——我们心里空虚，毫无希望，两人抱在了一起。

“啊，上帝！我刚才说了些什么！”

“我,我也是,我胡说了些什么!”

“我本来不想这样说。”

“我也是。我们怎么能这样放肆？”

赫莉说：“我们该看看岔子出在哪儿。一切都是因为我不能心平气和，因为我不想让大卫住在本尼那里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我该认可,该接受这一点。”

“也许我们该去找一个好一些的住处，宽敞一点的？”

“那就得找汤姆。别再保密了，我们要跟西蒙和汤姆把该做的事讨论讨论。”

结果“讨论”有点像游行者同警察的冲突。西蒙大发雷霆，这很自然,因为他要像我们一样,先当一回‘市场上的泼妇’。汤姆气得差一点犯心脏病，不过他也许是装的。赫莉倒是有了精神，也平静下来，她把最粗野的责骂和喊叫都讲成通用语言，晚上很迟的时候得出了一个结论：

“这样吧，我们大家都同意，还是让孩子们在一起住些时候，而且不能住在洞穴里，要找一个说得过去的房子。”

“好吧,’西蒙说‘可是我们要跟他们这些鬼东西签一个合同，仔仔细细地列出我们的条件，只要他们违犯这些条件，我马上就把他们赶到大街上。”

“就这样吧,咱们来拟一个合同,’赫莉冷静地说。

“把这四个猫也轰走，”汤姆说，“这也要写到合同里。”

“写上轰走三个猫，”赫莉说。

“还有不得吸食任何毒品，也不能用印度大麻膏，”西蒙说，“必须彻底戒毒。”

赫莉又冷静地总结道：

“合同里要写上一些先决条件……”

汤姆开始找房子。租一套房子几乎是办不到的，可是他自有办法，过了几天就带了“几个方案”回来，他认为自己“不担任何风险”。

“我要买下其中的一套，”他说，“房价在涨，我不会损失什么，让这俩鬼孩子住到那里去。”

就这样，汤姆让这俩鬼孩子上了车，带他们看了看“目标”，又一次把这俩鬼孩子安排得好好的：从十月一日起，他们就能在比利时公园区拥有一套住房，他们两人也很明白，不禁喜形于色。

“是的，我们喜欢。”

“是的，这样很好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你们可不要以为就能白住这么好的房子。这套房子很贵，所以一切都要正式说定，我们要跟你们签一个合同。”

“当然了，这样好一些。我们觉得这完全合乎情理。”

当然，本来应该让他们自作自受，经受一定程度的磨难，尝尝自己酿的苦酒，末了彻底堕落，坠入自己制造的肮脏泥潭不能自拔，那时他们就会爬着来求援，向能够帮助他们的任何人求援。这将是他们的第一个行动。然而我们没有这样做，我们又一次为他们安排得停停当当，再也没有人当面讥笑我们了。我们又一次按他们的意愿为他们提供了生活条件，从而剥夺了他

们养成独立人格、至少是经受磨练的机会。

九月二十九日，我们在家里签了合同。大家情绪都很好。我在家里摆满了鲜花——两个孩子也买了花回来，还稍微修饰了一番，“体体面面地”迎接这个时刻。大家要一块儿吃饭，还有上好的葡萄酒和点心……

汤姆拟定了合同，这是“任何人都不得违犯的”。他用低沉的语调念起来。合同签好了，我们大家举起了杯子。我们体验到这是神圣的时刻，是一个转折点，从此一切就要变样了，再没有人吸毒了，这是合同的约定。不能做丢脸的事——这一点我们特别要首先说明。本尼应当去找工作——这也写在合同里了，两个孩子把这一条当成了一纸空文。大卫应当去读夜校。

“我还是上自由职业学校吧，”他看了看我说，他的话使我大受感动。我们大家都很感动，只有朱丽叶例外。她一脸蔑视的表情，不过只有我一人看出来了。这天晚上我们最后还玩了“憋七”，本尼抽了那张牌被“憋住了”的时候，大家甚至互相打趣。

我们交了上自由职业学校的学费，希望越来越大了。第一个月我们总是在寻找理由为他们开脱。每个星期我和赫莉去“探视”的时候，不言而喻，见到的是住处越来越脏，可我们二人却互相安慰说：“算了，他们在这里不是还没住多久吗，以后就能学会了。”不过我们明明看见他们直到中午还不起床，但还是说：“一开始就立即上轨道，这不容易。等本尼有了工作，等大卫按时去上课以后，情况自然就变好了，对吧？”

然而本尼怎么也不能开始工作，因为他的头发太长，就凭那副模样，谁也不会录用他，他自己这么说。

“那好吧，给你钱去理发。”

“行，不过我可不想随随便便找一个理发师把头发给我剪

短。我要找个好理发店,这可贵了。”

“那好吧,再给你点钱。”

但他根本就没有去理发，也没有找到工作。

大卫要钱,说是要去买绘画用品,买笔、颜料、画稿本、成盒的画图器，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。我都给他了，可他从来没有买过一支笔。他们惟一的用项就是买毒品。本尼买了一大块印度大麻膏，两个人把它分成许多份，卖给上毒瘾的人。赚了钱，他们可以买毒品，吸上一段时间。本尼经不起诱惑，趁大卫星期六一整天泡在床上，就把能吸食的全都享用净尽，这一大块进肚之后,到晚上他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力,把‘汤姆不惜重金’买来的“这一套价格不菲的住房”好一通打砸。所有窗户上的玻璃都打得粉碎，餐具和家具扔到了街上，门打掉了，洗脸盆成了碎片。大卫受本尼的刺激也‘跃跃欲试”,不过收敛一些,仅仅撕毁了自己床上的褥子。大卫本来可能更加疯狂，可是他没有这个机会，因为邻居叫来了警察——市政医疗救护警察把本尼送到急救中心，大卫不过是小打小闹了一番。大卫想不出什么好办法，就钻到本尼床上继续蒙头大睡。汤姆被警报吵醒，叫起了西蒙。西蒙把大卫从被窝里拖出来，要求他给个说法。

后来发生的事我不太清楚。不管怎样，汤姆也来听取“说法”，这时两个做父亲的大吵一顿。汤姆把西蒙父子二人扔到门外，二人悻悻回府，一个夹着一只猫，另一个拿着猫窝。朱丽叶看见他们来了，便说：

“我记得合同里没写这一条……”

就这样，大卫又回家来了，回到了前不久为他的新生活准备的崭新的小屋子。他马上钻进被窝，我和西蒙在楼下坐着，设法压住满腔怒火。

“镇静,镇静,这次千万不要慌乱。”

“他不能呆在这里,”西蒙说,“得送他去医院。”

“也许什么地方有戒毒所一类的单位，能帮助他戒毒？”

“索性先让他去住院,可是住哪个医院？”

“一般地方不会收留他，因为他还未成年。”

“那就得等到他像本尼一样把什么都砸了。”

“或者他会像上次一样出现精神变态。”

“是的,不过大卫自己哪里也不想去。”

“很可能这样,但是他不能留在这里。”

“老天爷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这样的孩子哪里都不给安排？为什么没有强制的办法？为什么他们不做这件事？照现在这样，不管你把他们送到哪儿，他们都很容易逃跑……”

我们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，然而这个教养有素的人根本不能解决这一类问题，他一点好办法都没有。我们就去找市医疗服务站的精神病医生，但他说应当让大卫本人来。我们已经走投无路，便求助于儿童心理中心，那里的人倒是愿意帮助我们，“但是请把大卫领来”。可大卫什么也不想，依然四脚朝天躺在床上，只有想吃东西时才起来，还说不定在什么时候。

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此前的几天里，我使尽了各种招数，从指责和怪罪开始，接着就鸡毛蒜皮地唠叨，想唤起大卫的同情心(“你难道看不见我们为这事都快急死了”),再后就威胁(“你要是不……要是你还……那我们就一分钱都不给你了”），可是我马上改变了主意,主动给他钱(“如果你这样,如果你那样……如果你从此不吸了”，结果是我自己完全灰心了。最后我失去了理智,把他拽到门外,想让他死——“我才不在乎这个呢！”然而当我看见他四肢软弱，无还手之力，只得摇晃着走开的时候，我又感到十分恐惧，奔过去拉住他、求他回来。他回来了，又躺在床

上，我呢，则又忙忙叨叨地张罗着“照顾”他。到了晚上，我和西蒙就去找房间，找一个不和房东住在一起的房子，否则大卫又会被赶到大街上。

“为什么大卫自己不去找？”朱丽叶问。

“你怎么了，看不见吗？”我回答说，“他病得厉害，去不了。”

“他病得厉害？”朱丽叶反问道，“可到晚上他就出去。”

“是的，”我前言不搭后语地回答，“他是要出去，可不是去找房子，所以我们只得去找。”

朱丽叶耸了耸肩膀，越来越频繁地去找女朋友，因为她越来越不能忍受我们家里的气氛。

最后我们找到了租房办事处，用极高的价钱租了三层楼上后面的一个房间。屋里的设备都还能用，只是太脏了，不弄干净就不能用。我们带大卫去“看看”，他却突然间感觉不舒服，我们便把他带回来，然后去买锅、炒勺等炊具。就在我们忙着这些事的时候，他拿着我们的音响设备走了。到哪儿去了呢？

我已经知道一些“朋友们”的地址，挨个去找了一遍。没找到，大卫没在他们那里，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“我们已经几个月没见到他了”，说谎的本事一个比一个大——我看透了，他们狼狈为奸，就在我担心这可怜的孩子将饥寒交迫、流浪街头之时，他早已找到了栖身之处。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，他从来没有在公园的长椅上过夜。我和西蒙可是连每个棚子都找遍了，希望能把他找出来，因为我们又进入一个所谓“我们应当挽救他”的时期。当我们在斯赫宁根的一个地方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也到了非回家不可的时候了：钱用光了，他一声不吭地跟着我们走了。我们原谅他偷了音响设备，大卫则答应我们绝不再吸毒，作为回报。那正是圣诞节临近的时候，我买了一棵圣诞树，全家一起过了圣诞节。大卫“很天真”，和弟弟妹妹玩得好开心。我自己思

忖“: 是的，这次是真的。一切都已过去，他能够自我控制了。”但是第二天他又旧病复发，半张着嘴，目光呆滞，靠在椅子上，还不时进进出出，想找点可用的东西。我的妈妈根本承受不了这种场面，只得独自在圣诞树下垂泪。

我们同赫莉和汤姆的关系彻底破裂了。有一次我给赫莉打电话询问她儿子的情况，她痛苦地反问：

“难道你还有心问这个吗？”

“不错，当然，否则我就不打电话了。”

“兰恩，我简单地跟你说说他的情况吧。不过真的，这与你何干，我自己都闹不明白。而且我今后既不想理你也不想见你。我永远忘不了大卫是一切不幸的原因。要不是大卫带着那些猫去找本尼，本尼本来是能找到机会的，他现在说不定已经……”

“赫莉，”我气愤地叫起来，“你该明白这是胡说八道！”

“完全可能，不过我说的真是我的感觉！”

“我想，你毕竟明白，他们二人吸毒并不是别人的过错。我们做父母的也没有过错。我已经为自己的过错痛苦万分，可你总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这样说：‘兰恩，你又没对他说：这是毒品，你吸吧！’记得吗，你自己总是对我说这句话？”

“别说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不爱听这些风凉话。现在只说我的感觉。”

但是我没有住口，我一再重复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赫莉常对我说的话。

“大卫和本尼是自己染上毒瘾的。千千万万的人的处境也许比他们恶劣得多，可人家不会吸毒。他们既然自己沾上了毒品，就应该自己戒掉，不是两人一起戒，而是各戒各的。”

“别愣充好汉了 我不听！”她喊起来，扔掉了电话听筒。

我等了一小时，又给她打电话：

“现在说说本尼的情况吧。”

“当然不好。他已在急救中心呆了一个星期，要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，大概是在布卢门达尔。由于最近一次吸毒，但也许是由于这些年来的痼疾，他患上了精神忧郁症，他们说是躁狂性忧郁症，哎，上帝，我怎么知道！他好像整天整天躺在床上写，整本整本地写，写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感受。他一门心思地写，不能同他讲话。好在他还同意接受检查和治疗，说实在的，这要到了布卢门达尔才能开始。更多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了。汤姆完全垮了，我也不行了。我们去看过本尼好几次，但他不想见我们。我们就只好回家，坐下来想办法。噢，兰恩，我不想再看见你……”

“你自己都看见了吧，”西蒙说，“不管他住在哪儿，是家里还是别的什么地方，他一直在吸毒。所以我要把他赶出去，就这样决定了。这罪我受够了。明天他就得走。眼下我们还有一间房子可以给他，里面有一张床，其他的事就靠他自己了。什么东西也不能给他买了，反正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，或者在犯毒瘾的时候把它们扔掉。这罪我受够了！”

“让他明天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明天我下班回来就赶他走，你可别瞎搅和！”

“那你得早点回来，他每天五点钟都出去……”

“你就照直说吧：是去弄毒品。五点钟左右，等这混蛋过足了毒瘾，他就去推销那些混账玩意儿。”

“不，西蒙，他不干这个。他就是自己吸毒，他不贩毒。”

“他干，他是个无耻的毒品贩子，你自己在本尼那里看见的一大块一大块的东西不就是吗。他贩毒，这样就能自己赚些钱

吸毒。”

西蒙比平时早一些回到家来，为的是把大卫撵出去。看起来，大卫好像并不在乎。他收拾了一些东西，只问了问：

“怎么,让我走,是吗?”

“是的,走吧,”西蒙说“这是你那个新房子的钥匙。我们付房租。一星期给你一次饭费，星期六中午我在家的时候你来拿。到了那儿以后不能再吸毒，否则我们不让你回家。我们不会到你的新住处去看你的。”

大卫关上门，走了。我浑身颤抖，看着他的背影。

“西蒙,上帝,”我说“我们这样做好吗?”

“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一条：再把他留在家里不好。你看看朱丽叶吧 她根本就不在家呆着。”

大卫每到星期六中午都回来一趟，但是我们没让他进门，因为他吸毒后走路东倒西歪的，我看了心如刀割。西蒙把钱塞给他就赶他走，我看了心疼欲裂。还有一件事也令我不安：我们的护照丢了。我们一直把它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，现在忽然不翼而飞了。我没有马上告诉西蒙，想去问问大卫，可总不敢：我怕看到那里的情景。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：我应当见大卫，我要去找他，他好像有什么事，他需要我，我就去了。我等到三点钟，因为早去也没有用。我拿上西蒙定做的备用钥匙，在暖瓶里装上咖啡，就去大卫那里。

大卫住的那条街灰蒙蒙、脏兮兮的。汽车库前面是废车架、纸箱子、垃圾堆、空荡荡的房子，根本没有一点人气。街上不见行人，没有儿童嬉戏。先要把门抬起来才能打开。一股臭味迎面袭来。地板上什么也没铺，二层的走廊里堆放着一些旧报纸，靠墙放着卷起的地毯，从天花板垂下一根黑色的电线，吊着一个电灯泡。我上到三层，臭味更大了。忽然间我醒悟到，我还没见

一个人影。这里到底是不是住过人？我上了楼，走到一个门帘前面，轻轻一拉，看见一个壁龛式的东西，里面全是垃圾。发霉的面包,空奶盒,已经变成褐色的香蕉皮,破凉鞋,茶叶盒——总而言之，凡是该扔到垃圾桶里的东西，这里就径直扔在地上。全是一个月前的垃圾……我在大卫的房间前停下脚步，抓住了门把。我感觉到大卫在里面，但是我不敢开门，不敢。我轻轻压了一下门把，门打开了约二十公分的样子，露出房间的一部分，木地板，地上是一堆破烂，不知道是铺衬还是衣服。我把门再开大一点,到处是空瓶子,没有桌椅,没有炉子,没有花草,只有潮湿的气味。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大卫就坐在地板上，面前的一个破窗户没了玻璃，用三合板钉着。他坐在撒旦的头像中间，背朝我，身上披着被子和撒旦的头像。

“大卫，”我叫他。

我悄悄地走近他。

“大卫,是我，我来了。”

他慢慢地转过身来。我看见他披的被子下面没穿衣服，看见他消瘦的小脸脏兮兮的，眼睛四周有黑圈，脸上没有表情，完全是个陌生人。忽然间脸上有了表情，他认出我来了。他像孩子一样高兴起来，经过这几个月的流浪和磨难，他向我伸出手，喊道：

“妈妈,你来得正好!你来得正是时候,你知道吗,妈妈!”

他哭了，我也哭了。我用被子把我们两人裹在一起，拿出了暖瓶：

“咖啡，先喝点咖啡……普通的东西，知道吗，是家常的东西，它们能够挽救你，”我说。大卫点点头，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两手捧着杯子喝起来。

他还算“纯洁”,但是他坠入了孤独和贫困的深渊,身边那些

散乱的撒旦头像让他着了魔。他只消在这里再呆上一天，就会完全被吞噬而失去理智。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了。

“起来,大卫,跟我走,你应该离开这儿,出去,见见阳光。我们先回家,洗个澡,你吃点东西,睡觉,明天我们再看看,以后该怎么办……”

第二天西蒙和大卫进城去买衣服，让他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 鞋、袜、内衣、衬衫、裤子、背心和外衣。我不再考虑会用掉多少钱：如果钱不够，就再去抵押贷款。大卫把原来穿的衣服全留在商店里了——商店可以直接把他的脏衣服扔进垃圾箱。他们回家来的时候，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可绝不再是那个披着被子的孩子了。他一表人才，满面笑容，甚至向我们说感谢的话：

“我太高兴了。穿上这身衣服,我就不是‘那号人’了。”

他的所作所为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：他终于戒毒了，而毒品正是在“那号人”和那个环境中才会肆虐。我们又一次同他谈心 你想不想再去上学,还是上自由职业学校,反正要做点事,对吧。

“我最好是去工作,可是去哪儿工作呢?”

我们从报纸上剪下一些招聘广告，没有合适的。

“不，我可不想再去送报纸了……去那个超级市场又能干什么，就是摆货上架……上马都罗丹当摄影师助手？不，这个我不喜欢，上那儿就跟跑堂的一样。”

最后是鲁德的兄弟出了一个好主意：

“我正找一个仓库管理员，如果你想来，星期一就能上班。”

“行,我试试吧。”大卫说。

既然他准备上班，那就要处处立下规矩。

“我们家有家规，”西蒙说“我们都要遵守，你也一样。特别是你已经要上班了。我们大家要按时起床，你也一样。按时吃饭，你也一样。如果你觉得这不合适，那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。”

是的，大卫都明白。

“我还想知道，你一共欠人家多少钱，你可以用自己的工资去偿还。”

他拿出来一个账单，我们大家俯身去看。我们天真地以为，最多也不过几百荷兰盾。

“你们知道吗，”大卫说“我欠了一身的债。有一些是必须马上还的，不然我就要倒霉了。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孩子，我欠他五百荷兰盾，要马上还。还有一个人，我欠他七百盾，他也急着要，还有一个七百盾，也……哎，反正……都得尽快还上，还有……,,

星期日一整天我们都在给他算账，最后算出他一共欠债六千多荷兰盾。晚上我和西蒙躺在床上商量办法。

“你看，”西蒙说“我当然可以说，你自己欠的债自己去还，可是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又把他推到‘那号人’当中去了。我再帮他一次。如果他向银行贷款，我可以当他的担保人，可这没有用。还不如索性从我这里拿，让他打一个长期借条，他必须把这笔钱还给我，每个星期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百盾来还我，这不难，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一切都有保证。只要他不再借钱，十五个月就能清债……”

“可你又上哪儿去拿这六千盾呢？”

“老天爷帮忙，我再去抵押贷款就是了。”

过了五个工作日，大卫领到了自己的工资，二百多荷兰盾，

他觉得这钱少得可笑，便说：

“我给你们一百盾，自己就剩不下多少了。”

“你还有一百来盾呢。”

“不错,可是我还得从这些钱里再拿出一些还债。”

“怎么？我们不是把欠的债都算清楚了吗？”

“不错，差不多了，可我忘了几笔。我欠阿姆斯特丹一个朋友二百盾,还欠这里一个人二百盾。”

“阿姆斯特丹的朋友？我们已经把他的债算上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,这完全是另一个人,我把他给忘了。我想,如果这星期我从自己的工资里拿钱还他，而不交钱给你们，你们还给我零用钱……”

“好了,先不用还我们钱了,先还清你欠的债吧。”我忽然间想起了我们二人的护照：“护照怎么办？是你偷去卖了？”

“护照？你说什么呀？我会偷你的护照！”他的语气那样气愤，以致我为自己的怀疑而汗颜。如果我再像从前那样看他，那么这孩子一旦重蹈覆辙，我就用不着再发疯了……

过了一个月，大卫还是没能还给我们一分钱。他的债务对于我们来说是以代数的变数不断增加的，他总要再找出一些忘记了的债务，说这些钱必须立即还上，否则他就要倒大霉了。另外,他当然根本不在乎我们立的‘规矩’。他想出了以‘同债主会面’为借口,很晚才回家(‘上阿姆斯特丹给朋友还钱去了,没赶上末班车,只好搭便车’),好像还因此而开始上班迟到。他总是不来吃饭，偶尔赶上，就说什么都不好吃，离开桌子就去厨房自己做粥喝。

早已熟悉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再次出现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次我们的恐惧比过去更加强烈。从他那些奇怪的电话中我们听出，他正一步步地陷入黑社会的罪恶勾当。此外，我找到他的

时候不知他已堕落到什么地步，他身披被子坐着的那副惨相，我记得太清楚了。

“至少他已经不吸毒了，”我说，因为我好像学会了如何辨别，当然，我总在设法找到一点积极的因素。

“他有时吸自己卷的烟，”西蒙回答说，“不过总起来看，他这一段时间真的是‘纯洁’了。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再忍一段时间看看吧，是不是？”

然而我们不必再忍了。大卫正好干满一个月就被解雇了，因为他在作案现场被抓了个正着，他想偷……自己老板的护照。案情查清以后，还发现另外六个人最近也丢失了护照。鲁德怒发冲冠地来到我们家，我们给他塞了个什么东西！是他向兄弟推荐大卫的，他想帮助我们，可是大卫……　最后他让我们明白，他受到侮辱。大卫自己提出要去找间房子。现在根本不用再谈那六千盾的债务了。他仅仅回来过一次，告诉我们他已找到一间房子，我们可以通过银行转账付房租，然后就拿着新衣服走了。

“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不再要你们的钱了，我申请了救济金，可以这样，我所有的朋友都这样。”

“行，儿子，你做你的，”西蒙说，“我们已经受够了，再也不想一次次当傻瓜受骗了。”

我们通过银行转账的时候知道了大卫的新地址，但是我忍住了，没去看他。此外，家里出现了新问题：朱丽叶声称要到女朋友家去住。

“她的父母同意，因为他们明白，我住在家里对我没有好处，他们家的人特别好，我特别愿意和他们说话。”

“可是，朱丽叶，好孩子，……大卫已经走了。现在一切真的就会变好了。”

“大卫走了多少次了，可每次回来都把家里全给搅乱。再说有没有我,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影响。”

“朱丽叶，没有你我受不了。你一向善解人意，在关键时刻一向说话得体,啊,上帝,所以我都忘了你还是个小孩子。”

“你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，根本不知道我为此有多么难受。你们认为我说话得体办事有分寸。但是任何一个人只要看看你们做的蠢事，都会说我说过的话。你们以为大卫的妹妹就那么好当吗？同学都管我叫吸毒叶①，可我跟吸毒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谁都不到家里找我玩，我也不敢请他们来：要是大卫突然回来，那我就丢死人了，还怕你们哭得满脸泪痕在家里来来回回地走……可是最让我伤心的是，你们只说大卫怎么怎么了，从来不关心我。至于勃朗麦和约欣，他们该做的事只有吃饭和快快睡觉，他们也不愿意这样。难道说吸上了毒才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吗？”

吸毒叶，虔诚的上帝……上帝……难道吸上了毒才能……难道非得把胳膊腿都摔断了才值得你们关心吗？我的脑子轰地一响。这是我在哥哥遭到不幸后对母亲喊过的话。难道吸上了毒才能……

“朱丽叶，”我央求道，“请给我们一次机会,我们做错的事太多了。可有一个错误我们还是能够改正的。请留在家里吧。我和爸爸说说，你也说说。我答应你，再也不管大卫的事了，真的，不管了。今后他应该自己管自己了。不能因为他就让你离开家。”

“怎么是因为他？”她说，“是因为你们 当然,有一个吸毒的哥哥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可是更糟糕的是父母为这个伤透了

①叶是朱丽叶的简称。

心……”

我们大吃一惊，尽了一切努力来挽留她，但马上又走人另一个极端：西蒙想用快艇来笼络她，因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们也不能失去朱丽叶。

“当然,你可以带上你的女友。”

“那我们大家一块儿去不是更好吗？”我问，“如果我们租一个汽车活动房，到个有水的地方把船放到水里，就可以开开心心地过周末了……”

我的母亲也和我们一起想入非非：

“听我说，我给你们买个汽车活动房好不好？我不知是什么毛病，把钱放在银行里，那些钱最后反正都是你们的。最好还是拿来享受吧。”

就这样，我们买了一个汽车活动房，把它放在水边，全家真的得到了一些乐趣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。我和西蒙让全家去水上开心，可是我们两人却互相回避，再也不想提大卫的事了,西蒙不提,是因为他要摆脱大卫,而我为了朱丽叶,更得这样去做。

然而我的心灵深处还是忐忑不安。他到底怎么样了？这一切究竟会在他的精神上留下什么后遗症？他的身体还能支持多久？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已经憋不住了。我有他的地址，便又去找他，还拿上了几大包食品、一件新毛衣、一条新裤子、六身内衣。这次要瞒着朱丽叶，我像半夜做贼似的。

一个女孩子给我开了门，她根本不知道大卫是不是住在这房子里。

“是，在上面，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人住在上面。你自己上去看看吧。”

我感到自己健步如飞地上了三楼，敲了好几个门。有一个人开了门，指给我大卫住的房间。我走了进去，看见他斜靠着一张旧椅子坐在地板上，膝盖上放着一个盛馅饼的盒子，手里拿着一个馅饼，边吃边看电视里的儿童节目。电视？ ——我脑子一转，他从哪儿弄的？

我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。他看了看我，那表情就像是我从房间里出去了好半天刚刚回来。

“带什么来了？”他问。

“一些东西。”

我看了看四周。

“是的,我是要收拾一下,”他说,“我还什么都没动呢。”

我不胜惊讶。难道这就是大卫？难道“要收拾一下”这话是他说的？我再一次仔细看了看他。不，他至少没有吸毒……没有,没有吸毒。

“我想把我那个猫抱来，你不反对吧？要不还是让它天天自己呆着？”

“猫？行，想抱就抱来吧。可是你每天都在哪里？”

“我干活……”他咽了一口口水开始吃第二个馅饼,“给一个老妇人干活,她丈夫死了,她养着狗,三条大狗,我管遛狗。给了我一辆自行车，我就在那个水塔周围遛。这电视机也是她给我的。天线是共用的，所以影像不太好。可电视机挺好。我什么活都干，整理花园，要是别人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我就去修理。我早晨十点钟去遛狗，它们等不了。遛完了就用毛巾把它们的爪子擦干净。有一个狗眼睛害病，一天要给它抹三次眼药，这也是我的事。我还要给它们梳毛。要是它们把哪儿弄脏了，我就去收拾。下午三点我还要遛一次狗。跟这些动物说话挺有意思的，我真觉得再好不过了。这个阿姨不找我什么麻烦。星期六、

星期日也一样干活，我喜欢干活，我和这些动物在一起过得挺开心。”

他舔了舔手指，咂了咂嘴。让大卫十点钟就去？他怎么能醒来呢？大卫，我们的大卫有一些感受，想同别人交心？大卫在说话，而不是在骂人。

“要是我能把猫抱来就太好了，那我就会把这里收拾好，安顿下来。”

我觉得应该劝他：

“是啊，你完全可以把猫带在身边。(上帝，可怜的动物，真难以想像，那个小动物居然要到这么脏的地方来）那我就把它带来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晚上，差不多就是此刻，我吃晚饭的时候……”

我看了看盛馅饼的盒子，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……但是话到嘴边我留了三分。

“那你，嗯……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？”

“吉斯介绍的，我不久前见过他一次，他认识这个阿姨。”

吉斯，那个穿牛仔服、骑自行车的精神病医生又出现在视野中。这回他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

“别忘了带猫窝。你最好是自己把它抱来，我不值得为这点事回家，我决定了……”他忽然开始发抖，焦躁不安。“我自己在戒毒，我自己戒毒，不想让别人看见，你走吧！”

“大卫！”

“是的，你快走吧，别管我 如果我回家，也别给我开门。我想自己把这事办成，就在这里。”

“我一定把猫抱来……”

“好，快走吧！”

我尴尬地站起来朝门口走去，差一点摔倒，还扭伤了胳膊

肘。

“明天,大卫!”我大声说,“就这个时候,你自己努力吧……”

我刚刚出去，关上门，他就用一个硬东西闩上了门。是啊，是啊,我想,不让妈妈在场,你自己去修道院,索性到那里……

我把猫给他抱去了，还带了一个月的猫食。但是大卫不让我进屋。

“好了,你马上去吧,”他说着把东西全接过去,很不礼貌地把我推出来。我感到失望，但之后我明白了：他想爱抚自己心爱的小动物，不愿我在场。

我不能同任何人谈大卫的事，不能讲一讲我认为他有进步的那些迹象，这令我十分苦恼。西蒙不愿意相信这些事，而且会警告我，要记住我们二人的约定。那朱丽叶呢……不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感到自己非常孤独，而且心情恶劣，因为开始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不停地打来。过去从来没有人给大卫打电话，可现在忽然间一周四次电话，有一个人打了两次，也不自报姓名，另一个人也打了两次，他自称叫麦克，问大卫住在哪儿。

“不知道,”我说,“你找他有什么事?”

“他欠我的钱，很多，让他还，越快越好。如果你们愿意还，我就不碰他。”

“多少?”我问。

“一千二百盾。”

我怕得要命，但没有流露出来。

“大卫欠我的还要多呢,”我说,“我可明白了不能借钱给他。劝你也这样做。”

“那不行,你想这样支开我,没那么容易。”

第二次打来电话的时候，他索性威胁我：

“如果你们不还债，那你们的孩子可要遭殃了……”

我一整天都拿不定主意：该不该把情况告诉西蒙？家里好不容易才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我没有说，但是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浑身发抖。不过这种电话都是白天打来的，我便开始想：他们要找的是我，他们知道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他们不敢同西蒙联系，也就是说，我用不着把这当回事。

最后我坚持不住了。尽管我对吉斯很反感，又怕遭到拒绝，但还是鼓足勇气给他打了电话。我没给他留一点点时间来教训我，一口气把所有的灾难都对他说了：母亲不敢开灯的房间，西蒙如何决定还债,被偷窃的护照,那几只猫,撒旦的头像,大卫裹着的被子，玛丽胡安卡，我们决定不和大卫住在一起，我秘密地去看他，最后就是这些电话。

“全能的上帝!”吉斯说,“你终于走上正确的道路了。祝贺你,太太,我能和你配合了。”

我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你指什么?”

“从你的话中我听得出来，你们决定不理大卫，这太好了。你们现在不再日日夜夜围着一个大卫转了。”

“是的,可是这些电话……”

“如果他们再打电话,你马上就挂断,什么也别问,这不是你的事。你只管说，你不知道大卫住在哪儿。”

“大卫在戒毒，这是真的吗？他自己能办到吗？”

“如果不行，他自己会找人帮助，到时候就会有人帮助他。不过不是你们，他的事你们太上心了。如果你们完全放手，他就会去找别人帮忙。就是说，你们要完全放手不管，什么主意也不出，什么事也不提醒，主要的是不要想方设法对他施加影响。能施加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的生活。有朝一日你把这一点弄明白

了——现在你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走——那大卫也就一切都步入正规了。”

我叹了口气。

“你说放手不管，如果他来找我们呢？……知道吗，他对我说了什么？他说‘我要是回家去，你别让我进家。我想自己把这事办成’。”

“是的，他害怕他自己受不了，才去找你们。如果你们让他进家，那他就前功尽弃了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别让他进家门。”

“等一等!”我喊起来,因为我听出来,他想结束我们的谈话。“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威胁性的电话？”

“我想大卫不会再出现在自己常住的地方，不会再买毒品，为毒品他已经负债累累了。不要紧，这些固然让人生厌，但不过是区区小事罢了。”

同吉斯的谈话给我增加了一些信心，我决定继续走这条孤独的路。“能施加影响的仅仅是你自己的生活”——这话总是萦绕于我的耳际。当然，为了让大卫戒毒，我们已经费尽了心血！实际上全都尝试过了:干净的内衣,一袋袋的食品,新衣服,一次次收拾他的猪窝，替他还债，苦口婆心劝他，在他危难时伸手相助。把他自己该做的一切全包了下来，竭尽全力去做，到头来却是让他继续吸毒，真是事与愿违。我们为他吸毒创造了便利条件，同时又完全忘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为他绞尽了脑汁，忽然间我明白了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？两年，这费了我近两年的时间。现在我要立即改变这一切。否则是不行的。吉斯说我已经走上正确的路，但我还是有一两次为他绞尽了脑汁，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能够帮助他。至于说吉斯，我想，我终于开始理解他了。他对我并不

反感，而是对我扮演的那个牺牲品的角色反感。他首先得用他的办法来惩罚这个角色。

警察局来了电话，通知说大卫被人打了，由救护车送进了医院,我‘ 放手 ’让他自己做主的良好愿望就这样结束了。

“ 上帝，”我说，“ 他怎么了？哪个医院？他可吃了苦头，这是谁干的？”

“ 也许一切会平安过去，夫人。他摔倒在墙上，失血过多，所以才用救护车。你可以打电话向红十字医院了解情况。 ”

“ 可这是谁干的呢？”

“ 不知道。”

“ 麦克，是麦克干的！”我于是说了有人几次打电话的事。可是世界上有成千上万个麦克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么模样。跟警察讲有什么用？我往医院打电话，许多次都说在转接中，最后又说是占线。我等待着，问自己要不要去医院。不，如果有什么严重情况，他们就告诉我了。给西蒙打电话？不，最好不打，说不定一切会悄悄过去。上帝，我忘了告诉他们大卫吸毒，上帝保佑，他们不知道情况，可别用麻药！我又往医院打电话，还是半天才接通。

“ 是的，夫人，他吸毒。请再稍微等等。是的，夫人，你的儿子已经说了。 ”

他自己已经说了，他自己已经……我生自己的气。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他自己也能做些事情呢？他自己说了当然是好事，他不是傻瓜！为什么我不给赫莉打电话？就为那次稀里糊涂的吵架我们再也不来往了。但是我内心明白我不该给任何人打电话，应当等医院的消息，干自己的事。电话来了。

“ 你的儿子受伤了，缝了几针。没有理由让他再留在这里了。他没有脑震荡，可以回家了。 ”

回家？回哪儿的家？我没问，但我知道大卫会回来找我。那么我该把他撵走吗？你可要明白，孩子，人家打你，这是你的事,不是我的事……

我看见他朝家走来，向家门跑过来。他的样子非常可怕，嘴唇被打破了，额头上缝了几针，鼻子上贴了药膏，衬衣上全是血。一看见他，我马上就知道我该做什么：给他榨橙汁，换上干净衣服。把猫抱来吗？要告诉那个阿姨说你来不了吗？或许，你该躺一会儿？就在我忙活的时候，大卫只是躺着，我忽然间明白：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医院让他就这么走回家来，就是说他好了。是我自己找借口让他回家来的！

“大卫,”我说,“对不起,我做得不对。你没有什么事。你最好还是上班去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该回到自己那间房子去。好吧，快点起来。我好像觉得我们是傻瓜，你和我都是。”

他不知所措，坐了起来。

“行了,行了,别装傻了,”我说,“你已经取得了一半成功,下床吧。”

他下了床，起来了。

“太好了,”我说,“现在马上给我走,出去。今天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。我也有许多事要做，知道吗。孩子，我太忙了，该做的事太多了。”

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。

“你明明知道我这个样子,还赶我走,是吗?他们打我,说不定明天后天还来打我，你愿意他们打我，是吗？”他忽然间央求我：“妈妈，你能给我五百荷兰盾吗？我会还你的。我现在不是已经在挣钱了吗。我答应，我一定还给你。你知道我在戒毒。如果他们追着我不放，我受不了。给我五百盾吧。我要还债。”

我真的拿不定主意 给他吧,他正在戒毒,不给他,他们还会

打他……不给，他拿了钱马上就会去买毒品……

大卫看见我举棋不定，知道怎样才对他有好处：吓唬我。他把一只眼睛挤了挤，手捂着头做出头痛状。他的袖口没有系扣子，袖子忽然滑了下来，于是我看见他的前臂上有针眼。大卫知道我看见了,便把袖子放下来，系上扣子。我像瘫了一样。在此之前大卫还没有注射过毒品，他吸食过各种毒品，但从来没有注射过。

“噢,这是医院里打针留下的,”他说“给我打过好几针,预防破伤风，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你不想给我钱了，没办法，算了吧。”

他推开我，就像过去一样，把门一摔，走了。

我站在走廊里，手脚都不会动了。他注射毒品，我脑子里轰地一响，他还戒什么毒！

我不敢告诉西蒙任何消息。我一个人把这事捂着的时候，事情似乎还不太像是真的。我又给吉斯打电话，他故作惊讶。

“你难道就不知道吗?”他问“他注射的时间不长,所以应该不难戒掉。再说他在米拉那里条件很好。”

“哪个米拉?”

“就是养狗的那个女人。她是医生，用人智学的方法工作。她同他的关系非常好。你现在能做的仅仅是什么事都不要过问。别让他回家，这会好一些。不要给他钱，不要娇纵他，让米拉成为他能够接近的惟一的人。”

我装出不经心的样子把情况告诉西蒙：

“昨天大卫好像被人打了一顿，医院里给他缝了好几针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“他顺路回来说的。”

“你没有放他进家吧?”

我火冒三丈。我费尽心机就是为了装得若无其事，可他的反应却让我不能容忍。

我发脾气：

“你就会图清闲，就像从前那样光顾自己学习！对你来说，我们都不存在，现在儿子也不存在了。如果明天你听说儿子死了，你也会说：你不会把他的棺材抬进家门吧？我明白，我应该改变，但听到这一类的事还是受不了。你是最自私自利的人，就会玩你的快艇，你喜欢的仅仅是那些不用你费心的孩子，要么你就躲到一边干你的工作。我操心的事你一点也不想分担。”

西蒙沉得住气。

“我们说好了的,”他说,“不要让他破坏我们的生活。”他想吸毒，我不想，你也不想。如果他不想活，这是他的事。我不想死,我想活。”

“我也想活,”我喊起来,“我竭尽全力不想打扰他,可是我做不到，不能像你那样干脆把某人从自己的生活里抛开，这太残酷了，只有没有同情心的人才能这样做。”

“是的，你大概还想妥协……可我不想。我明白，不能总这样不死不活的。要么死，要么活，如果你让步，那你必死无疑。”

“你上哪儿?”他朝门口走去的时候,我狂吼起来。

“驾快艇兜风。天好极了。我不许任何人破坏我的休息日——大卫不行，你和你那些让步也不行。”

“孩子们怎么办?”

“现在我把他们找来,全带上。”

我气得哭起来。我感到过去的一切都涌到我眼前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。我又感到孤独，好像带着刚刚出生的大卫，

小孩子时期的大卫，可与此同时，西蒙却一直在准备他日常的考试，不许别人打扰。那时候不让，现在也依然不让。不过理智告诉我，现在西蒙做得完全正确，可是情感上我却接受不了，所以我才把年深日久积累的愤怒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。

那天晚上西蒙没有回来，和孩子们一起在汽车活动房里过夜，大卫给我打来电话。

“妈,你家里有没有猫食?”他问我,精神很好;“要点肉什么的,我忘记买了。”

“有,”我很克制地回答,他精神十足,但那腔调却没有取得我的信任。

“噢。那你给我送来,方便吗?”

我动摇了。为什么不行呢，为什么要让一个猫挨饿呢。

“好吧,我送。”我回答说。

只送猫食，我提醒自己。可是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却是没吃完的印度尼西亚的菜肉炒米饭。

“我只管送东西，在你那里最多呆五分钟，”我说。

他还是那么精神抖擞地迎接我，精神好得有些奇怪。

“妈妈,你知道,我完全忘记买了,星期六所有的商店关门都特别早。再说我脸上这个样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”

我知道他连米拉那里也没去，但是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这是给猫的。”我给了他一包东西后说;“这是给你的,饿了就吃。”

“哎,好吃,”他说完马上就坐下要吃了。

“要热一热，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。”

“不,不用,”他说着马上就吃了起来。

“大卫，听着！别用手抓！拿把勺子来吧！”

他站起来，看了看四周，把什么东西挪动了一下，还用脚踢

了踢，最后在地板上发现了一把刀子。

“ 这不是吗 ,找到了 ,”他说着便弯下腰去 ,把刀子当勺用 ,就这样也把锅里的饭扒到嘴里了。

我只是坐着，看他吃。

“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勺子 ?”我问 ,同时想到了餐厅里放着几年来为他买的餐具。

“ 没有 ,这有什么关系 ?这样也能吃。”

他把锅放到一边，想对我笑，但没笑出来，脸上的表情特别可怕，也许是因为鼻子上有胶布，我吓得一怔。

“ 不 ,现在还笑不出来 ,”他说 ,忽然间就大哭起来。

我又动心了。我看不下去。这个男孩是我的儿子……我怎么能一走了之，撇下他一个人在这里？我抓住他的手，好像怕被人听见似的轻声说：

“ 今天谁都不在家里 ,大卫 ,跟我回家吧 ,今天在你自己的床上睡一觉…… ”

他不哭了。

“ 他们都上哪儿去了 ?”

“ 乘汽艇兜风去了，晚上宿在汽车活动房里。走吧，谁也认不出你来。”

他迟疑了一下，然后摇头反对。

“ 我……哎……我还要把这里收拾收拾。 ”

“ 那也用不着今天晚上收拾。”我说。

“ 不 ,可是……不 ,我这个样子不能上街…… ”他忽然抽回自己的手 ,朝我喊道“: 我根本就不能上街 ,难道你不明白吗 ?我根本就应该离开海牙，否则他们还会抓到我。 ”

“ 那你到戒毒中心去吧，那是在城外，到那里你就安全了。 ”

“ 不 !”他大叫 ,“ 这事我自己拿主意 ,而不是你 .我也不去那

里，我自己有办法。你只要给我五百盾就行，我得把这笔债还上。”

“大卫，”我说，“我再也不能给你钱了。不给，否则你又要去买毒品了。”

“不是，我欠人家钱，告诉你，我要还债。”

“我根本不能给你钱。我手里的钱全用完了。要是找你爸爸要，他是不会给的。”

他拿起锅朝墙上扔去。

我站起来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我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大卫，我没有钱。”

他弯下腰，想从地上抓点东西朝墙上扔，可这时我已经砰地关上了门。

我太紧张了，不能就寝。我不能再给吉斯打电话了。如果他知道我又去了大卫那里，他就不会再理我了。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我知道我这样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放手不管他呢？我又开始生西蒙的气了，他和孩子们优哉游哉地在汽车活动房里享受。我本来也可以去的……可是，当你的孩子……你难道还能无忧无虑地去休息，去滑汽艇吗……

我心烦意乱。

一辆汽车驶近，两个男人下车来到我们家的花园里。我害怕了：这么晚了谁能来？接着我认出了大卫，多少放下心来。谢谢上帝，至少不是麦克，或者别的什么人。我没有开灯，门上是一把新锁，大卫进不来。我很快就上了楼。他要是按门铃我就从阳台上朝他喊，让他走。

他按门铃。我跳过了栏杆，还没有开口他就大叫起来：

“妈妈，快开门！快把五百盾递给我。我不必进家。如果你

不给，那我就糟了……”

我看了看另一个男孩子，但他站得离门太近，我看不清楚。

“挂断电话，什么也不问，”吉斯的建议闪过我的脑际，不过我还是问了：

“谁和你在一块？你的债主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欠人家钱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一点也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我没说话，赶紧思考应付的办法：对他说我去拿钱，却把警察叫来？警察好像会来，此外，即使来了，也要让大卫缴纳罚款。说家里没有钱？那么他们就会翻墙进来翻找……不，可以说西蒙已经回来了……

“我去问问你爸爸，”我向他大声说，转身向阳台门走去。

“爸爸玩汽艇去了，他的车不在家。给我拿钱来，我急需……”

“我没有钱。”

“你到外婆家去拿吧，我们在这里等着。”

我忽然怕得要命。如果大卫这样坚持，那就说明他真的面临危险。家里有钱——是家用生活费和我节省下来下星期买生日礼物用的：大卫七月三日过生日，朱丽叶——七月八日……恰好有五百盾。上帝，大卫倒霉了……

“这个孩子不走我就不下楼，”我说，“让他到汽车那边去。”

那孩子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慢慢地沿花园里的小路走到汽车旁边，站在那里看着我。

“大卫，”我小声说，“你说你要糟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开始不耐烦了。

“你有钱吗，给我拿来。别这么蠢！如果我想干，我就把窗户玻璃砸了！”

我关上阳台的门，拿出钱来，放在一个信封里。下楼的时候我想最好是把信封扔下去，便回到阳台上。

“大卫，”我喊他，“你准知道你还给他钱他就不再找你麻烦了吗？”

他看见了我手里的信封。

“知道，快扔下来吧。是五百盾吗？”

我把信封扔了下去，他一句话也没说，就和那孩子一起上车，扬长而去。

后来的几个钟头里我才明白，我又上了他的当，又中了圈套。那个男孩子看准了，大卫借了钱能够偿还。大卫的“还款能力”增大了，借给他一点钱一般不用久等。我替他还了债，不过是增加了他的困难，也没有让我自己摆脱恐惧心理。我绝望了，知道我一个人摆脱不了这种状况。每次我想“放手不管他”的时候，总要发生某种让我心惊胆战的事，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。我甚至想找个地方“隐居”，好让大卫找不到我，因而也就不能再耍花招。可是我“隐”到哪里去呢？太荒谬了！因为大卫“如坐针毡”我就该离乡背井？那样的话谁来照顾他的弟弟妹妹？因为有假期，我当然可以带上几个小的到什么地方去呆上一个月。可是我们没有钱了，甚至下个月的生活费差不多都为大卫还了债。况且我再也不能对西蒙透露一点消息，又给这一切雪上加霜。我把自己赶进了一个死胡同，只能一个人在那里绞尽脑汁、自言自语，孤独地承受这一切。直到有一天我发疯了，彻底精神失常，疯狂叫喊，哭闹不止，最后死去，人们给我穿上寿衣，把我拉走。

电话铃响了。是大卫！——这是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。他还是被他们打了，这次还……

“我是刚才和你的儿子大卫一起来的那个人。”

“大卫死了,”我说,“是你们把他打死了。”

“不,夫人,”他的声音变得柔和了。

“那怎么着?打电话有事吗?难道这些钱还不够?还要?我没有了!”

“不,夫人。”

“那到底是什么事?半夜三更的,你真的疯了?”

我哭起来,但我想控制自己,那孩子等着,希望过一会儿我能再说话。

“那你就别来骚扰我们了!”我喊道,“我受不了。”

“我根本不是想打扰你们,可是我欠你儿子的钱。”

我不知他什么意思,这个孩子欠钱?

“你欠他钱?”我重复说。“不,欠钱的是大卫,五百盾……”

“不,夫人,是我欠他的钱,二百盾,我没钱还他,可大卫等钱用,所以他说:你跟我去,我们两人演一场戏,让我母亲给钱,以后我就不再管你要这二百盾了。”

我把他的话重复了数次,这才明白是什么意思,每次这孩子总是回答:

“是的,夫人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给我打电话,把这事告诉我?你不是也参与了吗!”我喊道。

“我非常抱歉。我认为这太恶劣了。大卫不该这样做,我本来不想干,可他非让我干不可:要么还钱,要么跟他演戏……”

我的手垂下了,无力拿住电话。我听见话筒里那孩子大声说:

“我后悔,夫人,是他强迫我干的。我觉得这太恶劣了。”

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。我一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,一

会儿坐下，一会儿哭泣，酒也喝得太多了。大卫卑劣下流地欺骗了我，他利用我的害怕心理，迫使我给他钱，开头我是这样想的。可是过了几个时辰，我的怒气消了，我又生起西蒙的气来。西蒙让我一个人作难。大卫在生病，他做的一切都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我甚至不能责怪他。可西蒙却故意躲清闲去了，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。他把我一人留在这房子里是不负责任的，他明明知道大卫随时可能来惹事，却只会说“希望你不要放他进家！”一句话就把什么事都推得干干净净，这是不公道的。西蒙，西蒙，西蒙……我恨他，这次我决定和他一刀两断，离婚。我要离开他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沉入梦乡，一个接一个地做梦，有时又觉得隐隐约约地疼痛。我梦见大卫在用他吃米饭的那把刀子，我想夺下刀子，不料刀子掉了，一下子扎到我肚了上，我感觉到疼痛，便喊起来，吓醒后开始找身上的伤口。等我明白这不过是梦以后，才又躺到枕头上。我感到痛苦，痛苦极了，还感到恶心。这是神经反应，我想。一个精神失常，另一个就感到疼痛，这是情感变化引起的症状。应该镇静，放松，我不想生病，我不能生病，大卫已经病了，他不能没有我。他身边应该有一个人，既然西蒙避开他，那就只有我了。我应当是这个人。但是我的疼痛未减。我吐了。我必须走到电话机前……应当请医生来……

我勉强支撑着下了楼。我应当在楼下等医生来，好给他开门。医生给我做了检查。

“急性阑尾炎发作。最好马上去医院。”

我哭了。

“这不行！”我讲了大卫的事，“我无论如何不能住院。您知道……”

这是一位值班医生，他耐心地听我讲。

“也许这对您是一种解脱,”他说“你不想扔下儿子不管,但眼下只好这样做了。这样他就没有机会了，再也不能跟你耍花招了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还不明白！他有病，他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，他不择手段地要钱，那是任何健康人都干不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病了，你也病了，你们二人互为病因。这个不良的怪圈早晚得打破。现在你的身体需要照顾，可你还想管他。把儿子的事抛诸脑后,快去住院吧。”

但我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。我流着眼泪等出租车。好了，我先到医院去，但我很快就会回来，因为大卫需要我照顾。西蒙帮不上他的忙。我恨西蒙，我恨西蒙。因为他不管大卫，我才恨他。

星期一早晨给我做了手术。下午四点钟，麻药的效力消失，我醒了。我喊大卫，叫他的名字，我诅咒西蒙。我好像在用力挣脱什么，有一个人紧紧把我抓住。我发现他们让西蒙走开，这太好了，让他走吧，让他从我的生活里消失，我的生活里只有大卫和我。

感觉稍好一点，我就开始在走廊里活动。医生来的时候，我对他说因为有大卫，我要出院回家。

“你康复以后,我们就让你出院。”

我不赞成，可是他不听我的央求。伤口愈合得不好，因为我一分钟也躺不住。有时我受到警告就号啕大哭，他们安慰我，最后没等伤口长好就让我出院了。

西蒙来接我，显得很殷勤，可我却觉得不能忍受。

“上你的办公室去吧,”我说“我什么也不需要,谁也不需

要！”

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我给大卫写了信：“星期四回家来，我想同你谈谈……”

家里又遇到了新的打击：我的母亲来了。她收拾房子、做饭、洗洗涮涮、把一切都管了起来，我应该感谢她。然而我不领情，请她走，尽快走：“因为你们大家都让我发疯！”

母亲同西蒙耳语了一阵，没走。

“下午走，今天我还有许多事要做，”她说，“非做完不可。”

我相信大卫会来的。他真的来了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收到过我的便条或信件吗？是因为毕竟感觉到我病了？我的母亲去开门，我跟着她到了门口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开始看我的脸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，我看见他真的惊慌不安，“你怎么了？脸色为什么这样？”一种透明的纯洁情感出现在我们之间，但我的母亲把一切全搅乱了。

“你妈妈刚刚出院，身体虚弱得很，大卫，你同她说话要和气些，主要的是不能朝她嚷。”

一切都消失了，这个真情流露的短暂瞬间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样的东西。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。我从他的目光里忽然悟出，他不需要一个病弱的母亲，我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角色。绝望之余我决定再试一次，我想让他看看我多么不舒服，但我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角色。他还是想要一个强壮的母亲，像我这样的母亲，他只能弃之不要。

“见鬼，”他说，“你为什么不注意身体？难道能把自己糟蹋成这个样子吗？或者这是一种报应：这下可好了——美了吧！”

我勃然大怒：

“我大病一场，不错，是你把我气病的。你应该戒毒了。你把自己毁了，还连累了我。”

他忽然踢了我一下，恰恰碰到了伤口，我哎哟一声，痛得弯下腰。

“你妈妈刚刚出院,你还踢她!’我母亲喊了起来。

我对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，同时我自己也十分愤怒，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但不像对西蒙的怨恨，对西蒙的怨恨掺杂了其他情感。不像，我是生大卫的气，是一种真正的怒气，就像我对他产生的最初的感觉一样。因为他踢了我的伤口，因为他伤害了我,因为他拒绝接受我,我这时才恍然大悟:到时候了,我是该放手由他去，今后我要为自己操心了。这种愤怒对我来说是必须的，否则不能放手由他去。

第四章

一九七七年七月整整一个月，我的精力才慢慢恢复。孩子们放假了，西蒙带着他们去“汽车活动房”度假，朱丽叶和她的女友一道去西班牙，我独守家园，而且是我有生以来第二次想多做点“日常琐事”，以挽救自己。我拒绝任何外力帮助。

“不,不,不,任何心理医生,任何药物,任何治疗,我都不需要。我只想弄清楚，我自己有什么问题，我今后如何善待我的生命。”

我从卧床开始。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，所以也就没有人能让我生气。我看着壁纸，只觉得体力不支，断断续续地沉沉入睡，却没有梦。直觉告诉我：该发生的事总归是要发生的，我的任何反抗都会对我的进一步生存产生影响，今后就没法活下去了。我大概在床上躺了足足二十四小时，因为我依稀记得光明和黑暗的一个轮回。我从最后一次酣睡中浮游出来的时候，又恢复了思索。饥饿……口渴……我要上厕所……但我始终没起来。有一段时间，我静听自己的呼吸。我不需要为呼吸费力气，我想，我的腹部会自行呼气和吸气，我没花一点劲儿，就能吸进空气……我把手放到腹部，它就和腹部一道起伏。我吸入空气，再吸，我不需要为此花一丁点劲儿。

可现在我该起来了。

我要如厕。

就是说，我应该起床。

要上厕所。

好极了，我的肌体复原了！膀胱不用我挤压就有了活力，我满心喜悦，感到我的膀胱竟如此轻松。

渴了。我紧扶着洗脸池，连喝了两杯水。

饿了。就是说，该下楼了。我没去翻冰箱，没去找面包篮子，而径直去房后的花园，那里有我的一个角落，绿意葱茏，种着旱芹、峨参、圆叶当归、薄荷。坐在地上，背靠密实的围栅，我折了几根草茎，慢慢咀嚼。我闻着那草味，嘴里品味着淡淡的辛辣气息。我迎着太阳抬起了头，闭上双眼，感觉到了身下的土地。我的腹部在起伏。我这才再次意识到：我会喘气，我为此不需要费一丁点力气……

我终于站起来，头有些晕眩，两手扶着门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就从日常琐事中寻求支撑。

直到第四天，我才觉得需要淋浴。洗完澡我头一次照镜子。很长时间我才辨认出自己来。这张脸不会笑，而且不为外界的声色所动。过了好几天，我才听到电话铃响。第三声，第四声……哎，我似乎听到什么……第五声，第六声……但我没动弹，我只是听着，回想最近这几天我不止一次听到这铃声。这声音在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，与我毫无关系，暂时还传不到我的耳中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才取下话筒。人的声音。是人声吗？上帝，这是谁的声音？我在慌乱中放下电话。电话铃再响。这时我才不再害怕，对着话筒说了我的名字。喘气，膀胱，饥饿和口渴，认不出的自己的脸，最后才道出自己的名字。

“兰恩,我是西蒙,我想知道你的近况怎样。”

这句话太长，我重复了一遍后面这句话：

“你的近况怎样……”

“是啊，你的近况怎样？一个人行吗？想不想叫我去一趟？”

“不,”我说,“最好让我一个人……”

“你肯定行吗？我怕你不吃东西。我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问,我只想帮帮你,兰恩。”

“最好还是让我一个人……”

我放下话筒，手在发抖，心怦怦乱跳，步履艰难。我觉得由于接到电话，听了这段话而疲劳至极，我的额头上冒出了汗。

每天我都为自己开辟一块新天地。我发现我的衣服脏了，宅子里的花木枯萎了。我见邮递员从房边走过，就去看看邮箱。在花园里，我不再席地而坐，而是搬来一把椅子。我想吃葡萄，就决定去买。到了商店却很尴尬，因为忘了带钱。又是一身冷汗：

“您能不能给我记账？”

“当然可以,太太。”

我兴高采烈出了商店：我行了！我又什么都能干了！我第一次给西蒙打电话，就好像又学会说话了。

“对,我今天出门了。”过后我突然抛开自己,想问问别人的事:“你干什么了？”

西蒙学会了说短话：

“划船,去市场,跟勃朗麦打羽毛球。”

又过了三个星期，我同意了：

“好吧,来接我吧,我应该试试。”

我做的这些‘第一次”,弄得我疲乏不堪。一小时的车程,周围令人眼花缭乱的车流，闹哄哄的孩子们，走到船上，女邻居过

来呆了一分钟。吃过午饭，对我来说谁都不复存在了，我倒在椅子上酣然入睡。后来回家，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又尝试了一次。这次我做好了“准备”;给孩子们买点东西 给约欣买了一套比基尼泳装，给西蒙和勃朗麦买了杂志和连环画。我已经能和他们呆上两天，看着西蒙忙碌。我看着他里外清扫，看着他轻声细语跟孩子们说话，好像时时刻刻都在迁就我，这使我的心充满了温情。这就是说，他终于懂事了。那个戴着长长的毛围巾的大学生的形象，连影都没了。孩子们睡了以后，西蒙说：

“兰恩,你还记得亨丽艾塔吗?”

亨丽艾塔，我的表妹……

“是啊,当然记得,怎么啦?”

“她在荷兰。”

我连一封信都没给她写过，可能是怕和她联系。因为给她去信也好，她来信也好，岂不会使我想起我这不美满的婚姻？我不是一定要靠我自己来解决我自己的事吗？“我想自己闯过这一关。”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吗？西蒙平静地接着说：

“她来这里已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从母亲那儿知道的，我找到了她。当然，谈了大卫的事和我们现在的状况。我想，最好你也和她谈谈,她还要呆几个星期,有时间。”

我独自在家又过了一个星期，结果我终于听了西蒙的话。亨丽艾塔是个善解人意的女性。渐渐地，我觉得有必要找个人倾诉一番，以减轻内心的重负。就找亨丽艾塔吧，我需要再见到她。我们约好见面，于是她就此开始“洗耳恭听”。我和她在沙滩和沙丘上散步，在花园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当西蒙带着孩子们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她在汽车活动房里又过了两天。我说呀，说呀，把她走后我们家发生的事全都说了，我的全部生活就像在一个旁观者面前那样匆匆而过。我甚至能够把种种往事串

连起来,加以总结。

可是过后她却建议：

“跟我走吧，去我那儿呆上几个月。我介绍你和‘匿名者之家’取得联系。”

“‘匿名者之家’?上帝,这是什么?”

“这是吸毒少年的父母建立的组织，父母们每周见面，交流经验。你的经历就是一个女人孤独挣扎的故事。在美国，那些有大卫这样孩子的父母都不感到孤独，他们常常聚会，彼此诉说各自的不幸，敞开心扉，畅谈他们的感受，抱怨自己的挫折并共享各自些微的成绩。还远不止这些,他们来找‘专家’咨询,或者听取批评，不，是他们自己切磋，自己检讨，他们自己就是‘专家’。他们清楚地体会到子女吸毒是什么滋味，这一点谁也不如他们。”

我神智不清了。我仿佛突然看到我在大街上，站在那座涂泥灰的小房边,用自家的喷壶浇自家的天竺花。“算了吧,”赫莉说,“你成了我们大家的笑料了。”

“谁?大家是谁?”

“所有吸毒少年的父母。”

“所有的父母?他们在哪里?”

“我不知道，他们害怕受人羞辱而深居简出，实际上他们需要联合起来，彼此保护，以免陷入愚昧无知的境地。”

“就是说,在美国他们都联合起来了?”我说。

“对,”亨丽艾塔答道,“他们十个人,或十五个人结成社团。他们认为，有病的不仅是他们的孩子，他们自己也有病，只有治好了自己，才能帮助自己的孩子。”

“亨丽艾塔,”我说,“我病得很重,到现在我才明白,我病得有多重。如果我还想活下去，就要振作起来。带我走吧，让我见

见这些人，我要向他们学学。他们要当我的老师，教我怎样用自身力量治好自己…… ”

亨丽艾塔办事利落，当天晚上就给她称之为“ 匿名者之家 ”的一个女友打了电话，请她把现有的资料、小册子、书籍以及报上有关“ 匿名者之家 ”的文章统统寄来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的信箱里就出现一包东西。我读了这些材料，对那里一些人当时的处境有了一个印象，也很快就明白了我自己的处境。他们都像我一样，身为父母，眼看着子女慢慢堕落下去，眼看着他们的人格慢慢蜕变，越来越富于攻击性。这些为人父母者和我一样，看到孩子越来越孤独，自己也越来越孤独，因为他们不敢再和亲朋好友、家庭成员维持往日正常的交往。说实在的，他们不可能让任何人理解他们毫无出路、濒于绝望的处境，否则到头来还会给自己找麻烦。儿子吸毒的情况不是凭空发生的，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。错在父母身上……他们像我一样，受负罪感的折磨彻夜难眠。这一切的源头在哪里？我当时犯了什么错误？对这些问题我早就有了答案：就从我忍受不了他的啼哭开始，就从我们这桩轻率的婚姻和我们父母的干预开始，就从我认为这孩子来到人世就是对我的“ 惩罚 ”开始。我的过错，我的过错……我得知，那些父母也都慢慢得了病，结果整天整天就只做一件事，玩“ 侦探游戏 ”满城里转悠,找自己的孩子,把他们的房间翻个底朝天，找橡皮止血带和注射针头之类的罪证。他们一旦发现这些东西,马上就瘫软在地,呼天喊地,又是威胁,又是哀求,企图让自己的孩子改邪归正。但是孩子们不会就此止步，他们刚刚指天发誓一定要改，但转眼就违背誓言，因为他们有病，而病人是无法保证自己明天就能康复的。那些父母勃然大怒，因为孩子们说话不算数,没有为了‘ 父母 ’而痛改‘ 前非 ”,因为他们对自

己的孩子失望之极，又惟恐孩子再干些出乎意料的事。接着他们气急败坏，盛怒之下把孩子赶出家门，过后再百般哀求，劝孩子回来，毕竟舔犊情深，实在于心不忍啊。于是那些浪子就讹诈,就威胁,扬言要自杀,花言巧语,谎话连篇,还卷走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,最后,他们的抗拒症就转向外边 不想再工作,弄虚作假，放火，偷盗。于是父母们就慌了手脚，想尽办法为孩子解困，为他们开脱罪责。他们想办法减轻情节，证明孩子们无罪。他们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替孩子还债，给他们找新的工作。总而言之，他们想尽办法让孩子们改过自新，而孩子们也明白父母愿为他们赴汤蹈火，父母们始终都不明白，正是他们自己在怂恿孩子吸毒……上帝，这些父母都和我一样……

我不得不声明护照被窃，并申领新护照。我去办了签证，着手整理衣物。西蒙完完全全支持我去美国的计划。他也看过“匿名者之家”的材料，还提了一些问题。这样一来我们又一次志同道合了。

“好吧，我就详详细细写信告诉你，他们那里是怎样互相配合开展工作的。”

“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孩子们有什么事，我一定打电话告诉你。”

我买了票，定了行期——八月三十日。行前一天，一阵手忙脚乱。

“上帝,我不见大卫,就没法走。”

“你不可能见到他，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。”

“可是他怎么不回来呢？他突然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！我这是怎么啦？为什么我现在想到他？”

我大哭了一场。西蒙只好道出真情。

“那好吧，不得不说了。他已离开米拉，他受不了戒毒的滋味。他还到‘汽车活动房’来找过我，要钱，我没给。当时他就去了船上，在那里躺下，自然是去过他的毒瘾。到了晚上又来要钱，我就给了他一点。”

“他连饭都没吃上一口？你没让他吃上一顿再打发他走？”

“唉，兰恩，你算了吧!怎么，我该塞给他一串香蕉，或者你常给他榨汁的那种傻大傻大的橙子？为了上帝，兰恩，我们的儿子是吸毒者，他只对毒品感兴趣，这就是现实，现在要谈的，不是我们要为他做点什么，而是我们怎么救救我们自己。把大卫从你的脑子里丢开吧，你要做的是下决心寻求那些人的帮助，找到新的生活轨道。求你啦，兰恩，别再后退一步。”

我哽咽难言，朝他点点头。我无话可说，只能频频点头。

我在美国呆了近四个月。头两个月，住在亨丽艾塔家，她介绍我和艾琳相识，艾琳是她在‘匿名者之家’那个小组里的女友。这个小组只有九个人:艾琳，两对夫妇，即桑迪和鲍勃，安妮和迈克，还有两个离了婚的女子，维拉和雪莉，再就是贝拉和厄尔娜，这两个女人的丈夫认为这事纯属扯淡，不愿跟她们一块参加。他们每周碰一次头，遇有特殊需要就用电话“串连”。头一个晚上，他们向我简短介绍自己的身世。艾琳——单身母亲:“我已不存在了，因为我的儿子把我折腾死了。”桑迪和鲍勃有个十五岁的女儿，是个幼龄妓女，吸海洛因:“现在正想法子把她从越南人手里搭救出来。’安妮和迈克有两个儿子吸海洛因:“有时候我们就想:就当他们死了算了。’维拉有个儿子，由吸毒者而成了毒贩子:“我买了一支枪，要是遇到他，我就给他一梭子子弹。’雪莉有个女儿在精神病院：“对她来说，生命终结了，她自杀过三十次，我等着她最后成功，到那时我就能活下去了。’贝拉有个吸海

洛因的女儿：“她还有个小孩，这孩子是在她吸毒后的麻醉状态中来到人世的。’厄尔娜有三个儿子‘：这三个孩子都不同程度地吸海洛因。”

我第一个念头是：上帝，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最好先别忙着说大卫的事……可我给西蒙写信说：“都是些不可理解的事，但是他们还笑得出来。他们诉说自己孩子干的荒诞离奇的事，诉说他们如何对付这些事，而且总是有人忍不住捧腹大笑，或者就大嚷大叫：‘不这样就不行吗！’于是哄堂大笑……”

我呆坐了好几个晚上，到后来自己也跟着笑，恨不得比别人笑得厉害。厄尔娜说起她的儿子骗了她五百美元：

“他真的答应要重新做人，干点正事。他说得慷慨激昂……只是他还欠一个毒贩一笔钱，只要这笔债一还，他就可能干正事走正路了。”

迈克听到这里就嘿嘿冷笑。厄尔娜冲他振振有词地说：

“总有一天还是要开始信他的话吧。”

那边又传来冷笑声，是贝拉和鲍勃。厄尔娜大为扫兴，看着他们：

“哎,他至少是有了表示,他要学好,一连好几个晚上呆在家里……当时我就认真想了想……当时，我就……”

周围哈哈大笑，接着好像有人喊了一声：

“你还不去银行！……就把休假用的那点钱给他！”

我也没少笑，虽然我和厄尔娜一样，也是一而再、再而三这么干。但是，这有多痛快呀，嘲笑自己办的蠢事，然后嘲笑厄尔娜,她却叹息说‘：上帝,这太难了,你们又能怎么办呢？’厄尔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，她不知所措了。

“当然，一个钱都不能给！乖乖，瞧你那三个不争气的儿子，

这种事其实你已干过两回了。”

过了五分钟，厄尔娜自己也哈哈大笑，笑安妮和迈克家的事,比谁笑得都欢。

“他说:‘你们要是给我买一套打击乐器,那一切真的就全变样了。’他说有人请他到一个什么小组去演奏。我们想，也许真会好起来，他不是已在这样的团体演奏过许多年了吗。”

艾琳：“那么他就开始在那里敲敲打打了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与其让他成天无所事事……”

艾琳“:他那套旧的打击乐器呢?”

“他全卖了,这我们知道。”

哄堂大笑，厄尔娜高声说：

“好了，办成了。你们给他买了一套新的打击乐器……可他一次也没用过，马上就把它卖了去换这玩意儿！”

“是的,不过,”迈克说“,我们当时想的是……”

但是他左右顾盼，没有说完就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。

“西蒙,”我在信中写道“,我在这里已过了六个星期,参加了六次晚间集会。白天，我就抓紧时间找每一个人单独谈，读点书,确切点说,就是翻阅‘匿名者之家’的材料,甚至晚上也读一点，从中得知按计划要分十二步走。这很有趣，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真正明白这第一步是怎么回事。你要知道，这第一步的内容是，我们要有极大的信心说：作为有责任心的人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帮助孩子选择健康和自尊的生活方式。只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想得到答案：怎样才能使孩子转变，再按照我们心目中想像的方式来塑造我们的孩子？我们为此已经竭尽全力了。我们采取的办法是,严肃谈话,声色俱厉,絮絮叨叨,冷嘲热讽,喝斥威胁,限制这限制那,忽而给钱,忽而又不给钱,再加上打骂,这一

切都是为了对他施加积极影响。但是，最后的结局却是家里闹得一塌糊涂，打架，哭号，埋怨父亲，埋怨母亲，埋怨兄弟姐妹，埋怨亲朋好友，埋怨警察，埋怨国家。我们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，好像这一切都只能加剧对立情绪和反叛心理。由于我们认为‘孩子实难管教’，就忽视了自己的责任。现在，当我们回忆起为挽救孩子做出的种种努力，回忆起我们种种失败的时候，当我们了解到‘匿名者之家’其他成员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惊人相似的时候，我们就只能承认惟一的事实：我们既无能力改变他人的生活，也无法驾驭自己的生活。我们确乎一切都尝试过了，只有一点除外，即先别管孩子，而是回头看看自己。”

我为大卫踢我、反对我而生气是有价值的，这让我认识到我该放手不管他了。但是，当我明白我已完全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了。

然后是第二步，第三步。我逐步掌握了十二个步骤。我干吗老是叫唤“：我有病！”可是我一回都没想过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诊治的正是我自己。不，只有我把自己调理好了，才能去治大卫的病。我明白了这就是自我治疗。这就是说，我应当一心一意关注自己，关注自己的行为，关注自我松弛的方法。我不应该为别人设想这样那样的方案，但也不允许别人操纵我，或者说，不能让自责和恐惧的情绪支配我的所作所为。我应该先正己，而不是先正人，先正大卫。我怎样面对未来？这就是我的错误，这就是我失算的地方。我承认，我犯过错误，但这里没有犯罪的成分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因此，让负罪感去它的吧！我把这话对雪莉说了，她顿时觉得心情压抑，自责得不得了。

“这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。如果当时我不离开丈夫，如果我

没移情别恋，我的女儿就会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成长，她绝不会去吸毒……”

“别再想你的过错了，别再想了！你没错，你不过是个凡人。雪莉……”

我给西蒙写信说“主要的原因是,在这个圈子里,你感到温暖，进这个圈子后，你不感到孤独。我们大家的难题相同，不过表现形式各异，问题的要害是一样的。大家都一样地奋斗，有相同的苦恼，对事态有共同的反应。然而，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人，我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。鲍勃是牙科医生，迈克是码头工人，雪莉是教员，而维拉是饭店服务员。有的人生孩子早，有的人晚，有的人想生孩子，有的人不想。我试图找到规律，但是，唉，你简直没法说清哪个家庭会出吸毒的孩子。在我这个社团里，有八个互不相同的家庭。我在这里如同隔岸观火，是旁观者，我只能分析我的‘过去’,无法通过实践来考验自己,因为大卫离我太远。当然,我对‘今天’发生的事态自有我的看法,可是这不是我的事情，虽然我完全了解情况。只要一回去，我就（和你一道）组织这样一个社团,因为现在我亲身体验到要想或多或少过上正常的生活，还是办得到的，虽则凡是有吸毒孩子的父母，都有不可解决的问题。我在这里逗留的时间虽短，但我看到了另一种景象！还记得贝拉和她的女儿，还有她那个孙女吗？她和社团一起，那样认真地反思自己，没空儿操心她女儿的生活。到头来，她的女儿却能反躬自省，最后也才有可能自觉自愿下决心戒毒。自然，还很难说结果如何，但是，对贝拉和她女儿来说，这总算是个进步，甚至可以说，她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善。”

通过“贝拉案例”，我着手与别的父母社团取得联系。我感

兴趣的是，那里有没有“那方面”的积极成果。我到邻近的城市访问了十四个家庭，所到之外，人们都心甘情愿为我花费时间，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晚间集会。我搜罗了一些材料，又过了六个星期，我得出了清醒的结论，然后写信寄给了西蒙。

我不只给西蒙写信，还给赫莉写了信，因为我已经开始写信把我的感受告诉她。对我的信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激烈的否定：“当然，我很愉快地得知，他们在美国那个地方都不甘消沉。但是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参加那样的社团，为什么？我为什么要自己拯救自己？没那个必要。本尼的事情糟糕透了，我也看不出有何必要做点什么事来拯救自己。我常去看他，这就够了。我可以肯定，他丝毫都不觉得有必要出院。那里对他照顾得很周到，他觉得好极了。吃了那么多的药，做了那么多的检查。也有人问过我家里有没有人患心理疾病。怎么啦，我的姐姐也得了狂躁抑郁症，她自杀了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就摇头，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，他们围绕这个话题都说了些什么。但是，本尼如果不吸毒，就永远都不会是那个样子。只有吸了毒，他才能把隐藏在内心的事和盘托出。看到你们社团里那些人的情况时，我就想:他们有勇气,我可再也没有了,因此,别指望我。”

我向西蒙和赫莉说了如下的结论：

“那里有十四个社团,其中有‘匿名者之家’这个社团和子女在戒毒所的那些父母的社团，一共有一百四十二人。连同我们这个社团，共一百五十二人。其中有三十对夫妇和九十二个单亲（六个男人和八十六个女人）。相应地说，就是有一百二十二个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家庭。有十二个案例，吸毒者是由于父母行为的改变而开始走上‘正轨’的。这十二个案例说明了以下状况：

“我有一定之规。我的儿子知道，我绝不退让。我有自己的

生活准则，而他也有自己的准则。

“我不再庇护我的孩子。如果他犯了什么事，后果由他自负。这迫使他最终要直面现实。

“我再也不管他的事,再也不去为他‘着想’,结果,他就不得不为他自己着想。

“我再也不责备他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吸毒就是一种病态。我再也不说：看看咱们都做了些什么，我可是为你费尽了心血——我再也不这样说了。因此，他的负罪感就轻了。而负罪感越强，就越刺激他去吸毒。

“在一百二十二个家庭中有十二个家庭说明，孩子们的情况显然有了很大起色。可这只是百分之十！如果再算上已接近正常的三十个家庭（而这只是百分之二十五），那我就能明确断言，我们选择办这种社团的道路，其方向是正确的。”

我在亨丽艾塔家呆了两个月，花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在全国到处跑。十二月二十三日我回国了。在这之前，我还愉快地看到雪莉的车顶上有一棵圣诞节树。她拉下车窗，对我喊道：

“你走之前顺便来看看，好吗？我买了圣诞树……这些年来这是头一回！我要在这棵树边好好坐坐，别笑话我！”

雪莉和她那个扬言要自杀的女儿……晚间集会给了她新的力量，把她从孤立无援中救了出来。在雪莉家，我和全社团的人告别。难道这就是因为走到绝望的边缘而彼此结识的十个人吗？他们彼此以诚相待，各自都知道各自的弱点。

迈克说：

“各位，告诉你们我的最后发现：我曾经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规劝我的几个儿子，甚至试图把上帝拉出来帮忙。可那些小子们不听我的,我就祈祷:‘上帝,千万别让他们毁了,求求了……’

我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们可没少花力气。”

我们就讥笑迈克。是啊，是啊，我们过去都这样，但是，我们现在能彼此讥笑，这是多么幸福啊。

桑迪递给我一本小书。

“在飞机上看看吧，这本书真让我大有收获。”

这书的书名是《预言》，桑迪读了一首与我们的遭遇有关的短诗：

一个妇女抱着小孩，恳求着：
“说说我的儿女吧。”
他答道：
你们的孩子，不是你们的，
他们是对自己充满希望的儿女。
他们只是你们所生，而不属于你们。
就算在你们身边，但不为你们所拥有。
你们可以给他们爱，但不能把你们的思想给他们，
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。
你们可以庇护他们的躯体，但不能庇护他们的灵魂，
因为他们的灵魂在未来大厦之内，
而你们却进不了这座大厦，连在梦幻之中也不能。
你们可以尽力仿效他们，
但别企图让他们仿效你们自己。
因为生活不会倒流，也不必死死抓住昨天。
你们只是弯弓，而你们的孩子是出弦的飞箭。
射手看到的目标无限遥远，
他用力压弯你们，好让利箭轻快地飞向远方。
你们在射手的指掌之下弯曲着，这给了你们快乐，
因为他爱的是箭呼啸的飞行和他手下的强弓。

这是黎巴嫩诗人纪伯伦①的诗《预言》。我时常阅读这首小诗，时常向自己提出雪莉那天晚上提的这个问题：“那无限遥远的目标，不会是吸毒致死吧？”但没有答案。我们坐着，默然看着前方。艾琳对于儿子吸海洛因过量致死，只是反反复复地说：

“他们只是你们所生，而并不属于你们。就算在你们身边，但不为你们所拥有……”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我乘的飞机在斯基佛机场着陆。西蒙、朱丽叶、约欣和勃朗麦都来了。四个月，好长的时光。我突然发现勃朗麦长得更像大卫了：那双灰色的眼睛，那张圆圆的脸庞。

“我的小傻瓜，”我说道，把他拉到身边，就像亲近大卫一样。

我母亲里里外外忙活着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，这里一切都好。”孩子们围着她，她又心花怒放，兴致勃勃地指使着：“朱丽叶，放好茶壶，冰箱里有苹果冻。”然后说：“留一块给大卫。”

我看一眼西蒙，问：

“给大卫？”

“我们先别谈这个。”

“真怪了，”我说，“大卫在这儿吗？我想知道……”

西蒙轻声细气地说：

“现在先别扫大家的兴。”

日间，我们去散步，登上那个熟悉的沙丘——它知道我们过去的喜怒哀乐。

“现在说实话吧，”我说。

我看到西蒙很觉为难。

① 纪伯伦（1883—1931），阿拉伯作家，诗人和画家，多年侨居美国。——原注

“九月份，”他开始说，“他又回家来。起初，一星期回来几次，可后来……你是知道的，和你母亲……她给他弄吃的，买新衣服，结果呢，过了两星期他又来跟我们同住，旧病复发，赖在床上直到中午，想吃就吃点。当然，让人受不了。当时我就让你母亲带着两个小一点的孩子到她家去，朱丽叶呢，到她的女友家去搭伴。我和大卫面对面相处的时候，我就试着跟他说话。真是奇怪极了，我们真的聊了起来。他很清楚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却又没有毅力独自戒毒。他听说捷伊斯特有个暂时栖身的去处，想去那里试试。我们一起打听了一下，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到那里去面谈。但是他回来以后吓得要命。他在那里至少要呆上一年。他颠三倒四地说那里的戒毒计划‘恐怕一辈子都没法完成’。后来的几天里，他越来越放任自己。有时他到我工作的地方去找我。鲁德也找他谈过，过后就对我说：‘我看，你应该把他看紧点。他心情压抑，说不定真会出点什么事。’我特别害怕，打电话给吉斯，可他毫不担心，说：‘是啊，他当然可能出事。这种孩子并不少见，他们玩世不恭，想毁掉一切。自然，最好还是安排他到捷伊斯特去。但是，这要由他自己拿主意，而不是由你，否则不好办。只有在他自己明白再吸毒就没有出路，只有在他还想活下去的情况下，他才能下决心走这一步。’

“他一直在我这里磨蹭，心神不定，下不了决心。有一次他说：‘算了，明天我就去那里。’甚至着手收拾东西。可到第二天，又变卦了：‘不，我不去，’他又上街游荡，深更半夜才回家。我也像他一样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头一天我就对自己说：这太蠢了，我要把他轰到街上去，到那时他很快就会收敛，明白他该做什么。到了第二天，我说的却是另一番话：不成，不能这样，小孩子误入歧途了，要想点别的办法。找吉斯谈毫无意义，找家庭医生吧，你能想像他会说些什么……而对大卫来说，反正都无所谓。

我下班回来，他照例不在家里。说来奇怪，可我也总是跑上楼去看看他的房间…… ”

西蒙语塞了，我知道这是为什么，就不动声色地替他往下说：

“ 有一次你下班回来，上楼看见大卫躺在床上…… ”

他不胜惊讶，看了我一眼。

“ 对，上帝才知道他吞的是什么，量非常大……医院里的人说，这次是玩真的了，就差一丁点儿了，后来……他们留他观察几天，诊治他的心理医生建议他到耶林聂克医院去看看。大卫去了那里…… ”

我们肩并肩默默走着，渐渐地我理解了西蒙的苦衷。我在美国钻研理论的时候，我们家已在持续进行痛苦的实践了。而当我打算组织父母亲社团的时候，一想到这其实就是要解决我家大卫的问题，我就茫然不知所措了。如果要解决的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西蒙的问题，那和父母亲有什么相干……我慌乱之极，失落之极。我觉得西蒙抱住了我。

“ 你知道，没有你的信，我就支撑不下去了，”他说，“ 让我们一起组织起这样的社团吧，兰恩，你精力充沛。上帝啊，你在想什么 ?”

什么都没想，什么都没想……

过了三个星期，大卫从耶林聂克医院跑了。做这件事再容易不过，因为他是自愿去的。把这样一个小伙子拘在医院里是不可能的。他在阿姆斯特丹的“ 朋友 ”那里一直住到十一月中旬，和他们一起整天注射毒品。每天买毒品用的钱是大家一块儿偷的。在阿姆斯特丹被盯得很紧的时候，他就到了格罗宁根，那里也有“ 朋友 ”。我回国前一个星期他开始回家。朱丽叶看见

他，毫不留情地把他赶走了：“外婆带着弟弟妹妹已经忙得团团转了，如果你有事，就到办公室找爸爸去吧。”大卫没有去“找爸爸”，傍晚又回来了。西蒙已经下班回家，外婆也没有因为带着弟弟妹妹“忙得团团转”。朱丽叶告诉我：

“大卫太坏了，他一点也不可怜。他要钱，爸爸说一分钱也不给他，让他自己去申请补助。可是到了外婆跟前，他又装出一副可怜相，要吃的，还说他衣服不够，外衣被人偷了，特别冷，也不知道去哪里过夜。你是知道外婆的，她哭起来了，爸爸火了，把大卫赶了出去。我们一晚上都在安慰外婆。可是大卫却看出了还能找外婆。她呢，板着脸，每天给大卫留吃的，一点也不避讳，完全公开地这么干，根本不听爸爸说什么。这样大卫就每天趁外婆一个人在的时候回来。我和爸爸谈过这件事，决定什么也不管，再等一等，等到过几天你回来了，就请外婆走。那时候至少有我们三个人一条心。你在社团里学了那么多东西，爸爸把你的信全都给我看了。现在我们真的能够让大卫知道，我们不想为他吸毒而搭上自己的命……”

朱丽叶再次把我从漫无思绪的空茫之中解脱出来。头一回见大卫，我就恢复了信心。圣诞节第二天，大约四点钟，他站在门口。我犹豫了。

“如果他像个人样，就放他进来，西蒙。我好久没见他了。”

我们还没围桌吃饭的时候，他还算“像个人样”。当时他去卫生间磨蹭了好久，我听见他在里面用鼻子“嗅”什么。我叫西蒙过来，一起守在卫生间门口。

“他吸呢，”我说，“他在吸海洛因白粉。”

我用拳头砸门。

“大卫，出来，你说话不算数！”

孩子们都在屋里。我做了一桌节日大餐。大卫把好日子全毁了，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

“出来，大卫，”西蒙说，“要不我就用起子撬门了！”

于是再次出现我们常有的迟疑不决。过圣诞节本不该这样的……如果我们装作什么都没觉察到，好好吃顿饭……也许孩子们就什么都不会看到……但我马上再次清醒，故意发火，就像当年他踢我时那样。

“西蒙，”我说，“你还等什么，拿起子去把他轰出来。”

门打开了，大卫不正眼看我们，径直走向衣架，揪下领带，在这之前他是自觉自愿跑到镜前系领带的。然后他猛摔前门，勃朗麦吓得急忙跑到走廊里去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，“又是大卫吗？”

他瞪着大眼睛，一张小脸惊恐不安，他总是预感会发生什么事。只要大卫一进家门，勃朗麦就仔细听我们的每一句话，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领他回屋里。疑问消解了，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有可能生活正常，百分之十的家庭浪子回头，有积极进展。我攥住勃朗麦的小手，决心想办法进入这百分之二十五的行列。

要从头做起，西蒙、赫莉和我为此花了个把月的时间。赫莉曾写信给我说：“这些人有勇气，而我再也没有了，别指望我。”但是西蒙从未罢手，坚持把我的那些信拿给她看。西蒙去看她的时候，她打听我在美国的所有情况。本尼毫无变化，她却变了。她不再愤怒，又成了随遇而安的女人，觉得可以带着心灵的创伤活下去。至于汤姆，她说他：

“不，汤姆不再……可怜的汤姆，对他来说，一切都完了。如果我和你们一块儿组织那种社团，他不会阻碍我，但他自己不会参加，不会的……此外，他认为我们的力气用的不是地方，我们

该做的不是互相帮助，前不久他说过，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。我们应该给政府施加压力，提出要求，反对贩毒。我问：那你为什么不付诸行动？可是他到头来也没开始行动，况且他也不可能行动,他完全让本尼弄垮了。”

每到上午，我和赫莉就埋头工作，翻译和复制资料。过了这一阶段，我们和吉斯联系，他赞赏我们建立社团的计划，答应让一些父母到我们这儿来。我们还跟留心过本尼和大卫的心理学者谈过话，他们也赞许我们的想法。从这时候起，就真忙得晕头转向。一些灰心丧气的家长，多半是做母亲的，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就只好听他们那一套不知已重复了多少次的诉说。我们散发材料，然后静候答复。但是多数的答复都是这样的：“我已没勇气看完这些材料了，赶快成立这个社团吧！”我们又把吉斯拉了进来，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每周聚会的场所。

我们开始先组织了一个十八人的社团。晚上的聚会太嘈杂，没有秩序，与会者太感情用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的心事一吐为快，而西蒙、赫莉和我还控制不住局面，不能把大家引入应有的轨道。第二天晚上来了十二个人。六个人不来了，三个人无故缺席,三个人打来电话说‘我心里太难受了,或许要晚一点来……”过了一个月，社团就稳定下来，没有人员的增减。又过一个月，秩序也正常了。我们三个人能够控制晚间的会场，没有人长篇大论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。晚间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请境遇最苦的人诉说。有时我们也给一些人优先说话的机会‘我觉得今天最困难的是艾莉,请她先说吧。’有时一个晚上就让处境最为艰难的一个人占用了。需要紧急做出决断，分出轻重缓急。如果那人自己束手无策，大家就帮他弄清情况。

四月过去，到了五月……社团的工作进展顺利。我们彼此都已很熟悉。

有个叫蒂娜的管束儿子一向很严：

“我早就对你说过:‘一定要按时出家门,你老迟到。’”

社团“:你干吗说这话?”

蒂娜“:因为我非常担心,他有那么好的工作,可别把工作丢了。”

社团“:你总缠着他,可别这样,他都二十四岁了,该明白事理了。”

蒂娜：“怎么不担心？这是仅有的一点令人欣慰的……”

社团：“这是你的看法。显然，他的看法不同。你最好还是自己去找份工作，按时出你的家门。”

蒂娜“:我,如果我去工作,那就全完了。”

社团“:你怎么知道?你又没试过。”

蒂娜“:那他就根本不起床了,因为没人叫醒他,闹钟他听不见。”

社团“:他干吗要听,你不是有耳朵吗。”

蒂娜过去的操心还真不多余。她的儿子不注射，只吸大麻，还时常吞食药片，跟外界几乎没有往来。但是社团明白，如果母亲不改变态度，情况就越来越糟。

社团“:他为什么现在还留在你身边?”

蒂娜“:我不能赶走他,他又没干什么坏事。”

社团“:他没干坏事,就让他赖在你身上?蒂娜,你迟早要咬断你的脐带。”

蒂娜“:但我怎么对他说呢?”

社团“:你要不要让他留在你身边?”

蒂娜“:不,他游手好闲……总是泡在我的房间里,我就猜他今天过足了瘾没有。”

社团“:那就别说他‘游手好闲’,要把你的想法都告诉他,就

说你确实不高兴，想单独找个清静的地方都找不到。”

蒂娜终于跟他儿子说了自己的心事，与此同时，并不对他的行为多加指摘。这个青年人终于去找房子了，但事情并不顺利。

蒂娜“: 他说,他什么房子都找不到,那我怎么办 ?”

社团“: 你喜欢他老跟着你吗 ?”

蒂娜“: 不,老跟着我就没法过了,他仍是混日子……可我长此下去要发疯的。”

社团：“为了救你自己，你可以向他发出最后通牒。给他一个月的期限，反复提醒他。向他表明，你要为你自己奋斗，但别指责他‘游手好闲’。”

事情终于有了转机。那青年人搬走了，可把他的大部分东西留在蒂娜那里，这样他就总有借口回家：拿毛衣啦，拿书啦。他感冒的时候就叫他外婆来，在她那间老房子里侍候他。由于得了咽炎，要两个星期才能好，他最后又赖在家里不走了。

社团里的人大为愤怒：

“蒂娜,你知道你犯错误了吗 ?”

蒂娜：“对……他得了咽炎……总不能把得病的孩子拒之门外吧 ?”

社团“: 但他得的是两种病 :一是身体上的,就是说你要好生看护，但要去他的住处照顾他。二是精神上的，因此特别重要的是让他回自己的地方去。”

蒂娜：“你们怎么知道他精神上有病？”

社团：“任何一个像他这么大的孩子，都想挣脱父母的管束而独立，许多孩子很早就离开家，所以他的表现未必正常。你先别为此责怪他，如果有机会和他谈谈试试。”

机会来得相当快。这青年人想买点礼物讨妈妈的欢心，结果她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打发走。她气得直冒火，这一点儿子

看得一清二楚。

在社团里,蒂娜说:

“那天他又给我送了一本书来，我说：‘你再别做这傻事了，我看这是变相收买。’他大失所望,回答道:‘要是在六年前,我送你点东西，你说不定多高兴呢。’结果我们谈了一次话。我问：‘你怎么啦,想一切都像六年前那样吗?’他答道:‘是的。’‘但这是不可能的,’我说,‘谁也不能让时光倒转,你已长大成人,再不是小孩子了，你应当自己管自己了。’当时他就敞开心扉说了起来,说他现在的感受大不同于从前,因此,我也说了我的感受,其实这是我们头一回互相理解。他并无怨言，我也不责备他。只是我们的情感……晚上他重新回到他的房里，我们从此休战。”

社团里的人嘿嘿直笑。是啊，成了，蒂娜学会了……

“现在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呢？”这话是赫莉说的。

蒂娜:“什么没做完?你指的是什么?”

赫莉：“这样……只要你保留他的房间，还有他那些破烂……”

蒂娜:“可是,他难道就不能常回家看看吗?”

赫莉：“当然能……但他得住客房。注意，这过去确实是客房,他也有理由留下过夜。”

我们这里还有一对夫妇，贝蒂和尼克，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戒过几次毒的儿子。其实社团也并帮不上他们什么忙，因为我们谁也不了解问题出在哪里。我打电话给吉斯，问他愿不愿意来一趟，讲讲这方面的事。

他就尽量给我们说得浅显易懂一些。

“我们脑子里有这样一个地方,”他说,“即‘敏感中心’,如果有外因刺激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觉得‘愉快’。假如我们要好好过

个假期，我们可以买点漂亮的物件，欣赏点可爱的玩意儿，如观赏绘画等，同样，如果有人向我们献殷勤，或者拍拍肩膀以示友好，或者使我们感到温暖，那就好像用一把刷子搔到这个‘敏感中心’，我们就觉得好受。一个吸毒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就觉得自己好受,无论度假也好､漂亮的物件也好､绘画也好,都不能使他感到愉悦，他不需要这些，只有毒品才能通过血液直接作用于他脑子里的‘敏感中心’。这种作用不能与刷子的搔痒相比，毒品的刺激作用要强烈得多，就像用刷子搔到这个‘敏感中心’似的。如果注射毒品，刺激作用就更强烈，好像用锤子敲击这个‘敏感中心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中心就会由于吸毒而对一般的美好东西失去觉察和认知。当一个人开始戒毒的时候，那锤子就不再敲击他的敏感中心，但是这个中心对别的刺激已毫无知觉，因为它已经对一般的可爱玩意儿没有反应了。长此以往，他已麻木不仁，就像失去了性欲的要求一样，就是说他失去了快感。你可以给他新房，给他新的工作，给他形形色色的好东西，但他毫无所动，而一个正常人却会感到快活。你可以爱他，可以抚摸他，但他无动于衷。他已无回应能力。他周围那些能够感觉到刷子的摩挲的有感知的人，对这一点是没有体会的。一个戒毒的人还要面临另一些让人心烦的事。他已经意识到他能给别人带来多大的痛苦。比如说，他的父母就在某种程度上让他拖垮了。戒毒的人回顾过去，总感到颓丧。吸毒的那些岁月都白白度过了。硬是有书不读，抛开学校走了，偏偏喜欢另类的节奏，另类的格调……一个不想再注射海洛因的人真是难而又难。他突然发现他无事可做，因为注射海洛因几乎就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事，他每天每夜都要注射，一天十二个小时都忙于注射毒品。这就是那些青年人极易陷进去的原因，即便他们得到百般的关爱呵护，即便全然不知内情的父母在他们的身边，

他们也会陷进去的。但是，就你们的情况而言，问题已经解决，你们现在明白……”

“但是，”尼克说，“我的儿子已经是第八次张罗着要戒毒了，第一次我们都帮他。现在我们还帮不帮他？我们已经拿不定主意了……”

“最主要的是，要知道怎么帮他。你不能只是怜惜他，你要定一系列的规矩，一定要把握尺度：我只能做这些了，否则我也完了。吸毒者总想像着自己还能讨价还价。不错，我是想戒毒，但我不想受罪，不想折磨自己……其实，迁就吸毒者毫无意义，因为他是玩把戏。吸毒者是玩把戏的。因此，你们做父母的首先要考虑采取强硬措施，这是对你们孩子的最好帮助。”

“但是，”贝蒂说，“我们的孩子是不是真想戒毒呢？尝试过八次，还蹲过监狱。他在那个地方呆了一年，‘干净’了整整一年时间……但是出来后没过三个星期，又旧病复发……”

“在监狱里是被迫戒毒。顺便说一下，谁也无法抵御这致命的诱惑。他们之所以想戒毒，是因为怕有副作用。这就和吸烟一样，我们不想得癌症，不想得哮喘，不想得心血管病，所以想戒烟，但无论如何也戒不掉，因为吸着过瘾。”

“可我的孩子，”哈尼说，“这难道不可怕吗？……”

她很激动，断断续续地说着，吉斯等着她往下说。

“他是我的独生子，吸毒以前一切都好好的。真是噩梦一场！就这样过了四个年头，我为这事生病住了医院。我请教了那么多的医生，每次诉说我的遭遇的时候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‘太太，把那孩子赶出家门，难道你还看不见，他是在吓唬你……’但是，你们都见过他，瘦得皮包骨头，什么也不吃，就是迷恋海洛因。他已经服毒自杀四次，最后一次差点送命，是大夫

说的。我没把这孩子赶出家门。医生们说得倒轻巧，敢情不是他们的孩子。我不能，说老实话，我再也不能了。在来社团之前，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，我整天整天地哭泣。我简直没法再说了，而且我找谁说去？大家都躲着我。现在来到社团，我轻松多了，但是我怎么对付这个没法活下去的孩子？”

“这方面的事,我就不跟您说了,”吉斯说,“你自己也明白：大夫说得倒轻巧，敢情不是他们的孩子。但是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为什么这类青年多数自杀未遂。他们真想自杀吗？说说看？”

“人都需要关注,”吉斯说,“大家都一样。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中，我们的这种需求能够得到满足。这些青年人的行为是不正常的，更何况他们已没法用正常的方法得到关注，物极必反，他们就采取卑劣的手段，于是就自杀未遂。对多数人来说，这确实是争取别人关注的一种方法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。有些人失去了继续生活的旨趣，干脆选择自杀。比如你们也会选择，医生大概跟你们说过这一点，你们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。”

大家散了以后，我和吉斯单独谈话。

“但是,一个孩子不想活下去了,你怎么办？”我问,“下星期哈尼就会向我们提这个问题。”

“所以她是找对了人，因为你们的儿子是一样的。你的儿子不也这样吗？像哈尼这种女人长年和医生打交道，从每一个医生那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，但于事无补。她迁怒于医生，因为她认为他们一定能解救她的孩子，最好也带上她。她要来自外部的奇迹，不费力气就出现奇迹。这种奇迹是不会有的。”

“开始的时候我很像她,对吧？”

“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像哈尼。但是，哪能就这样耗上四年的时光？总有一天会明白，该从自己做起了。”

“但是我们怎么解决她的问题呢？她找到我们这儿，是上门求医来了。”

“目前她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，而不在她自己。她的问题得不到回答。她应该自己先弄清楚，要解决的是她的事，而不是儿子自杀未遂的事。这个觉悟的过程可能要在你们社团里开始，到时候她终将明白，她应该向你们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：‘要想不让自己先垮,我要做点什么？’但是,等她能提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已迎刃而解，因为一切都已经明朗了。”

我躺在床上想吉斯说过的话。现在我才开始明白，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他对我几乎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。当时我一门心思想着儿子吸毒的事，还未开窍，我的觉悟过程还没开始，也不能从社团得到指导，因为当时还没有社团。吉斯用他的激将法让我醒悟。我当时误解他了，我说他看到我们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，就报复我们。我也报复他,说他‘假充善人”,由着大卫的性子在他家里“闹翻了天”。那天晚上，我终于向他说出了我当时的疑虑，他点点头。

“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,’’他说;“但是,你当时不可能听我劝。”

“可我现在能吗？”

他又一次点点头。

“大卫拿着麦角酸来找我。他已经不止一次服用这种毒品。服用后产生奇妙的幻像，似乎见着纷飞的蝴蝶和柔美的色彩。可后来突然是‘糟糕的梦游’,就像他自己说的,他死了。他想再次看到纷飞的蝴蝶和柔美的色彩，就再买麦角酸，但是又怕独自服用。他来找我，我用很长时间听着他说，直到肯定，尽管他害怕，但还会独自服用这种毒品。当时，我就建议他在我的观察下服用，要不他就自己试验，可他的状况却使我不能让他冒这种风

险。”

我们这里还有个乔依斯。

“千万不能让我丈夫知道我到这儿来，他怕极了，最好让谁都不知道这事!”

她穿着运动鞋来了，手提包里放着运动服。她在家里说她要去羽毛球俱乐部。十一点半我们回家，回家前她要对着镜子把头发弄乱，这样才能糊弄过去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?”我们问，“难道就不能明说你到社团来了?”

但是她一个劲儿地摇头。

“别,别,你们真不了解我的丈夫,如果他听到这事,家里就要出人命了。”

我们不了解她的丈夫，可是完全想像得出他的为人，他在外交部是个重要角色。“杰克是大人物,”我们都这么说,他不能容忍吸毒的儿子，同样也看不得妻子为这事过于伤心，哭红了眼睛出现在正式场合。儿子已经被撵出家门，周围的人对他的名字都讳莫如深，甚至都不让乔依斯提这个名字。来客偶或问道：“您的儿子怎么样？他今天不在家吗？”杰克就面带微笑答道：“他得到一个机会去国外深造了，成绩相当出色，已经拿到硕士学位。”

“噢,有其父必有其子,”来客用夜莺般的嗓门高声说，“将门出虎子嘛。我一向说您教子有方。”

乔依斯跑到三楼的卫生间去呕吐了一阵，从此就下定决心：“在这种场合,我再也不演戏。”她穿着运动鞋来找我们,聆听我们的指导。过了两个月，她气得要命，把运动鞋脱下来，举得比我们的头还高，穿过整个房间用力把鞋甩到墙边。

“那就得穿袜子回家了，”尼克说。

赫莉站起来，吻了吻她。

“这就好，我的乖乖，”她说，“那我们就要挨着个儿挨骂了。”

乔依斯觉察到赫莉抱着她，终于从自己的蜗牛壳中挣脱出来。她哭了，双肩抖动着，她擤鼻涕，用袖子把脸上的脂粉抹得一塌糊涂。

“嘿，嘿，”尼克说，“我说，在正式场合流泪可不好。弄杯咖啡喝吧。”

尼克端着壶转着圈给大家倒咖啡，我们靠近乔依斯，她这才感慨万千，轻松地倒出苦水。

“他不在家住，这没什么可怕的，因为就应该这个样子，你们的孩子不也都是如此吗？和吸毒的人住在一个屋檐下是不可能的……但在我们家，他这个人好像死了。我不能提到他，就算他死了，他不存在了。然而硬把他说成一个勤奋的大学生。我们确实幻想他能再去上学……但是，怎么才能打动杰克呢，对我来说，宁肯要一个真实存在的吸毒的儿子，也比要一个幻想中的无生命的孩子好吧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说呢？……”

“这样吧，乔依斯，”尼克说，“你已经做了不少，就做下去吧。”

乔依斯深深叹了口气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尼克。

“当然了，问题在于，”她说，“我从不敢对他说心里话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我没法再这样下去了，但是迄今为止，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剧烈变化。我还可以苟延残喘下去。但是到此为止了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认为我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我儿子吸毒的事做出反应。从此我不再说他是死人了！”

“那把运动鞋带回去吗？”尼克问，站起来去取运动鞋。

乔依斯伸出一只手，脸上有了笑容。

“ 好吧，把运动鞋给我。’她说。

“ 好，拿这儿来，’她说，‘ 再穿一次，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，好让我时时想起今天这个晚上。”

乔依斯的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乱子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到了下一个星期，她来社团时穿的是靴子，她只是简短地说了说家里的事。

“ 有点难，但是这事总要发生的。我说我要去社团，这里的人都匿名。还说我不想有个死了的儿子，何况他还活着。杰克坚持他的信念，我也坚持我的。”

再下一次，她说得更多一些：

“ 我看过儿子，这对我是真正的打击。当然我知道，他这是埋葬自己，可我总还抱着希望，也许这段时间他……但是他越陷越深。我回家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杰克，他装作根本没听见。当时我说，这事我不但应该和你们谈谈，也应该和他谈谈。可他充耳不闻，后来躺在床上突然开口说话。他比我大，再过一年就六十岁……一九四四年，他二十三岁的时候，在死囚牢里被羁押了一年。他被判处死刑，要等一年才处决。那时他就失去了一切激情，不善于表达任何情感了。那天夜里他恳求我忍耐……”她轻声接着说：“ 我很高兴，他终于向我吐露了真情……我想，这么一来情况就要大变了……”

乔依斯处事很理智，在社团里，她和我们讨论每周与儿子见面的情况，讲述她的失落与消沉、希冀与绝望。到了家里，她还要时刻小心翼翼地想着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但是，起码事情说开了，门扉已微微打开了。

“ 哪怕透露出一线光明也好，’乔依斯说，‘ 可是杰克要求再多些忍耐。有时我就想大叫：‘ 我们的儿子吸毒！’ 但我回过头来又想：要慎重，乔依斯，首先要做的是彻底把死囚从牢房里解救

出来……”

我们再说说努斯的情况吧。她也参加了社团。她的丈夫一年前死去，儿子为此有罪过感。他已经有六年注射毒品的历史，父亲也就花了六年时间想方设法把他从泥潭里拉出来。他无法放弃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，与此同时，努斯心里明白，要挽救他们爷儿俩也只能如此了。她则独自采取“超脱”的态度，但身边的丈夫却越发痛苦不堪，不仅是精神上他变得多疑、易怒，而且肉体上也备受高血压、心肌梗塞的折磨，最后就免不了心脏病发作。父亲去世之初的一段时间，他变本加厉，毒瘾更大。但是有一次努斯接到通知，说他去了戒毒中心，坚持了六个月的“洁身自好”之后才去看她，从这一天起，努斯和儿子就正常来往了。

“他来了,我非常高兴,”努斯说,“戒了毒,他成了一个非常真诚的青年，见到几个小妹妹欣喜若狂，她们也特别喜欢他。但是我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，他心情大变，想了解父亲的情况和他的晚年。我就对他说，算了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现在你要好自为之。对你父亲来说，如果你能坚持到底，尽快恢复健康，重新走向生活，就是对他最好的酬报。可是他哭了起来，过后说，对，这都对，但是他是为我而死。我无话可说，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。但是这话我不能说，说了马上就会前功尽弃，他一定会旧病复发，再去吸毒。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我也很难做出若无其事的姿态,所以我沉默着,这样一来情况更糟。他坐着,等着,想听听我说什么，想听到要他赎罪之类的话，可这话我决不能说。”

“老实说,”西蒙问,“你在责备儿子,因为他气死了父亲?”

努斯：“唉，从那以后总算熬过来了。一切顺其自然。如果我说：这是你的罪过，那到头来他吸毒也是我们的过错。没办法，最好是沉默。如果他戒了毒，我会多么高兴。他来了，我就

很高兴。只是他又来翻旧账……”

西蒙：“但他一定会翻旧账的。现在你可以做两件事：要么说这没有必要，你已经痛改前非，重新生活了。那样你就忽视了他的感情。要么就说，你会自始至终和他一道迈过这一道坎儿。但是你自己很清楚，不能责备他，你要理解他的情感。”

努斯沉默良久，接着蒂娜就说：“或者，你不敢走这第二条路？这自然就意味着你要彻底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。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，'努斯说，“我总算熬过来了，不堪回首，太可怕了，毕竟……我并没有因此颓唐下去，恰恰相反。不是说得很动听吗，你的阅历‘更丰富’了，就我而言，情况确实如此。我已经不是七年前那个样子，由于遭此不幸，我成熟了，我老练多了。总之，我没有必要隐瞒我的感受。”

“不过，你说的话，努斯，'西蒙说，“会对你的儿子大有好处！他总会明白，甚至生活中的坎坷也能有好的结果。他还会明白，他完全可以向你吐露情感，和你忧喜与共，甚至让你分担他的负罪感。”

过了两个星期，努斯说：

“事情弄糟了，我一直寻找适当机会找他谈谈。当然，总没找到谈话的由头。今天晚上，就在我来这里之前的十分钟，他突然来了。我说：‘很抱歉，我要走了，’接着对他说了说社团的事，还有我们这里要做的事。他一下子变了脸：‘就是说你并没有因为我的事而垮掉，对吧？’他说，‘你在忙着，用这个办法来挽救你自己的生活。’瞧，就发生了这事。当我梳洗完毕在厨房里收拾东西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我，我在十分钟之内就把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一股脑儿全端了出来，说我已今非昔比，说我已历练老成，而且我丝毫不动声色。请想想看，这时我一直看着表，穿鞋，穿大衣。他说：‘也就是说，你不相信父亲的死会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’

说真的,我根本没有做作,就说道:‘那咱们马上就说好,我死不死，没有你什么错。因为不管你做什么，如你自己所说，我已经学会了利用这个来自救。’我一步迈出门去，因为已经晚了。他在我身后喊:‘我给你洗碗!’你能想像,他的语气是那样……好像他已如释重负了……”

已经是六月了。我们没有一点大卫的消息。大约有半年时间，他常到吉斯那儿去，吉斯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我们，并不特意做任何解释。我从吉斯那里得知，大卫得到了救济金，由于吸毒，这点钱只能勉强维持他四天的生活，其余的二十六天，他就伙同他的哥们儿去偷，暂时还没落入法网。现在我和西蒙心平气和地谈大卫的事，再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但也不想惴惴不安地惶恐度日。就这样下去吧。我们有个吸毒的儿子，我们应该自重。如果大卫回来，就让他看看，他的父母还没垮掉。

六月中旬，我忐忑不安起来，但没有任何具体理由。还是过去那样急不可待：我应该去看看他……他出事了。这是一种不明智的感情，它把我至今所取得的一切统统推翻了。我跟社团里的人说了这事：

“有时感觉会提醒你，这种情况我以前常有。那时也应该去看看他,我就赶紧去了。”

艾莉听了这话，特别激动。

“我能理解你，我就整天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。”

她有好几个月都在问我同样的问题：“好吧，我把他赶出家门了，可我怎么能把他从我脑子里抹掉呢？”她日日夜夜想的就这么一件事：儿子会做什么？她自己可就什么都做不下去了。社团的人劝她说“:他有他的生活,你有你的生活,先管好你自己

吧。'于是我说出了我的预感,说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,影影绰绰想到大卫光着身子裹着被子。

“他当时已濒于疯狂,我去得正当其时。”

努斯火了,答道:

“你还想及时赶去,是不是?在你的内心深处,你还想着救他一命,虽然你知道,这也无济于事。这就是你,上帝宽恕吧……”

“说得都对,'哈尼说“但是,人都活在情感之中,而不是活在理智之中。你想去看看他吧,兰恩?下不了决心?你怎么啦,怕西蒙吗?”

我看了一眼西蒙,他伸出两手放在桌子上,直率坦诚地看着我的眼睛。说吧,兰恩,我们都应该以诚相见……我想去,对,是有感觉:大概发生什么事了。多半我又犯老毛病了,但是我的确想看看大卫……但是,这话我说不出口,其实你也在尽力控制自己,我现在看着你,看到你也是那么脆弱……

我们沉默不语,突然电话铃响了。我们呆若木鸡,西蒙站起身来。

“对,'他声音平静地说“对……对……对……'长时间的停顿。

他反反复复地说“对……对……对……”艾莉扶着桌子慢慢站起来,然后离开桌子向西蒙跨近一步,突然死盯着他,大张着嘴欲喊无声。西蒙想推开她。尼克走过去紧紧抱住她的肩膀,她依然叫不出声来,张嘴呆站着。

“对……对……对……'西蒙说“好……对,好……”

他放下听筒,转身以央求的眼光看着我。艾莉挣脱开身,喊出声来。她冲向西蒙,用拳头打他的胸,她的头急速地晃来晃去,她的恐惧化为喊叫:

“不,不,不,他没死,这不可能,不能这样 我那样爱他……可现在他死了，这不可能，不能这样，这太卑鄙了，我是那样爱他，我可怜的孩子，我是那样爱他……”

西蒙脸色苍白，没有躲她，只是摇头。贝蒂、尼克和乔依斯终于凑过去和她拥作一团。尼克抱着她的脖子吻了一下，但艾莉还是不停地喊叫：

“不,不,不,他没死,我是那样爱他……”

西蒙惘然若失,纹丝没动,站在原地看着我,我心领神会 这是大卫的事。没错。我要去，尽快地去。

“这是大卫,”我说,但是西蒙摇摇头。

“本尼,”赫莉平静地离开椅子说,“这是本尼,我知道……”

西蒙点点头，失魂落魄地跟在她后面。走到门口，她把手伸给他。

努斯走过来，把我拉到身边。我觉得她在抚摩我的头发，一副全然无动于衷的样子看着挣扎中的艾莉，艾莉依然在呼天喊地：

“不，不，不，他没死，这不可能，不能这样，我是那样爱他……,,

社团散了，我们已经再没有勇气相聚。本尼的死让我们再次惊恐不已。我们都只为自己的孩子忙着，顾不上自己。维姆和玛琳是仅有的两个敢于再出面试试的人，四年前他们就有过丧子之痛，三个女儿中的老二也是个吸白粉的瘾君子。

“咱们不能在这个关头散伙,”维姆说,“还像往常一样聚聚吧，否则我们还要重蹈覆辙犯老毛病。”

他打电话联络我们，可是没有人来。

七月到了。七月三日是大卫的生日，现在这一天到了，怎么办？

“你们干吗不找个地方吃上一顿？”朱丽叶问道。

“吃？为什么？干吗？”

“是啊，想起他出生的那一天，本来应该让人高兴，可你们只想大卫开始吸毒的那一刻。”

但是我摇摇头。大概她说得对，不过我实在无可奈何。

“那就看着办吧，”朱丽叶说，“你没事就傻呆着吧……或者你能帮我收拾收拾假期用的东西？”

我摊开她的东西，但是心不在焉地茫然看着窗外。到了下午很晚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年轻人转身向我们家的房子走来。

“朱丽叶，”我说，“看，这好像是大卫，可是他旁边还有个女孩……”

朱丽叶走近窗子。

“这是大卫，”她肯定说，“上帝，他变化太大了……”

他脸孔瘦削，表情疲惫，皮肤是土褐色的。一个刚十九岁的年轻人的脸色，难道就是这样？他多大了……三十岁了吗？我祝他生日快乐，他神色颓唐地笑笑，把那个姑娘介绍给我：玛琳。她没说客套就直奔主题，问起汽车活动房的事。大卫把手插在兜里看着旁边，好像不打算过问此事。

“汽车活动房？”我反问。

姑娘便向我们细细道来。她二十四岁，有过一段时间不长的吸毒经历，很快就被抓去。戒了一年的毒，后来从社会学院毕了业。

“我知道他的经历。我还知道独自一人吃不消。我想帮他……当然是配合医生。但是他住在那个污浊地方什么也办不成。你们有个汽车活动房，就让我们在那里住上一两个月，要是

我陪着他,他说不定能戒掉。”

“不行,这不可能,”我说,“过一个星期我们要带两个孩子去那儿。”

大卫不耐烦了，向门口走去。

“你看到了吧,”他说,“我跟你说过的。走吧,这是白费时间。”

可是她一动不动，神态自若地先看了一眼大卫，再看我。

“要想周全了，商量商量吧。我明天晚上再来一趟，就我一个人来……”

她向我伸过手来，再向朱丽叶点点头，跟在大卫后边走了。门被狠狠地撞了一下。我看着他迈开大步向前走去。她根本不想追他。

“这不像话,”朱丽叶说,“你们要去‘汽车活动房’。如果大卫真下决心戒毒，你们怎么办，连休假都要放弃？不过，他是不是想洗手不干了，也许是那位社会学小妞的主意？”

我们本来就心存疑虑，朱丽叶的话让我们更加怀疑了。

“朱丽叶,”西蒙说,“为了着手办这事,妈妈和我明天跟玛琳谈谈。对，你要理解我们……本尼出事以后，我们吓坏了……”

“本尼出事前和本尼出事后，简直如同前后两个世纪。真见鬼了，刚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就碰到这样的事！上帝，我怎么摊上了这样的父母……”

是呀，我们算什么父母。整整一年都好好的，可现在我们吓得坐立不安。我们还希望十六岁的小姑娘体谅这一点呢！

“你们心里好像就没有勃朗麦和约欣似的,”她接着说,“你们想对他们说：今年我们就守在家里，因为汽车活动房给了大卫，让他胡乱糟蹋去了……”

“糟蹋？”我们异口同声地问。

朱丽叶哈哈大笑。

“就是呀，”她说，“看着你们就想笑，你们真的好可怜！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们会发生什么事吗？窗户一定撬坏，门也一定要破损，因为只消过上一天，钥匙就要丢掉，汽车活动房就要变成猪圈，一片恶臭，因为他们决不会去打扫。大卫是戒不了毒的，不仅他本人，她也会跟他一块注射毒品……再往后就统统砸得稀巴烂，要不就统统烧光。这仅仅因为我们是生活在‘后本尼’时代……”

我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，绝望地看着朱丽叶。她只是摇摇头，意思是：跟你们把话都说清楚了——她沉默片刻，又说：“好吧，你们和她谈谈吧……”

玛琳来了，捧着一束鲜花。她不要茶，不要咖啡，更不要烟，她把这一切连同毒品一起都戒掉了。她立即切入正题：

“怎么办呢？你们想过了吗？我们实在没别的办法，只能去你们的汽车活动房。我们可不可以到那儿去住？如果你们说不，你们就剥夺了他的机会。”

这又同大卫多年来要挟我们一样，但我们还是上钩了。这不是个机会吗？我们没有权利剥夺大卫的这个机会。这个女孩比他大得多，而且她的职业是社会救助……她到底是否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？

她说“十分清楚”，而且她爱他。一个娇小的金发女郎，年方二十四岁，却是个为大卫设计了一整套骗术的小骗子。

她走了以后，西蒙突然说：

“这又是一出什么戏呢？迫于他人压力戒毒，这太不合逻辑！”

“迫于他人压力？”我反问。

“对，迫于他人压力。这套伎俩是她编的，而不是他。事事都由她安排,他呢,求之不得…… ”

“你看,西蒙,既然你不信这一套,那为什么又说同意呢 ?”

“我都不知道该信什么了。他原先没结交过女孩子……你看，我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她十分精明能干。最后她自己把毒戒了。你又说什么呢 ?”

我不敢再说什么。我明知道朱丽叶是对的，我们本来就应该说“不”，我们本应带着孩子们到那里去休假。但是我不敢再说什么,因为这是在‘本尼事件’发生之后。

就这样决定了。我们呆在家里，而大卫和他的玛琳到汽车活动房去。勃朗麦和约欣想不通，他们无精打采，到街上闲逛，因为小伙伴们都各奔东西度假去了。他们过一会儿就跑回家来，提出一些新点子：

“要不我们也去西班牙？难道我们不能去吗？”

“不,不成,我们没有帐篷。”

“要是坐飞机去,到西班牙再租房子呢 ?”

“不,也不成,所有的飞机都已经满员,房子要预订才行。”

天公也偏偏不容人闲呆在家里，过了一个星期，我坚持不住了。

“西蒙,”我说,“我想去看看这两个孩子在那儿干什么,如果我看着不对头，就把他们轰走。”

“如果看着不对头 ?”

“到时候我就和他们谈谈，因为在这种场合可以谈谈，然后就让他们走。我们还有朱丽叶的一个帐篷和旅行用品，如果他们想要的话，就让他们带去。但是我要在汽车活动房里住一阵子。”

“你说话不算数。”

“当然不，如果你想要人，那就记住，总有一天他会醒悟过来。就这样，我不是让人骗了吗，可我现在吃一堑长一智了。感谢上帝。就是说，他们滚蛋，我们住进去。我马上就开车，把这决定通知他们。”

“马上？”西蒙问，“现在才上午九点！你十点钟到那儿，这对宝贝还躺在床上呢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晚点去。”

“不行，马上去，我不能再等了！”

西蒙没有立即回答。

“那我也和你一块去。”

在汽车上，我接着推心置腹地对他说：

“要是有人耍你，最倒霉的就是你一开始没有觉察到。要是来求我：‘可不可以到你们的汽车活动房住一阵子？’我就答复：‘不行，我们自己还要用。’但是这种回答她不会满意，因为她下决心拿我们的亲情做筹码：大卫要戒毒，大卫好容易才有这机会，也许是最后的机会……上帝呀，我早就吓破胆了，只能答应她的请求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为了上帝，快去住汽车活动房吧，好像这样就能解决大卫的一切问题。我们算什么父母？‘你们真挺可怜的，’朱丽叶说过……西蒙，说老实话，我让人耍了！”

“非常高兴，”西蒙说，“但是，先看看那里出了什么乱子没有。”

果不出朱丽叶所料，那里闹翻了天。窗户破了，一堆玻璃碴中倒着一个瓶子，门在合叶上晃荡，臭气熏天，到处是污秽，猪圈一般的屋里有两个活物，他们的邋遢样儿简直没法形容。

我好容易克制住自己，就像破损了的唱片吱吱呀呀转动一样连声喊姑娘的名字，终于她哼哼着坐了起来，一副莫名其妙的

样子，把头埋在双膝里，然后看了我一眼，又呻吟一声，两手抱头，嘟囔说：

“至少应该先说一声再来。”

“穿上衣服，”我说，“跟我到外面去。”

过了十分钟，她出现在门口，光着身子披着一件塑料雨衣。

“嗯，有什么事？”她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，那是西蒙放的三把椅子。我们也坐下，看着她那满不在乎的样子。

“玛琳，”西蒙说，“我们想让你们离开这里。你们已经尝试过了，可是什么结果也没有。”

“真见鬼，”她毫不在乎地仔细打量着深绿色的雨衣说，“我又来月经了……”

西蒙站起来，走向汽车，显然，他和这位小姐无话可谈。

“玛琳，”我说，“去洗洗，穿上衣服。过一个小时我们回来，到时候你们就别在这儿了。”

“我吗？或者还有大卫？我们不分开。”

“两人都滚，过一个小时……”

我朝汽车走去的时候，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的背影。

“怎么样啦？”西蒙说。

“我限定他们一小时。”

“那这一小时我们干什么？”

“找个地方喝咖啡。”

为了可靠起见，我们等了两小时。我们回去的时候，玛琳已梳洗完毕，穿戴停当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看书。

“噢，请坐，”她说，“我怎么也叫不醒大卫。”

“多谢，至少你醒了，”我答道，“我们要把话说在前面。这么着吧，你们从这里搬走。我们车里有一顶帐篷和旅行用品，如果想要，尽可以拿去用。不过即使你不愿意，你们也一定要离

开……,,

她眼朝前方看了好长时间，过后猛地摇摇头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哪能马上走,”她抽抽嗒嗒地哭泣着,“我们到哪儿去?”

“住帐篷，”西蒙说，“现在是夏天……然后再找别的地方……不然就回大卫的房里住。”

她转过身，透过打开的门往里看，大卫还是那个样子睡着。接着她很快弯下身子，悄悄对我们说：

“我不能叫醒他……我们身无分文。他说让我想法子弄钱，可他的救济卡放在城里，他的房子里。他要签了字才能发出去，但是他什么也不干……”

“玛琳,”西蒙说,“没人强迫你跟他厮混在一起。可是,既然你要跟着他，那就别找我们。就是说，也别抱怨。”西蒙稍事停顿,接着用截然不同的腔调说:“你是说,你没钱了?”

她点点头。

“那我给你一点钱，够这几天买吃的……但是，如果你用这钱尽快离开这里，我也不会生气。”

玛琳一把抢过钱，放在裤兜里，然后站了起来。

“帐篷在哪里?”她问。

“在汽车里。”

“好吧，拿这儿来，我看看我们该把它放在哪里……”

第二天，汽车活动房空了。玛琳给我们留了个字条：“再次感谢借钱给我们。”我拿着这字条，突然觉得心情异样沉重！

“这丫头以后怎么办?”我说,“她完完全全被大卫握在手心里。她说下大话，要挽救他，跟我一模一样……”

我四顾茫然。瞎折腾吧！

“西蒙，我们已经多少次跟在大卫屁股后面，想把他拽出泥潭……”

“别诉苦了，”他说，“干正事吧。”

我们在汽车活动房里住了三星期。西蒙每周驱车回家两次，看看有没有发生‘意外的事’，换句话说，看看‘大卫是不是闯到家里，又给我母亲添乱去了”。但是，我们学会了彼此珍惜。有一次，西蒙比平时回来得要晚些，这是明摆着的：出事了。

“你母亲收到大卫的一封信，”他说，“我到的时候，她刚刚看完。”

“噢，上帝，”我的心凉了，“她很难过吧？”

“是啊，当然。还好，我去得及时，否则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。”

他递给我信，我念道：

“亲爱的外婆！您的身体好吗？我好长时间没见您了，但是，我希望您一切都好。我写这信是告诉您我有了女朋友，她叫玛琳，我想有机会让您见见她。目前我们住在我的房里，但是，下个月我们就要从这里搬开，另找住处。我有可能在一个体面地区从我一个朋友那里租到底层的房子，但是要付三千五百盾家具费，可偏偏我们没有这笔钱，您是了解的，我们要是丢掉这个机会，实在可惜，因为玛琳对我的帮助很大。玛琳很可能不久就有工作，她已提出申请，但目前还不能肯定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我们就用她第一笔工资还一部分账。我一切都好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我的膝盖一有好转，我也会尽快去工作。您还记得，踢足球的时候我的膝盖有多痛，您看，现在我的膝盖又犯病了，要是去工作，肯定是个大障碍。再加上我的牙病，痛苦极了。您会觉得这很奇怪，因为您有一口好牙，您过去不是一向自豪地说，像您这把年纪竟没补过一颗牙。可是牙科医生说，我这坏牙是遗传，

要及时采取措施。据他说，修好牙齿要花四千盾，这太让我犯难了，因为我必须决定，是修牙还是置办家具。我真的没脸跟您要七千五百盾这么大一笔钱，因为我不愿意让您为难。我明白，刚刚开始生活的青年人，日子过得紧点是常有的事。亲爱的外婆，如果您想帮助我们——您的外孙和他的未婚妻的话，能不能把这笔钱转在我的账户上？如果可以，就在十天之内把钱转过来，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失去这个好机会。您的外孙大卫……”

我把信叠起来，这才看见西蒙那副哭笑不得的样子。

“三千五百盾用来买家具，”他重复了一遍，“亲爱的外婆，您身体好吗，您一向以您的牙自豪……多么天才，我们这个小青年！他没脸向她要七千五百盾这一大笔钱，因为不愿意让她为难……十天之内，如果可以……唉，兰恩，多么天才！”

西蒙哈哈大笑，逗得我也由不得跟着放声大笑。我再打开信，两人一起找那几句话，结果我们还是忍俊不禁，太有趣了。

“等等，”我说，“再看：‘如果顺利的话，第一笔工资还一部分账……’他甚至都没问人家会不会借给他钱，他这样写，好像已借成了似的！”

“对，下面还有……”西蒙笑得喘不过气来，“关于膝盖……”

“对，”我也笑，“他的膝盖犯病了，这里……妨碍他……去工作……”

“还有牙齿……是遗传……”

我们又放声大笑，两颊淌着泪水，最后我猛烈咳嗽起来。

“唉，西蒙，”我说，“我们终于有这么一回来嘲笑他，多开心呀。”

西蒙需要拨动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我母亲别寄钱。

“因为他们既不去看牙医，也不去租房。”

“没错，但是大卫不会骗我，这些话不会是他胡编的，对不

对？’

“也许不是胡编的，也许这都是实情，可是，只要钱一到手，他们干的就完全是另一码事。唉，您可以帮助大卫，不过要让他面对现实 该自己管自己的事了。”

“对，但是他很快就要装假牙！”

“如果他真的需要付很大一笔治疗费，那我不会眼看着他为难，吸了这么久的毒，牙齿坏了是完全可能的。但我打算直接付钱给医生，钱不能经大卫的手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就给他写信，’我母亲说‘“这多可怕，那么年轻，就装假牙……你们以前有没有给他吃足够的钙片？”

赫莉再次把社团的人凑到一起。她打电话给我们每一个人，说得干脆利落：

“我们彼此需要，确实如此，如果没有社团，本尼死后我早就没法活了。”

艾莉是惟一不想来的人。她说，她为自己那回歇斯底里大发作深感羞愧。

赫莉在第一次聚会上对我们说：

“我们要给艾莉一点时间，她一定会来，我一直和她保持联系。本尼的事，我对西蒙和兰恩说过，从他们那里你们也会了解到这一情况，但是我要亲自告诉你们。快过去两个月了……本尼选择去死，完全是自觉的，他实在不想活下去了。近半年来，他多次自杀未遂，我甚至自问：他们对他怎么了？我去看他，他说到这事的时候平静极了。他还问我，我是不是不想帮助他……在戒毒所里机会很少。如果星期六和星期天他能回家的话……当时我对他说，这事我想帮他，却又于心不忍。在戒毒所的时候，有一个戒了毒的人常来看望本尼，本尼就问，可不可以

去一次，看看那人的生活状况。他总提这个要求，却总是被拒绝。直到有个男护士对他说：‘好吧，等我值完班，我们一起去，我问明白,这事能不能做。’是谁说‘可以’的,我不知道,但他们是坐那男护士的汽车去的。那个戒了毒的人不在家，他们就在车上等了一会儿。可是过了半小时，本尼说：也许我们没看见，再去看看。在这之前，他们坐着，平静地谈话，甚至说到本尼有朝一日‘从那地方’出去会干什么。因此，男护士丝毫未加怀疑，就让他去了。只过了几分钟，他害怕了，忙从车上下来，打算上电梯。但是这已不可能了。后来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上到最后一层，本尼锁住电梯，把大衣挂在门上，好让门关不上。当时男护士就顺着楼梯往上跑，查看所有的阳台。等他爬到最后一层的时候……是的……他往下看，下边的停车场上有一群人，弯着身子在看什么。他叫了起来，人们往上看，他看到本尼躺在地上……顷刻之间他就死了……第十二层……本尼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……我们很难从他的角度来看问题。但是，这就是他的生活，他的选择。他不想带病活下去，他知道再下去会更糟。这太难承受了，但我认命……”

我们久久沉默着，后来西蒙说：

“我希望今天晚上汤姆也能来……”

但赫莉摇摇头。

“不，他难过起来和别人不一样。我甚至不知道我该不该害怕……是的……有时候他做的事就让我害怕。他做一些奇怪的事。他找到一个专门从第三世界领养小孩的团体……现在他以本尼的名义领养小孩……我不知道……他收到一些资料，拿着照片坐在那里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有时，我看了这个非常害怕……”

可是我知道，还有一件事让赫莉害怕。汤姆认为，万恶之源

是大卫。是大卫引诱本尼吸毒的。

“他现在要找一个替罪羊,”赫莉对我说,“他自己堵死了所有的路，也绝对不会到社团里来同大家谈心，所以他就旧病复发，借酒浇愁，去领养个孩子以减轻痛苦……”

十二月到了。大卫根本没给我母亲回信。他并没去镶牙，因为我们从未收到账单。这几个月没有一点大卫的消息。圣诞节前，在人声嘈杂的“贝因霍夫”商场里，我们突然碰到了大卫。我抓住他的双肩看着他。他微微一笑，没有挣脱。

“大卫,”我说完就沉默不语。

“你好吗,嗯?”

“我吗?是的,我还好。”

“爸爸也好吧,你们常去社团吧?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

他笑了。

“是这样……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的，他母亲也去社团……”

“谁?”我问。“乔依斯?蒂娜?哈尼?努斯?”

“对,努斯。啊,没什么区别……我看,你真行,至少有点事做……”他指指我的提包:“你买什么了?圣诞节礼物吧?”

我推开他。

“对，给孩子们买了点东西……”

他冷笑了一下。

“瞧你，一切都不错嘛……”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?”我问。

“是这么回事,只不过来转转,玛琳在楼上。”

“这个丫头还和你在一块哪？”

他又笑了笑。

“我们最后还是从我那个房间搬了出去。她租到了住处，她现在有工作。她认为我们需要大一点的住房。她是这么说的。现在她在楼上买东西布置新居。总之……我觉得一切都很好。”

我咬紧牙关，别多管闲事，别说话，尤其不能说：你当然认为一切都挺好。她有工作，管着你的家，管你的吃喝，她叫你起床，替你洗涮，要是衣服破了，就给你买新的，她就跟我以前一样抱怨你染上这坏毛病。她扮演的是我的角色。当然，你认为一切都蛮好的。倒是蛮好的，只不过不是对你而言……

“大卫，”我说，“我要走了，我的时间不多。你一切顺心，那就好。问玛琳好。”

我吻吻他，发现他突然一惊。接着我消失在人群里，但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还站在那里，我回头看他的时候，他扬起手，手里提着一个小黑包。还是那个小黑包，那里面有他所有的混账东西。我确定这个事实，就像数秒钟后确定外面已然飘起丝丝细雨，可我还在那里。

圣诞节前夜，玛琳来到我们家门口。她不想进来，只是问可不可以和我谈谈，接着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。

“大卫的，”她说，“您的戒指，他偷的。”

“我的戒指……”

我打开信封，看到我不知何时从手上摘下的那枚戒指，是钻戒。

“难道他没把它卖了？”

“没有，拿到银行去换抵押贷款……”

我们互相看着。我们无需说话。大卫拿走这枚戒指后一直就没平静过，卖掉太费事，不如从银行换取贷款。

“大卫很为这事苦恼，尤其是在城里遇见您之后……我赎了回来……,,

“那钱呢？”我问，“这对你来说岂不太破费了？”

她微微一笑。

“我有工作！完全有能力赎回这小小的戒指……”

“玛琳……”我开口说，但她马上就打断我：

“是的，他还是老样子，扎针！他有时想戒掉这东西，但过后又旧病复发。我偶尔也忍不下去。说老实话，有时我对他说：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，哪怕你把你的小命毁了，我也管不着。但是也有非常美好的时刻，这就要看心境如何了。只是我不想被他拖下水……不，我不想……”

她抱着我的脖子吻了一下。这女人娇小瘦弱，锁骨尖削。和大卫厮混了短短六个月，她的丰腴体态终于消失殆尽。

我紧紧抱着她。

“可是你已经下水了，”我说。

她大为惊讶。

“没有，真的没有！”

“当然，是你赎出的戒指……你说大卫为这事非常苦恼。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，戒指该不该由大卫去赎？他不是领了救济金吗？”

她心事重重，看着前面。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您可能是对的……但是情况就这样……大卫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什么也不做，到时候我要替他张罗一切……真倒霉，这根本不对头嘛！”

“不只是不对头，”我说，“而且非常可悲。大卫终于有所进步，为偷这枚戒指感到愧疚，如果你不管，说不定他自己多少能做点什么。”

她颔首同意，她的小脸蛋不知为何骤然显得十分疲倦。

“您是知道的，”她说，“要是大卫的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人，他就什么都做不成。为什么只要他想干什么，我就照办不误？他非常清楚，我哪儿也不会去，否则我就成了孤家寡人。我受不了孤独，怕一人独处，我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不寒而栗，心情压抑。但是我早该抛开大卫不管了，像您和您的丈夫那样。”

“我们是让他平静下来，而不是抛弃他，玛琳，我们费了多少年的时光才做到这一点。”

“对，让他平静下来，在这一点上他很尊敬你们。我注意到，近来他说到你们的时候口气变了。可是现在有我在……一切都是老样子，只是走的是另一股道。”

“玛琳，我没法帮助你。你自己要定一个限度，什么你能容忍，什么不能容忍。‘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还是一个人为好’——大概你还要为这话再多尝点苦头。”

玛琳点点头，推开门。

“多谢，”她说，街上吹来一股凉气，她浑身抖了一下，“和您谈谈很愉快。”

她跑了出去。我站着，看着她的背影，但是她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。

其实我们都已不需要社团聚会了。西蒙、赫莉和我心里都清楚，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别人，为了新来的那些讲同样故事的人，也为了回到社团的艾莉，现在她可以说：

“我甚至能控制自己，又乐于生活了。我已经不再整天想着儿子，只有他打来电话或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才想起他。”

也是为了蒂娜。她把儿子的房间改为客房，靠社团的支撑熬过了一年的时光。她每次前来都是老一套：

“是的，他病了……”要么就说“：他太不成熟，我不能再看着

不管了……”

社团里的人每一次都劝她说：

“让他明白你为他做的事够多了，他应该自己解救自己了。”

后来她报告了下述情况：

“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一周都见不到他一次。”

社团的人就说，别去看他，蒂娜，需要的时候他自己会来。

她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明白，儿子终于抓住了机会。

我们还为了哈尼。她刚走了一半路程，有时她直截了当地问赫莉“：我这个孩子不想活了,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问你自己呀,你自己想不想活下去,”赫莉答道“，我就这么做的。我还没活够呢。”

哈尼频频点头。

“对,对,”她说“，我现在也有一大堆事,但还……如果你的孩子不想活……不，哈尼还有一段路要走。”

为了乔依斯和她的杰克。杰克刚从死囚牢里出来，现在也常来社团，并小心翼翼地想给人们一个印象，似乎他来这里和儿子的事“无关”。他并不避讳儿子是死囚，只是想保持某种中立，在此基础上和大家建立一种全然不同的关系，乔依斯也帮他的忙。

“我对儿子说了，我也想退出。也许以后我们就不再老谈这些吸毒的事，那样我们才能对他采取另一种态度。”

为了努斯。尽管儿子吸毒，他们母子的关系还是非常好。她不厌其烦地和他谈，也谈了参加我们社团的事。他是大卫的朋友，他们谈起自己的母亲时，都掩饰不住自豪之情，就像他们的父母在成人学校学到了什么似的。这个青年人戒了又犯，犯了又戒。现在孩子在戒毒，努斯对儿子充满信心。

“我们不妨碍他，”她说“，我更不刨根问底，他吸也罢，不吸

也罢。这是他的事，而不是我的事。如果他没戒成，就再从头开始,只能这样。”

但只要儿子没戒成，她就一定来寻求社团的支持。

我们到社团里来，还为了维姆和玛琳，他们就不肯让自己的女儿安生。

“我们本来是想让孩子自己做主的，可是没一点好结果。现在我们以为我们没错，不过还是担心：可别又犯了吧？”

“但是,每一个人都需要机会,”赫莉说“难道你不是和每个孩子都有特殊关系吗？把女儿和她的兄弟等同看待，是不公正的。”

“对,说得轻巧,”玛琳反驳说“但是,现实是这样的 她来看我们，和她兄弟一模一样要钱，如果我们不给，她就又去卖淫。”

“她以各种方式干这个,”维姆说“倒不是因为我们没给钱,她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。”

“对,这是他的说法,我可不能,我没有勇气,瞧瞧她那瘦瘦的小手，瘦瘦的身子……”

“当然啦，她来看母亲，母亲就坐在她旁边哭！那丫头就不再来了！”

“我明白,你不能放弃她,不能让她胡来,”努斯说“目前你还不能。但是，你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，至少不要坐到她旁边哭，因为你这是做给她看：瞧，我多么痛苦！一个健康的人都受不了这个,更何况她吸毒,卖淫,陷得太深了。”

玛琳点点头。每一次她都需要听听我们说的这些话。

贝蒂和尼克也不来了，他们说：

“我们已经重新站起来了。接触层出不穷的新事例，对我们利少弊多。”

他们对两个小一点的孩子，一个十二岁，一个十四岁，都说

了毒品的危害。

“我们把自己知道的毒品的危害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她们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否则我们以后说让她们千万远离海洛因，她们就不会相信我们的话了。”

这一席话深深触动了我，我也买了一本写毒品之害的书，开始念给勃朗麦和约欣听。

三月底的一天晚上，玛琳给我们打电话：

“可以和你们谈谈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西蒙答道，“你说什么时候？”

“现在，”她回答，“因为事情不能耽搁。”

“她一个人来吗？”我问。

她一个人来了。老习惯，就站在门口说话。

“我要走了，能不能跟你们要点钱？”

“先坐下，”西蒙平静地说。

她拿了一支烟，却又赶紧为自己辩解：

“是啊，我又吸上了，也是自己卷的烟……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我跟大卫学，把工作也丢了。对社会性的工作我已不感兴趣了。我就像狗一样与当事人一起流泪，汪汪叫，说麻醉剂用得少一点没什么可怕的。我宁愿去当空姐，也不要去什么俱乐部用自己卷的烟去糊弄那些孩子……上帝，我从哪儿做起呢？”

“我想，最好从散伙开始，”西蒙说，“你再也没有精力了，所以想走。你根本没必要向我们说理由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帮帮你。”

她死盯着一个地方，沉默了好长时间。

“也许没必要，”她终于说道，“但是我想说清楚。我认为不能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你们不了解我……你们只知道我也吸毒，还有别的事……我去过戒毒所，但你们不了解我。”

她突然变得脸色苍白，我就坐到她身边。

“玛琳，”我问道，“你想谈谈自己吗？”

她咽了一口唾沫，说了起来：

“三年前我动了一次手术，卵巢炎……当然，我不是就这样得了这种病的……开始的时候在家里吃了许多药，也很苦，但是没有治好，只有动手术了，没完全切掉，只切了一个，另一个卵巢还留了一点。于是我想，生孩子的事与我无缘了。但是还有一线希望，可我没那么想。实际上我的身体……我又瘦又小……以后，我从医院转到那个中心，这是我的主治大夫安排的。过了一年，我回学校，毕业后，说实在的，我身无分文。我遇到大卫的时候就想，也许我们有缘……那些正常的小伙子都不理我了。总之，我拼命努力，但总做得不好，发生了戒指的事以后，我才开始明白这一点。我想挽回这件事，但是没有任何结果，最后我懂了：再和他一起混下去我就完了，所以绝不能再拖了。”她停了停，几乎以乞求的眼光看着我们。“起初看起来是不可能的，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……可……我还是怀孕了。”

她怀孕了……这母子俩……这瘦若小鸡一样的身体……还有小孩……

她把手放到我的膝上，轻声说：

“别大惊小怪，我看这很好。我知道这事已有两个星期。对我来说，这是好事，要生小孩了……可是你们明白，和大卫在一起是不可能了……”

“我们明不明白有什么关系，”西蒙说，“我们根本没有义务明白。就连这小孩，我们的孙子，也是你们的事。”

“是我的事，”她生硬地说，从我的膝上抽回她的手。

“你没和大卫说过这事吗？”

她的脸抽动了一下。

“那就请你们告诉我，他什么时候能听进这些话。不，我自己已下定决心，我不能不要这个孩子……可是我的孩子不需要一个吸毒的人当爸爸……”

“但是他早就吸上毒了,’西蒙说。

“不错，可我没怀孕的时候，我对自己是否会因吸毒而死是无所谓的,但现在怀着孩子……不,我要离开他。”

我们默默无语。我想起了那个遥远的晚上，是我自己开口说我怀孕了，先要告诉西蒙的父母，因为他们出钱供我上学，还因为我母亲的号叫比什么都更让我害怕。我不能独自去，不能。西蒙低着头，闭着嘴，坐在旁边。我可没勇气说：是的，我怀了孕，但是，但是要给我一点钱我才走，因为我并不想嫁给这个傻瓜。我看了一眼西蒙，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，他也在想这件事。他朝我挤挤眼，我顿时哈哈大笑。

“请原谅,玛琳,’我表示抱歉‚“但是我和我的丈夫……我们两个突然想起……你要知道，大卫也是这样出乎我们意料地来到人世的。当然，时代不同了，可是，我还是想对你说……一切是可以改变的，人会成熟起来的。总之，你不知道这个小孩会给大卫带来什么影响。”

“我没有必要等大卫成熟起来。他能成熟起来，这当然很好,但跟我没什么关系。”

“好吧,’西蒙说‚“既然事已至此,我能为你做点什么？”

她伸直腰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忽然张开嘴像有话要说，像是蓦地想起了什么。

“当然,该离开的不是我！’她大声说‚“好像我发昏了 这是我的住所，是我租的房，我付的钱，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！是我把这些东西一点点买来的，因为大卫的钱一向都拿去吸毒。惟一属于他的东西是他的那个床垫。当然，我不能走，要让他

走。你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已经习惯了一切都由我来办，是我让他闲呆着吃白饭……不行，够了，让他走吧，我留下来……„

她毅然决然地站起来说：

“我很高兴到你们这儿来。非常感谢，你们想帮助我，但我不需要,就这样。”

西蒙去送玛琳，我在屋里急得团团转，觉得我犯了错误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就朝他发火：

“大卫会有什么反应？难道他就这样让人家推出门外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,”西蒙说“一切都取决于她的安排。”

“这个我可以告诉你。她一回家，就把大卫的东西塞进包里，告诉他可以走了。那大卫呢，照我的判断，不会轻易拿起东西就走，一定会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，还要把她臭打一顿。我们可不能放任不管！女孩怀孕了！”

西蒙好久没说话，后来说：

“你这几年在社团里到底学了些什么？为什么你总说我们永远没法预知未来，不能没事找事？现在这就是我们要谈的话题。就是现在，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成年女人，她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了。她那点本事可能不算高明，但是她要走自己的路。打个电话给赫莉看看，她能告诉你的也不过如此。”

我一听赫莉的名字，肺都要气炸了。

“赫莉,”我说“她什么都知道 可是她并没有遇到这么多的新难题。她的儿子都死了,她还能有什么事？”我不觉一惊,顿时语塞,因为我居然这样看赫莉“上帝呀,我都说了些什么 我可一向很尊敬她的……”

他只是微微扬扬眉，又能对我说什么？

“西蒙……”我胆怯地说。

“你是知道的……”他打断我的话，但他的感受却难以用语言表达。他只是摇摇头朝门口走去，说“：我去睡了。”

我一人独处，顿时浮想联翩，不能自己。难道我羡慕赫莉吗？我想起了艾尼和迈克说他们那两个吸食海洛因的儿子：“我们有时想，他们还不如死了吧……”其实他们说的这话在我的下意识里不是也有吗？不，这太不尽人情了。这会儿几点了？玛琳可能已经到家了。我能想像他们现在大吵大闹的情景。‘大卫听着 请吧，这是你的东西，还有这件衣服，拿走吧，因为所有别的东西都是我的。我看不出跟你再混下去还有什么意义……’大卫呢……先是走出去，然后在楼梯上停住脚步，又回来。‘你还想干什么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过下去……’‘我要我的床垫……’‘哈，床垫吗？为了上帝，我给你床垫，把窗户打开，你看床垫跑到大街上去啦！’这不幸的丫头 噢，老天，他猛的一拳，她就踉踉跄跄滚到屋子的那一头。她可是怀孕了，这丫头还剩下一半的卵巢，还有她那小鸡一般弱小的身子！这样的女人也会怀孕？挨了他一拳，她就在整个屋子里连滚带爬……他就像喝了大量烈酒，连砸带摔，把一切东西通通扔到地上，最后下楼，摔门而去……“真的，你这几年都学会了什么？为什么你总说我们永远没法预知未来，不能没事找事？”对，你只会信口开河，你只会躺在床上，拉被子蒙头……可大卫徜徉街头，这见鬼的丫头把他轰出了家门。如果他回来，会再打她一顿，她可是自讨苦吃了……

如果他回去的话……我摆脱不开这个念头。如果他回去再打她……噢，老天爷，千万不能这样！我要去那儿一趟……不，我不能掺和进去，但我还是要去看看，要有个人在那儿，万一出点什么事也得有人帮忙。

我悄悄溜到走廊里，轻手轻脚地穿上大衣，轻轻地，不能让西蒙听见。我轻轻打开门，随后又关上。栅栏门可不能发出响声，迈过去算了。所幸的是汽车停在大街拐角，我开车出去的时候西蒙不会听见。可不能往那边走，傻瓜，都深夜一点了，怎么能往斯赫文宁根市中心去呢？我始终沿着单行线大街走，后来终于把车停在街灯下面看地图。我的手指着地图找那些熟悉的地名。这不是吗，巴德黑斯维赫，我们家的牙医就住在这里。不过别忘了：大卫的牙不好，他要好好治治……就是这里……他们就住在这儿……

过去我确实是把车停在吉斯住的那条街上，停在其他汽车中间，远远的，不让人发现。但是这次又不能停得太远，刚好看见那被丢在台阶上的大卫的床垫。我的心吓得怦怦直跳，果不其然……如果说这件东西丢了下来，那别的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。都是这坏娘儿们逼的，可大卫也把她一顿好打。

我等待着。楼上没有灯光，她在上头吗？还是走了？大卫回来没有？不，无论如何我都不离开，我要守在这里。

玻璃哐啷一声响，我一惊，醒了。

“烂货!”我听到一声叫喊，“肮脏的烂货!”

我再往楼上看玛琳住的那一层，有两扇窗子打破了。刚开了灯，马上又关上。邻近的几家房子也亮了灯。我放下车窗往街上看，杳无一人。没过多大一会儿，我在惟一一扇完好的窗子里看见了玛琳。她推开窗子，俯身向下。

“大卫……”听得出来她在对他说话，“大卫……你走吧……”

邻近的房子里也有一扇窗子打开了。

“我已经打电话报警了,听见没有,太太。”邻居说。

玛琳气急败坏，瞥了邻居一眼，但没有答话，马上朝街对面

看。我向那边望去，只见两家商店之间有个窄道，大卫可能藏在里边。

“太太,我已经报警了……”

玛琳又报之愤怒的一瞥,意思是‘少管闲事’,接着她哐啷一声关上了窗子。

接着又是玻璃被打碎的声音，不过是从大街对面发出的，侧面的玻璃两边出现了窟窿和裂缝。灯光照耀的橱窗里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，那人拿着一个小凳，耀武扬威地把它的四条腿伸向前方。大卫一闪而过……但是我已认出是他。他站在那里朝上看了一眨眼的工夫，接着就转过身去，抬手就砸汽车，砸近旁的房子,左手一挥,玻璃响了,右手一挥,砸到汽车顶。随着打砸房子的哐啷声，人们纷纷跑出来，彼此靠着站在没危险的地方嚷成一片。在楼上的窗前，玛琳再次露面。突然我听到了她叫喊:‘大－卫!’是那种透着野性的呼喊,求救的呼喊,但是没人来制止他。人群向她那边靠过去，伸着脖子听一个刚下楼的邻居说明原委。既然玛琳拒绝了他的善意帮助……一生中总会有对立面。

“这就是和她同居的那个男孩，他们两人没完没了地打。早晨倒听不见他们怎么样，但一到夜里就吵死人了。这两个没教养的东西,一向如此,吃救济金,自然,没工作……才过半年他们就过不下去了。他们夜里抽烟，扎针，白天就泡在他们的小窝里……这两人真让我受够了……”

“不过,我每天早上都见她从家里出来。”

“对,开始是这样,后来她明白了,没这玩意也过得去。”

我看到她带着鄙夷的表情往下看着他们，后来又用探索和惊恐的目光朝大卫的方向扫视，并再次打开窗子。

“大卫……”

下边的人就嘻嘻哈哈地跟着叫：

“大卫！回家来吧！上床吧……”

但是当大卫穿过大街走近大门口的时候，他们就吓得赶紧溜到另一边去。我又一次看到她看他们时的神情，那是蔑视和嘲笑。

“警察！”有人喊，“终于来了！”

汽车开进人行道，逼着大卫向墙边靠，接着有几个警察从车上跳下想抓大卫。他挥着小凳，左推右挡地拒捕。又一辆警车开到，又是四个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察挨了小凳一击，我看见他抱着头趔趔趄趄地靠近汽车，他们就向大卫冲了过去，大卫倒在地上，但并不服软，手脚还在乱踢。

就在我的汽车旁边，我再次听到玛琳的叫声：“大卫！”她向他跑去，但被从第三辆警车上下来的四个警察死死抓住。她没哭泣，也不挣扎，任他们把她推到旁边，她左右各有两个警察。另两个警察赶紧冲过去救助负伤的同事。玛琳看着他们捆大卫。最后，他们把他塞进车里，自己也上了车，把他往下压，这是制服他的惟一办法。汽车加大油门向前窜去。受伤的警察钻进了车内。有人去叫增援警力，过了几分钟大街上警笛呼啸，塞满了车。各家的灯都亮了，所有的窗子里都有人探头向外看。人群里发出笑声。是的，他们在笑，检点着被砸坏的东西，朝玛琳的房子指指点点。还有一个邻居则活龙活现地描述事情的经过。两个警察连推带搡地让玛琳回家，她让他们进了门。

“这女孩不能住在这地方，”我听见有人说话，那是个男子，靠着我的车。“她是干什么的？是登报的妓女吗？”

周围一阵嘿嘿笑声。这无耻之徒应和着笑声，高声朗诵：

“阿尼塔……年轻的……迷人的丰满……热辣辣调皮的猫咪见什么都舒服……我满足你的要求。如果需要，就来法国式

的……„

一阵哈哈大笑。这种轰动可不是每天夜里都碰得到的……

“当然是他拒不付钱喽，因为她侍候得不到家，她就把这小子还有他的床垫一股脑儿扔到大街上……瞧……那就是床垫。”

他们离开我的汽车去看床垫。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受伤的警察在一群人的欢呼声中离去。

“躲开点，伙计们！让开！”

警察到来之前，有个邻居出面疏导交通。两个警察从玛琳家出来的时候，响起了一片掌声。

“嘿，怎么样？她怎么样？是个甜腻的小妞吧？”

人们再次哈哈大笑。一个警察拿起那个小凳让人们各自回家，但他们并不着急，不想马上丢开这桩开心事。已经弄了些三合板先把窗户钉上。和睦的邻里关系又恢复了。

“约翰，扶住，我要钉了。”

他们查看了损坏的汽车。

“我可走运了，看，我的车顶上本来就有个坑。”

有人拿扫把出来打扫碎玻璃碴儿。有个女人拿着折断的仙人掌，挪动着小碎步走到一个警察跟前。

“散了吧，都回家吧！太太，为了上帝，都请回家吧！”

“您知道这花值多少钱吗？这种仙人掌值好几百盾哪。要是我明天来找，肯定得不到赔偿。”

第一批警车开走了。

“谁家要木板？我这里还有一块。”

“各家都要，明天晚上小区开紧急会议，你知道，这个骚女人必须从这里滚蛋……”

“听着，这小伙子吸毒，至少邻居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不是，不过是个酒鬼，那小凳也是从酒巴里拿出来的！”

“把他们都送到毒气室去不就结了吗。”

“还有他们的父母,都是他们把孩子惯成这样子!”

“还有政府!”

“对,还有政府!”

“统统都送到毒气室去!”

“就说这减速路面①吧,愣就没给我们修!”

“不是的，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把这个小区变成步行区！”

“我看,这是个黑人,我琢磨着是苏里南人。”

“不,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苏里南人,就是个普通的吸毒者。”

“我们这个区里有苏里南人,把他们全撵出去。”

“这些野蛮人都吃饱喝足了!”

“我就说嘛,把他们统统送进毒气室去!”

“对,对,送毒气室,还有这个婊子!”

我呆呆地坐在车里，没人看见我。我只听见四周有说话的声音，但说的是什么，我并没有听见。我不断抬头往上看，看玛琳的窗子，看这个弱小而又勇敢的小荡妇家的窗子。她只有小鸡一样的身躯和半个卵巢。我默默无言，欲哭无泪：为这个弱小而又勇敢的、有着小鸡一样的身躯和半个卵巢的坏女子而哭，为这个弱小而又勇敢、蔑视这条街的坏女子而哭，而这条街却想把她和她们“这些人”统统送进毒气室。

四点了，所有的窗子都已经堵好，住家的灯光也已熄灭。街道的两个角落里停着两辆警车。两个警探严密监视玛琳的房子。

我一直在吸烟，直到烟盒空了，我才从车里出来，用钥匙开了门，把大衣挂在衣架上。上楼，进卧室。西蒙自然是睡熟了。

①在荷兰，居民区内的街道路面铺成波浪形，以利车辆限速。——原注

如果我静静躺在他的身边，什么也不对他说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
我和衣躺下,静静地躺着、等着,等到我有了知觉,等到我能够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再说。

然后我起来，久久地站着查看酣睡中的西蒙。不能告诉西蒙……我去他的书房打电话。赫莉，就告诉她……我可以原原本本把一切都告诉她。我拨电话号码，她立即拿起听筒。

“赫莉,我是兰恩……”

电话线的那一端久久没人说话，后来她才说：

“你在哪儿?”

“在家里……你知道,赫莉,有件事……”

“好吧,”她说,“我就去。”

我心平气和、一五一十把事情都说了。西蒙和朱丽叶也下楼来。我的话只被打断过一次。

“真见鬼啦,”西蒙说,“谁叫你跑去看他的?”

但是赫莉和朱丽叶都压低了声音责备他：

“嘘,让她说,先让她心里轻松点。”

我沉默下来的时候，赫莉说：

“现在就让我们把一切都放下，只有一件事除外，那就是你的负罪感。”

我惶惑不解地看看她。

“你在玛琳面前的负罪感。你一直反复地说：‘我本来应该到她那儿去……’但是从你刚才说的情况看，她根本就不需要你。”

“再说呢……”西蒙说,“我们这里还要总结一条……如果你还是每一次都跟在这小子屁股后面跑，那……”

“这事我们先放一放,”赫莉说,“我们大家都常有反复的时

候。我们以为已经摆脱了，可以安生好几个月的时间了，可后来总要发生点事，去它的吧，你又要越轨了。我们社团里的人都常有反复，虽然你认为你已经不需要社团的帮助了。现在只说你的负罪感吧…… ”

我有负罪感。是的，我本来应该到她那儿去，不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不管。

“ 朱丽叶，”赫莉说，“ 你设想一下你就是玛琳。警察先把你带进房里，然后离开，只剩下你一个人，而大街上，在你的窗子下面，有一大帮人在咆啸。如果她在这个时刻来看你，你会做何感想？别忘了，她不是你的母亲…… ”

朱丽叶表情严肃，看了赫莉一眼。

“ 可怕，”她答道，“ 最好她别来。我自己能对付大卫。而且我一向引以自豪的是，我能维护我自己。我面对警察不会胆怯……„

赫莉回家了，朱丽叶去上学，西蒙上班。我冲了个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想做点日常的家务事。要是来电话，我就冒充用人。“ 是西蒙太太家，她的独生子大卫？好吧，先生，我转告太太。 ” 要争取时间，先搪塞一下。当事情来了，我没法对付的时候，决不能让自己乱了阵脚。

房子附近驶来一辆出租车。我看见玛琳下了车。她提着一个圆鼓鼓的塑料手提包，急步向我们家大门走来。我一开门，她就把我推进房里。

“ 我不进去，”她说，“ 出租车在等着。我有话要简单地对你说说。大卫，他被抓到局子里去了，总之，发生了一点事……但是我想跟你说点别的：他正用一种‘ 盐酸抹酸酮镇痛疗法 ’ 戒毒，每到十二点就注射。但他要是被拘在那个地方，就没法注射了。要有个人到那儿去，想个法子让他注射。 ”

每一次她都能设法把所有的事一下子说清楚。她边走边说:倒霉了,闹了一场风波,警察来了,镇痛疗法,注射。可是,我坦然对待。

“你不能让出租车先走吗?过十五分钟另找一辆。”

她放慢脚步,到街上付了钱就回来了。

“好吧,可能的话还是好好跟你说说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我已目睹了一切,不过就让她说吧。

“我哪,就是说,昨天晚上回家,本没打算说我怀孕了,可是出了意外。大卫不在,他比我晚一小时回来,马上就问我为什么那么紧张。没过两秒钟我们就吵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彼此责骂,我按捺不住火气,冲口说出我怀孕了。真是怪事,突然出现死一样的寂静。大卫什么话也没说,一个字都没有说。当时我就向他解释,我要爱惜自己,我要留下这孩子,这是我的权利,就像他有权在吸毒者中间鬼混,过吸毒的日子一样。他说:‘现在……我刚刚开始接受镇痛戒毒疗法,你却说这种话。’”

“这和你的镇痛疗法有什么相干?”我答道,“我又不是靠这玩意儿怀的孕。是不是继续用这种疗法戒毒,你自己拿主意吧,反正我怀孕和这无关。不过现在情况变了,我要自己拿主意了:是跟你过下去,还是不……我决定了:不再跟你过了。”

“一切都明明白白,”大卫说,“这孩子不是我的。”

我惊呆了……真是……真是委屈极了……

“你简直是个骚货,”他接着说,“这孩子是弗兰克的哎,在这种情况下该走的是你,想让我认这个黑孩子,办不到!”

他依然那样平静,可我忍不住了。弗兰克是苏里南人,他的工作就是跟苏里南人打交道,是个优秀青年。我常和大卫说起他,他有时也来看我们。弗兰克……这太卑鄙了,我真的气疯了。可大卫仍用他惯用的手法,溜之大吉。他一言不发地飞快

下楼,把门摔得山响,找地方打针去了。吸毒也好,戒毒也罢,随他去……这就是大卫干的事。看不见他的人影了。我愤怒之极,紧追下去,锁上门,再跑回楼上,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把大卫所有的东西都扔到窗外。他的东西不多，只有个床垫……后来……他喝醉了酒，没去打针，否则他就没事了。他一回来就砸窗户……警察赶到,把他逮走了。”

她只字未提那天夜里楼下人群的无理取闹，只字未提她叫“大 一卫…… ”时声音中流露的惊慌，这是我从她的喊声中感觉到的。她只字未提看见大卫被捆着手脚拖进汽车时她感到的孤独无助。她沉默了，我正好用这时间把这些事仔细琢磨一番。大卫开始接受镇痛疗法，就是说决心戒毒了。但是在此以前，大卫为了试用新的毒品，总要找出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。今天夜里也正好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不过至少他没有注射毒品……

“ 你说,他不吸毒挺得住吗 ?”

“ 挺得住,”从她的声音里听得出几乎喜不自胜的心情“ 所以就要有个人来帮忙。这个人要有权让他接受镇痛疗法，要保证他能戒毒。 ”

我没问她为什么不能充任这个角色，她已做出了自己的抉择：再跟大卫在一起，事情只能更不好办。她手里的提包最好不过地说明，在目前这个阶段，她决心自己走开。

“ 你到哪儿去 ?”我问。

她耸耸肩。

“ 你为什么走 ?你怎么啦,你怕大卫回来 ?”

“ 他们不会很快放他……不是，我不是怕大卫，而是觉得在这条街上住下去太不方便了。您看看今天夜里，这些人的仇恨劲头有多大…… ”

“ 可是你到哪儿去 ?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去找弗兰克……我还能到哪儿去？不能找您，对吧？”

“如果你愿意,可以暂时住到汽车活动房里。”

“我?住汽车活动房?一个人?噢,不,多谢,我不能一个人住，我要和大家共同生活。”

我叹口气，她对我笑笑。

“这对大家都好些,”她说,“我先住在弗兰克家,他有很多熟人，我能找个地方安身，以后再来拿我的东西，因为带着这个手提包……”她微微抬起那个小包,“我逃的时候有些慌,自然把要用的东西忘了……”

“那你需要什么?”

“嗯……洗漱用品,手巾,内衣,一些衣服……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忘带存折了，我是把它单独放在一个地方，怕忘了。”

“那就要回去一趟……虽然大卫随时都可能回去。他有钥匙吧?”

“对，不过他们不会很快放他……”

“别太天真，玛琳。如果警察把每个人都拘留起来……他没杀人,他只是打坏了窗子,砸坏了汽车,可能还碰伤了人,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警察还没拘留过他。只不过让他在那里睡上一觉，审问他一下，末了缓判放人。说不定他还来得及接受戒毒治疗呢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?”她惊奇地问。

“我常去社团，有的人家也有像大卫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父母也去。”

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对,大卫说过……”接着她突然紧张起来,“那就是说,我需要……但是，我今天不到这条街上去了。您能不能替我去一趟？”她很快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钥匙，塞进我的手里。

“劳驾了,您能不能替我去一趟?”

在出租车上，她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存折。

“存折不是放在前厅里，就是放在厨房里了。”

“玛琳,我最后一次问你,你不跟我一道去吗?”

“不,不,请把我带到弗兰克那儿去。”

她是怕街坊们，还是怕面对大卫？她过于害怕，我就没再坚持。我把她送到弗兰克那儿之后，请司机在街角等我一会儿。路没有多远，我慢慢接近那座房子，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大部分窗子都装上了玻璃，只有个别地方玻璃仍是破损的，但是我从汽车的旁边看去，倒没有破坏得特别严重的迹象。有两个女人站在敞开着的门边说话，我走过她们身边的时候，她们停住话头，但并无敌意。我推开门进去。玛琳叫我拿里边屋子柜子里的东西和挂在椅子上的东西。不，先找存折。我在厨房里找了找，但是没有，也许在前厅里。我先走近打坏了的窗户，玛琳已把碎片收拾干净了。尽管天冷，我仍觉得有温馨的气息袭来，玛琳是怀着怎样的爱意收拾这个房子啊！墙上挂着木刻画、照片和钢笔画。我过去并不知道她还作画。或者这都是大卫的作品？不，大卫画得更好些……涂着淡蓝色的小柜子，白色的木地板，地板上放着淡紫色的靠枕。到处都是小巧玲珑的花草。小桌上放着一摞书：梅利·艾尔得特①,《占星术》,《顺势疗法家庭医生》,《韵律》,一些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的杂志,还有一本《数字之力量》，等等……壁炉上是搜集来准备雕刻用的石头，我一块一块地拿到手里掂量掂量。这个丫头，这个令人称奇的女孩，她怕孤独，并善于为自己创造一个家……

我在提琴乐谱架上找到了存折，乐谱架巴赫的乐谱是翻开

①保健题材的科普图书作者。——原注

着的。这真是太荒唐，太可笑了。我把存折放到手提包里，把那些乐谱码放整齐。旁边是一把提琴。她没提到提琴，但我仍觉得要给她带点有用的东西，因为她对我是真诚的。在里面的一间房子里，我没看到她留下什么东西，这里是他们睡觉的地方。另一间是大卫的房子。他的床垫给扔到外面去了，椅子上，地板上，到处都是零乱的衣服。我忽而在这里，忽而在那里，翻出了一些背心来。我打开第一个柜子，里面是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决不可能找出什么有用之物。另一个柜子是玛琳的，在上边的一格里，有娃娃、小驴和一个褐色的考拉熊。下边一格有教科书和两张别在后壁上的照片，一张是男人的，另一张是女人的，那是她的父母，她长得很像他们，可我从来没听她提起过他们。在底下的格子里有一堆裤子、背心和毛衣，我挑了一两件，就塞进随身带来的提包里。接着我关了前面房间的炉子，从窗台上拿了几盆花草，她在浴室里的梳妆用品，关了燃气热水器……终于提着提包，拿着提琴，下楼到了街上。

到那时我才知道玛琳为什么怕回来。

大卫就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，一动不动地靠在一堵没有门窗的墙上。他看到我呆呆地站在门前，但我们彼此没说一句话，只是站着、看着。我们两个都想穿过大街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对方的眼神提醒我们，应该保持距离，心心相印，相对无言。我曾是他的母亲，他曾是我的儿子。当初我们在阁楼上画画的时候就这样彼此对视：

“妈妈,那我是画家吗？”

“你是画家,大卫。”

“我能成为画家吗？”

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。长大成人的儿子再也不会向母亲提这样的问题了。

“这样的情况一生中只有一次，大卫，人的一生只有惟一的一次机会恍然大悟，此后他可以为自己选择另一条道路。”

“那我有天才吗,妈妈?”

“妈妈,在这里,在楼上,我们俩完全是另一种人,不像在楼下,对吗?”

我隔着大街对他笑，他也报以微笑。这是相知和默认的神情,仅此而已。这神情里包含了一切友谊,信任,理解,挚爱,痛苦和忧患。但是这一切还没来得及体现，这脆弱的情感共鸣就被外界的因素抹杀了。荒唐。错误。这是不同的气质使然。玛琳的提琴上有一根弦断了，因为我找不到琴盒，提琴就在我手上,看得见,摸得着。就这样,我手拿提琴和玛琳站到了一起,在这个时刻此情此景成了最卑鄙的背叛。

他离开墙，过了马路，直冲我走来，但对我视而不见。他打开了门，又是那种熟悉的哐啷声，提琴受震发出嗡嗡声。

“怎么样，他们打来电话了吗？”西蒙从办公室回来后问道。

我否定地摇了摇头。

“也许就不打电话了,”他说,“当然,有时候他们就这样做,一个年满十八岁的青年，按刑法就算成年人了。遗憾的是按民法却还不是……我今天去咨询过：如果有人要我们赔偿经济损失,那可有我们的麻烦了。”西蒙忽然向电话奔去,“你猜谁了解情况？汤姆……”

“是的,是汤姆。”我回答说,“汤姆和死去的儿子,嗜酒过度和从第三世界领养的孩子……别打扰汤姆了……咱们还是先吃饭吧。”

西蒙不知所措地坐到桌子旁，但立即拿起电话，一个个地给熟人打电话，每个人都为他出了主意。

“西蒙,”我请求他,“劳驾了,我听够了这一套……再说为什么一定要当着孩子们的面打电话呢？”

“有道理,可是我到底要闹个明白,我究竟是在哪里？”

朱丽叶站起来说：

“好了，问个明白吧……我到外婆家去了，家里就她一个人。”然后又对西蒙说：“那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……一整天大卫长大卫短的……”

“大卫又怎么了？”约欣问。

“没什么……特别的事,”我回答说。

“可我听见爸爸说打破了玻璃，砸坏了汽车，还说我们要赔钱。”

“不,没有的事,什么事都没有……”

我以责备的眼光看了看西蒙，他见状不妙就回自己房间去了。约欣依然若有所思地盯着什么。

“妈妈，”她终于开口了，“不过我没想到他会做这样的事……”

我坐在她身边，抓住她的手。

“那你想到他会做什么呢？”

她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“我想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从前他可是一直对我挺好的。”

“如果他突然回来,你想不想把这话说给他听？”

她又摇头表示否定。

“不……因为我觉得他太可怜了……”

孩子们睡下了。我一个人坐在楼下。西蒙在楼上他自己的房间，不时下来看看我。他同杨谈过，同皮克谈过，同他自己的保险代理人谈过……

“行了,西蒙,到此为止吧,前天你自己问过我,这些年你学

会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在社团里说我们绝不要想以后的事，不该杞人忧天……那就等着别人来找你赔偿吧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人来找过你。”

他再次向我投以充满疑惑的目光。上帝呀，我想他又快崩溃了。

“行了，西蒙，别这样了，你就按时躺下睡觉吧，哪怕一次也……”

“是的,”西蒙说,“按时上床,可长夜难眠啊……”

晚上十点钟朱丽叶回来了。她同我们打了招呼就想上楼回自己的房间，但我叫住了她，她不怎么乐意：

“叫我？什么事？”她问,“我想睡觉了。”

“我就是想说说话。”

她耸耸肩膀。

“不明白，可是你和我……永远不会像你和大卫那样谈话。我们当然可以谈一谈，但是你们两个人……就算你们不说话，我也能感觉到有某种感情把你们联系着。你明白，妈妈，我说这话不是忌妒……不知道……我说不明白……今天在外婆家也是这样。我把什么活都给她干了，还常常去看她，可是她心里只有一个人——大卫……”

我想打断她的话，她不让。

“不,你不用说这不是真的。我感觉到了,这是真的,我并不生气,因为你自己也没有办法。”

“朱丽叶，”我说，忽然就把那天见到玛琳的事都告诉了她：玛琳乘出租车前来，存折，我同意去给她拿存折，我自己对他们家的印象，那些植物和提琴。“方才你说的我和大卫之间的那种感情……在我和他不期而遇的时候我也感觉到了。他站在街的

那边,在我对面。”

“ 那我就不明白了,’朱丽叶说‘“ 大概这是仅存的一点点令人欣慰的东西，可你自己却任凭一种愚蠢的责任感和负罪感把一切都糟蹋了。 ”

“ 任凭责任感和负罪感 ?”

“ 不错！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急着为这个玛琳去拿什么破烂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怎么了，这个丫头没有提琴就活不了啦，是吗？难道这比你和大卫之间那种令人欣慰的感情更加重要？我可以想像大卫感觉到你把他出卖了，顺便说一句，可别跟我来这一套，如果我和我的男朋友分手，你根本用不着去拿我男朋友的笛子…… ”

“ 我知道,你认为我不该这样做,’西蒙说‘“ 不过我还想给汤姆打电话。”

他专门下楼来声明这一点，显然自己也明白在做一件错事，所以我什么也没说。

“ 你为什么不说话 ?”

“ 汤姆——他是惟一能帮助你的人吗？ ” 我问。

“ 现在他是。我自己大略计算了一下赔偿额，不管我问谁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我非掏钱不可了。所以我又拿出不动产抵押条款来看 ,想找汤姆问问,能不能再提高比例。”

“ 你在做什么蠢事 ?”我问。

但他听不进去，要去打电话。我又一次听到他讲事件的详细经过。他放下听筒告诉我：

“ 汤姆一会儿来，过十五分钟，现在他正忙。请他在这里坐还是上楼 ?”

我看了看表，正好十一点。

“我看就在这里吧,我要睡觉了。”

可是西蒙像一阵狂风嗖地经过我身边上楼去了。

“好,好,”他说,“我把我的东西拿下来。”

我刚脱下衣服，就听见门外有声音，过一会儿消失了，然后又响了起来，不过声音变大了，我听出了这是他：这是掀动邮箱的声音。我立即打开了阳台的门。

“大卫!”我喊了起来,他抬起头,那表情像一头被追逐的小兽。

“我病了,”他说,“放我进来吧。”

“你可以回自己那里去。”

“不行,他们把我赶出来了!”他环顾左右,这时候我看见两个男人站在对面的马路上。

“我弄坏了他们的汽车，所以我得离开那里。我病了，放我进来吧……”

掀动邮箱的声音表明过去的那个孩子在叫我，但我在同一瞬间也产生了另一种感情。如果我放他进来，西蒙会怎么样？大卫是不是真的病了？也许这是买卖毒品的人向他讨钱？也许是街道上的住户开会决定自行前来执法？不，西蒙这时候精神如此紧张，我不能放大卫进来。

“大卫,”我说,“没有办法,你应该走……你不能回来……”

可是他依然站在那里，看着楼上。

“我病了，”他又说了一遍，并摇了摇头，“这两个人追着我……他们用板子把我的门钉上了，等着我管我要钱，要我赔他们汽车……,,

我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又是这种强盗伎俩。

“我要叫警察了,”我说罢想回房间去,忽然听到大卫绝望的

喊叫：

“不！”

他转过身去，沿着花园小路朝外走，对面那两个人也立即活动起来，但没等他们朝大卫挥拳，大卫就落到汤姆手里了。汤姆伸出手臂，抓住了他的肩膀。然后我看见汤姆认出了大卫便火冒三丈，疯狂地把大卫扔到一边去，大卫向后一仰，摔倒了，一头扎到篱笆上。汤姆迈进一步，揪着大卫的衣服把他抓起来，用自己的大手朝大卫的脸一拳打了过去，一拳接着一拳……

“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！”他咆哮着，“你和你那些该死的猫害死了我的儿子！

我猛然间从慌乱中清醒过来，跑进西蒙的房间。他还在那里埋头于他的赔偿估价。我只说了一个名字就把自己的恐惧全部倾吐出来：

“汤姆！

“汤姆？！”西蒙吃了一惊。“别喊，我这就去开门！”

他想经过我身边走出去，可是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抓住了他。

“在门口台阶上……汤姆……他打大卫。给警察局打电话……不，你去……”

我几乎把他推到楼梯那里，可依然抓住他。

“你倒是放开我呀！”西蒙喊道，可是我松不开手，两只手在发抖，两个人你拉着我，我拉着你，连滚带爬似的下了楼梯，到了大街上我才放开手，忽然我看见赫莉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男人扭住汤姆的胳膊，大卫趁机跑回家来。西蒙设法安慰汤姆，可他却气急败坏地推开西蒙，他力气特别大，那两个男人都管不住他。汤姆那个大块头，他的狂怒和他打大卫时那种仇恨，使我怕得要死。我怕得要死……我害怕，我朝大卫跑去。直觉告诉我，他去自己的房间了，我看了看，他果真在那里，

躺在床上用手捂着嘴。朱丽叶进来了，拿着一条湿毛巾跪在他的床边。

“让我看看。”她说。

他放开手，满脸是血，两个门牙向里倒着。

“牙！”我害怕了。

“妈妈，请你走开！”朱丽叶喊道，“让我来照顾大卫！”

她看了看我，那眼神在告诉我：难道你看不见，我也想让某种情感把我和大卫联系在一起吗。给我这个机会吧，请了……

我点了点头，走出了房间。下楼梯的时候我听见街上的吵嚷声更大了。

我从阳台上看着事态的发展。又是整条街家家都亮起了灯，又是人们从家里来到街上。汤姆爬到汽车顶上，无论西蒙还是赫莉都没法叫他下来。他醉醺醺地摇晃着，叉开双脚，大声喊道：

“大家都听着！毒品……这不是宇宙航行的时代，是吸毒的时代！我们取消了死刑，无期徒刑也没有了，就算你杀了人，也不过判你六七年的监禁。我告诉你：应当把这些人全都绞死……还得恢复死刑！把所有毒贩子都判死刑，因为他们是凶手，是嗜血成性、躲在角落里赚黑钱、专门加害于我们孩子的刽子手！我们的政府是软骨头，它允许吸毒，让我们的孩子当这些刽子手的牺牲品。我们做父母的应该采取措施向政府施加压力。我们应当唤醒市政府的参议员们，不能再消极地看着毒品危害越来越多的孩子，使越来越多的家庭遭受不幸。吸毒，这是国家的灾难！我们做父母的应当给各政党的党团写信。所有的父母，不仅仅是吸毒者的父母……都要写信，因为明天你们的孩子、后天你们的孙子都可能染上毒瘾。我们应当写信呼吁，应当敲响警钟，要求严厉打击贩毒现象，要守法，因为目前的法律还

是禁止卖买毒品的。如果所有的父母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海牙议会前的宾宁霍夫广场就会堆满我们的信件，各政党就不会再回避，他们就会明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了！我们大家……我在这里宣布，明年是吸毒儿童年！”

汽车旁边的人群喧哗起来，有人喊道：

“他喝醉了!”

“叫警察吗?”

接着还有不同的声音：

“他说得对，应该有所行动。他的儿子死了，他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!”

另一个人，一个年轻人，也爬到汽车顶上，站在汤姆背后开始模仿汤姆的动作，让人们给他鼓掌。但是汤姆不管他，继续讲：

“我们应当要求政府让医院把所有毒品管起来。小儿麻痹症或脑膜炎流行的时候不也是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吗，这不仅是为了病人，也是防止疾病扩散传染。吸毒也传染，吸毒者会把自己的朋友带坏，可对吸毒却听之任之。吸毒者是重病人。他有权要求很好的治疗，同时一定要把他们送到医院去，这样才能把他们治好……”

汤姆背后那个小丑开始起哄和乱跳。

“嘿！嘿！嘿！女王和她的子孙们万岁！嘿！嘿！嘿！好啊!”

他赢得了众人的掌声，但是汤姆还是毫不理睬。

“荷兰有一万个吸毒者,”汤姆继续说“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，一百个人里就有一个人吸食海洛因！如果有一万人得了小儿麻痹症或者脑膜炎，我们就不会让我们的孩子上街，所有的政党也就会行动起来要求政府采取措施。如果有十万人得了

小儿麻痹症，格尔德兰就会关闭，不放旅游者进去了！”

“嘿！嘿！嘿！”那个小丑又折腾起来，“我们女王的子孙可都很健康！他们不会得到海洛因！他们弄不到，有警察管着呢！”

“荷兰有足够的进步教师和青年领袖，”汤姆继续说，“他们不反对软毒品，甚至还建议人们吸食，说是因为这东西没有坏处！大麻和印度大麻这类东西绝不是无害的消遣品，人吸了会伤害自己的机体，伤害脑子，此外还为吸食海洛因埋下祸根！没有一个死于海洛因的孩子不是从吸大麻开始的！要把这些祸害连根除掉。要把那些宣传软毒品的教师和青年领袖全部解雇。学校里一定要积极开展预防毒品的教育。既然我们给学生们讲解交通规则，那为什么不试一试把毒品的危害讲给他们听呢！通过你们的党团写文章提出这样的要求吧！你们是做父母的，这关系到你们的孩子！”

汤姆背后的小伙子认为这是拿大顶的时候了。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，后果肯定对他不利。结果他摔倒在行李箱上，又滚到地上，他的父亲接住了他，拽着衣服把他拖回家去。

“哎，哎，哎！帮忙吧！”小伙子喊道，“被打儿童年！”

我看见赫莉和汤姆正在同住在我们街上的一位医生说话，医生不时点头称是，然后朝汤姆走去，敲了一下汤姆的腿，以引起他的注意。

但是汤姆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做父母的应该联合起来，”他喊道，“联名写信，要求把那些贩卖海洛因的人清除出青年组织和当局支持的团体①。录用这

①为了进行试验，荷兰一度正式允许在警察和学校当局监督下买卖小剂量的毒品。原以为这个办法会防止毒品的进一步泛滥，结果适得其反，后取消。——原注

些人做试验的部门应当明白，他们是在拿别人的孩子当试验品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再也不允许你们这样做了！做试验用的经费是我们交的税，让他们放明白点，我们不想送自己的孩子去死。不要忘了，我们的家庭会妻离子散！当局应当保护我们的家庭！人权宣言有一条说：家庭——这是社会中一个自然的基本单位，它有权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。我们做父母的也一样，我们要求自己的家庭受到保护！”

汤姆摇晃了一下，又站稳了。医生没能吸引汤姆的注意，眼下正同两个警察和其他几个刚下汽车的人说话。我看到市政医疗服务中心的人来了，西蒙和赫莉朝他们走过去，跟他们谈了起来。

这时汤姆又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：

“所有的父母都会犯错误，这是自然的，可是从来还没有哪个父母对孩子说：给你大麻，吸吧。不，只有罪恶的社会拿他的生命做试验时这么说，孩子才吸上了毒品！可现在竟有一些团体主张自由推广海洛因，说什么这样就不会受到刑事追究了。可是政府应当做出安排，不应当让海洛因和大麻泛滥，因为这是万恶之源！而政府做了些什么呢？政府怂恿吸毒！一九七六年通过了一个新的鸦片法律：拥有三十克鸦片居然不算犯罪！政府还允许广播电台公布各类大麻的价格！公布这个条令的竟然不是别人，而是我们的弗林卡部长的公子。我们不能再坐视这些现象不管了,大家注意,不能!”

两个警察走到前面，汤姆转身直面他们：

“啊!”他说,“警察局的先生们,现在听我对你们说几句话！我可不止一次到警察局检举毒品贩子和他们销赃窝赃的地点。我得到的回答是什么呢？‘先生，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，这是小菜一碟。给我们报告点大事吧！’不好,先生们,这太糟糕了,病

兰人民应该时刻警惕并且盯住每一个毒品贩子，警察应当认真对待这样的事，这是他们分内的工作，请你们二位向你们的长官汇报这一点！如果我打电话举报抢劫或火灾，你们不会对我说：只有荷兰银行遭到抢劫或苏茨戴克宫失火，我们才会出动。你们俩好好记住吧……”

警察紧紧抓住汤姆的腿轻轻一推，他就倒在车顶上了。然而这并没有影响他接着说：

“这场灾难是于十五年前从大学生当中开始的，其中有社会学家、政治学家、心理学家，还有其他所谓的这个家那个家。从他们开始又传到社会上的弱者，这些弱者成了牺牲品。让这些已经身居高位的这个家那个家关心关心弱者兄弟的命运吧！”

城市医疗服务中心的人走到汤姆跟前，抓住他的手把他从车上拉下来，没有遇到反抗，不过汤姆还是接着说：

“我的不幸很快也会落到成千上万人的头上。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伸出援助之手。孩子们会死，父母们会死，国家将亡，荷兰人将亡……救命……救命吧，帮助我们可怜的国家吧！今天就给各党派写信吧！到议院大院去游行吧！帮帮我们吧……赫莉……帮帮……”

赫莉由西蒙搀着跟着汤姆走，她看着他们把他推进汽车带走了。她又同当地医生说了几句话，便随西蒙上了车。西蒙开着车穿行在人群中，沿大路驶去。

我去大卫房间的时候，朱丽叶立即离开他的床，好像在给我让坐位。

“别走，’我说。

“当然，’她笑了笑，吻了吻我，把我身后的门紧紧地关上。

我和大卫对视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坐在他身边。

“大卫，’我说‘你像小时候一样敲打邮箱，要求回家。我不想再听这样的声音了，你自己大概也不想再敲了。”

“我病了，’他说‘我正在戒毒，浑身都痛……没处可去。”

“如果你病了，我会帮助你，但是我绝对不赞成你像小孩子那样敲打邮箱。”

他点了点头，无力地微微一笑。

“好了……我明白……”

“就这样了……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让我呆在这里，呆在我自己的房里，过一个星期我就会感觉好一些。”

“你要求这样，’我说‘那我就一个人做主，不问爸爸。只要你觉得身体不舒服，我会帮助你，照我的话办，我有自己的分寸。你知道我参加社团后，同别人就这个话题谈过多次。我在那里了解到，我不该对你存有过多的幻想。如果你要戒毒，大卫，我不会抱希望。我会做好准备，过一个星期你又去找毒品贩子。不过这一个星期毕竟不会白白过去。你留在这里，但这不是你自己的房间，这是客房。你不再是敲打邮箱的小孩子，不再是向母亲撒娇的小孩子。你是我正在戒毒需要照顾的儿子。这一个星期里我们大概能为这种全新的关系打下基础。”

我想的是努斯和她的儿子，儿子几次三番戒了又吸，吸了又戒。她同他建立了完全不同的关系。他一个星期到她这里来吃一顿饭。她知道，儿子来到之前要先吸一些毒品，为的是愉快而平稳地度过在母亲身边的这几小时，毒性快消失的时候他就走。儿子到她这里来做客，还吸毒。他有救济金，却依然偷了东家又偷西家，以支付吸毒的费用。她知道这些情况，但是无力改变。不过这不是她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。他每个星期回家都同母亲非常友好，对她说东道西，而她也不因俩人的观点不同而与他顶

嘴。她有自己的一定之规，不强求他什么。只有一次他请母亲去看看他的新“小房”,二人又闹得不大愉快,因为问题又全部暴露在她面前了，因为她明白了：这是一个吸毒者的家，在她看来，这人已经不可救药了。不过她同时又认识到：这是我绝对不能再做的。对于他的那个世界来说，也许这样的“安排”完全正常，我最好离它远一点，主动地敬而远之。如果我想同他保持联系，那就只能从我的世界出发，在我自己的家里。我根本不想了解他那个世界的任何情况。

“我不想扯断维系我同儿子的那条线,”努斯说,“我一个星期好好地接待他一次，我能看出，他为我的友好态度而高兴。我们看一会儿电视，在沙发上坐一会儿，说上几句话，但不要流露悲观情绪，不要流露不安和愤怒。可是我不久前还是做错了一件事。当时儿子看起来脸色特别不好，蓬头垢面，上次他来的时候说他有另外一个‘地址’，在那里可以买到便宜得多的‘货’。我当时什么也没说，我恪守自己的信条：‘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，不流露悲观情绪。’可是一见他那副模样，面色苍白，形容瘦削，我忽然心中不安,怀疑是这个新‘地址’不好。‘你在哪里弄到这种海洛因,’我说,‘可能提练得不好吧？’就这样我进入了他的世界。‘你就根本不该说这话,’他咕噜着,‘你什么事都记在心里，下次就该惹人烦了。’这天晚上当然就不欢而散了。他站起来要走。可是你已经在学习了，学习处理这些小事……现在我学会耍滑头了：要么什么也不说，要么只说上一两句，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些共同的东西。这大部分是过去年代的回忆，那时候一切都还正常。晚上十一点钟他到自己的房间去——对他来说,这是儿童的作息时间，可我坚持不住了，因为我早晨七点钟就得起床，我们两人都很高兴，我们谁也没有做错事……”

“你在耍滑头,”蒂尼反驳道,“你刚才说同儿子的接触是指

什么？”

“这是另一种接触，”努斯回答说，“我根本就不该进入他的世界。可是即使同我那‘好儿子’的接触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样了。有一些问题我也不能与他谈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偶尔涉及，他会生气的，会以为我讽刺他，那他就会提早离开。”

“不过你这‘另一种接触’不是与你‘敬而远之’的初衷背道而驰吗？”

“不，它们互为因果。”

“爸爸呢？”大卫问，“如果爸爸不让我回家，我就走是吗？”

“爸爸有他自己的主意。我不敢说他能不能和你在同一屋檐下住上一个星期。不过，大卫，我也决定了，你生病的时候，我会照顾你。如果不能住在这里，我们就到汽车活动房去。我也不想不顾一切地盼这盼那或等待回报。不，我心里有数，这事多半办不成。因为现在我知道你吸毒，或者正在戒毒，知道你不信守诺言，经常要把我逼得走投无路，你的行为对我来说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那么陌生，现在我明白了。但是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牵肠挂肚。我不再以你的安危为中心来安排生活了。

他吃力地掀动着肿胀的双唇想对我微笑。我看见他的门牙，看见他额头上的汗珠。他站起来，忽然全身发抖：

“我先到医院的急诊室去，”他说，“可以叫出租车吗？”

玛琳可以退出他的生活，可我不能。我等了他一夜，不着边际的梦境里全是炸弹和湍急的水流。枕头底下放着我的小钱包，我的护照，驾驶证，因为家中有吸毒者，需要时时提防。但是我的小心是徒劳的。大卫没有回来。拂晓时分我明白了，他出去是为了注射。

校 订 后 记

中国读者并不熟悉本书的作者伊福娜·克尔丝,本书是她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。伊福娜·克尔丝是著名的荷兰女作家、剧作家，从事写作已近半个世纪。一九六五年海牙喜剧院演出了她的戏剧《老鼠》，此后她为电视台和影剧界写作了十多年，曾把荷兰古典作家的《小人物》搬上舞台,把弗兰芒语小说《青铜花园》等改编为剧本公演。此后她开始关注社会问题，在广泛社会调查的基础上，以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写出了《杨拉普和他的朋友》(1977)、《大卫的母亲》(全名为《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大卫的母亲》)(1980)、《福勃鲁姆卑劣的一生》(1982)等书。这些书一经问世，便引起国内外注意，先是几部小说被改编成剧本和电视剧，接着就是《大卫的母亲》被翻译成德、法、英、俄、西、捷等多种语言广泛传播,荷兰王国把这本书列入中学生的必读书目，至今它仍畅销不衰，足见其巨大的感染力。

本书原书名中的“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出生的”一语，是大卫第一次因吸毒闯祸被扣留，警察局打电话核实其身份时说的，这句话深深震撼了大卫母亲的心，并在书中多次出现，所以我们一度想用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脍炙人口的诗句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

作为本书书名。待译校完毕，掩卷静思，感到书中所写的兰恩，虽然从血缘的角度看是大卫的母亲，但作者把她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，一个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人来描写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揭示了她的儿子沾上毒品并非仅仅因为“养不教父之过”，他还是毒品泛滥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牺牲品，因此我们终于未改书名，而只把它简化了。

小说开头，写兰恩和西蒙这两个尚未走出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未婚同居，兰恩怀孕后生下儿子大卫。当时作为父亲的西蒙“还那么小”,还需要父母的照顾,还在读书、拿学位。于是兰恩作为母亲，为了儿子而不得不辍学。随着儿子慢慢成长，这个家庭竟面临儿子吸毒这一残酷现实，一个不算复杂的故事就围绕着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展开。大卫几进几出戒毒所，最后总算决心戒毒了，但他身心饱受摧残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不过他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，前途是光明的。读者虽然仍心怀不安，但都盼他戒毒成功。

本书不以跌宕起伏的情节或曲折离奇的故事取胜，而是以母亲对儿子的亲情为切入点，把故事逐步展开，推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，字里行间蕴含着“救救孩子”的强烈呼吁。

首先是向世上之为人父母者呼吁。作者以兰恩和西蒙的处境为例，向青年男女传达了“我”的体会和泣血的感受——要慎重地对待结婚生子这一人生大事，结婚前要从思想、物质等各个方面为负起养育孩子这一社会责任做好充分的准备。父母的呵护，物质上的保障，对孩子的成长固然重要，但家庭生活是否和睦与父母的一言一行，都对孩子的行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一个成长于和睦温馨的家庭、并能得到足够精神慰藉的孩子，不会去上白色恶魔的当。

第二是向学校呼吁。学校是孩子们接受教育并赖以成长的

主要园地。教育孩子远离白色恶魔，这是师长的责任，但是对于不幸沾上毒品的孩子，更重要的是要对他们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向他们伸出友善之手，不可歧视他们，而要使他们回到同学们中间，以免他们远离社会，堕落下去。

第三是向社会各界，特别是当政者呼吁。作者通过书中人物汤姆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呐喊。汤姆的儿子因为吸毒而死，汤姆亲眼见到儿子坠入的深渊——那是一个充满肉体折磨、心理摧残、灵魂堕落、亲情泯灭的黑暗世界。汤姆忍着丧子之痛，向国会议员们呼吁，向教育部门呼吁，向当政者呼吁，请求严厉查禁毒品。他要求媒体向社会揭露毒品的危害，并大声疾呼：毒品不除，家将不家，国将不国。汤姆义正词严地申斥了那些毒品贩子，他的大段讲话浓缩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：毒品对于社会和人类是洪水猛兽，国际社会要形成合力消灭这个毒瘤。

克尔丝女士这本书的中译本于世界戒毒日之际在中国出版，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中国不能忘记鸦片战争的历史。今天我们仍深深缅怀林则徐的伟大功勋，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禁毒英雄。当今黑色的烟膏被白色的粉末取而代之，我们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，那就是拒绝白色恶魔，让人们远离毒品。我们要动员社会舆论推动禁毒，净化我们的社会，让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，并愿全世界都奋起投入伟大而艰巨的禁毒斗争！

王福曾，2001年4月，写于窗外春光明媚之时